

闽北掌故

武潭芝双剑
夷阳城溪津
杭昭湛熊南春沧古岁钩
川船卢城浦秋桑韵月沉
忆拾逸漫梦
旧萃史话笔

福建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卢　和
装帧设计　池民海

ISBN 7-211-03889-6

9 787211 038893 >

ISBN 7-211-03889-6
K·313　定价:19.70元

K295.7
F121

闽北掌故

方彦寿　徐贯行　主编

等徐圖書館藏書

主要撰稿人

（以撰稿数量为序）

方彦寿　徐贯行　潘渭水　方留章
傅唤民　蒋　仁　熊源泉　刘光舟
俞景明　冯顺志　徐学仁　高中良

A1004694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闽北掌故/方彦寿，徐贯行主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12

ISBN 7-211-03889-6

Ⅰ.闽…　Ⅱ.①方…②徐…　Ⅲ.掌故—福建省

Ⅳ.K295.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11779号

闽北掌故

MINBEI ZHANGGU

方彦寿　徐贯行　主编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东水路76号　邮编：350001）

福州屏山印刷厂印刷

（福州铜盘路278号　邮编：350003）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11.5印张　4插页　266千字

2001年12月第1版

200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7—211—03889—6

K·313　定价：19.7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游定夫书院（南平市）

/方卉春 摄



谟武文苑前大厅（顺昌县）

/刘亦农 摄





光孝寺（建瓯市）



万木林（建瓯市）



考亭书院（建阳市）方卉春 摄



◆ 武夷精舍（武夷山市）



◆ 古甘居（武夷山市）

/方卉春 摄



◆ 千岩竞秀（武夷山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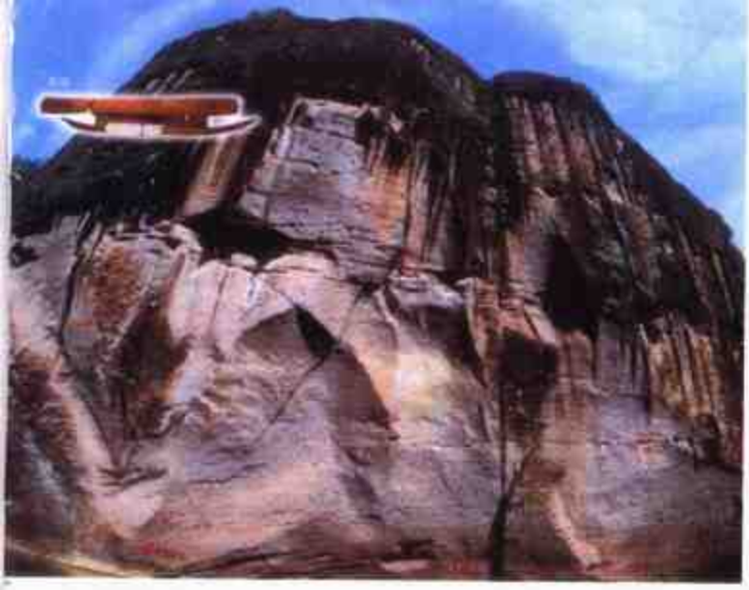
◆ 朱熹纪念馆（武夷山市）

/方卉春 摄

◆ 朱熹纪念馆内正厅的朱熹及其门人铜像（武夷山市）







架壑船棺（武夷山市）



理学徽记“道南理窟”（武夷山市）



黄巢寨（浦城县）/李虹 摄



练氏夫人铜像（建瓯市）



供四平戏演出的英节庙古戏台（政和县）/宋德华 摄



洞宫山九孔岩（政和县）/宋德华 摄



◆ 湛卢山全景（松溪县）



◆ 渭田五福桥（松溪县）



◆ 李忠定公祠（邵武市）



◆ 越王台（邵武市）

◆ 乌君山（光泽县）/邓京士 摄

◆ 沧浪阁（邵武市）





序

马照南

方彦寿、徐贯行同志主编的《闽北掌故》，把见诸于闽北地方史志或流传于民间的人物事迹、逸闻趣事、故事传说加以收集整理，汇集成册，形象生动地向人们介绍闽北的悠久历史和多彩文化。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闽北历史悠久，文化掌故多。从石器时期开始，古闽人就在这块富饶美丽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创造文明。从光泽印纹陶、武夷悬棺、建瓯甬钟，到规模宏大被誉为“江南第一城”的闽越王城，展示了闽北先人荜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创业历程和绚丽文化的发展图景。唐宋以降，随着中原经济文化重心南移，闽北文化发展进入鼎盛阶段。李纲、柳永、杨亿、朱熹、袁枢、杨荣等名人辈出，灿若星河。闽北茶文化、雕版印刷文化、陶瓷文化、理学文化都有长足发展，并以其鲜明的独创性在福建乃至全国居领先地位。尤其是朱子学，影响尤为深广。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闽北的这方热土上，逐渐产生了众多掌故，或见于典章史籍，或广泛流传于民间。闽北掌故无疑是闽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观《闽北掌故》，我想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

翔实。参与掌故搜集编写的多是长期从事地方史志文化工作的同志，对一方水土一方历史有较全面深刻的了解和把握。掌故多采自史书、笔记、家谱、碑刻、遗迹，以及考古成果，且做了许多去伪存真的筛选、求正功夫，保证了内容的正确性。

丰富。此书以广阔的闽北为地域空间，纵横捭阖，广集博采。所收掌故涉及历史地理、名胜古迹、民俗风情、名人轶事、社会琐闻、艺文著述、地方风物，方方面面，一应俱全。

精炼。书中所收集的掌故，经过作者去粗取精的制作功夫，在依据有关史料的基础上加工提炼，短小精悍，从一定意义上反映闽北历史概貌。如果说历史是一部鸿篇巨著，许多掌故则是这部巨著中的精彩片断和点睛之笔；如果说历史是一条奔腾汹涌的长河，许多掌故则是长河飞溅的朵朵浪花。赏析精彩片断和飞溅浪花，往往有窥一斑而见全豹之效。

有趣。生动有趣，具有可读性，便于流传，是许多闽北掌故的共同特点。比如神剑化龙、梦笔生花、程门立雪等故事，都以人物或事件为中心，展示其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有情节，有细节，读之有趣。

由于历史的原因，相当一个时期闽北文化疏于整理和研究。这些年出版市县志和一些书籍，弥补了许多不足。《闽北掌故》的出版又为闽北文化研究和普及增添了奇葩。相信这本书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闽北，认识闽北，激发建设闽北的热情，而且有助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增进文化交流，促进以武夷山为龙头的闽北文化旅游业的发展。

2000 年 2 月于福州小柳

编写说明

本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约请方彦寿、徐贯行二先生起草、拟定章节框架，并联络闽北各县市撰稿人分工撰写，其后由方、徐二人承担了统稿工作。

全书编写工作分工如下：

《剑津钩沉》主要由刘光舟先生撰稿；

《双溪岁月》主要由高中良、方彦寿、徐贯行先生撰稿；

《芝城古韵》主要由潘渭水先生撰稿；

《潭阳沧桑》主要由方彦寿、徐贯行先生撰稿；

《武夷春秋》主要由方留章、方彦寿、徐学仁先生撰稿；

《南浦梦笔》主要由蒋仁、方彦寿先生撰稿；

《熊城漫话》主要由熊源泉先生撰稿；

《湛卢逸史》主要由冯顺志、吴声洪先生撰稿；

《昭阳拾萃》主要由傅唤民先生撰稿；

《杭川忆旧》主要由俞景明、王建成先生撰稿。

由于南平市所辖10县市过去分别隶属延平府（南剑州）、建宁府（建州）和邵武府（邵武军）管辖，故全书按延、建、邵三府州顺序排列，并将本书定名为《闽北掌故》。

福建省社科联副主席马照南先生拨冗为本书作序，在此谨致以诚挚的谢意，并向本书责编卢和先生辛勤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1年2月

目　录

剑津钩沉

平定南疆置南平 …… (3)
“神剑化龙”与“剑合延津” …… (4)
崇蛇·游蛇神·舞蛇灯 …… (5)
“刊山开道七百里”在何处 …… (8)
国宝郑和铜钟始末 …… (9)
南平双塔与“火”字两点 …… (10)
闽北第一楼 …… (11)
空海入唐过闽北 …… (13)
剑浦诗人陈陶 …… (14)
黄裳愧吟《采葵行》 …… (15)
延平四贤 …… (17)
轿夫歌谣贯似道 …… (19)
隆武皇帝在延平 …… (20)
县令逃命装裁缝 …… (21)
袁知事修建中山路 …… (23)

双溪岁月

富屯溪畔说顺昌 …… (27)
仙源胜境华阳山 …… (29)
黄岩寺前“千年不朽木” …… (32)

谟武村人敬先贤 …… (34)
洋口“特种区”归属记趣 …… (36)
刚直廖刚忤权奸 …… (37)
百年两刻《高峰集》 …… (39)
廖氏世彩堂与“指鹿为马” …… (40)
少年英才出顺昌 …… (42)
藏书家的教子诗 …… (43)
廖德明从学四书院 …… (45)
马性鲁革毁寺庙 …… (46)

芝城古韵

郡县州府古建安 …… (51)
建瓯城缘何称“芝城” …… (52)
西周青铜二甬钟 …… (53)
雄镇南天话鼓楼 …… (55)
建瓯孔庙 …… (56)
千年古刹光孝寺 …… (57)
一城三庙学，八门九关公 …… (58)
沧桑巨变紫霞洲 …… (60)
环溪精舍与画卦洲 …… (61)
艮泉井与朱子家酒 …… (63)
徽国朱文公祠 …… (64)
建瓯博士府 …… (65)
朱熹“对镜写真”石刻板 …… (67)
“小武夷”归宗岩 …… (68)
古树参天万木林 …… (69)
端午“舟歌”是古傩 …… (70)
“挑幡”绝技展风采 …… (72)

"三山"、"六水"、"七座桥" …… (73)
独具风味的建瓯弓鱼 …… (75)
梨岳庙与《梨岳集》 …… (76)
福建现存最早的茶书 …… (77)
古音韵训诂学家吴棫 …… (79)
历史学家袁枢 …… (80)
四朝元老杨荣 …… (82)
杨荣题诗济寒士 …… (85)
建瓯图书馆创始人谢源 …… (86)
"三一八"烈士刘藻彝 …… (88)

潭阳沧桑

潭阳古邑话沿革 …… (93)
大潭山上曾筑城 …… (95)
东周青铜剑、矛与西周青铜斧 …… (97)
兔毫碗盏话建窑 …… (98)
"琅嬛福地"与"图书之府" …… (99)
巍然屹立书林门 …… (102)
"书林门"与"积墨池" …… (104)
白塔山上漫流连 …… (106)
灵泉不涸说庵山 …… (107)
拿坑小村十三桥 …… (108)
云谷路口"钦差庙" …… (109)
"千柱落地"与"一夜巷" …… (111)
街坪"剥皮亭" …… (112)
《长坂坡》欢迎太平军 …… (114)
乡间最爱"采茶灯" …… (115)
暨南大学驻文庙 …… (116)

“高照”彩灯甲四方 …… (118)
江为的绝命诗 …… (120)
“吾道南矣”与“程门立雪” …… (121)
“考亭书院”与“南闽阙里” …… (123)
朱熹悔作广告诗 …… (125)
“风飘罗带”与“龙归后塘” …… (127)
蔡氏九儒美名扬 …… (128)
七贤过化之乡 …… (130)
宋慈和《洗冤集录》 …… (133)
昌茂山中“访”宋慈 …… (134)
江湖诗人宰建溪 …… (135)
谢枋得桥亭卜卦 …… (137)
“南渡四大家”与建本 …… (140)
建本《史记》的故事 …… (142)
版权文告此为最 …… (144)
麻沙本《王右丞文集》 …… (145)
“四大奇书”的建阳刻本 …… (146)
熊氏医书传东瀛 …… (148)
健笔纵横写英雄 …… (150)

武夷春秋

人杰地灵武夷山 …… (155)
走向世界的武夷山 …… (156)
秦砖汉瓦古王城 …… (158)
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 (160)
众说纷纭话武夷 …… (162)
“三三六六”甲东南 …… (165)
武夷山架壑船棺 …… (166)

绝壁遗存古崖居…… (168)
清献渠与吏隐亭…… (170)
朱熹纪念馆…… (172)
朱子故居紫阳楼…… (174)
摩崖石刻“道南理窟” …… (175)
武夷茶的魅力…… (177)
老外杰作《武夷图》 …… (178)
武夷最早的隐士顾野王…… (180)
高僧扣冰与武夷佛教…… (181)
李商隐首开武夷诗风…… (183)
福建最早的词集…… (185)
李纲梦游武夷…… (186)
理学先驱者的武夷情…… (188)
爱国诗人刘子翚…… (190)
陆游提举冲佑观…… (192)
辛弃疾四主冲佑观…… (194)
飘逸如仙白玉蟾…… (196)
翁合上书驱奸邪…… (198)
武夷昆仲二诗人…… (199)
戚继光勒石武夷山…… (201)
曹学佺月夜泛舟九曲…… (203)
桐城武夷文脉相连…… (204)

南浦梦笔

话说“福建北大门” …… (209)
余善筑城拒汉…… (211)
九牧流芳折桂岭…… (214)
“黄巢寨”内屯兵马 …… (215)

闽北相思鸟…… (215)
浦城是肉燕的发祥地…… (217)
浦城特产桂花茶…… (218)
贺齐与汉兴之战…… (219)
江淹与梦笔生花…… (220)
练雋大义救芝城…… (222)
浦城“八宰相”…… (224)
章惇、胡寅险遭弼杀…… (227)
真德秀树廉诚邑宰…… (228)
葛寅亮隐居岩顶山…… (230)
才思敏捷的外交家潘赐…… (231)
郑芝龙弃守仙霞关…… (232)
李光地题名万寿桥…… (233)
梁章钜及其北东园…… (234)
“留香书室”留书香 …… (235)
悠悠古琴伴书香…… (236)
崔世孔寻父蒙冤…… (238)

熊城漫话

政和建县一千年…… (243)
“琅嬛福地”洞宫山 …… (245)
花桥——古代建筑的瑰宝…… (247)
铁坑殿——临水第三宫…… (249)
独具特色的东平“跑龙”…… (251)
千古绝唱四平腔…… (254)
别具风味的“新娘茶”…… (256)
颜真卿后裔定居赤溪…… (258)
“三诏先生”陈朝老 …… (260)

黄华起义与“头陀军” …… (262)
叶宗留竭竿锦屏银矿 …… (264)
宋人杰与“构候笔” …… (267)

湛卢逸史

分合析置话松溪 …… (271)
天下第一剑——湛卢 …… (272)
欧冶子铸剑传说 …… (273)
湛卢三峰十六景 …… (275)
白马山上“雄狮”吼 …… (277)
中峰山与留洋寺 …… (278)
福建最早的纪年墓葬 …… (280)
巨型圣旨绣幅 …… (281)
郑墘万前百年蔗 …… (282)
闽北现存最长的厝桥 …… (283)
松溪的“挑茶担” …… (284)
松溪方言话剧 …… (286)
湛卢书院与朱熹 …… (287)
杨缨与杨氏书室 …… (289)
明末重臣魏浚 …… (291)
抗倭义士张德 …… (293)

昭阳拾萃

斗转星移话铁城 …… (297)
宝严寺大殿 …… (299)
李忠定公祠 …… (301)
朱熹题写“鸢飞鱼跃” …… (302)
严羽与钓鱼台、诗话楼、沧浪阁 …… (303)
南宋黄涣“重见天日” …… (306)

聚奎塔与袁崇焕……（307）
源远流长的傩舞……（308）
黄峭后裔满天下……（310）
“上寺倒了金刚，下寺出了李纲”……（312）
惠应祠李纲祈梦……（313）
“油米石”的传说……（314）
望江狮子……（315）
邵武端午龙舟竞渡……（316）
“闽酒当以此为第一”……（318）
锁着轿门的花轿……（320）
江氏山庄的来历……（321）
白渚桥的来历……（323）
黄伯思与《法帖刊误》……（325）
秋声亭与《秋声集》……（326）

杭川忆旧

光泽县建置沿革……（331）
九关十三隘话光泽……（332）
奇峰怪石乌君山……（335）
茅店宋窑遗址……（336）
汉畲同邑，婚俗迥异……（337）
光泽擂茶……（339）
光泽灯舞多姿多彩……（340）
理学世家“李氏七贤”……（343）
方志学家高澍然……（346）
连捷七年三太史……（347）
何秋涛和《朔方备乘》……（349）
一家三位女诗人……（351）

剑津钩沉



九峰山“四贤堂”（南平市）

平定南疆置南平

南平地处全闽之中，控三江而带两溪，噤喉水陆，为上游之枢纽，闽北第一都会。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素有“铜南平”之称。

南平在汉代为闽越国，也称山越。居民为百越族之遗裔，多散居于山间。

南平地势不平，为何称南平？

据《三国志吴书》和《南平县志》载，汉献帝时，会稽太守王朗投奔东冶（福州）侯官长商升，商升为王朗起兵反叛。吴主孙权的哥哥孙策，遣永宁（温州）长韩晏领南部都尉，讨伐商升。韩晏被商升打败。孙策又遣贺齐（字公苗，会稽山阴人），代韩晏领都尉事。商升怕贺齐的威力，遣使乞盟，送上印绶，出舍求降。贼帅张雅、詹疆等不愿商升求降，杀了商升。贺齐进伐，大破张雅和詹疆，张、詹率众出降。侯官既平，南疆平定，故称南平。于东汉建安元年（196）分侯官之北置南平县，成为福建历史上最早建立的五县之一，此五县即侯官（福州），建安（建瓯），汉兴（浦城），建平（建阳），南平。四县久已易名，唯独南平沿用汉名至今。

晋代改南平为延平。刘宋明帝时撤延平县，归属建安郡（建瓯）。唐为延平军。五代为延平镇，继为永平镇，又改为龙津县，置镡州属闽国，开运二年（945）改为剑浦。元大德六年（1302），改剑浦复称南平。自宋起为南剑州、延平府所在地，直至明、清、民国。1956年，南平县升为南平市。1995年，南平市升为省辖市，是闽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刘光舟）

“神剑化龙”与“剑合延津”

南平别称很多，有剑津、剑州、剑潭、剑浦、龙津等，这是人们所熟悉的。这些美称为何总离不了“剑”与“龙”呢？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据《东周列国志》载，春秋末，吴王使干将铸剑，铁汁久久不下，干将知欧冶子炼剑曾遇同样困难，后以女人配炉神，炉乃出铁。干将之妻莫邪受丈夫示意，乃断发剪爪，投入炉中，果得雌雄二剑，雄曰“干将”，雌曰“莫邪”。其后吴王知干将匿剑，使人往取，如不得剑，即当杀之。干将取剑出观，其剑自匣中跃出，化为青龙，干将乘之，升天而去。使者还报，吴王叹息，自此宝剑不知下落。

六百余年之后，在晋朝惠帝时，有一位丞相叫张华，他学业优博，泛览群书，能识灾祥异物。有一天晚上，星空灿烂，夜色似水，张华登楼仰望，见牛斗之间有紫气，感到奇异，听说豫章人雷焕妙达象纬，召而问之。雷焕说：“此宝剑之精，在豫章丰城。”张华为寻得宝剑，派遣雷焕为丰城县令，雷焕当即赴丰城上任。有一次，县衙修建监狱，在挖屋基时，发现一个石函，长逾六尺，宽三尺，开函视之，内有双剑，以南昌西山之土拭之，光芒四发。雷焕以一剑送张华，留一剑自佩之。张华收到剑喜出望外，详观剑文，乃“干将”也，尚有“莫邪”为何不至？张华心想神物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总有一日要会合的。

不久，张华被害，宝剑不知下落。后来，雷焕亡故。其子雷华宦游闽中，乘船从建溪南下，舟过惊涛骇浪的黯淡滩，顺水驶

进延平津（今南平），旭日东升，霞光轻照，延平水泛滚着万斛明珠，别开生面。舟上看山，千峰秀丽。雷华为青山碧水所吸引，佩着“莫邪”宝剑立在舟头，正望得出神时，宝剑突然从雷华腰间跃出，坠入水中。雷华急命船夫停桨潜入江中，惟见两龙张鬣相向，五色炳耀，船夫恐惧而退。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神剑化龙”和“剑合延津”的传说。

后人有《龙津春浪》诗云：

紫气高腾贯斗牛，寰中神物岂长留。
昔人并鹤来金阙，此地双龙卧碧流。
浊浪排空春浩浩，神光拔地夜悠悠。
何当探取津中物，环佩乘风上帝州。

1995年，在南平三江合流处建了一座“双剑化龙”的大型雕塑，成了城市的标志。

（刘光舟）

崇蛇·游蛇神·舞蛇灯

早在4000年前，闽越族人就在福建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云：“闽，东越，蛇种也。故字从虫门声。”闽越人以蛇为部族图腾，其崇蛇的习俗，虽然历经中原文化和中原汉人进入福建的漫长历史发展进程，却依然在闽北长期传承下来，成为我们探究上古闽越文化的“活化石”。

闽北山清水秀，处处呈现出如诗如画的风光。许多山村里，古老的崇蛇习俗代代沿袭。在那里，人们将蛇称为“小龙”，不但不许打蛇，而且对蛇有一种神秘的崇敬。如果在山野或田间遇到蛇，

人们会自动为蛇“让路”，待蛇穿入草丛或洞穴后人才前行。要是在家中发现有蛇盘在厅堂、房间的地上或床铺上，就会被认为是吉兆，是预示这个家庭将会有好运气到来，此时家里人要赶紧用红布将蛇覆盖住，让它自然“消失”或以新扫帚扫入谷斗，虔诚地将“小龙”请出家门。

在南平市闽江边的樟湖坂古镇，每年农历七月初七，都要举行盛大的祭蛇和游蛇神活动，是古闽越族人蛇图腾崇祀在民俗文化中的典型遗存。

七月初七早晨，樟湖镇上的男子便聚集在古老的蛇王庙前。到了规定的时间，放起声响震天的土炮，敲起气氛热烈的锣鼓。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从庙里抬出蛇王菩萨。这时，参加游神的男子每人颈上挂着或手上握着一条几天前捕来的活蛇，浩浩荡荡的游蛇队伍开始出游。走在前面的是肩扛太极方旌、手持大锣的开道者，他们一路走一路敲着大锣。紧跟着的是两排少年高举太极图大彩旗，接着抬的是蛇神的“总管”连公菩萨，再接着是崇祀物的象征体“蛇王”——人们抬着一座青枝绿叶扎起的蛇龛，里面盘着一条为准备游蛇神而捕来的最大的蛇。蛇王之后抬着的是头戴桂冠、身穿绿袍、面目慈祥的蛇王菩萨。菩萨身后紧跟着游蛇的队伍，只见一条条活生生的金环蛇、青竹蛇、大蟒蛇等，或缠绕在人身上，或盘在人头顶，或紧箍在人手臂。那圆圆扁扁的蛇头，有的竖起、有的潜下、有的游来游去，形态万状。长长的游蛇队伍后面，有两少年手托木盘，盘里放着金色的酒壶和酒盅，用以敬蛇。少年之后两路人提着各种色彩的蛇灯，抬着一座彩纸扎糊的大庙，庙门前供桌上放置许多祭品。后面有一位舞蛇者，一路拖着剖开的长长的竹片。这之后便是一群戴枷如古代囚犯的镇民。据说镇上的人非常乐意戴枷作为蛇的罪人参加游行，游过后蛇神会保佑他们水陆平安。最后是举着各种古代兵器的仪仗队伍

和抬着的一尊红袍黑脸菩萨，是殿后的判官。游蛇队伍遍游镇上街道，家家门户大开，妇女、儿童和老人在家门口举着香火向蛇神顶礼揖拜。逢叉路口，队伍中就放响土炮。到街中心，要进行舞蛇表演。长长的队伍，无数的彩旗，喧天的锣鼓以及许多支民乐队演奏着动听的古乐，樟湖古镇犹如欢度盛大的节日一样。直至中午，游蛇队伍才回到蛇王庙前，将菩萨请上宝座，把活蛇王放于案台中央，接受镇民三叩九拜。这些祭蛇仪式完成之后，人们便将手中的活蛇送往闽江边放生，整个游蛇神活动才告结束。

在闽北，对于蛇崇拜的欢乐的民俗文化活动，还有“舞蛇灯”。每年春节至元宵期间，南平市樟湖坂镇、建阳市黄坑镇以及邵武、光泽等县市的部分乡村，都有“舞蛇灯”的习俗。

蛇灯也有称作“板凳灯”、“烛桥”或“游龙”的，其实不是举在手中“舞”而是扛在肩上“走”的，由村庄里每户出一板灯，板用杉木做成，形如长板凳，板的下面正中装有一根可供扛时抓手的木棍，板上面装置着统一高度裱糊极为精致的花灯三盏，板的两头凿有圆洞，供与其他板灯捆接之用。舞灯前，各户的男子将自家制作好的板灯扛到指定地点集中，以棕绳将板灯一板与一板捆扎连接好（也有以木栓插入圆洞连接的）。村庄小的板灯有七八十板，大乡镇的板灯有数百板，接起来有一二华里长。舞灯开始，舞灯人将板灯扛在肩上，由蛇头（近年来已改为龙头）引领，在阵阵土铳声和鞭炮声中走出各种阵式，它有时笔直行走，有时蜿蜒而行，有时盘桓，有时疾驰……那“长蛇阵”犹如长长的火龙腾跃在节日的夜空，景象实在壮观！中央电视台曾将樟湖坂与黄坑镇的“舞蛇灯”实况录像向全国播映，展现了闽越古文化民俗活动的灿烂。

（徐贯行）

“刊山开道七百里”在何处

唐乾符年间（874—879），黄巢农民起义大军入闽，史称其“刊山开道七百里”。究竟所开的是哪条道呢？

起义大军是分二路入闽的，一路从浦城的仙霞岭，经水吉，直趋建州（建瓯），到南剑州（南平）。这一条是古道，无需刊山开道。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开辟有通往闽中郡的官道，史称五尺道。刘宋元徽四年（476），南朝著名文人江淹为吴兴（浦城）令，在吴兴北部重镇仙阳留有《仙阳亭》诗一首：“揽胜访亭候，兹地乃闽城。万古通汉使，千载连吴兴……”可见从汉代到南北朝，浦城早有出入福建的古道。唐贞元二十年（804），日本空海大师一行入唐学法，从福州赴帝都长安（陕西西安），走的也是这条古道。

黄巢大军入闽刊山开道七百里，指的并非这条路，而是另一条路，即从江西入闽。据南平县志《大事志》载：乾符二年（875）曹州人黄巢“倡乱”，势如破竹。五年，破虔、吉、饶、信等州。因刊山开道七百里，直趋建州崇安，镇将邓光布率兵御之，中流矢死。而沙县被屠戮。巢顺流而下，过延平，遇风雷雨鹫。说明“刊山开道七百里”指的是从江西的信州（上饶）入崇安，经建阳、顺昌、绕沙县，到南平这条路。黄巢占领南平后，从南平顺闽江而下，攻克福州。

（刘光舟）

国宝郑和铜钟始末

国家一级文物郑和铜钟于1981年在南平发现，震撼了文物界，郑和铜钟为何会在南平出现？

郑和（1371—1435），明朝航海家。本姓马，小字三保，昆阳（今云南晋宁）人，回族，其祖、父均曾至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圣。他于明初入宫为宦官，侍奉燕王府，从燕王起兵靖难有功，赐姓郑，擢内官监太监，称三保太监。谋与四邻通好，以广交流，前后七次奉使西洋，历时28年。先后到达东南亚、印度半岛、阿拉伯、东非等三十余国，促进了中国与各国间的经济、文化的交流。

明宣德六年（1431）元月，郑和受明宣宗之命，第七次下西洋。船队由南京下关出发，驶抵福建长乐城，等候冬季的东北季风。时郑和年过六旬，回忆历次下西洋的惊涛骇浪以及与海盗作斗争的情景，虽然都安然凯旋，但如今已届高龄，不免心有余悸。因此欲铸一铜钟，祈求保佑“开洋成功”。在何处铸钟呢？从原材料、燃料、技术、交通等几方面考虑，“铜南平”当属首选之地。据明《八闽通志·食货志》载，延平府的南平、尤溪、沙县、将乐四县俱出铜、铁、银，并有丰富的冶炼燃料——木炭，面且交通方便，水运可以从南平直通长乐。5月，郑和等顺闽江北上，在南平铸造了一口铜钟。

1981年，南平地区物资局局长张茂贵先生到南平市物资局检查工作，在仓库发现作为废铜收购来的一口造型精美、工艺精湛的铜钟。钟高69厘米，钮高14厘米，通高83厘米，口径49厘

米，厚2厘米，重77公斤。钟体上部刻有“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字样。钟体下部刻一周楷书铭文，文为：“永远长生供养，祈保西洋往返平安吉祥如意者，大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夏吉日，太监郑和、王景弘等同官军人等，发心铸造铜钟一口。”经鉴定，铜钟为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前所铸。

铜钟铸就后为何会留在南平呢？在铜钟的原存放地，离城三十余华里，海拔千米的茂地镇依朝村，当地的老人说，此钟早年悬挂于雪山寺，明初该寺毁于火，被移至华光庙，已有一百余年了。迄今依朝村仍流传着铜钟的故事。

1983年，郑和铜钟从南平护送到北京参加全国精选文物展览。后经国务院批准，铜钟由中国历史博物院珍藏。南京博物馆复制三口，南平市博物馆陈列的为复制品。

（刘光舟）

南平双塔与“火”字两点

南平三溪合流处有两座塔，一在水南九龙岩巅；一在水东鲤鱼山上。双塔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三月，竣工于三十五年（1607）六月。东塔高九丈，南塔高七丈，均七层八角，实心青石结构，有浮雕佛像、龙、鹿、花、鸟。塔顶每角原系有铜铃，迎风作响。双塔均刻有“民财永阜”、“文运遐昌”八个大字，书法方正苍劲。

古人为何建双塔？明朝宰相叶向高写的《双塔记》讲了建塔的缘由，记文说：“郡前东西溪，交流直射，风气涣散，人文厄塞，职此之故，宜建一浮图于龙山之巅，收东溪之水；又建一浮图于

化剑阁之前，以收西溪之水；两水汇合，环绕郡治，于形胜大壮，当有兴者。”可惜，古塔的灵光并没有给南平带来形胜大壮，也未有兴者，几百年来百姓仍然遭受种种天灾人祸。

南平自古有火城之说。有这样一段故事：南平三溪汇成“人”字水，自明代建了双塔，“人”字加了二点，成了“火”字，取火旺之意，如火如荼，蓬勃发展。但恐火旺过剩，招致火灾，便在塔旁埋下水缸，以防起火。不管人们对火有多少祝愿，市民常受火灾之苦却史不绝书。据《南平县志》的《灾祥志》载，明清二代，城内发生重大火灾达95起之多。

解放后，塔下建了闽江铁路大桥，横跨东南，“火”字上方加了一横，成了“灭”字，希望有灭火之功。由于南平地势不平，住家多为木屋，依山而筑，火灾仍然屡屡发生。不幸之中又有幸，木屋烧了，现在建起了造型新颖的混凝土高楼，千年古城增添了新姿。

叶宰相的祝愿，经历了四百多个春秋，到20世纪末才呈现“民财永阜”、“文运遐昌”的情景。郭沫若《咏南平》诗，赞叹“今见万家荣”。今天，南平的兴旺之火，如火树银花，闽江源头的双塔，像巨笔抒写日月星辰的光辉，在抒写山城的吉祥和繁荣。双塔成了南平古邑的一个景观，也是南平的城标之一。

（刘光舟）

闽北第一楼

在南平悬索桥左侧，旧有一座称为“闽北第一楼”的乐群社，面山临水，风光宜人。年纪稍大的人对此楼还有印象。

乐群社的全称叫“南平基督教乐群社”，是美国卫理公会外洋布道会筹建的，由福州基督教协和建筑部承包工程，所需的建筑材料，如水泥、玻璃、白铁皮都由香港购进，当时福建还不能生产这些建筑材料。

乐群社始建于民国十四年（1925），耗时三年，费资墨西哥银圆四万元，占地1000平方米，仿苏州基督教乐群社的设计，中西合璧型五层楼房。虽然没有中国传统建筑的雕梁画栋，却有宫殿式的屋顶。内有礼堂两个，房屋三十余间。礼堂的地板是红木的，板下铺设厚厚的棕片，走动没有声音，又可防湿防潮，建造颇为考究。

乐群社首任总干事洪元盛牧师，并组织有董事会，邀请社会名流为董事长和董事，中小学教师、教徒多参加乐群社为社员。社内设有阅报室、台球室、乒乓球室、文化用品供应处、理发室等，不时还放映电影。

从北伐到抗日时期，乐群社是当时福建军政单位的政工大楼，高级军官的招待所，过境部队的军营、留守处。1931年租与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南平邮政局，长达15年之久。抗战胜利后乐群社恢复活动，开办公共卫生站、平民学校、幼儿园等。

在四五十年代，乐群社与南平城内破烂矮小的民居比，确有鹤立鸡群之势，在闽北确实也没有其他建筑物可以与其媲美的。但若与今日南平的高楼大厦比，又有鸡立鹤群之感了。可惜，1966年3月15日，“闽北第一楼”被大火烧毁，后来改建为名噪一时的中山商场。80年代，水口水电站建设，城区沿江一带淹没，在旧城改造中商场旧址开辟为今日的江滨公园。

（刘光舟）

空海入唐过闽北

空海大师是日本国平安朝前期的著名高僧、诗人、书法家。他生于公元774年（日本光仁天皇宝龟五年，唐代宗大历九年），圆寂于公元835年（承和二年，唐文宗太和九年），享年62岁。他是日本谳歧国多度郡弘田乡屏风浦人（香川县善通寺市），幼名真鱼，俗姓佐伯直，法号遍照金刚，敕赐谥号“弘法大师”。

空海入唐将中国新的佛法传回日本，创立了真言宗，在日本佛教史上统称为“平安佛教”，现为日本佛教的主流。

唐贞元二十年（804）七月，空海随日本第十六次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品（贺能）一行来中国帝都长安（西安）求法，原拟定在明州（宁波）上岸，七月正逢台风季节，因遭暴风雨，四艘船有两艘船遇难，空海乘坐的船在海上漂流了五十多天，后漂泊到东海福建的长溪县（今霞浦县）赤岸。十月三日，空海一行抵达福州。十一月三日，从福州出发，北上帝都长安。由陆路经侯官芋原驿、白沙驿、水口驿，再从水口经南平的仓峡、茶洋、剑浦、大横驿、建安县（建瓯）的太平驿、建阳的营头驿、浦城县的人和、柘浦、小关驿至浙江衢州府的江山县……空海赴长安之道最艰险和困难的是闽北境内几百里的路程。《南平县志·山川志》载：南平山脉，矗起高峰，亘数百里，层岩叠嶂，茂林密菁。从南平到浦城的仙霞岭，要经过许多险山恶水，作为外国人其艰难可想而知。空海一行23人走过数以百计的村寨，与当地的百姓有广泛的接触，武夷文化必然对空海产生影响，现在日本诸多民俗与闽北相近，如用木制饭甑、木竹制作的漆器用具、木屐、扁担、草鞋，

以及赤脚、蛇崇拜、七月十五中元节、赛龙舟等等，都是闽北人自古以来流传迄今的民俗文化。空海传播中国的文化，自然有闽北文化的成分。

日本以茶道为代表的茶文化，是通过中日两国僧人交流，从中国带进日本的。中国是世界饮茶的发源地，闽北又是中国茶的主要产区，而且自古出贡茶。欧阳修诗曰："建安三千五百里，京师二月尝新茶。"闽北的擂茶、茶艺与日本的茶道十分相似，空海亲临茶的故乡，品尝了闽北的擂茶，对日本的茶道文化的影响也是可以肯定的。

空海一行过闽北，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到达长安，全程5033里，历时49天。

（刘光舟）

剑浦诗人陈陶

凡曾熟读《唐诗三百首》的人，都知道其中有一首脍炙人口的《陇西行》：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这首诗的作者就是剑浦（今南平）诗人陈陶。

陈陶，字嵩伯。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游学长安。因屡试不第，功名利禄之心渐趋淡薄，开始云游名山大川，寄情于绿水青山之间，晚年时隐居于洪州（今南昌）西山。写诗之外，对佛学、道教也颇有研究，并兼通天文历象之学，故自号"三教布衣"。其诗作，早期以表现渴望建功立业的志向和雄心为主；中期

以描写山川胜景、闽北风物居多；晚年则以表现隐居生活，或表达神仙难觅、人生如寄的慨叹为主调。陈陶的著作有《癖书》十卷、《陈嵩伯文录》十卷，均已散佚无存。后人辑有《陈嵩伯诗集》一卷，今存《唐诗百名家集》本。

《陇西行》是陈陶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作，也是唐代福建籍诗人作品中惟一被选入《唐诗三百首》的诗作，他也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地位。

《陇西行》是一首描写唐代边塞战争的力作，反映了唐代长期的边塞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和灾难。前两句以高度概括和精炼的语言，正面描写了唐朝军队奋不顾身、英勇杀敌的激战场面，五千将士因此全部壮烈牺牲，血洒疆场，丧身“胡尘”。接下来的两句，作者一反常态，既不正面描写战争所造成的巨大不幸，也不借此着力渲染其家人的痛苦和悲伤，而是匠心独运地将笔触伸向闺中少妇，描写她们毫不知晓征夫已逝，犹在做着能与他们早日相聚的团圆之“梦”；而此时，他们的丈夫却早已化作了无定河边无人掩埋的累累白骨。一种撕心裂肺的巨大冲击力就这样在表面的不动声色的对比中引发，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最后两句诗也由此成为传诵千古的名句。

（方彦寿）

黄裳愧吟《采蕨行》

黄裳（1044—1130），字冕仲，一字道夫，剑浦（今南平）人。北宋元丰五年（1082）进士第一。博学多才，精于礼经。政和年间（1111—1116），曾历官闽县令、福州知府，累迁端明殿学士、

礼部尚书。著有《演山集》六十卷，其诗文俱骨力坚劲，不为萎靡之音。性喜道家玄秘之书，自号“紫玄翁”，往往爱作尘外虚无之语。政和年间，在官福州知府时，曾主持刊刻我国第一部雕版印刷的道教总集《政和万寿道藏》，共五千四百八十一卷。

黄裳在任闽县令时，遇到荒年，县内饥民纷纷上山挖蕨以充饥。蕨是一种野生草本植物，生长在山野草地里，闽中山林中多有生长，而尤以闽北居多。其嫩叶可供食用，根茎可以制淀粉。若偶尔食用，其味尚可，若作为主食长期食之，则味苦涩难当。作为邑令，见到属下百姓纷纷以此充饥，黄裳心中深感愧疚和难过，特作《采蕨行》七言歌行一首，以明心志。诗云：

皇天养民山有蕨，蕨根有粉民争掘，
朝掘暮掘山欲崩，救死岂知筋力竭。
明朝重担向溪浒，濯彼清冷去泥土，
夫舂妇滤呼儿炊，饥腹虽充不胜苦。
棠阴诸公知不知，朝夕思餐浓与肥，
赈饥无策未足怪，胡忍剥我民膏脂。
嗟予忝为斯邑宰，致民多饥敢谁罪，
见尔奔波心甚惭，立马无言额生汗。
但愿皇天怜尔苦，五日一风十日雨，
雨顺风调五谷登，蕨根满山长不取。

此诗开头八句以质朴的语言，描述了饥民上山挖蕨、下河清洗，以及舂捣、滤粉、炊饼并以此充饥的全过程。以下将笔锋指向“棠阴诸公”，即作者的上司及僚属等一批手握大权的封建统治者，责问他们岂能再昧着良心巧取豪夺，搜括民脂民膏？同时作者对自己作为当地的父母官，“致民多饥”而束手无策也深感愧疚，并对此作了深刻的反省。最后作者希望上天庇护，今后能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百姓再也不要上山采蕨充饥，表现了作者对穷

苦百姓深切的同情和比较浓厚的民本主义思想。

（方彦寿）

延平四贤

杨时受学于二程之门，得其学术真传，一传罗从彦，再传李侗，三传朱熹，至朱熹而集诸儒之大成。故后人将四人合称延平四贤，或闽学四贤。

杨时（1053—1135），北宋学者，字中立，南剑州（今南平）将乐人，晚年隐居龟山，学者称龟山先生。

当时，南平教育兴盛，谓州学“独先于天下”。城里“五步一塾，十步一庠”。南剑学风对杨时影响很深，他于熙宁九年（1076）登进士第，闻知河南程颢、程颐讲孔孟绝学，就弃官不赴，往河南师事程颢。当杨时归闽时，程颢目送他说：“吾道南矣！”颢谢世后，杨时又于元祐八年（1093），与游酢一起到洛阳拜程颐为师，留下了“程门立雪”的千古佳话，世称“道南第一人”，东南学者奉为“程氏正宗”。

杨时在高宗时为工部侍郎，后以龙图阁直学士致仕，绍兴五年（1135）卒于将乐，终年83岁。

罗从彦（1075—1135），北宋学者，字仲素，南平东坑罗源村人。他毕生致力于理学研究，初从吴仪，后知同郡杨时得河南程氏学，决心求教。当时罗从彦已41岁，还背上书包，长途跋涉到浙江肖山，从学于杨时。听讲三日，惊得汗流浃背，说：“不至是，几虚过一生。”后尽得其秘传。朱熹说：“龟山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然潜思力行，任重诣及，惟仲素一人而已。”罗从彦

得杨时学后，在南平筑室山中，绝意仕进，以体验天地万物之理。从游者甚多，如李侗、朱松等皆出其门下。罗从彦、李侗常聚南平九峰山育德泉讲道，常饮此泉。罗从彦精于易经，取“蒙”卦“象”辞名之，谓山下流出泉水，犹如启蒙幼童，开始是潺潺细流，最后成为滔滔江河，滋生万物。因此，君子应当效法这一卦的精神，以果敢的行为，培育品德。于是取名育德泉。此泉迄今尚在。

绍兴二年，罗从彦61岁，才经朝廷特科授予广东惠州博罗主簿，64岁，卒于武平县学。又数年，门人李侗始为归葬南平罗源里，世称豫章先生，赐谥“文质”。代表作有《遵尧集》等。

李侗（1093—1163），南宋学者，字愿中，南平炉下乡樟林村人，学者称延平先生。他的祖父、父亲皆以儒学起家。李侗24岁时，始学于罗从彦，一心追求儒学真谛。从学数年后，尽得罗氏所传。后屏居山田，结茅水竹间，谢绝世故，一生不为官，专心致志于圣人绝学，体验四十余年。他主张“默坐澄心，以验夫喜怒哀乐未获得之前气象为如何”。李侗还以黄庭坚称赞周敦颐“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这句话作为座右铭，经常诵读，要求学生牢记心中，所以后人都以“静中气象”、“冰壶秋月”、“光风霁月”称颂李先生的品德。清朝康熙皇帝御赐给李氏家祠匾为“静中气象”，至今尚存。

李侗性拙朴，好静坐，不喜著书、作文，醇然有处士之风。李侗将河洛理学传给朱熹，形成了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隆兴元年（1163），李侗应福唐守汪应辰之邀，赴福唐讲学，不幸病逝于府治之馆，终年71岁，归葬南平炉下瓦口村，谥文靖。朱熹为撰行状，并辑语录为《延平答问》行世。

朱熹（1130—1200）南宋理学家，字元晦，号晦庵，别称紫阳，祖籍徽州婺源。生于南剑州尤溪县城毓秀峰下。以闽籍登绍兴十八年进士。朱熹就任同安主簿后不久，深感初师刘屏山、胡

籍溪未有所得，有进一步向贤人求教的必要。朱熹的父亲朱松是李侗的学友，生前曾告诉他李侗理学造诣很深，朱熹即遵从父志，于绍兴二十三年从同安徒步到南平，投学于李侗门下。当时朱熹方24岁，而李先生已经61岁了。从绍兴二十三年至隆兴元年李侗病卒为止，此间整整十年，朱熹先后六至南平，五访李先生。朱熹每至南平都住在李先生寓所旁边的西林寺，他题西林寺诗曰："触目风光不易裁，此间何似舞雩台？病躯若得长无事，春服成时岁一来。"

庆元六年（1200），朱熹病逝，终年71岁，诏谥"文"，追封信国公，改封徽国公。代表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楚辞集注》、《诗集传》等。

（刘光舟）

轿夫歌谑贾似道

贾似道（1213—1275），字师宪，台州（今浙江临海）人。南宋末权臣，理宗贾妃之弟。少时不务正业，以父荫补嘉兴司仓。其姐受宠于理宗，他有恃无恐，荒淫无度，贿赂公行，密向蒙古称臣输币议和，诬陷良臣，贬之远方。他不顾国家安危，斗蟋蟀、玩宝物，终日淫乐。襄阳危急，他隐匿不报。德祐元年（1275），出师至芜湖，大败于鲁港，逃入扬州。时任枢密院兼参知政事的陈宜中，以反贾似道面目出现，上疏劾贾似道误国之罪，贾乃被贬，放逐循州（今广东龙川西）。当派人监押时，会稽尉郑虎臣因父亲曾被贾似道陷害，故请行监押。

当时，贾似道寓住建宁（建瓯），随行的侍妾有数十人，一副

皇亲国戚的气势，乘坐的花轿富丽堂皇。郑虎臣令轿夫撤掉屏盖，暴晒于秋阳之中。并令轿夫唱杭州讽嘲贾似道的民歌，边走边唱，每人唱一首，贾似道敢怒不敢言，狼狈不堪。而后，郑虎臣又令撤去轿子，改乘木船。船至南剑州（今南平）黯淡滩，此滩系南平古八景之一，俗称“黯淡洪涛”，宋代刘子翬诗曰：“南来瓯粤无平陆，林峦起翠波浪绿。扶舆政恐犯霜露，买舟倘可休童仆。清滩白昼雷霆作，乱石惊湍犬牙错。平生珍重千金躯，舟子一篙哪可托。”在黯淡洪涛中，郑虎臣对贾似道说：“黯淡滩的水如此清，你为何不死于此呢？”贾似道傲慢地说：“太皇许我不死。”他仍以理宗皇帝的小舅子蔑视郑虎臣，可是已无反扑之力了。贾似道一行在延平住了一夜，沿着官道水陆兼行，至漳州木棉庵时，郑虎臣将贾似道拉入厕所杀之。而后，上疏弹劾贾似道误国之罪的丞相陈宜中得知贾似道被杀，恐连累自己，到福州捕郑虎臣杀于狱中。《南平县志·杂录传》载有此事。

（刘光斧）

隆武皇帝在延平

隆武帝朱聿键，1645－1646年在位，明太祖八世孙，第十九任皇帝，也是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中袭封唐王，于顺治二年（1645）为郑鸿逵、郑芝龙、苏观生、黄道周等拥立于福州，帝号建元隆武。

据《南平县志》载：“乙酉（1645）闰六月，明唐王聿键称号于福州，次年（1646）二月移驻延平。丙戌七月二十六日，王以兵部主事王士和知延平府。八月二十二日，清征南将军贝勒孛师

薄（迫）城下，士和死之，事在顺治三年。”志书详尽地记述了隆武帝驻跸延平的经过。

古谚云：“铜延平，铁邵武，福州豆腐府。”隆武帝详悉延平是重要的战略重镇，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上可进，后可退，若延平失守，福州无法抵抗清兵的南下。隆武帝移跸延平，图谋重振旗鼓，组织人马出师北伐，抗击清兵的南侵。

是时，朝廷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斗争十分激烈。主战派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黄道周自请往江西，欲夺回失地，所至远近响应，得九千余人，不幸至婺源遇清兵战败。以大臣郑芝龙（南安人）为首的主和派，操纵了隆武政权，拒绝发兵给饷。1646年春，清兵越过仙霞岭，长驱直入福建，浦城失守，驻守北大门的郑芝龙不战而降，隆武朝廷内外百官惊恐万状，知府王士和留守延平而无兵应战。

八月二十二日，清征南将军贝勒孛师迫延平城下。隆武朝臣仓促出走，士民也逃窜殆尽，唯独知府王士和孤守皇城。他得知清兵破城，回到衙署题壁云：“朔风烈烈捣虚城，正气从来履险贞。一月守延甘殉难，孤忠千载有谁明？”遂衣冠怀印，北面再拜，从容缢死。南下将卒悉惊叹称忠。

隆武帝从北门出逃，经官道三千八百坎途中被俘，送至福州被杀。嗣后坎下村百姓立庙祀之。

（刘光舟）

县令逃命装裁缝

清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陷武昌，福建的红巾军（以红

巾裹头为标志），乘驻闽清军内虚之机，揭竿号众，夺城争地。四月间，红巾军头领黄有使（永春人，旧业操舟）自闽南起义，一路攻陷永安、沙县。四月三十日，黄有使率众数千，围困延平，声势浩大，全省为之震动。

闽浙总督王懿德以延平为延、建、邵三郡门户，省垣屏藩，派遣统带官副总兵李焯赴延救援，会同延平府知府胡应泰（浙江人，进士）、延协副将李寿春（武探花出身，有勇力，手持大刀 40 斤）固守郡城。红巾军数千由后山抄出包围，众寡不敌，官兵阵亡 38 人，二李仍坚守郡城。当时，南平县令李正芳，道光庚子科举人出身，他听说红巾军登城，急忙脱掉官服，戴上斗笠，穿上草鞋，伪装成平民，想逃出东城，并以三百两银交妻以为走计，嘱她先匿入理发店。当红巾军由东门龙山偷入城时，李县令穿着蓝布衫从西门逃跑，人呼老爷，他不敢答话，低着头溜窜。

五月十一日，省援军至，李焯、李寿春率兵开城出战，红巾军被二李打败，黄有使逃逸，延平得以解围。

第二天，役人劝李县令回府，李不识役人，诳云："我系裁缝，不是县官。"李县令惊慌失措、贪生怕死的丑态，被城里人编成了白话诗，张贴在南平街坊，一时遍为城乡所知。此诗题目原为《录嘲南平李司马》。诗云：

非选非挑十八孩（李），居然百旦表奇才。
也曾八百银巴结，（买官）莫问功名那旦来？
当年庚子作文魁，今日人称我父台。
尚恐愚民疑履历，头衔写与日徘徊。
骤然烽火起南平，无计寻思可避兵。
一顶罩篷双不借，要思得得出东城。
当时海誓与山盟，一对鸳鸯不负生。
今日无端逢大难，纹银三百送卿行。

理发匠人我子民，伊家可以避卿身。
逃生肉食多讥骂，但有是非莫认真。
短短蓝衫出后衙，迷蒙天色尚朝霞。
相逢只恐人相识，役隶偏偏唤老爷。
巴结十分禀贼逃，要侬回署换靴袍。
当时强着心肠答，我是裁缝岂彼曹。
从今官味醒迷津，求饱宦囊买鲙莼；
本县当为黄有使，商家要你百余银。
开销守具已空营，堵了夫人又折兵。
不若督同狼虎出，藉征赋税勒愚氓。

（刘光舟）

袁知事修建中山路

南平中山路，是沿江主干道，古称大街。其实不大也不长，是民国初修建的。据《南平县志·艺文志》载，民国8年上任的南平知事（县长）周赓慈（湖北人），他写有《建筑邑城石路记》一文，记载了南平中山路的修建始末。

从清末到民国初，南平城关自东到西是一条“市衢湫隘嚣尘，过者掩鼻”的土路，当时任建安道道尹（知府）的蔡凤礼（晋江人，清末岁贡出身）觉得南平为闽北重镇，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市区“路政之窳，固守土者之羞耳”。商议要修建从东到西的沿江大街，可是南平找不到一个修路的技术人员。当时南平吐呲哩医院院长、美国人苏雅各熟悉工程。蔡凤礼于是请他筹划，平整道路，疏通地下水道，湫隘嚣尘者，稍为廓清。但旧貌未改，仍

然是土路，行人深受雨天泥泞、晴日嚣尘之苦。为了一劳永逸，南平县知事袁世钟（湖南人）决定修建石路，又请美国人苏雅各任总监路工，并推举郑鼎铭董其事。开了几次会议，请示道尹蔡凤机，蔡说“此予夙志也”，并捐款二百金。当时驻南平的福建陆军第一师师长、省防司令姚建屏，旅长张清汝也慷慨捐资，地方绅商也纷纷捐款，共六千余元。

民国 8 年（1919）7 月动工，9 年 4 月竣工，全长 500 丈。每长 10 英尺，宽 11 英尺，造价 12 元大洋。自东门到西门“则曲者以直，狭者以广，行旅商贾，咸啧啧称便焉”。从当今看，此路微不足道，在 20 世纪 20 年代，可谓南平的大工程了，知事写文章，载入县志，并刻石为记，以昭来者。这就是南平中山路从土路改为石路的开始。这条凹凸不平的石路到解放后才改为水泥路。

今日的中山路已更名滨江路。路上车水马龙，行人摩肩接踵，远非昔日中山路所能及。今人有联赞曰：金道展新姿，异彩祥光昭十里；山城更旧貌，丰功伟业贯千秋。

（刘光舟）

双溪岁月



华阳山锭瀑布（顺昌县）

富屯溪畔说顺昌

顺昌县位于福建省中部偏西北，闽江上游富屯溪和金溪沿岸。东北与建瓯市相依，东南与南平市衔接，南与沙县相邻，西与将乐县接壤，西北与邵武市毗连，北与建阳市交界。东西宽74公里，南北长61公里，总面积1985平方公里。

顺昌历史悠久，位于县城西南十公里处的金溪河岸边被称为“仙字石”的摩崖石刻，不仅说明这里很早就有人类活动，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文字。根据《福建地理志》和旧县志沿革表记载：夏禹时代，顺昌属古扬州地域。商书称福建为东越沤，顺昌先民也属东越沤之部落。周朝时期，福建称“东越”。春秋末期，越国勾践灭吴，属有东南之地，顺昌属于越。公元前355年，楚灭越，江南归楚。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取百越统一全国，在闽越国辖地置闽中郡。汉初，因越王勾践后裔无诸曾率兵助刘邦灭秦击楚，汉高祖立无诸为闽越王。到汉武帝时，又发兵闽越，将闽越地归属会稽郡，后立县治，取名东冶县，东汉改东冶县为侯官都尉。汉末分北侯官建立建安郡（以今建瓯为中心的闽北地区）。到三国吴永安三年（260），割建安县之校乡地置将乐县，这里置将水口，属建安郡将乐县管辖，这是顺昌最早的地名。隋开皇末（600）将水口并入邵武之南乡。唐武德四年（621）复立将水口，归属将乐县管辖。贞观三年（629）又析将乐东南两乡置将水场，属建安县管辖。垂拱三年（687），武则天执政时期，分南乡将水口为蠲科镇。元和五年（810），蠲科镇改归将乐县管辖，属建州。景福二年（893）又改为将水镇，后改为永顺场，直属建州。

五代，后唐长兴四年（933），王延钧在闽称帝，改为龙启元年，升福州为长乐府，领14县，同时升建州的永顺场为顺昌县，因“县有顺阳乡，水有顺阳溪”而名顺昌。清嘉庆《延平府志》则称“以其初顺服，故名，取顺而昌之意”。自定名顺昌后，历代沿用未改。因富屯溪纵贯县境，故有“富屯”之别称。又因城东有一双峰山（又名丫髻峰），苍然秀丽，故顺昌又别称“双峰”，“双峰”别称始见于元代。

五代十国的闽天德元年（943），王延政在建州称帝，国号殷，顺昌县为其所辖。天德三年，南唐灭闽，顺昌又为南唐所辖。南唐保大六年（948）置剑州（今南平市），顺昌县属之。

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剑州改称南剑州，顺昌县属福建路南剑州。

元至元十五年(1278)，置福建行中书省，南剑州升为南剑路。延佑元年（1314），南剑路改称延平路，顺昌仍属之。

明洪武元年(1368)，延平路改为延平府后，府名沿用至清末，顺昌县仍属延平府所辖。

民国2年（1913），废府改道。顺昌属建安道（道治在今南平市）。民国16年，废道改省、县两级制、顺昌县属福建省直辖。

民国23年7月，实行行政督察专员制，顺昌属第九行政督察区，区治设今邵武市。

民国24年10月，顺昌改属第二行政督察区管辖，区设今南平市。

建国后，福建省划为8个专区2个市，顺昌属第二专区，专员公署驻南平市。1970年，专员公署迁建阳，改称建阳地区行署，顺昌县即为建阳地区行署所辖。到80年代末，建阳地区搬迁南平市，改称南平地区行署。不久，南平地区撤地改市，称南平市，顺昌县仍属之。

顺昌县境域变迁自立县至今仅五次；建县之初，仅辖二乡，一名崇义，在县东北；一名崇礼，在县西北。宋熙宁三年（1070），因县境偏小，割剑浦县(今南平市)交溪乡(今元坑镇、郑坊乡辖地)以益之。县城由二乡增至三乡。第二次为民国27年(1938)，省政府以上洋特种区（今洋口镇，原属建瓯县）划归顺昌县辖，并以瑞云岩为建瓯、顺昌两县分界线。第三次为1964年，增设建西县时，将顺昌县洋源公社（后改称际会公社）和洋口公社的谢屯、麻溪、元峰三个生产大队划归建西县。第四次为1970年，建西县撤销建制，原建西县的城关（大埠岭）、际会、大历、岚下、高阳、房道六个公社划归顺昌县辖，1975年4月，房道公社复归建瓯县。第五次为1972年12月，经地区行署批准。将远离公社的郑坊公社扶延大队划归沙县管辖。

目前，顺昌县辖有9镇5乡，129个行政村，总人口24万，其中畲族人口7000余，为南平10县市中畲族人口最多的县。

（高中良）

仙源胜境华阳山

华阳山，位于顺昌县城正北，距城八公里。旧县志载："华阳山，在县北仙源都；三峰并列，是为邑之祖山。山半有石门，高广数丈，虽盛夏寒气凛然。峰顶有仙水坛。石常润，岁旱祷雨辄应，一名仙水岩。"

华阳山被尊为"祖山"，坐落于"仙源"之地，不单有"仙灵"之气，更在于它的景与物之美。在一片重山密林之中，危岩耸立，奇石万状；飞瀑流泉，飘云溅玉。宋朝绍兴初年，县丞熊

毓有诗："杖策来游为爱山，石门有路到仙坛。云埋竖石旱犹湿，风转灵岩暑亦寒。"

华阳山景区的前部以田园风光和畲族风情为主，核心区以华阳三峰为中心，山后则是被称为"邑之少祖"的豸角峰、龙兴岩和"邑之太祖"的九龙山三十六窠等大范围森林地带。

离县城西去，过水南镇的下沙村向北行数里，便是华阳山入山第一胜景——黄坑畲族自然村，俗名燕子坪，也是华阳山主景之一——九龙戏珠的龙珠所在地。小村群山环抱，村入口处便是传说为天上七仙女下凡洗浴游戏的"仙浴潭"。源自九龙山的泉水清而发亮，如轻纱薄绸般在溪中平滑的岩石上飘然而过，依次形成三泓小溪潭。潭东是马面山，潭西是龙珠山，树荫浓郁，到最后一水潭时，眼前豁然开朗：一片平畴，清溪绿野，小桥流水，畲民十数家，粉壁青瓦，编竹为篱，鸡犬相闻；橘柑围于户外，棕竹梨桃植于溪畔，稻田芋畦，连丘接垅；吴地山、华阳山、田螺山、龙珠山、马面山和老鹰岩环于村周。山上竹树映红交翠，山麓花草缤纷，一幅绝妙田园风光图，不亚于桃源仙境。清嘉庆年间县令许庭梧有《仙源道中作》诗："路入仙源胜，飘飘致欲仙。新苗浮水绿，红叶竞花妍（山有木叶不霜而红——原诗注）。激水滩喧碓，穿墙竹引泉。尘嚣已不到，底复爱逃禅。"实在是写实之作，一点也没夸大。村口那古老的石坝依然起作用，只是坝旁的水碓房遗址已布满水草苔藓，藤盘蔓覆。

经仙浴潭过清和桥，西去里许，到了田螺山旁，可见到一小盆地，广约百亩。此处便是计划建坝蓄水为湖的"九龙湖"所在地。如果日后此处湖现，那将是华阳山又一绝胜。

沿"湖畔"往前不远即抵华阳山麓，举头仰望，华阳峰、天门峰、三宝峰，三峰排列眼前。东峰天门有拔地入云、擎天捧日之势，峰顶危岩笔立，乡民称为"天门"，相传是八仙"上下于

天”的地方。中峰华阳威严端庄，雄踞两峰之间，峰顶有一块金字塔形巨石，名“玉玺岩”，传说是镇山宝印。西峰则因峰前有三块巉岩巍然突兀，卓立神秀，显得有些超然，峰名“三宝峰”，岩名“三神石”。这三座山峰便是华阳山风景的精华处，它以中峰下的华阳寺为起点，分左、中、右三条线路。从寺后而上为中线，这一路以石趣为主，最为神奇，万千巨石怪岩，从下到上层层垒叠成许多石穴岩洞。乡民把这一路称为“八仙洞府”，其传说故事颇多，大都与八仙有关，有旋风洞、神猴洞、练丹洞、卧佛洞、聚仙厅、华阳洞等石室岩洞。这些巧石奇岩更不同凡响，有仙人船、望月神猴、麒麟石、试剑石、虾蟆石、蟒蛇出洞、仙鹿驮桃、金雀蹲窝等，无不奇巧，惟妙惟肖，佳趣天成。山中还有一座不知建于何朝代的石拱桥，古朴玲珑，称“仙人桥”。

过仙人桥东行或从华阳寺前往东，再折向北去，便是迷人的幽绝奇胜——华阳山多级泉瀑的九龙溪涧谷。上级名虎跳瀑，相传吕洞宾在此剑劈虎精。涧岩壁立如削，飞瀑悬空，如倾万斛，水大时排山倒海，声如夏雷怒吼，银珠四溅，升腾起迷蒙细雾。如碰上日光照耀，即现七色飞虹，流光溢彩，至为奇观。

泉流在乱石巨岩密布的涧谷中蜿蜒而下，流到半山时，涧谷中出现一条长约七十余米，宽有二十多米的岩石水道。这段水道光滑平整可爱，却陡斜得厉害。泉流从这岩面宛如飘绸拖练般飞泻面下，在一断崖处喷发而出，这就是二级瀑布，名“鸳鸯瀑布”。一般的瀑布多是顺悬崖面下冲，但是此处颇有特色。岩面在此突然断裂下陷十余米，而那直立的岩壁却凹凸不平，一石高出岩顶数尺像凸角，旁边却塌陷一块如斜置等水的圆盆，还有一块平伸向前突出似屋檐。泉水下泻已是高速，经这几次阻挡被反激，便如碎玉裂冰，又似奔马飞龙，喷射飞溅出高低远近大小不一的各种水柱水花水雾，人在数丈外都难免水滴雾珠溅面侵衣。水落

为潭，即是脍炙人口的“鸳鸯潭”，时有双双对对的鸳鸯鸟在潭中悠游。

从华阳寺后往西迂回上山，行至山坡后的一处山坞中，可见一人面状圆形岩石，石名“寿仙岩”，眉眼鼻唇分明，酷似寿星仙翁，旁有一块高高的方形石壁如屏。岩下浅池一泓，这泓水便是西线银河泉的源头。这一路山中还有大佛岩、三生石、一线天、神龟挂壁、双龟望龙潭、目鱼石、藏宝洞、石木相亲等诸多石景。

华阳山不仅风景迷人，而且动物繁多，动植物资源丰富。据县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科考队在此进行多学科考察后的初步估计，乔木、灌木类不下 150 种，草本、苔藓类 250 种以上，中草药材类远远超过 200 种。还有许多珍稀动物如大灵猫、狸、狐、鹿、獐、猴、白鹇、大鲵（娃娃鱼）和老虎等。尤其难得的是处于中亚热带的顺昌县却有南亚热带雨林植物种类在华阳山核心区出现。这种独特罕见的地理小气候和物种，在闽北林区并不多见，对科学考察和物种多样性研究有很高价值和重要意义。

（高中良）

黄岩寺前“千年不朽木”

郭岩山坐落在顺昌县北部，与建阳、建瓯毗邻，海拔一千多米。过去有人说，登上郭岩山巅，可以俯瞰建、延二郡，可见其山之高峻了。

旧方志记载，汉朝时有一位“郭仙”居住在此山上，后人便将此山叫做“郭岩”。

不过，郭岩山上的黄岩寺里，奉祀的主神并不是郭仙，而是

梅福和岐公两位神仙。尤其是寺前地坪上那一口圆圆的池塘里立着的一截“千年不朽木”，更让人觉得稀奇，它使梅福和岐公这二位神仙与郭岩山增添了神话般的色彩。

传说，梅福原先是南昌县的县尉，因不满腐败的朝廷，看破红尘，弃官来到建州，隐居城南山修道。不久，梅福到了武夷，望见郭岩山上紫气缭绕，便立即动身前往郭岩。等他登上郭岩山，才知道已有岐公早就在此隐居修道，于是和岐公一起修炼仙术。

有一天，梅福和岐公闲游于山上。岐公说：“好一座郭岩山，就是少了…座寺庙。”梅福就接着说：“我们何不为后人留个修炼之所？这件事我来办吧。”

于是，梅福下山去请了许多木匠师傅上山，让他们动工盖庙。木匠师傅到后，梅福就在准备盖庙的大坪前用手一划，划出了一口圆圆的池塘，他指着池塘里碧清的塘水对木匠师傅们说：“我不要你们砍这山上的木头，只要你们守着这池塘，如果塘水中冒出木头，你们就赶紧搬起来。”说完就倏地不见了。

梅福去哪里了呢？原来他来到了省城福州，打扮成一个拄着拐杖的老者，去闽江边的木行买木头。木行老板听这老者说要买木头去闽北的郭岩山盖庙，就觉得很好笑，说：“我就是把木头卖给你，你也无法让几十连木排从闽江倒流到上四府去呀！”

梅福说：“我自己会将木头一根一根地运去。”

木行老板听了更好笑了，说：“你能一根一根地运去，那你就去运吧，运多少根我都送给你，不用付银子！”

梅福听了很高兴，再三对老板说：“你说话可要算数呵？”

老板也很大器地说：“你就运吧！”

于是梅福在泊木排的江边，用他手中那根拐杖点起木头来。他点一根，木头就沉到江水里去一根，他不断地点，木头就不断地沉。与此同时，郭岩山上那口圆圆的池塘里，就一根又一根地冒

出木头来，等在池塘边的木匠师傅，赶紧一根接一根地搬木头，等到木头都堆成小山一样高，木匠师傅们也累得满身汗淋淋。有一位师傅就脱口说："够了，够了！"那池塘中还有一根刚冒出一截的木头便停住不往上冒了。而这时，恰是福州木行老板看见泊在江边几十连木排已差不多要被老者点光，他赶紧跪下求老者不要再点，梅福也就停住拐杖不点了。梅福如数将银子付给了木行老板，便飘然不见了。

郭岩山上建起了寺庙，梅福和岐公二人看了十分高兴，各人骑着一只白鹤，冉冉升天了。

梅福临走之际，还在寺旁一块大岩石上留下颂文，后人称其为"留颂石"。如今，留颂石也许已经不被人们记得，但寺前池塘里那一截"千年不朽木"，却依然还在叙说着梅福仙人运木盖庙的动人传说呢！

（徐贯行）

谟武村人敬先贤

金溪之畔的谟武村，从宋代以来不仅是顺昌县重要的商贸集市，也是文化名人辈出之地。北宋理学家杨时，南宋名臣廖刚、余良弼，大理学家朱熹的门生廖德明等人，或诞生在谟武，或在此生活过。就连程门四大弟子之一、与杨时一同"立雪程门"的建阳学者游酢，也在这里讲学与生活过，其后裔的一支则在这里生息繁衍。

谟武受到过先贤的教化，一代一代的后人传承着崇敬先贤的美德，这里至今还有为纪念杨时而命名的"杨时弄"，为纪念游酢

而命名的“游酢弄”。杨时祖上东汉杨震为官清廉、不受贿赂的“你知我知，还有天知地知”的“四知”故事，在谟武家喻户晓。过去村里凡是有功名的人家，在用红灯笼时，灯笼上一边写着自家姓氏，另一边就写着“四知堂”三个大字，把杨家“四知堂”看做是全村人的“四知堂”，足见先贤遗风影响之久远。

为了铭记先贤的恩德，至今在谟武还传承着公祭“游酢公”的民俗活动。这种公祭不同于一般的祭祀，它别开生面，独具特色，很有启迪意义。

公祭“游酢公”按古礼仪分为春秋二祭，春祭在农历正月十四举行，秋祭在农历九月二十八举行。

公祭这一天，村里男女老少先到“游将军庙”拜祭“游将军”——因为游酢曾担任过汉阳知军之职，故谟武人称游酢为“将军”。其实，“军”是宋代行政区划名称之一，它和府、州大体同一级别。“知军”即某一行政区域的行政长官。但谟武人尊崇游酢，便奉祀他为将军了。拜祭过游将军后，将游酢神象抬出在村里主要街道巡游，祈愿他保佑全村平安。此时，“游酢弄”的街路两侧一张接一张地摆开60张琴桌，村民将各自家里收藏的古董文物、名人字画陈列在桌上，供全村和外地来参加公祭活动的人们观摩欣赏。“游酢弄”里，就像是一个露天文物展览会。而这一天，整个谟武村也像过节一般热闹，各地来“赶祭”的人，熙熙攘攘，谟武前、中、后三条街路，山货特产与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公祭游酢公”成了物资交流会。

公祭游酢的民俗活动，既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又有较高的文化品味，也是颇具特色的物资交流活动，所以传承不衰。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谟武历史文化积淀的丰厚和谟武人崇敬先贤的传统美德。

（徐贯行）

洋口“特种区”归属记趣

洋口镇位于闽江上游三大支流之一的富屯溪畔，距离顺昌县城15公里，原名上洋，通称上洋口，别称蜚江。洋口镇“兴于唐、宋，盛于元、明”，其正式建置沿革的文字记载始见于明朝，自明朝至民国初年，隶属于瓯宁县温柔乡高阳里和麻溪里。到了民国27年（1938），才划归顺昌县管辖。这划归过程有一段趣闻。

洋口地处建瓯、南平、顺昌三县边界，离建瓯60公里，离南平60公里，到顺昌只有15公里。自清初起，由于水路缘故，商业繁荣，人口稠密，曾由二郡一县划界分治，以洋口主街道上的顺济桥为界，桥西以上属顺昌管，桥东以下属南平府管，桥北面的新街等处属建宁府管。每逢三、八墟期，二府一县各派衙役兵勇巡逻各管地段。由于划界分治，矛盾过多，于是在洋口建立分府，实行统一治理，并规定“凡在上洋发生有关府、县之间的纠纷、诉讼，统由分府处理。各该府、一县不得介入”，成为特殊区域。因此，在民间有“三府衙门（分府俗称）权大过府县”之说。

既然区域特殊，商业又繁荣，距顺昌又近，为顺昌县出入门户，自然早就为顺昌当政者所觊觎。自明代以来，顺昌屡屡以县境偏小为理由，请求省府将洋口划归顺昌管辖。然而，因洋口士绅极力反对和瓯宁县不放，数百年来都未能解决。直到民国时期顺昌人高登艇出任省民政厅长以后，在其大力支持之下，先是由省政府做出决定（民国24年4月）将上洋设为特种区，脱离建瓯县管辖。特种区自然不能长期特殊，仅仅是一种政权过渡的形式。次年3月，省政府又决定将上洋特种区划为顺昌县管辖。消息传

到洋口，群情愤慨。士绅出于自身利益，利用洋口百姓的历史隶属感情，以语言不通（洋口属建瓯语系）和“天高皇帝远，近城十里穷”相鼓动，组织全镇街道和所属24保（村落）数千百姓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划归顺昌，以至喊出“宁做建瓯狗，不做顺昌人”的口号。当时，高登艇以省民政厅长身份，从南平乘专用汽船前来主持划界仪式。汽船将近洋口时，洋口地方士绅怂恿市民百姓，包括小学生在内上千人，手举抗议旗帜，抬着粪桶，集中在河边谢家渡码头。当高登艇乘坐的汽船快驶近码头时，码头上爆发出愤怒的抗议声，打倒声，并不时将鹅卵石抛向汽船。高登艇见状，急令掉转船头，返回南平去了。与此同时，愤怒的洋口人群还围攻了顺昌县派来接交、监交的官员。纵然如此，仍无济于事，上洋特种区终于划归顺昌。民国27年（1938），上洋特种区撤消，改为顺昌县第三区。上洋为区辖镇，称洋口镇。

（高中良）

刚直廖刚忤权奸

顺昌廖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历史上名人众多。其中声名最著的是两宋之交的廖刚和南宋中叶的廖德明。

廖刚（1070—1143），字用中，顺昌元坑乡蛟溪村人，因所居有山名“高峰”，耸拔挺立，故自号高峰居士。少时先后就学于南剑名儒陈瓘、杨时。北宋崇宁五年（1106）中进士，先后历官主簿、录事、教授等职。宣和初（1119），由漳州司录升国子监，后又升监察御史。

监察御史执掌考察六部百官、巡按郡县、纠视刑狱、整肃朝

仪等职责。在御史台诸御史中品秩最低，但权任颇重，多在新进的士人中选择刚强果断者充任。廖刚任此职时，正逢权奸蔡京为相，他忠于职守，为此屡屡忤逆蔡京，故史称“时蔡京当国，刚论奏无所避”。后以亲老求外补，离开京都到兴化军任知军了事。

宣和七年（1125）十月，金兵大举南侵，宋军战败。朝中投降派拟议放弃北方大片国土，迁都南方，廖刚上书力主抗金，反对迁都，支持李纲抗敌。

绍兴七年（1137），廖刚任御史中丞，成为御史台的最高长官。其职事除主管绳纠百官不法之外，还兼谏诤、审刑治狱等。因此，御史台往往又称为“台谏”；其中的官员，又被简称为“台臣”、“谏官”、“言官”等。御史台是皇帝的耳目，设此机构的本意是为了制约相权、整顿吏治和监督舆论。但在两宋时期，由于屡屡宰执弄权，奸邪当道，他们往往控制御史台，使其成为弹劾正人、贬逐忠臣的工具。廖刚之任御史中丞，就处于这样一个政治漩涡之中。

当时的宰执是权奸秦桧，他为了巩固所窃取的相位，欲利用台臣的力量，来达到排除异己的目的。廖刚之所以得以担当此职，起初就得益于秦桧的极力推荐。以常理来推断，秦桧于廖刚有举荐之“恩”，为之所用应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秦桧此次却打错了算盘。廖刚上任后，不但不肯按秦桧的意旨行事，反而对秦桧招降纳叛、卖国媚敌的举措一一予以揭露。他明确表态说：“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枉道徇人，非吾志也。”故史书对其有“及居言路，介然守正，无所承望”的评价。郑亿言曾背叛宋廷，在伪楚张邦昌朝中任职，因与秦桧有姻戚关系，被委任为资政殿学士，廖刚据实上奏，郑亿言遂遭贬谪，秦桧因之嫉恨在心。不久，金人撕毁和约，举兵南犯，廖刚又上奏乞起用旧相有德望者，以与金人相抗衡。廖刚此奏，实是希望宋高宗能起用主战派抗金名

相李纲，矛头无疑是直接对准了秦桧。秦桧大怒，道："此举欲将我置于何地？"由于廖刚屡忤秦桧，后终遭其迫害，以一个有名无实的祠官离开了朝廷。对廖刚一身正气、刚直不阿的精神，后人有诗赞扬他说："高峰之英，笃钟伟人。道南高弟，绍兴名臣。忠直抗言，奸邪沮气。完名全节，仪型百世。"

（方彦寿）

百年两刻《高峰集》

《高峰集》是宋代名臣廖刚的文集。这部文集的刊行很有意思，一是首次刊行在乾道七年（1171），适为廖刚诞辰100周年；二是二次刊行在咸淳七年（1271），适为首刊百年之后。而主持刊行此书的均为廖刚的后裔。

廖刚（1070—1143），字用中，号高峰，南剑州顺昌县人。北宋崇宁五年（1106）进士。宣和初，官监察御史。南宋绍兴初，召为吏部员外郎，累官至刑部侍郎。绍兴七年（1137），拜御史中丞。金兵毁盟入侵，廖刚因奏言乞起用旧相之有德望者而忤逆秦桧，以徽猷阁直学士提举亳州明道宫致仕（退休）。

《高峰集》传世的版本有七卷、十二卷、十七卷本三种，廖刚在世时未刊行。最早的刻本是乾道七年（1171）邵武军学刻印的《高峰先生文集》十二卷。刻印此书的主持人是廖刚的长子廖迟，字元达。他子乾道六年（1170）任邵武知军，次年刻印此书于军学。当时任军学教授的闽清人葛元鹭为之作序。葛元鹭曾纂集邵武最早的府志《武阳志》十卷，乾道六年也由廖迟刻印于邵武。

廖迟刊行《高峰先生文集》后的100年，即咸淳七年

(1271)，廖氏后裔中又有一个名邦杰字怀英的人任邵武知军。他“询之书库，已无全书，遂出家藏旧本补缺”，并重新刊行此书。

《高峰集》在邵武两次刊刻，但这两种宋刻本都没有原刊本流传下来，而且此后再也无人重新刊刻。此书现留存于世的都是明、清时期的抄本。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所据底本也是一个传抄本，以至四库馆臣感慨地说：“其集久无刻本，传写多误，脱字或至数行，无从校补。今亦姑从旧本录之焉。”

（方彦寿）

廖氏世彩堂与“指鹿为马”

“世彩堂”是宋代名儒廖刚所居之室名，在顺昌县西靖安都，即今元坑乡蛟溪村廖坑里。廖氏一门多长寿，至廖刚时已出现五世同堂，其曾祖母享年 93 岁，祖父享年 88 岁，都能见到曾孙、玄孙，其余诸人也多长寿。当时，有人写诗祝贺：“公家王母九十余，大父侍立垂白须。子孙还如祖妣寿，康强不用旁人扶。谁家高曾见五世？不比徐卿生二雏。闻说一门能养志，膳馐壶酒随亲意。畏暑黄童扇枕忙，学啼莱子斑衣戏。”顺昌旧志则记载说：“（廖）刚世享眉寿，相继见曾、玄孙。作堂匾曰‘世彩’。时士大夫皆赋诗以歆羡之。绍兴六年（1136），诗集经高宗御览，因名曰《御览世彩堂诗集》。”

世彩堂也是南宋刻书名家廖莹中的堂名。廖氏刻有《九经》、《文选》、《诸史要略》、《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等一批图书，又刻印《淳化阁帖》、《绛帖》、《小字帖》等法帖多种。所刻书于版心下刻“世彩堂”三字；或于卷末刻“世彩廖氏刻梓家塾”、

“廖氏世彩堂”等木记，世称为“世彩堂本”，被后世的藏书家视为宋版书中的上品。

廖莹中（？—1275），字群玉，号药洲，邵武人，为贾似道幕客。宋末，蒙古军挥师南下，贾似道率军出援鄂州，私自向蒙方称至纳币，蒙方因此撤兵。贾似道又对朝廷谎称获得大捷，廖莹中竟撰《福华编》颂扬贾之“功德”。后贾似道位居太师，把持朝政，大小政事皆决于廖莹中之手。贾似道被革职待罪家居期间，门下客皆辞去，独廖氏仍朝夕相随，以示“忠心”。最后见贾氏大势已去，竟服冰脑自尽。观廖氏之所为，政治上、人格上均毫无所取，但因其倚靠贾氏，势大财雄，在刻书上毫不计成本，故所刻书极为考究，在质量上居于宋代私家刻书之冠。宋人周密《癸辛杂识后集》中评价说：“廖群玉诸书……《九经》本最佳，凡以数十种比校，百余人校正而后成，以抚州蒻抄纸、油烟墨印造，其褾至泥金为签。”所刻韩愈《昌黎集》、柳宗元《河东集》二书，仍有原刻本存世，现珍藏在北京图书馆，是珍贵的古籍善本。

廖刚的世彩堂与廖莹中的世彩堂是否有何联系？从现存的建阳《廖氏族谱》考察，可以知道，廖莹中应为廖刚的后人。据谱序记载，廖刚的后人有一支迁居邵武和建阳，今距邵武界五公里处的建阳麻沙江坊，尚有廖氏子孙居住。故廖莹中的“世彩堂”实际上打的就是廖刚的旗号，借此以忠臣和名儒之后炫耀于世。但以廖莹中追随权奸贾似道的所作所为而论，他应愧对廖氏列祖列宗，“世彩堂”传至他这一代，已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或者说，已蒙受了他的玷污。

事情到此似乎应该结束了，偏偏到了清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对廖氏世彩堂刻印的《九经》作了一番评价。他们认为“宋时《九经》刊版，以建安余氏与兴国于氏二本为最善。廖刚又厘订重刻，当时称为精审”。对此，著名古籍版本学家魏隐

儒先生指出："宋咸淳间廖莹中世彩堂刻印群经，周密《癸辛杂识》、《志雅堂杂抄》记述甚详。……《四库全书提要》竟误廖莹中为廖刚，指鹿为马，可称笑话。"（《古籍版本鉴赏》第48页）

（方彦寿）

少年英才出顺昌

顺昌地灵人杰，自古以来就颇多少年英才，其中以宋元时期尤多，较有名的有廖执象、廖伯宪、廖衡和张升。

廖执象，北宋初人。父廖逊，曾在南唐为官，后归宋，有诗名。廖执象7岁就能写诗，福建转运使牛冕发现这位才华横溢的少年诗人，甚为器重。未满18岁，廖执象携诗卷入京，宋太宗御览后连声赞叹。一日，偶遇著名道士陈抟，陈对他说："你是天上被贬谪的神仙，恐在人间不能久留。"不幸言中，端拱元年（988）他赴省试时，不幸患了急症，抢救不及而卒，知情者都甚为惋惜。著有诗集十卷，由著名文学家徐铉为之作序。

廖伯宪，字梦先，南宋人。年不满10岁，曾祖父召集诸孙试诗，曾祖的诗题一出，他少顷落笔即成。诗句老到，不似少儿所为。曾祖大喜说："光大吾门者，莫非即此孙耶？"后果于绍兴八年（1138）举进士，历官至朝散大夫、推院提举。

廖衡，南宋人。6岁就能吟诗作赋。有一县尉下乡催租听说此事，把他抱到村外天龙庵，叫他以"雨中山茶"为题作诗。廖衡不假思索，口占一首。其中有"泪多陈后愁离殿，浴出杨妃困倚阑"一联，对仗工整，用典贴切，用拟人的手法描写雨中山茶尤显得高明，县尉不由连声叫好。县尉是湖南人，这天正好接到家

中来信，于是以此为题出上联云："洞庭消息寄来迟"，廖衡应声对以"巫峡梦魂归去早"，县尉大奇之。由此声名不胫而走，很快就传到延平府城。延平知府得知此事，特发公函至县，以礼相邀廖衡前往试诗。知府出了几道诗题，廖衡均"迎题立就，句尤婉丽可嘉"。府中一干人均啧啧称奇，不由不叹服。廖衡成年后赴乡举，主考官读其文，将其列为第三名，不料被知府私易他人，竟遭落榜。从此心灰意冷，"绝意功名，徜徉林壑终其身"，故顺昌旧志将他的事迹列入《隐逸传》中。

张升，字伯起，元代人，自幼聪悟颖异。年方 8 岁，就能诵读《九经》，在当地就很有诗名。9 岁时，顺昌县尹召见他，命他以顺昌名胜丫髻峰（又名双峰）为题作诗，他应声而吟："天外双螺髻，青青高插天，地灵人必杰，果是产英贤。"由是被荐赴省参加乡试，福建行省的官员对他才华均甚为赞赏，并将他荐之于朝，由此以"神童"闻名于朝中。三年后，毕业于国子监。年方 12 岁，就被任命为秘书省正字。后历官江西儒学提举，累官奉议大夫。元末，陈友谅率军攻下豫章，向其索取署印，张升将署印投入井中，绝食而亡。他的事迹，见载于明正德《顺昌邑志·忠烈传》中。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顺昌少年英才还有北宋的翁邵、龚懋、冯安国，明代的廖中、张智等人，均以年少有文名而名噪一时。

（方彦寿）

藏书家的教子诗

闽北素有文献之邦的称誉。西晋时有"琅嬛福地"藏书的传说，两宋时有建阳的"图书之府"名闻天下。自古以来，著名藏

书家代不乏人，南宋初顺昌余良弼就是其中的一位。

余良弼，字岩起，曾建草庵于顺昌龙山之下，作为习学游息之所，故自号龙山居士。少年时就读于县学时，就以文名著称。建炎二年（1128）举进士，曾历任枢密院计议官，漳、泉二州通判，广西转运使，静江知府，广西经略使等职，均有政绩。史称“为政知大体，每以教化为先”。著有《龙山文集》，余逝世后，朱熹为之作序。

余良弼博学多才，对传统经学也有研究，尤喜藏书，数量多达数万卷。在南宋闽北藏书家中，是比较有名的一位。他的《教子诗》是一首劝诫其子要珍惜年华，认真勤奋地读书学习，而且与他的藏书事迹也有一定关系的七言律诗，颇具特色。此诗被清人厉鹗编入《宋诗纪事》一书中，诗曰：

白发无凭吾老矣，青春不再汝知否？
年将弱冠非童子，学不成名岂丈夫！
幸有明窗并净几，何劳凿壁与编蒲。
功成欲自殊头角，记取韩公训阿符。

诗中以西汉两位家境贫寒的学者，匡衡凿壁引邻家烛光来读书，路温舒牧羊于郊野，以蒲草编织苇席，并借用别人的《尚书》抄写而读之的掌故，来反衬自家有净几明窗，藏书逾万，自应比前人取得更高的成就才是。末联的“头角”指的是青少年的气概和才华。语出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

余良弼有三子：大雅、大猷、大用。大雅、大猷均为朱熹武夷精舍的学生；大用则曾任建阳尉，编其父《龙山文集》，请朱熹为序。他们在仕途上虽未曾取得显赫的功名，但在理学研究上却取得一定成就，成为朱门高弟，理学传人，也算不枉其父的一番教诲。

（方彦寿）

廖德明从学四书院

理学家朱熹生平在建阳、武夷山先后创建了四所书院，即地处建阳崇泰里马伏的寒泉精舍，以及距此不远的云谷晦庵草堂，地处武夷山五曲的武夷精舍，地处建阳考亭的竹林精舍（又称沧洲精舍，今名考亭书院）。作为一个大教育家，朱熹的及门弟子众多，前后不下千人。而能在他所创四所书院的每一所书院中都曾从学过的弟子则不多见．顺昌廖德明就是其中的一位。

廖德明，字子晦，因所居顺昌西峰都（今元坑槎溪村）在大槎岭侧，有槎溪环绕其地，故自号槎溪。乾道五年（1169）廖德明中了进士，此后曾先后历官韶州教授、莆田知县、浔州知府、广东提刑兼知广州、吏部左选郎官等职。

乾道九年，廖德明已踏入仕途数年，但他却在此时拜朱熹为师，从学于寒泉精舍。究其原因，史书记载说，廖在青少年时接受的是佛家出世的思想，一次偶然读到闽学先驱杨时的著作，恍然有所悟，对佛家思想产生了怀疑，于是投入当时声名最著的理学家朱熹的门下。

淳熙五年（1178），廖德明又从师于建阳云谷晦庵草堂，并随朱熹往来于云谷、寒泉、五夫屏山之间。淳熙八年，廖德明官韶州教授，在任上重建了纪念北宋理学师祖周敦颐的“濂溪祠”，朱熹为之写了《韶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在此期间，他在广东还刊刻了朱熹的著作《家礼》、《近思录》等书，与州学诸生讲论理学思想，使朱熹的学说传播到广东。史称：“在南粤时，立师悟堂，刻朱熹《家礼》及程氏诸书。公余延僚属及诸生亲为讲说，远近

化之。”

淳熙十年四月，朱熹武夷精舍建成，当时廖德明仍为韶州教授，未能相聚。三年后，即淳熙十三年四月，廖德明离韶州任后，迫不及待地直赴武夷，再一次随学于朱熹，《朱子语类》中记载了廖德明这一时期问学的条目有十几条。

廖德明也是朱熹考亭沧洲精舍的弟子，曾先后三次问学于此。一是在考亭精舍建成的当年即绍熙三年（1192）；二是在庆元元年（1195）廖德明将赴莆田知县任之时；三是在庆元四至五年“庆元党禁”风声正紧之时。

对廖德明的勤奋好学，尤其是在“庆元党禁”期间，在朱熹受到权奸迫害，理学被指斥为“伪学”，部分学生因害怕受到株连，避之惟恐不及的情况下，廖德明毫不畏惧，仍然从学不辍。其精神，其人品，就连朱熹也为之感动。他曾对廖德明说：“朋友间多中道而画者（指部分弟子半途而废），老兄却能拳拳于切己之学，更勉力扩充，甚慰衰老之望。”

由于廖德明前后从学于朱熹创建的四所书院，长期勤学苦读，因而成为朱门弟子中的佼佼者，顺昌廖氏中继廖刚之后的理学名家。他学问渊博，著述丰富，流传于后的著作有《春秋会要》、《朱子语录》、《槎溪集》等。

（方彦寿）

马性鲁革毁寺庙

佛教从汉代传入中国后，由于历代统治者的提倡，得到迅速发展。到了宋代，福建的寺庙数量之多已居全国之首，明代，福

建佛教更趋兴旺，各地庙宇众多，禅寺林立。就连小县顺昌，到明正德年间，所建寺庙竟也多达119座。寺庙多占有大片良田，又拥有各种免除赋税的特权，从而在各地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不劳而获的特殊阶层。为了对抗佛老在各地的泛滥，历代进步思想家多从国家、政治、经济、道德、思想等各个方面对佛教的危害性进行批判和揭露。如南朝范缜著《神灭论》，高举反佛的大旗；唐代韩愈立“道统说”以排斥释道；宋代朱熹广建书院以对抗佛老等。明正德间，则有顺昌知县马性鲁大刀阔斧地革毁寺庙，在当地引起巨大震动。

马性鲁，字进之，江苏溧阳县人。以进士任兵科给事中，因故降任平阳县丞。正德十三年（1518）十二月，升任顺昌知县。在职期间，兴学校，修县志，革毁寺庙，兴办公益事业，政绩颇为显著。

马性鲁任知县期间，顺昌的庙宇、道观计有119座，遍布境内大小山头，对其危害，马性鲁在其所编《顺昌邑志·寺观志》前言中曾予以深刻的揭露：“释、老二教之无益于人国，无补于生民也，先儒论之已详，无庸多辩。予独怪夫盘踞名山，所在相望，栋宇之僭，拟诸王公，资产之富，不啻豪右。游手群聚，蚕食一方，蠹国耗民，莫此为甚。……”在封建社会中，修纂地方志，通常均由地方长官领衔主修，实际执笔者则为其下属的一干文人。但从上文所引用的这一段酣畅淋漓的批判文字看，作者直抒胸臆，指斥盘踞山头的寺僧为“游手群聚”、“蠹国耗民”的蛀虫，其笔调，实为马性鲁本人所写而非代笔之作。

作为一方父母官，马性鲁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为此，他指出：“顺昌为邑虽小，而二氏之居，布列于中外亦广。予莅政以来，思欲裁抑未遑也。”恰在此时，他接到上级有关部门对既多且滥的庙宇、道观予以查革的通知，于是，他借此良机，重拳出击。据其

所编《顺昌县志·寺观志》载，此次查革，除18座历史比较悠久、具有文物、古迹价值的寺庙得以保留外，被其革毁的寺庙多达101座，占其时顺昌寺庙总数的85%。在《寺观志》中，被革毁的寺庙一一列出名单，加上由他亲自执笔的前言，该志实际上可看成是马氏的一篇绝妙的向宗教迷信宣战的檄文，这在古人所编的地方志书中，也是极其罕见的。

（方彦寿）

芝城古韵



西周甬钟（建瓯市）

郡县州府古建安

建瓯是闽北的一座历史古城，早在5000年前，先民们就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生息繁衍。

西周时期，建瓯为“七闽地”，秦时属闽中郡，汉时为冶县地，属会稽郡。

东汉建安初年（196），以年号为地名设立建安县，这是建瓯建县的起始，距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了。

三国吴景帝永安三年（260），以会稽郡南部为建安郡，辖十县：建安（今建瓯）、建平（今建阳）、吴兴（今浦城）、东平（今松溪政和一带）、将乐、昭武（今邵武）、绥安（今建宁、泰宁一带）、南平、侯官（今福州）、东安（今同安、南安一带）。郡治设在建安，事实上当时的建瓯已成为全省的政治中心。

晋惠帝时（291—306），建安郡改属江州（今江西九江），辖建安、东平、吴兴、建阳、将乐、邵武、延平（今南平）等七县。

唐武德四年（621），改建安郡为建州，州治设在建安县。建瓯曾称为建州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五代后晋天福八年（943），闽王王审知第十三子、建州节度使王延政在建州建立殷国，改元天德。南唐保大四年（946），南唐兵陷建州，殷亡。时间虽很短暂，当时的建瓯毕竟还做过国都。今天耸立在市中心的鼓楼，就是当时王宫的大门“五凤楼”。

宋治平三年（1066），划出建安、建阳、浦城三县部分地盘设立瓯宁县，县治所与建安县同驻芝城。熙宁三年（1070）撤销瓯宁县，属地回归原来建制。元祐四年（1089），当时建安县辖15个

里，划出它西北部分的12个里复设瓯宁县，县治所仍与建安县同驻芝城。

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高宗赵构退为太上皇，由其子建王赵昚接任皇帝，是为孝宗，第二年改元隆兴。“建王”成了皇帝，就好像建瓯出了个皇帝一样，这可是个了不得的大喜事，于是当地士绅上表祝贺，并请求将建州升为建宁府，以示庆贺。因此，当时的芝城就设有一府两县的衙门——建宁府、建安县、瓯宁县。这在历史上，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

元代曾将建宁府改为建宁路，建、瓯两县设置仍旧。明朝初年又复为建宁府，领县七：建安、瓯宁、建阳、崇安（今武夷山市）、松溪、政和、浦城。清朝沿袭明朝制度。

民国2年（1913）撤销府的建制，合并建安、瓯宁两县为建瓯县——“建瓯”县名自此产生。

1992年10月20日，经国家民政部批准，撤销建瓯县，设立建瓯市。

（潘渭水）

建瓯城缘何称“芝城”

建瓯城背山面水，东西两溪在城南汇流。城内街巷纵横有致，都沿正南正北、正东正西设置，宽广通直。城内商市繁华，自古以来是闽北货品的聚散地，是福建沟通浙赣的孔道。

早在吴永安三年（260），建瓯就已建设城池，不过当时是建在水南复船山下。到南北朝刘宋元嘉初年（424），太守华瑾之才将县城迁到黄华山麓，即今建瓯城的豪栋以南地盘。不过当时只

是建了一些房子，至多是以木栅为围，作为县城的治所而已。直到唐朝建中元年（780），刺史陆长源才将县城改为州城，并开始修筑城墙。到明朝洪武二年（1369），指挥沐英扩大城的西南部，增筑通济门。洪武十九年，指挥时禹又扩大城池，包黄华山于城内。这个规模一直延续到今天，城内面积大约为4平方公里。

熟悉建瓯的人都知道，建瓯城又有“芝城”的美称，但对其来历，可能知道的就不多了。

建瓯城水南光孝寺的西南侧有一座铁狮山，铁狮山西侧的那一座山叫紫芝山。五代十国时期，闽国王审知贞明五年（919）的一天，建瓯名士谢宫锦同几个朋友到铁狮山一带游玩。傍晚，满天霞光，他们下山时见到草丛中有什么在闪闪发光，认真一看，原来是一丛紫色的芝草在霞光中闪烁。人们认为芝草是瑞草，地方上出现芝草是吉兆。他们很高兴，谢宫锦还写了一篇《瑞芝赋》来纪念这件事，并把那座山命名为紫芝山。建瓯城与紫芝山隔溪相望，出现芝草是全城的大喜事，因此，就把建瓯称为芝城，寄托了全城吉祥的愿望。

此外，将当时州衙后堂外，城中三山的最高山也叫做芝山，即今公园青少年宫、工人文化宫的地址。还将芝山北侧的一条偏街称作紫芝街。

（潘渭水）

西周青铜二甬钟

1978年12月，在小桥镇阳泽村北黄科山的西坡出土了一座青铜甬钟，是农民开垦茶园时发现的。

该甬钟重100.35公斤，通高78.8厘米，甬长29.8厘米，作圆筒状，中空与钟腹相通，甬端未封口，直径10.5厘米，壁厚0.8厘米。距离甬端三分之二处有凸出的斡，斡径14.4厘米，斡带宽7.8厘米，斡上无旋。平舞，舞纵24.5厘米，横42厘米。侈铣，铣间56.6厘米。鼓间33.9厘米，子微上剜，厚2.2厘米。

此钟双范合铸，两栾有明显的范痕，斡带内壁残留内模。钟体两面纹饰相同，无铭文。每面各有圆枚18个，左右各列3行，每行3个，中间无钲间。枚上半球状，直径3.5厘米，高2厘米。饰涡纹，纹上出景作乳头状，高0.8厘米。铜钟通体布满以云雷纹为母题的纹饰。甬上部两面各饰兽目一对，与云雷纹组成变形的兽面纹。斡带以细云雷纹为地，饰突出的勾连纹。甬与舞面连接处饰卷云纹一周。舞面饰对称的粗云雷纹4组。钟面各部分都饰粗大深刻的云雷纹，只鼓部中央的隧部略高起，上饰有较浅细的云雷纹组成的图案代兽面纹。内壁光素。钟口内沿以粗三角梭一道为界。

据考古工作者鉴定，此钟当为西周早期铸品，在福建还是首次出土如此型制的甬钟，是解放后我国出土的西周铜钟中体型最大的一件。现由福建省博物馆收藏，建瓯市博物馆存有石膏复制品。

无独有偶，1990年10月，在南雅梅村西约1公里的丘坑山，又出土了一口青铜小甬钟。此钟距地表仅10厘米左右，农民在茶山除草时发现，周围未见共存遗物。梅村与阳泽村相毗邻，小甬钟出土处距1978年大甬钟出土处仅5公里左右。该钟重11公斤，双范合铸。甬高35厘米，呈圆筒状。上端锈残，残长8.5厘米，口径5厘米，壁厚0.8厘米。甬中空，与腹腔相通。甬上有斡无旋。斡径0.5厘米，斡带宽3厘米。斡上锈蚀较甚，纹饰不清。平舞，舞斡13厘米，舞修20厘米。栾长27厘米，中长25厘米，铣

间 24 厘米，鼓间 22.5 厘米。弧斡，斡厚 0.9 厘米，舞部长 18 厘米，无明显钲间。钲两面分别饰枚 9 个，分排 3 行，呈圆锥状，径 1.8 厘米，高 1.7 厘米，篆间饰凸双线云雷纹。

这件甬钟铸造古朴精细，甬体呈锈绿色，具有西周时期甬钟的明显特点，约为西周中期之作。

（张　家）

雄镇南天话鼓楼

在建瓯人民路的中段，有一座古朴高大的城楼式建筑横在大路中间，往来车马行人，都从楼下三个高大的拱门通过。这就是远近闻名的鼓楼。这鼓楼今天已成为芝城的象征。

鼓楼原是唐末五代十国时期闽国王延政在建瓯称帝时所建的“五凤楼”。该楼始建于天德元年（943），以后几经毁建。清康熙二十三年（1681）重修，乾隆九年（1744）失火焚毁。乾隆十九年重建，为石基砖拱木构楼房，楼高二层，连基座共 23 米、宽 50 米。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修缮过。经 200 多年的风雨侵蚀，内檐梁架均遭白蚁蛀坏。“文化大革命”中又遭破坏，不堪使用。1980 年重建，新建的鼓楼为石基砖混结构仿古建筑，楼下拱洞维修加固保持原样，楼上 3 层，建筑面积 4545 平方米。

明代，“五凤楼”改称为谯楼，乾隆时重修后改称镇安楼。民国 6 年（1917）楼上置大鼓一面，高 1.8 米，直径 1.71 米（今存市博物馆），鼓声一响，声震全城，因此将该楼改称鼓楼。长期来定时击鼓。抗战时期，曾将击鼓作为日机来袭警报；抗战胜利以后，以击鼓作为火警信号。

民国初．本县书法家曹耀宗书写“雄镇南天”四字，用蓝釉瓷片镶嵌在中拱南面楼前，增添了鼓楼的雄伟、庄重。北面中拱上则写有“恩迎北极”四字，只是用三合土突塑。抗战胜利后，由本县书法家江朝宗用魏碑体写成“功高北斗”四字取代。“文革”时都被铲除。1996 年为纪念建瓯建县 1800 周年，请现代书法家陈奋武写“雄镇南天”、“恩迎北极”等字，制成木匾重挂在鼓楼前后。

从民国 23 年（1934）以来，鼓楼就充作县立图书馆，1952 年改为文化馆址。1990 年以后改作建瓯文化活动中心。入夜，楼上霓虹灯、彩灯齐放，光彩辉煌，为建瓯增添了一处历史文化新景观。

（潘渭水）

建瓯孔庙

建瓯孔庙始建于北宋时期，原为建宁府孔庙，位于芝城东北隅之仓长路北端，是一组颇具东方建筑色彩的古建筑群。原先学、庙并列，衢道、下马停轿碑规制齐全，含有棂星门、泮池、戟门、大成殿、明伦堂、尊经阁、春风堂、藏书阁、集贤堂、聚星亭、崇圣祠，并附有乡宦祠、名宦祠、节孝祠、忠义孝悌祠等馆舍，占地二万余平方米。殿阁堂庑建筑仿山东曲阜孔庙制式，三进庭院，贯穿在一条南北长达 300 米的中轴线上，四周围以高墙，黄瓦红墙，雕梁画栋，气势雄伟肃穆。

现在府学已改作森工医院，仅留下大成殿、两庑、戟门及前后一些空地，新辟棂星门、墨池、拜台，占地 4688 平方米，保留

了原有明清建筑风格。

孔庙主体建筑大成殿为重檐歇山式屋顶，15 檩抬梁式屋架，天花板为有板砌上露明造，面阔 5 间，总宽 33 米，进深 4 间，总长 21 米。大殿由 34 根楠木组成柱群，其中金柱、中柱直径达 50 厘米，檐柱直径也在 40 厘米上下。内柱之间都用横额或普柏枋作 90 度衔接。明间、次间、斗拱、柱头夹用平座、铺作等式。内檐天花板、枋板、藻井，均彩绘苏式花鸟走兽、人物故事，整座建筑雄伟美观，是福建省现存县级最大文庙，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庙内现藏有明嘉靖浙江黄岩符验摹刻唐吴道子手笔孔子立像碑一块，竖在大成殿中，另塑有孔子、子思、孔鲤等三尊高大的塑像。市博物馆在庙侧办公，并在后院建有文物展览室一处，已辟为中小学生的课外教育基地。

（潘渭水）

千年古刹光孝寺

佛教传入建瓯始于南北朝刘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初（424），距今已有一千五六百年历史。南北朝陈武帝（陈霸先）永定二年（558），在城南铁狮峰下建光孝寺，是福建最早修建的寺庙之一，比泉州的开元寺（始建于 686 年）还早 100 多年，因此有“南有开元、北有光孝”的说法。

光孝寺背靠铁狮峰，面向双溪水，建筑规模雄伟壮观。唐朝时称为“隆兴”，宋称“景德”、“崇宁”，绍兴七年（1137）改名报恩光孝禅寺。元末毁于兵，明洪武十年（1377）重建，嘉靖四

十年（1561）冬毁于火，万历五年（1577）重建，清顺治五年（1648）毁于戊子之役。现存建筑是清康熙元年（1662），建安知县周沛生重建，光绪间（1875—1908）僧骊珠扩建精修。民国14年（1925）又修缮过一次。

光孝寺坐南朝北，天王殿、大雄宝殿、地藏殿依次建筑在中轴线上，东西两侧建有庑廊。东庑廊外原为僧房，全盛时期有僧众500多人。西庑廊外依次建有香积厨、斋堂、寮房、伽蓝殿、祖师殿、禅堂、法堂、观音殿、方丈室等。三殿之间互隔宽庭大院，四周围以高墙，组成封闭式建筑群落。主体建筑大雄宝殿为重檐歇山式屋顶、抬梁式屋架，天花板为明栿砌上露明造，顶高15米，面阔5间，总宽30米，进深6间，总长29.1米；内檐柱网布局采用“元式减柱造法”，减去前后金柱各2根。殿内柱径1.2米，柱础为清代鼓镜式石墩。

光孝寺向为闽、浙、赣僧人求戒圣地，福建传教法会历来都以此寺为戒坛。而今，曾在光孝寺受戒僧人侨居美国、日本、东南亚等地传播法音者还大有人在。唐代，日本空海法师入唐取经时路过建瓯，也曾登寺膜拜。

为保护名胜、抢救文物，建瓯县人民政府于1982年将光孝寺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发动海内外各方人士筹集资金修缮殿宇，重塑佛像，千年古寺重放光彩。

（潘渭水）

一城三庙学，八门九关公

芝城是一座文化古城，素有“一城三庙学，八门九关公”之胜。

“一城三庙学”，说的是明、清时期，在建瓯城内有三座孔庙、三处学宫；“八门九关公”，说的是建瓯城有八处城门、八座关老爷庙，却有九尊关公的塑像。

唐贞观四年（630），诏令天下府、州、县皆立孔庙。孔庙原仅祭祀孔子，宋代后与学宫结合，名为文庙，始作为行礼习仪场所。各地文庙建筑规模大小不同，但多以山东曲阜孔庙形制为典范。建瓯孔庙建筑制式当然不能例外，并且规模形制还很精美宏伟。

建瓯早在东汉建安初年（196）就已建县，叫建安县。唐武德四年（621）升为建州。宋元祐四年（1089），分出建安县一半的地盘设立瓯宁县。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升建州为建宁府，“建安、瓯宁并附府治”。这样，在一座城内就设有一处府衙门和两处县衙门。因此，按照规定，就在城里建了三处孔庙，每处孔庙都附设了儒学学宫，即建宁府孔庙和学宫、建安县孔庙和学宫、瓯宁县孔庙和学宫。这就是“一城三庙学”的成因。

建瓯城的城墙，始建于唐建中元年（780），规模宏大宽广。《县志》载：“周九里三百四十三步，高二丈，广一丈三尺，门九。”以后屡圮屡修，到抗战前后还基本完好。当时有八处城门在通行，即高门（宁远门）、东门（政和门）、长桥门（通仙门）、南门（广德门）、通济门、临江门、西门（威武门）、北门（朝天门）。其中通济门是在明朝洪武二年（1369）拓占管门（市门、抗战时拆除）外西南隅新辟的。先时，在每座城门不远处都建有一座关老爷庙，祀关（羽）圣帝君，八处城门就建有八座关老爷庙，每座庙里都塑有一尊关羽塑像。此外，在葡棚下有一座周仓庙，周仓是关羽的部将，在周仓庙里，关羽的塑像坐大殿，周仓坐二殿。这样，在建瓯就留下了“八门九关公”的佳话了。

（潘渭水）

沧桑巨变紫霞洲

从宋朝到明代，建瓯的磨房前路是叫做紫霞洲街的。那么紫霞洲在哪里？

紫霞洲北起磨房前，南到铁井栏，东自紫芝街，西至小梨山。中心地带就是今天的建瓯市第一中心小学、民政局及总工会所在地。今天，在这圈内已是偏街小巷了。可是在当时，这里却是人烟稠密、商贸繁盛的街市。千百年来，这里积淀着很深的文化遗存。

宋朝淳熙年间（1174—1189），郡守韩元吉导引城北橄榄坑之水进城，沿途浇灌果蔬，在紫霞洲开辟了一处“玉仙池”积水，在池的周围建亭植树，使紫霞洲成为城内一景。

朱熹曾前来紫霞洲畔的建安书院讲学，并在书院门前凿了一口井，命名“艮泉”。

朱熹第三子朱在，曾卜居紫霞洲街，建朱子祠，并在池旁的亭子上题有“溪山一览”的匾额。

宋代还曾在这里建丰国监铸钱，是当时全国四个铸钱基地之一。

由于时代发展，山河变迁，今天已看不到当年的紫霞洲及周围的绿树凉亭了。但是，当年的玉仙池尚在建瓯市第一中心小学的操场南沿留下一汪水，艮泉也已修复一新。

从宋代到明、清时期，磨房前建有建安书院、朱子祠、博士府、陈孝子祠，及供奉妈祖的万寿宫；铁井栏建有建安、瓯宁两县的孔庙和儒学、练氏夫人纪念堂（章氏家庙）、南城会馆；紫芝

街除建有规模深广宏大的王氏大屋之外，还建有刘氏五忠祠；小梨山建有李纲行祠、武圣庙及朱氏祖居。这些名胜古迹，不仅在全县出名，而且，有些还影响闽北各县市，甚至远播浙赣等省。

民国时期，这一带也出了不少故事。磨房前的万寿宫改成了基督教堂，附设一座心光学堂——瞽盲学校，收留盲聋哑儿童入学工读。民国23年（1934），十九路军发动“闽变”，在福州成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蒋介石偕宋美龄前来策划镇压，就住在这座基督教堂内。民国19年（1930），为纪念朱熹诞辰800周年，在朱子祠举办盛大活动，影响遍及东南各省。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在建学创立建安高等小学堂，民国时改称梨山小学；同时在瓯学创立瓯宁高等小学堂，民国时改称省立铁井小学。这两所学校，是闽北最早创立的高等小学，初创时招收建属七县生童入学。民国26年（1937），重建中国共产党建瓯县委，机关就设在梨山小学内，这里成了建瓯以至闽北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活动中心。

解放50年来，紫霞洲有了很大变化，旧的历史陈迹已成过去，改革开放为建瓯带来了繁荣昌盛的局面，也为古老的紫霞洲注进了新的血液。

（潘渭水）

环溪精舍与画卦洲

朱熹的父亲朱松，号韦斋。南宋建炎期间（1127—1130）曾先后担任过政和、尤溪的县尉。因为主战，受到朝廷权臣的排挤，加上“怀异自贤”的罪名，命出知饶州（今江西波阳），不就，得

台州崇道观祠禄，遂于绍兴七年（1137）带着妻儿到建州（今建瓯）城南紫芝上坊（今中水南）筑环溪精舍读书课子。当时朱熹七岁，朱松每出访，总是把儿子带在身边接受教育。

环溪精舍建在建瓯城南东西溪汇流的南岸（即今水南食品公司仓库西侧），这里山清水秀，环境幽美。相传朱熹八岁时，曾和小朋友在门前河滩上嬉戏，朱熹独坐沙上画八卦。

绍兴十三年（1143），朱松抑郁病死于环溪精舍，以后事托付挚友刘子羽、刘子翚、胡宪，朱熹遂随母祝氏夫人移居崇安五夫里。以后里人将环溪精舍改作朱韦斋先生祠。

明朝洪武初（1368），有僧人造城南石桥，借环溪精舍为督工之所。桥成后，僧人竟拓增精舍，改作方广寺。明成化二年（1466），朱熹十世孙朱燧告于官，仅收回精舍两侧空地。明正德七年（1512），裔孙朱炜举请于提学，才全部收回修整，祀朱松像于中堂，以文公配享。后又将环溪精舍改作环溪书院。

从明正德年间到现在，又经四百七八十年，沧桑巨变，至今精舍已荒废无存，遗址在今水南食品公司仓库西侧。

朱文公童年坐沙画卦事，明代修撰的《建安朱氏族谱·文公行实》、民国《建瓯县志》中均有明确记载：画卦洲“在城南环溪书院前。《文公年谱》云，八岁时尝坐沙上画八卦。今书院久废，沙上尚有片碣，大书‘朱文公坐沙画卦处’”。

按八卦是我国古代经书《易经》中的八个符号，由称作“爻画”的“—”（阳）和“--”（阴）组成，用三个爻画交错排列，可组成八个不同而又相对的图形，就称作“八卦”。童年的朱熹竟能画出八卦来，这与其父师承二程理学，平日教育关系密切。

后人为了纪念朱熹，曾在画卦洲建一亭，名“画卦亭”。由于年代久远，到了民国前期已倾圮无存。民国17年（1928），邑人晋国华又出资重建。翁鹤年撰碑记云：“昔朱文公少时，随父韦斋

先生侨寓城南环溪精舍，坐沙画卦于此。有碑署云：朱文公坐沙画卦处。遗迹相传，后人建画卦亭，以表景仰。今七百余载，碑碣犹存，而亭之颓废不知几经年矣。迩者，晋君国华重建而新之。”

翁鹤年先生，曾在建瓯中学任国文教员20多年，晋国华先生，当时是裕丰钱店老板。晋国华出钱建亭，翁鹤年为撰碑记，在当时也不失为“尊贤重道”的盛事。

（潘渭水）

艮泉井与朱子家酒

宋淳熙二年（1175），朱熹前来建安书院（今建瓯磨房前福利院址）讲学，并在书院门前凿了一口井，取名“艮（gèn）泉”。“艮”是八卦之一，卦形是“☶”。八卦是我国古代《易经》中用来象征各种自然关系和人事现象的符号，其内涵极为丰富，且变化无穷。比如“艮”，在自然中代表山、方位在东北、季节属晚冬、五行属土……。井凿好后，朱熹还作了一篇《艮泉铭》：“凤之阳，鹤之麓，有屼而状。堂之坳，圃之腹，斯濊而沃。束于亭，润于谷，取用而足。清于官，美于俗，是为建民之福。”所谓“凤之阳”是指井在凤凰山的南面，“鹤之麓”指在白鹤山下。其中的堂、圃、亭、谷是指紫霞洲的各种人文、自然景观。铭文还说到那井水清而美，足够周围的人饮用。能凿成这口井是当地的官好、民风好，建瓯人有福气啊！因为这口井是由朱熹倡导开凿的，所以也有人叫它为朱子井。“艮”是八卦之一，或传说井底铺有一块刻了八卦的石板，说是人失足落井，八卦会把人托起，不会淹死，所

以又有人把这井叫为八卦井。

艮泉井与朱子祠、博士府隔路相望，井水清冽甘美，周围居民多来汲水饮用，朱家大小当然不能例外。建瓯人向有家酿红酒的习惯、博士府朱子后裔，世代都取用艮泉井水酿酒，所酿的酒甘淳浓郁，香味隽永，故有“朱子家酒”之美誉。前几年建瓯酒厂了解到“朱子家酒”的情况，改进了家酿酒和福茅酒的酿制方法和配方，酿造出酱香型低度白酒，取名“朱子家酒”。酒厂还于1992年捐资，重新围墙建亭，修复井栏，将艮泉井修缮一新，为建瓯增添了一处新的文化景点。

（潘渭水）

徽国朱文公祠

朱文公祠建在建瓯城内中和坊紫霞洲街，即今磨房前农业局宿舍至樟树下种子公司处。

宋宝庆二年（1226），朱熹第三子朱在，辅佐长兄朱塾之子朱鉴自建阳考亭移居建宁府（今建瓯）建造祠堂奉祀朱文公。宝庆三年正月建成，祀文公神主于其中。

朱鉴，字子明，号环溪，是朱熹嫡长孙，出生仅八个月，其父朱塾即病逝。朱鉴从小跟祖父朱熹在考亭读书，由寡母潘氏抚养，三叔朱在悉心辅佐。恩封奉直大夫，主管鸿禧宫，再授大中大夫，湖广总卿，两浙运使。奉养母亲至90余岁而完节，得遂孝养之志。

朱鉴38岁，由三叔朱在辅佐移居建宁府建祠奉祀朱文公，以实现朱熹生前的愿望。朱熹70岁时曾作《致仕告家庙文》，将主

持祀事重任嘱交长孙朱鉴，但当时朱鉴仅10岁，所以在“定议属之奉祀”时，又嘱二子“塾、在相与佐之”，并立下遗嘱：“异时朝廷察熹遗忠，或有恩意，亦令首及。”可见，在封建社会，长房嫡系有重要地位。朱鉴移居建宁府时，二叔朱塾已死多年，辅佐之责当然就落在三叔朱在身上。

明永乐十三年（1415），朱子祠建成已近200年，破损严重。给事中陶伟、御史蒋彦禄和都指挥师佑等鸠工重修，由郡人工部尚书、少师杨荣撰写碑记。明天顺五年（1461），知府刘钺刚到任就前往祭拜，见朱子祠又小又破，而祠旁空地开阔，加上开国公朱在的故第，归并在一起，重建朱子祠。中为大堂，计四开间，匾题“道学渊源之祠”，祀文公神主于其中，而以蔡元定、刘爚、黄榦、真德秀配享。堂前两侧建有庑廊，前为重门，第一道门跨街建筑，与照墙相对，将大路围入墙内，东西两端设有门障，每逢年节祭日，才开门放行，平日行人一律绕照墙外小路通行。祠后建聚星阁，左库右庖，亭池俱备。清康熙五十年（1711），祠堂年久颓坏，由建宁府学政范光宗捐俸，授朱熹十六世孙朱玉重修，并在朱子祠后面建了一座“启贤祠”，奉祀朱熹的父亲朱松。这种建筑制式，一直延续到1949年建瓯解放。

（潘渭水）

建瓯博士府

博士府位于建瓯朱子祠东侧，即今磨房前建委办公楼及其后面水利局宿舍一带，始建于明景泰年间（1450—1456）。

景泰六年（1455），特旨召朱熹嫡长九世孙朱梃入京，钦授世

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世代祭祀先祖朱文公。这事发生在朱熹死后250多年之后，其原因何在？

由于朱熹倡导的理学，适应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他所宣扬的三纲五常确定了封建等级制度，维护了统治之道。他的理学思想体系，既然对巩固封建统治有利，封建统治者当然就会加以利用和宣扬，这是历史的必然。这也是明代宗朱祁钰要封朱熹后裔为世袭五经博士、世代祭祀朱熹的原因。

博士府分为前后两厅，前厅是个大厅，四壁挂有朱熹手书（拓片）四幅条幅："雪堂养浩凝清气，月窟中空疑有神。春报南桥川叠翠，香飞翰苑野图新。"堂中按国公规制设有公案，案上置笔砚签筒，厅两旁立有"肃静"、"回避"牌和出行仪仗。两厢各建有鸳鸯房，到抗战时东厢住当任博士朱秉圭一家，西厢住其弟朱庆圭一家。当时已很破旧，有些部分已倾圮成为荒坪。后厅原是内眷住处，抗战时已由朱碧梧一家居住。两厢建有前后房，后阁两侧是厨房。后厅墙外东侧是书房，西侧是花厅，当时已倾圮成荒坪，跟后花园连成一片，栽有桃树和蔬菜。

博士府门外建有木牌坊，牌坊东额题有"景星庆云"，西额题有"泰山乔岳"，正中悬有"圣旨"字样。牌坊大门两侧挂有一幅木刻对联，左为"徽国衣冠世胄"，右为"考亭理学名家"。门旁设有门房，过去设有库子4名轮流值守。

始建于明景泰年间的博士府，到清顺治五年（1648）曾毁于戊子之役。至康熙四年（1665）重建。康熙九年，耿精忠叛乱，工程因此延搁。直到康熙二十八年，巡抚张仲举提请承袭奉祀，二十九年奉旨以十八世孙朱滢承袭五经博士，才全力建成。康熙二十九年是公元1690年，距今也已300多年了，土木结构的房舍，朽坏也是当然的事。今天能留下后厅供人凭吊，已属难得！

（潘渭水）

朱熹“对镜写真”石刻板

1974年4月7日，建瓯一中高一(8)班师生开展社会调查时，在建瓯豪栋街朱熹后裔家中的乱石堆中，发现了朱熹“对镜写真”石刻板一块。该石板高93厘米，宽50厘米，厚3.5厘米，是用黑色油页岩石刻成的，表面打磨平整光滑，字迹图像十分清晰。石板上端有朱熹亲笔行书题词：“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是予盖将有意焉，而力莫能与也。佩先师之格言，奉前烈之遗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几乎斯语。”题词之后注明：“绍熙元年（1190)孟春良日熹对镜写真，题以自警。”注文之后有两颗图章，上一颗是“熹印”，下一颗是“晦翁”，图章两旁都刻有花纹。

石板中央有一大圆圈，中间就是朱熹的对镜自画像，是半身写生图，两手插入袖中，拱在胸前，面部须发及七颗黑痣都清晰可见，栩栩如生。

圈内右边写明朱熹61岁时，在崇安五夫紫阳书堂对镜写真自题。像的左下方写明是朱熹第十六代孙朱玉所刻。

解放前，很多朱熹后裔或读书人家，将此像用朱红色拓印在白纸上，悬挂在厅堂或书房壁上。

这块石板后来存于建瓯文化馆内。1984年西大街失火，延烧到文化馆，将此石板烧裂，幸好尚有拓印的图像保存下来。1987年，已由县博物馆照拓印图像另刻新碑碣珍藏在馆内。

（潘渭水）

“小武夷”归宗岩

归宗岩位于建瓯西北部徐墩镇境内，距城关17公里，向有“小武夷”、“奇冠南闽”之誉。景区方圆4平方公里，险峻的山峰、奇异的岩洞、嶙峋的怪石、清澈的飞泉、古朴的亭轩、千年的古寺和历代名人的摩崖石刻，蔚为奇妙的自然景观，被古人喻为一盆“玉树琪花”拱揖于碧水丹山之中，是一处历史悠久、文物古迹丰富、兼有奇山异水、古寺森林的游览胜地。

在归宗岩流传着一个美丽的神话。说是古时候武夷山在天上，有100座山峰，天上仙人每晚要点100枝香，每座山峰插一枝，第二天清晨收回残梗，以记山峰座数。一天，上帝命令这100座山峰飞往崇安落户，并各插一枝香为记。不料到时一数，却只收回99枝残梗，也就是说有99座山峰飞到崇安，即是现在的武夷山；而其中最美丽的一座听错了，飞到了建瓯境内的“红安”落户，自成体系，这就是今天的归宗岩。所以，归宗岩也有“小武夷”之称。

归宗岩风景区有“渐入佳境”、“凌虚宝境”和“屏风落日”3大景区、26处景点。目前可供游览的主要景点有会仙桥、紫云堆、补天遗品、十八盘、香炉峰、听泉阁、一线天、齐天峰、落珠岩、石心泉、凌虚台和仙人下棋等十多处佳境，以及石门、石屋、风洞、云洞、蝙蝠洞、蚺蛇洞等天然洞穴，既巍峨峥嵘，又玲珑剔透，妙趣横生，令人神驰。

此外，归宗岩景区还有一座古寺，名崇仁禅寺，始建于五代后梁开平二年（908），距今已有1100年历史。因年久毁坏，康熙

十八年（1679）曾重建，后又颓败。现存建筑是清咸丰十年（1860）所建，距今也有140多年历史。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作为生产队的耕山队驻地，庙宇破损，佛像颓坏。改革开放以后，辟为建瓯旅游景点，重修庙宇，装塑佛像，面貌焕然一新。该寺庙建筑制式很为奇特，庙宇因地制宜，坐东朝西，依山而筑，是一组木构回廊式建筑群，前殿、大殿、偏殿、客堂，都建筑在楼层上，占地1000平方米上下。四周古木参天，落叶不断，但寺庙屋顶却不留片叶，寺内屋宇，不结蛛网，叹为神奇。

从来名胜与名人结缘，宋代理学家杨时、游酢都曾在此留有诗文，可惜却未蒙朱熹光顾。明代名士陈珪曾深有感触地写道："归宗未遇朱夫子，寥落人间若不闻。假使当年聊一憩，风流何羡武夷君。"

相传日本高僧空海法师入唐求法时曾到归宗岩崇仁寺参禅。1984年3月，日本空海法师入唐寻迹参拜团曾前来参拜，并留下墨宝。

现在，建瓯市旅游局对景区进行全面整修，并纳入闽北武夷山旅游圈参观景点之一。寺庙列为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归宗岩已在1992年10月列为省级风景名胜区。

（潘渭水）

古树参天万木林

万木林在房道镇的泳村和上库两村之间，地名大富山，面积有2800余亩，距城关约35公里，是解放后我国第一批公布的重点自然保护区之一。

万木林始建于元朝末年。据说当时建瓯一带遇到了严重饥荒，灾民嗷嗷待哺，乡绅杨达卿有心赈灾，但又恐当地乡亲不愿食施舍之物，于是就想出一个“以工代赈”的办法，宣布“有于吾山种木一株者酬之斗粟”。种植多少，听凭自报，四乡饥民踊跃参加造林。于是，“随山之高下曲直皆有木矣”，造成了一大片人工林。以后，这片林木成为杨氏的家族林，公议决定，树木成材之后，只能用于修建桥梁、学舍、寺观，以及施舍穷人棺木，不准私人砍伐取用或盗卖，世代封禁保护。由于植物群落的自然演替，各种杂木混交生长，至今这片林木已发展成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山中古木参天，巨藤盘错，沉水樟、闽鄂山茶、肉桂等珍稀树种，均为国内罕见。经科学考察，林内拥有各类树种160科、580属、1204种，所以有“亚热带植物博物馆”之美誉。山麓建有万木林科学研究所和科研大楼，已收存各种植物标本2万多份，昆虫标本4000多份，鸟兽标本160多种、500多份，蛇类标本及野生菌蕈标本100多份。

万木林现在已被列为武夷山旅游区参观景点之一，已成为闽北森林科研的重点基地，也是教学实习及科普教育的理想场所，吸引国内外有关专家和科研工作者以及学校师生前来进行森林生态、地质土壤、植物、动物、森林病虫等学科的调查研究。

（潘渭水）

端午“舟歌”是古傩

建瓯的端午节，除和各地一样有包粽子、划龙船、插艾叶菖蒲、吃雄黄酒等习俗外，过去还有一种和别处不同的民俗活动，即

演唱“舟歌”。“舟歌”也有写作“秋歌”的，大约是方言谐音之故。

“舟歌”的历史悠久，早在明朝嘉靖年间，《建宁府志·礼俗》就记载：“端午节……城市有送神者，犹古之傩也。”旧时，建瓯城关每年端午节先不赛龙舟，而是举办舟歌“送瘟神”，其表演过程就是整套复杂的古傩活动。

每年农历四月初一起，便由会首召集有关人员在奶娘庙（即奉祀陈靖姑的“临水宫”）排练。在端午节前一天一切筹备就绪。五月初五中午，从奶娘庙整理队伍出发。游行队伍前面是“得胜鼓”（四面大鼓）引路，接着是锣鼓队，吹管队（唢呐、笛、管），然后是《挑茶担》（一种民间舞蹈），接下来就是“舟歌”队了。舟歌队分为两部分，一是唱队，由一人打鼓兼领唱，二十多人伴唱。歌的内容是唱杨家将、薛仁贵、桃园结义三兄弟等24名历史名将以威慑鬼怪。二是舞队，由“无常”、“八大将”、“五路神”、“张天师”组成。“无常”有三位，都着专门服装，头戴篾扎纸糊面具，手中各带铁链、镣铐、绳索等抓鬼器具。“八大将”各以粉墨涂抹脸面，形同恶鬼，手中各持蛇、癞蛤蟆、老鼠、黄鼠狼、蝎子、血桶等。“五路神”由五人分别扮东、西、南、北、中五神，用竹扎纸糊成两个高圆桶状人形，彩绘成神像，人钻进去在肚脐处设观望孔。“张天师”一般由道士扮，骑真马，手执尘拂及神符。“舟歌”队将无常、八大将、五路神安排在唱队之前，张天师骑马殿后。另外还准备一条“纸船”（用麦秸编好后糊纸）放在奶娘庙门口备用。

“舟歌”游行队伍穿大街过小巷，其意为惊动各处的“妖魔鬼怪”，把它们都驱赶出来。绕城一周，回到奶娘庙门口，由会首向奶娘菩萨祷告卜“善告”后，进行“送鬼”。这时游行队伍的前半部（舟歌队除外）立即解散，各人回家，各家各户将门窗紧闭。然后，“神将”和“无常”将“八大将”等恶鬼拖起来赶往城外跑，

“舟歌”队继续高唱历史英雄名人事迹恫吓鬼魂，并把纸船抬起一并送往城外河边。人们把“恶鬼”拖向河边丢在水里，把纸船架在两条竹排之间烧着，向河中划去。这时，扮“八大将”等恶鬼的人在河里洗脸，并将纸糊的面具及道具等丢在“纸船”内焚烧，以示神已将恶鬼押上“纸船”送走了。等纸船快烧完时，将两条竹排分开，纸船也就散了架。“舟歌”队偃旗息鼓，各自回家。至此，整个活动才告结束。

建瓯“舟歌”最后一次演唱活动是在1948年，现在已基本失传。90年代初编纂民间文艺志书，其有关资料才得以发掘，结合方志记载来看，“舟歌”确属古傩文化之传承无疑。

（杨慕震）

“挑幡”绝技展风采

“挑幡”是建瓯特有的民间文艺绝技，产生和传承在建瓯城郊大洲村，据说有300多年历史。

相传当年城郊大洲村的乡民，曾在村头立了--根旗杆，杆顶悬挂旗帜，用以纪念牺牲了的村里参加抗清斗争的兵士。不久清军入村，砍倒旗杆，撕毁旗帜。大洲乡民不畏强暴，又将旗杆扶起，重新挂上旗帜，争相擎举，人倒旗不倒，使清军大为骇惊，只得退走。这一天是正月二十四日。为了永记这个日子，便年年在此日举行擎举悬挂着旗幡的旗杆的表演活动。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渐演变成为“挑幡”，凡逢年过节或大的庙宇举办庙会时，都要进行“挑幡”表演，“挑幡”便成了娱神娱人的民间文艺“绝活”。

“幡”是用一根约10米长、碗口粗的大毛竹制成，竿顶扎彩

灯，彩灯下以彩绸扎成一圆形或六面体小“城”，“城”周围悬挂小彩灯和小铜铃，并从“城”底部悬垂下一条长长的“幡”，幡上用大字书写祈颂之辞。表演者表演时，将幡杆扶直，竖立在足尖上，轻轻一挑，“幡”便飞到肩上，随后在锣鼓声中，两手轮番舞动，或足挑肩扛，或头顶齿托，上下腾飞，左右盘旋，长幡飞转，竿顶彩灯缤纷，铜铃叮当作响，彩幡不倒，煞是壮观。

由于种种原因，“挑幡”这一民间文艺绝技，后来濒临失传。改革开放后，“挑幡”才得以重新焕发光彩。经过十多年的精心培育，现在建瓯已有包括男女老少在内的数百人能够表演“挑幡”绝活。

尤其可喜的是，“挑幡”已经名扬海内外，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将“建瓯挑幡”列入“吉尼斯大全”。纽约联合国总部播放纪实片《中国小城镇》，联合国官员和各国外交官观看到其中的建瓯市“挑幡”时，个个赞叹不绝，暴发出如雷的掌声。“挑幡”为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徐贯行）

“三山”、“六水”、“七座桥”

建瓯城里有“三山”、“六水”、“七座桥”之胜，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但其由来，却鲜为人知。

“三山”、“六水”、“七座桥”，这是古人用七个字对建瓯县城的山川地貌、街道建设、交通情况的总概括。刘宋元嘉初年（公元425年前后），建瓯县城由水南覆船山下移到黄华山麓。在建设新的县城时，削平了三座山头；在城墙脚下开掘了六处干沟下水

道；在交通要道、在城内河交叉处架造了七座桥梁，便于人们来往。

“三山”是指芝山（今公园少年宫东侧是山顶）、旗山（今都御坪市委门前北侧的双线道公路处是山顶）、符山（今大市街扇巷口是山顶）而言。据民国版《建瓯县志》卷六《城市》记载：吴永安三年（260），建安太守王蕃始筑城于水南覆船山下。刘宋元嘉初（424—425），太守华瑾之将县城迁于黄华山麓。当时，建瓯旧城没有现在这么大，北面只到上下豪栋之南，现在从二中门口到都御坪豪栋口的那一溜鱼塘，就是当时的护城河。到了明朝建宁府都指挥时禹时，才把县城的北面扩大到现在城址处，把黄华山、小黄华都包括在城内。由此可以看出，建瓯城里有“三山”是指旧城而言。若按现在县城计算，城内就有五座山头，除上述的芝山、旗山、符山之外，还有黄华山（高 202 米）、小黄华（高 149.4 米）。

“六水”是指城墙脚下开掘的六处干沟下水道。建瓯县城的排水系统，安排得比较科学、合理，城内污水北半部主要是靠城内河排出。除城内河外，还有六处干沟下水道，把城里南半部街道的污水分区由城墙脚下水道排出。如今六处城墙脚下水道的水洞口都在，并且都能排水。

“七座桥”是指仓长路与河边交叉的泳泽桥（俗名仓桥、又名广实桥）、公园口与河边交叉的平政桥（俗称府前桥）、鼓楼前路与河边交叉的镇安桥（一名州桥）、北辛街与河边交叉的升华桥（俗称新桥、今辛桥头）、西大街与河边交叉的恩波桥、跨在河边可通上西河的顺母桥，以及朝天门路与濠水交叉的德胜桥。这七座桥都跨架在交通要道的城内河上，位置又都在“十”字路口，因而改善了县城的交通，方便了人们的来往。

（王政信　潘渭水）

独具风味的建瓯弓鱼

在建瓯芝城市场上，每天都能买到一种活鱼，那就是建瓯渔农用传统特殊方法处理过的、远近闻名的建瓯“弓鱼”。

建瓯的弓鱼技术历史悠久。据钟楼村几位八十多岁的老渔农回忆，弓鱼约始于清朝中叶，迄今已有二百年左右的历史。在当地还流传着一个为弓鱼打官司的故事。

据说一百多年前，有人以“弓水鱼是惟利是图”的罪名告到官府，在公堂上受审的渔农理直气壮地把弓鱼的好处诉说得淋漓尽致，驳得原告哑口无言。他们拿来弓水鱼和从塘里抓来的活鱼当堂开剖煮熟，让县官及证人等品尝，大家都觉得弓水鱼清甜爽口，而未经弓水处理的塘鱼却有浓重的土腥味。于是官府明断：“弓鱼有理”。

弓鱼到底有哪些好处呢？它能保鲜（活），能消除土腥味，使鱼味更加鲜甜，并且还便于渔农运输和顾客提携。

弓鱼能保鲜活，是因为在弓绑时在鱼腹中留有一定的水分，绑定后鱼不能蹦跳活动，呼吸放慢，耗氧量少。并且弓鱼还要放在活水中冲养，让鱼不断吐污纳新，消除体内的土腥味。

弓鱼也叫弓水鱼，究竟鱼肚子里进了多少水？据养鱼行家测算，一般占鱼重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因为弓绑的水分不能流出，使鱼能保活三四天，夏天也能保活一两天。

弓鱼一般要经过两次弓绑。首先是在池塘边捕边绑，用小草绳在头部从鼻穿到唇，尾部绑在肛门下，叫“初绑”。而后将绑好的鱼放入鱼塘或溪河清洁的活水中吐污纳新，一小时左右后重绑，

即头部不动，重绑尾部草绳，移到肛门稍偏上，把鱼弓成半月形，使鱼肚子里的水分不能流出，从而起到保活保鲜的作用。

外地人在建瓯街上有时会看到渔农用长鱼竿串挑着百几十斤弓鱼，骑在自行车上利索地穿行，或是在市场上看到一串串活鱼，都觉得很新奇。中央电视台曾在“正大综艺”节目中专门介绍了“建瓯弓鱼”呢。

（叶夏汉　潘渭水）

梨岳庙与《梨岳集》

建瓯城中，原有一座历史颇为悠久的庙宇，称梨岳庙，是祭祀唐代名宦李频的。

李频，字德新，浙江建德人，唐大中（847—859）进士，曾任南陵主簿、武功令，官至建州（今建瓯）刺史，卒于官。李频在建州刺史任上，颇多惠政，遗爱在民，卒后，建州人感其德政，建祠于梨山之上，并将此山尊称为梨岳山。因梨山距城较远，祭祀不便，建人又在府城中和坊磨房前西端建行祠，称梨岳庙。他的诗集因之也被称为《梨岳集》，又称《李建州诗》。

李频青年时即以诗著称，他的诗以描写自然风光和景物见长。七律《湖口送友人》是他这方面的代表作。“中流欲暮见湘烟，岸苇无穷接楚田。去雁远冲云梦雪，离人独上洞庭船。风波尽日依山转，星汉通霄向水悬。零落梅花过残腊，故园归去又新年。”全诗以离人孤舟为主线，串联起诸多景物，层层设景，景中有情，情中有景。送别友人远去而无通常的伤感之情，而对友人的依依之情沛然溢于言表。

李频的诗共195首，南宋时，名儒真德秀得其遗稿，准备以己资刻印于建州梨岳庙中，因故而未果。嘉熙三年（1239）李频的同乡后辈金华王埜任建宁（今建瓯）知府，于是把他的诗集刻版印行，这就是最早的李频诗集刻本，名《梨岳集》一卷，另有《附录》一卷。王埜序称："公诗百九十五篇，刻于建州，以报公德。"遗憾的是，由于年深岁久，这个刻本，现已无存。

李频诗集现存的最早刻本也是建本，这便是明嘉靖十七年（1538），由汪佃和朱幸在建宁府刻印的《李建州诗》一卷及《附录》一卷。汪佃字友之，江西弋阳县人。嘉靖间以翰林侍读出为建宁道按察司佥事，也是历史上惟一见于记载的直接由朝廷派出的监校麻沙书版的官员。朱幸是直隶长州人，瓯宁县（今建瓯）训导。这个刻本，现存北京图书馆。

此书现存的另一个较早的建本是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建宁知府龚道立刻印的，现也珍藏在北京图书馆。

（方彦寿）

福建现存最早的茶书

我国最早的茶学专著，是唐代茶圣陆羽的《茶经》。福建最早的茶书，则是北宋咸平年间（998—1003）刊行的丁谓的《北苑茶录》三卷。继之者有大中祥符初年（1008）周绛任建州太守时，撰《补茶经》一卷。但这些书都没有流传下来。以现存而论，福建最早的茶学专著，是蔡襄的《茶录》一书。

蔡襄（1012—1067），字君谟，福建仙游人。他是北宋著名的书法家、茶学家。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曾任福建转

运使，当时转运司设司建安（今建瓯）。建安的北苑在南唐时就是贡茶产地，在全国颇有名气。入宋后，朝廷屡派茶使到北苑督造贡茶。为显示皇家气派，特颁制龙凤图案的模型，所产茶称“龙团”、“凤饼”，白茶则有石乳、的乳、白乳等名品。蔡襄上任后，在前人制作贡茶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创制出形状小巧，质地精良的名茶小龙团，把茶叶的制作工艺技术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使建安北苑在北宋时成为全国最负盛名的茶叶生产和加工基地。

《茶录》一书，就是蔡襄根据自己多年的制茶、品茶的经验，以及他在建安民间与茶农、茶人的广泛接触，所得的饮茶、斗茶习俗方面的知识总结而成，书成于皇祐年间（1049—1053），原本一卷，分为上、下二篇。上篇为《茶论》，内容包括茶叶的色、香、味的鉴别，以及藏茶、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熁盏、点茶的方法。文中首次提出了茶叶色、香、味俱佳的质量标准，认为贡茶以珍膏油面，以龙脑和膏，破坏了茶叶原有的色香，造成失真。此外还侧重介绍了建安民间试茶、点茶、斗茶的功夫，及品茶的方法。蔡襄作为一个贡茶的监制者，在书中并不热衷于介绍皇家贡茶龙团凤饼的加工制作，而更多的是记述当时建安一带的茶艺和民俗，这是本书的卓异之处。蔡襄因之也被后人尊为“中国第一位品茶专家”。

本书下篇为《器论》，内容主要介绍制茶工具如茶焙、茶笼、砧椎、茶铃，品茶工具如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等。其中所介绍的建安兔毫盏则是研究建盏的重要史料。

《茶录》最早的版本，是由蔡襄手书刻石的拓本，成于治平元年（1064）建安转运司。由于蔡襄是北宋著名的书法四大家之一，故此石刻小楷手书拓本，流传到后世，后人视同手书真迹，珍贵异常。明万历间，此石版曾在建安出土。著名藏书家徐燉通过当时在建安的福建转运副使屠本畯有幸得到此拓本一帙，欣喜异常，

曾为之作跋。

（方彦寿）

古音韵训诂学家吴棫

语音作为语言的传播形式之一，由于古今时差和南北地域的影响，会逐渐产生差异。尤其是在上古时，文字借助于竹简、帛书得以流传，但语言却很难准确地记录并流传，以至到后来，这种差异就越来越大。到了南北朝时，人们就已发现《诗经》、《楚辞》等典籍的某些篇章的韵脚，以当时的语音读来很不和谐。所以，当时的学者徐邈、沈重等人便以为古无定音，而是根据需要临时将某字改读为某音，以求和谐，这便是古音韵学上的“叶韵”（协韵、叶音）。

南宋时期，福建的音韵训诂学家吴棫上取《周易》、《尚书》、《诗经》，下取欧阳修、苏轼、苏辙等人的五十种著作，摘其中声韵与当时所不同者，撰成《韵补》五卷，以阐述“叶韵”之说。这是福建最早的古音学著作，也是我国宋明以来古音学的创始之作。

吴棫（约1100—1154），字才老，建安（今建瓯）人，北宋宣和六年（1124）进士，南宋绍兴间官太常丞，以忤秦桧出为泉州通判而卒。吴棫此书的特点是根据古书中的本文，以音训与古韵文来说明古时韵部，并通过互相比较，推求古音。

吴棫的《韵补》一书，当时曾得到朱熹的赞扬。朱熹作《诗集传》、《楚辞集注》即采用吴棫之说。但在编排上，《韵补》一书材料繁杂，缺乏条理，错误也较多。明代福建学者陈第著《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攻驳其说；明末顾炎武有《韵补正》，专

门纠正此书之误。《四库全书》认为此书颇多"参错冗杂"、"牴牾百端"之处，同时又认为"自宋以来，著一书以明古音者，实自棫始"，"而后来言古音者皆从此而推阐加密"，具有"筚路蓝缕之功"，也就是认为此书上补从汉到宋研究先秦古音的空白，下启明清时期的古音学研究。

《韵补》的最早刻本，据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七）所载，为南宋嘉禾（今浙江嘉兴）刻本，疑即乾道三年（1167）吴棫同乡徐蕆为之作序而后刊行的刻本。原本已不存，辽宁省图书馆有宋刻本一部，为此书现存的最早刻本。元明以后，此书曾多次刊刻，有元刻本、明许宗鲁刻本、明嘉靖何天衢刻本，清代则有《邵武徐氏丛书》本等诸多版本行世。

此书之外，吴棫著有《毛诗补音》、《楚辞补音》诸书，内容即以"叶韵"解释《诗经》、《楚辞》的韵脚，但此二书今均不存。

（方彦寿）

历史学家袁枢

袁枢是我国知名的历史学家。他字机仲，南宋建安人，生于绍兴元年（1131）。幼年就能赋诗，很有抱负，在故乡南桥上曾题诗："玉龙倒悬过寒潭，人在云霄天地间。借问是谁题柱去，茂陵词客到长安。"17岁进临安（今杭州）太学，20岁以"修身与写赋"参加国子监考试。后又参加礼部考试，得词赋科第一。孝宗隆兴元年（1163）中进士，任温州判官、兴化军教授，累拔为工部侍郎。宁宗即位，升任右文殿修撰，后任江陵府知府。

袁枢在阅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时，感到此书浩博精深，但受到体例的限制，读者不易把握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于是就“区别其事而贯通之”，著《通鉴纪事本末》，把通鉴内容分为239个专题，42卷，概括自战国到唐五代共1362年的历史，创造了写史的“纪事本末体”。这种体例的突出优点是所辑的专题，以历史事件为中心，按时间顺序，脉络贯通，而且条理分明，文字精炼，既具史实，又不失史体。历代治乱兴亡的史迹及其因果关系，一目了然。所以有人说：“事非本末不明。”孝宗读后，令东宫及诸帅熟读，并说：“治道尽在是矣。”淳熙元年（1174），庐陵杨万里读过此书后说：“如生乎其间，亲见其事，使人喜，使人忧，使人鼓舞。”又说：“有国者不可以无此书，学者不可以无此书。”清代谷应泰评论说：“以类事相比附，使读者审理乱之大趋，迹政治之得失，首尾备久，分部就班，较之盲左之编采，则包举而赅谈，比之班、马之传志，则简练而隐括，盖史外之别例，而温公之素臣也。”

此书问世800多年来，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称许。

袁枢史才为世所推崇，其史德也令人景仰。他兼国史编修官分修国史传时，浦城章惇曾以同乡的情谊，命家人送交自传，请为润饰，被袁枢严词拒绝，并说：“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天下后世公议。”当时宰相赵雄总管史事，感叹说：“无愧古良史矣。”

乾道七年（1171），袁枢为礼部试官，任太学录，他忠直地上奏治国三论：一论开言路以养忠孝之气，二论规划恢复当图万全，三论士大夫多虚诞、幸荣利。很得孝宗赏识，命袁枢任大宗正主簿，并召他入殿面谈。袁枢知道孝宗常以诸葛亮论两汉盛衰一文中的“小人不可不去”之语为训，他便以这句话为中心，作深入阐述发挥，历述自汉武帝至唐文宗偏听奸佞，招致祸乱的史实，敬

告孝宗提高警惕。调任太府丞时，又直言孝宗有宠任武士、厌薄儒生、猜疑大臣之心，想使近侍参与军国大事。孝宗感悟，并表示："朕不至与此曹图事帷幄中。"

袁枢在朝任职不畏权贵。他任大理寺少卿时，有通州民高某因产业一案交大理院审理，殿中侍御史冷时光受贿包庇，袁枢予以揭发。同列官员都怕他招祸，而袁枢无所畏惧，大胆陈奏。孝宗根据奏本，立即罢免冷时光。所以有宋代以朝臣弹劾御史的事例自袁枢开始的说法。

袁枢任江陵知府，江陵在长江岸边，如遇水灾，人民就要流离失所。江陵原有楚的故城，名"楚观"，袁枢察看地势后，决意移民楚观。于是亲为规划，修筑民房，迁民安居，深得人民称颂。

袁枢66岁时，因受朱熹牵连，也被罢官。自此闲居10年，致力著作。到开禧元年（1263）去世，享年75岁。有《易传解义》、《童子问》及《辨异》等传世。

（陈翰孙　潘渭水）

四朝元老杨荣

明代前期，有一位历事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的大臣。他安定社稷，爱民亲仁，竭尽才智，政绩卓著，有一代名相之誉。他就是建安（今建瓯）籍的著名政治家杨荣。

杨荣（1371－1440），字勉仁，建安人。17岁被选入郡庠，建文元年（1399）福建乡试第一，次年礼部会试中第三，殿试中二甲第二，赐进士出身，授翰林编修。

朱元璋死后，建文帝即位。燕王朱棣反对建文的削藩政策，起

兵“清君侧”。建文四年（1402），朱棣兵进应天（今南京），杨荣马前迎谒：“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朱棣警悟，遂先谒陵，后即位，即为成祖，杨荣从此受知。

成祖初建内阁，杨荣与解缙等人入阁参与机要。其后历任翰林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仁宗即位，进太常卿、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工部尚书。正统三年（1438），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兼尚书大学士。

成祖注重边务，杨荣以通晓边务受到成祖重用。永乐五年（1407）受命前往甘肃规划军务，所经山川形势、城堡险易、道路远近、军民休戚等，都细心考察回奏，成祖深为满意。

永乐十年，甘肃守将西宁侯宋琥报称：叛寇老的罕逃去蒙古，将为边患。成祖命守陕西的丰城侯李彬率师进击，命杨荣前往经略。杨荣还奏：戎狄时叛时服，不需动用大军进攻，且隆冬不宜用兵，有罪不过数人，不致造成大患。成祖准奏，敕令李彬按兵固守，不久，叛兵纷纷回来归附。

永乐十二年，杨荣扈从征瓦剌，驻兵于大石镇。成祖召问足兵足食之计，杨荣提出：“宜择将帅从兵屯田，将帅得人则军士不扰；军士既安，则耕不违时，何患兵食不足。”

永乐二十一年，杨荣扈从西征，兵扎万全，十月进军天成，宁阳侯陈茂奏称番王也先献疑来降。成祖命杨荣到大同纳降，十一月班师。

杨荣辅佐朝政，注重儒家的仁政爱民的传统德治。

永乐二十年，成祖下诏出征阿鲁台。为解决军粮的运输问题，有人建议调用建文时所征用的江西民兵充为运粮丁夫。杨荣则认为这些兵夫已明令罢征，且已时过 20 多年，再征用则失信于民。成祖认为有理，不再征用。

永乐二十二年，巡按浙江监察御史报称丽水、政和有山民作

乱，请发兵进剿。杨荣认为：彼等乡民，或为有司所苦，或为衣食所穷，逃入山林苟活朝夕，何敢动乱。若宽而抚之，当可逐渐散去，急则坚其为盗之心。况兵戈所加，不免枉及善良，请妥善处理。成祖命闽浙三司招抚，果然归顺，人民得以安生。

交趾原称安南，成祖平定后，曾设郡县治理，后又屡次叛乱，屡次征讨。宣德二年（1427），交趾黎利派人到总兵官柳升兵营要求罢兵，请立陈氏后裔为王。蹇义等大臣都议为不可，惟杨荣和杨士奇认为交趾战乱不息，劳民伤财，为了安定边荒，极力主张允许交趾自立国王。宣宗也因厌烦用兵，同意二杨意见。自此交趾安定，明朝廷也得免劳师动众。

杨荣崇尚儒学，重视皇统。永乐二十二年，成祖卒于榆木川，遗命太子继位。杨荣与金幼孜计议，以六军在外，朝中诸王闻知，恐生不测。于是决定密不发表，仍整军旅，严号令班师。大家推荐杨荣等快马先回讣告皇太子，等成祖灵柩到京，再宣告大行遗命。皇太子继承正统，是为仁宗皇帝。仁宗崩，当时皇太子坐守南京，杨荣奉皇太后命南下迎驾，是为宣宗皇帝，改元宣德。宣宗崩，英宗即位方9岁，太皇太后听政，信任杨荣、杨士奇、杨溥三人，朝政多咨询三人裁决，三人也勤政谨慎，史称“三杨辅政”。时人认为：正统初，朝政尚清明，实杨荣等三人之力也。

杨荣在朝40年，曾五次扈从出塞，两次巡边，主编《五经四书性理大全》，总裁修撰太祖高庙实录，仁宗、宣宗实录，一生“事君有体，进谏有方”，被成祖誉为岁寒松柏，仁宗赐“绳衍纠谬”银印，对朝政得失，准盖此印密疏，可谓恩宠隆厚。

杨荣著有《两京类稿》、《玉堂遗训》、《训子篇》、《北征记》、《杨文敏集》等。

（陈翰孙　潘渭水）

杨荣题诗济寒士

杨荣是明前期著名的政治家，由于历事明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故有“四朝元老”之称。他与台阁其他两位重臣杨士奇、杨溥共同辅佐帝室，史称“三杨辅政”。他与二杨等人还经常唱酬往来，逐渐形成了一个诗歌流派，称为“台阁体”。其诗作，大多是应酬之作，歌咏太平、颂扬圣明成为这个流派的主要特点，杨荣就是这个流派的领袖人物。杨荣现存的诗文集《杨文敏集》中，这一方面的诗作占了很大部分，但其中也有一部分描写闽北家乡山水风光的作品，清新可喜；写给子侄亲朋、闽北乡亲父老的诗作也颇具情味。其中载于该书卷七的《题画》，是二首七言绝句，其中还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掌故。

建宁府瓯宁县有一位穷书生，因进京赶考落第，身上盘缠用尽，饥寒交迫，穷困潦倒。好在此人颇善丹青，画得一手好山水，于是把家乡的好山好水倾诸笔墨，裱成卷轴上街叫卖。因为他是一个落魄书生，在画坛上又是无名之辈，上街喊破了嗓子，也没能卖出一幅画。

就在此窘迫困顿之际，偶然得一内行人指点说，此画技法不差，若得名家题词，则身价倍增，何愁区区衣食之资？他茅塞顿开，于是绞尽脑汁寻找名家，忽然想起了位居宰辅的瓯宁乡亲杨荣。但此穷书生与杨荣素无交往，只是在家时曾听人说杨家人颇乐善好施，口碑甚好。其祖上造“万木林”济贫救困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在家乡世代传扬。为今之计，别无他法，只好贸然去找他试一试了。

于是，第二天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杨府，递上自制的名刺求见。也是此穷书生时来运转，这天正好杨荣在府中，一见是瓯宁同乡来访，于是宣其进府。见面后，穷书生将身世、来意一一禀明。杨荣命人打开画轴，平铺在案几之上，一面欣赏画幅中家乡的山水，一面构思题诗，不过一盏茶的功夫，二首七言绝句已分别题写在画幅上。其一是：

谁家老屋枕溪渍？十里青山半是云。
此处更无尘迹到，只应啼鸟隔花闻。

其二是：

小桥流水漾晴沙，策杖归来日未斜。
昨夜东风花落尽，一林高树锁烟霞。

题毕，将其书室“白鹤山房杨氏”的印章钤在纪年之末。题字稍干之后，穷书生带上书画，高兴地拜谢而去。

第二天，穷书生将此二幅画悬挂于京城最繁华热闹的市中心，一时观画、购画者络绎不绝，藏家竞相抬价争购，穷书生因此得到一笔数额不小的钱财，得以平安返回家乡。

（方彦寿）

建瓯图书馆创始人谢源

在福建县市一级图书馆中，建瓯图书馆以建馆历史悠久，藏书丰富，古籍文献众多面著称。当渴盼知识的人们置身于翰墨书香之中，泛游于书海之时，不能不怀念该馆的创始人谢源先生。

谢源，字伯安，建瓯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生。民国4年（1915）与黄润、张炳、叶籍、谢煌等筹备建立图书馆。民国7年正式建立建瓯县公立图书馆，议定先由筹备同人自献藏书，同时向

地方宿儒学人募集，并向商界募款购书。民国9年，谢源任馆长，无薪给，惟求奠定图书馆基础。民国12年，谢源向笋商劝募，年得沙笋捐附加银圆300元。自此有正常经费，得以购置新书、报刊及儿童读物等。馆址也自缪公祠（今实小校址）迁至夫子祠，先后设立阅览室、图书室、书库，粗具规模。民国14年7月，谢源赴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参观先进图书馆，并在南京参加全国图书馆协会年会，向上海各大书局募集新书。回省后，聘请瓯籍在省木商及热心地方文化事业人士为赞助人，募来《四部丛刊》全集，《万有文库》第一集，《二十四史》及《新科学丛书》等，计1.2万余册。民国17年5月举行建馆10周年纪念大会，扩大了社会影响。民国21年，得政府批准，更名为建瓯县立图书馆，正式纳入国家文化事业体系。当年，谢源征集展品参加福建省社会教育成绩展览会，获二等奖。此时，馆址迁至建学明伦堂（今公安局东半），宇舍宽敞，环境幽雅。但驻军56师特别党部要占用，经谢源交涉，才同意拨款修缮鼓楼为新址。为发展新馆需要，谢源又向省、县各赞助人集资购得《四库全书》珍本、《福建通志》全部、《万有文库》第二集全部及各种丛书1万余册。至抗日战争前夕，藏书已达5.8万余册，与厦门、福州两图书馆齐名，为全省三大图书馆之一。谢源先后任馆长24年，一生心血尽耗于此。

谢源辞退后，仍关心馆务，因藏书繁多，建议聘专人编成《建瓯图书馆藏书目录》甲、乙两编。民国34年，建瓯县政府奉南京政府内政部通知，以抗战胜利要求设置县文献会纂辑文献，委任谢源为县文献会主任委员，并照规定成立修志馆。谢源聘请地方人士开馆修志，历时一年，完成全志三分之一初稿，并出版民国35年《建瓯文献年刊》1册。后因物价暴涨，经费不足，工作中断，所辑志稿也散失无存。

民国25年，建瓯消防队改组为消防委员会，谢源被推为常务会主席。民国27年抗日战争初期，参加抗日后援会消防工作团，

谢源任团长。建瓯频遭敌机轰炸，消防工作团在救火救伤时，谢源都能到场指挥。民国31年消防队改组，谢源在家设诊所行医。1982年无病而卒，终年93岁。

（杨敬村　潘渭水）

“三一八”烈士刘葆彝

刘葆彝，字明伦，号序五，建瓯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生。民国8年（1919）就读于福建省立第五中学，民国12年毕业。初进北京郁文大学文科，感于国弱民穷，有志振兴实业，于次年考入中国工业大学，潜心工业研究。曾撰《论实业与革命》一文，既痛恶军阀乱政，实业不振，又恨帝国主义侵略，民族工业备受摧残。对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及所著《建国方略》深表景仰，尤倾向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孙中山先生逝世，他哀悼革命未成，痛失导师，乃于民国14年加入国民党，为继承孙中山遗志而奋斗。

民国15年3月13日，冯玉祥革命军与奉军作战，日本帝国主义军舰公然驶进大沽口炮轰冯军，被大沽口守军击退。日军竟联合英美等八国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撤除大沽口炮台”的无理通牒，激起爱国民众的义愤。18日，北京群众5000余人在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在天安门举行国民反抗八国联军最后通牒大会，会后游行，要求执政府拒绝八国通牒。当游行队伍行至国务院门口时，段祺瑞竟下令卫队向群众开枪，当场杀害群众47人，伤150余人。刘葆彝与工大同学江禹烈、陈爽3人同时殉难。次日，《北京国民新报》以段祺瑞屠杀爱国民众为题，向全国通报。工业大学学生会由《上海申报》传达向全国通电，并发表宣言吁请全国

各界爱国同胞一律罢市、罢课、罢工，打倒段祺瑞卖国政府。全校师生员工于3月21日举行大规模追悼会。次年“三一八”纪念日举行公祭，并将刘葆彝等的遗骨葬于圆明园。工业大学还于校内建立纪念碑及烈士亭，由书法家于右任题字，以表敬仰，并定为烈士。

刘葆彝殉难时仅24岁，遗有二女。其故居在城关五通巷，民国18年以刘葆彝之号改称“序五里”，以资纪念。

（潘渭水）

潭阳沧桑



清代建阳《蔡氏九儒书》刻版（建阳市）

潭阳古邑话沿革

建阳是福建五个最古老的县邑之一(其余四县分别为侯官、建安、汉兴、南平)。从考古发现的地下文物和遗址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闽越族先民栉风沐雨，披荆斩棘，生息、劳作、繁衍在这块土地上。

商周时期，建阳属七闽地。秦属闽中郡。汉武帝元光至元鼎年间（前134—前111），东越王余善因不满汉室之封而叛汉，自立为东越武帝。他在闽北营建了六座军事城堡，以抵御汉军。其中一座为大潭城，虽然，上古的“城”不能等同于现代意义的城市，但现代的城市却往往从古“城”演化、发展而来，因此，也可以说，此为建阳建城之始。余善筑城，本意虽为拥兵自立，进行军事割据，但在客观上，对建阳古城的城市建设，有首创之功。余善筑城，时间约在公元前134—前111年，距今已有二千多年，而建阳建县的历史比其晚了三百多年，故有建阳筑城早于建县的说法。潭城西北依山，东南临水。山名大潭山（今登高山），城也因之而名，并沿用至今。后人有潭邑、潭阳、潭水等名者，均由此衍化而来。

东汉建安十年（205），孙权遣贺齐讨平上饶，分上饶地及建安（今建瓯）的桐乡置建平县，此为建阳建县之始。西晋太康元年（280）更名为建阳，属建安郡。晋永嘉三年（309），光州固始人危京任建州郡守，率领一批“避兵之民”定居建阳。此后，每当中原战乱，闽北诸邑成了难民移居闽中的第一站，建阳由此风俗日移，后人有“备五方之俗”的说法。梁朝著名文学家江洪，曾

任建阳县令。他是见载于历代《建阳县志·职官表》中的第一位县令，也是历代《建阳县志·名宦志》中的第一位名宦。

隋开皇九年（589），建安郡降为县，建阳县被撤销，并入建安县。唐武德四年（621），建阳复升为县，隶属于建州，并被列为全闽七个上县之一，人口超过6000户。武德八年（625），复撤县并入建安。直至垂拱四年（688），再度恢复建阳县。唐咸通十年（869），邑人余镐举进士，此为建阳历史上第一位进士。

唐乾符间（875—879），豫章（今江西南昌）熊秘偕其侄熊博入闽定居建阳，为建阳熊氏始祖。熊秘在崇泰里建鳌峰书院，为福建最早的书院之一。乾宁间（894—897），京兆（今属陕西）刘翱偕弟翔、翾及妻兄蔡炉入闽定居建阳，分别为建阳、崇安五夫刘氏及建阳蔡氏之祖。

唐末，建茶已有“晚甘侯”名品，有建阳“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品”的赞誉。唐代建阳青瓷，已开宋代建盏先河。今存将口唐代窑址，长达52米，为全国目前已知最长的唐代龙窑遗址。

五代保大元年（943），闽王王审知三子建州刺史王延政在建州称帝，建立起仅统治建安、建阳、邵武、浦城、将乐五县的“大殷国”，时人讥为“五县天子”。历时三年，为南唐所灭。

北宋淳化五年，将建阳县北部的崇安场划出，另设崇安县。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建州升为建宁府，府治设在建安，建阳为其属县。景定元年（1260），唐石里（今黄坑）产嘉禾，一本十五穗，诏改建阳县为嘉禾县。自此，建阳又称“嘉禾之乡”。两宋时期，建阳经济文化发展迅速。建茶、建盏列为贡品，风靡海内外。造纸业发达，刻书业兴盛，建阳成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蜀、浙、闽）之一，建本图书无远不至。书院林立，讲帷相望，以朱熹为代表的“考亭学派”迅速崛起。

南宋景炎元年（1276）十一月，元军入闽，占领建宁府；次年（元至元十四年），攻占建阳。建宁府改为建宁路，建阳为属县，有元一代，建阳仍是全国刻书中心之一。元皇庆二年（1313），朝廷颁发政令，以朱熹的《四书集注》、《周易本义》，蔡沈《书集传》，胡安国《春秋传》等书，为科举考试法定经本。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一月，明军从杉关入闽，攻克光泽，直下邵武、建阳。明洪武元年（1368）正月，攻克建宁、延平。建宁路复称建宁府，建阳仍为属县之一。朱明王朝重视文教事业，邑中先贤遗留的书院屡经修复、扩建。刻书业发展至鼎盛时期，前后累计麻沙、崇化两地书坊多达二百多家。

清顺治三年（1646）八月，清军攻克建宁府，连下建阳。顺治四年（1647）和九年（1652），分别有建阳长埂农民赖逢吉、麻沙陈得容先后率农民军起义，反抗清军压迫，占领县城。“三藩之乱”中，建阳曾有两年多时间沦于耿精忠叛军之手。房屋焚毁，百姓逃离，人口锐减。盛于三朝的刻书业从此走向衰败。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次年二月，撤建宁府建置，设延建邵道观察使于南平，建阳为其属县。

1949 年 5 月 11 日，建阳解放。6 月 9 日，成立建阳县人民政府。1950 年至 1956 年、1971 年至 1987 年建阳曾两度为建阳行政公署驻地。1994 年 3 月 4 日，国务院批准撤销建阳县，设立建阳市。具有悠久历史的建阳，从此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方彦寿）

大潭山上曾筑城

建阳城北，有一座不高的山，形状像一头斜卧的大水牛，因

此被称为“卧牛山”。过去每逢重阳节这一天，城里的男女老少都会到这山上“登高”，所以后来又被叫做“登高山”。其实，这座山就是史志上所记载的“大潭山”。

大潭山地处由北向南而流的崇阳溪畔，扼守着建阳城北路口，位置十分重要。别看它范围不大，但在上古闽越之时，这山上却曾筑过“城”，是一处战略要地呢。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将闽越之地立为“闽中郡”，仍由闽越族首领无诸管辖。建阳当然属闽中郡管辖范围。汉朝建立后，汉高祖刘邦因无诸佐汉攻楚（项羽）有功，因此在高祖五年（前202）封无诸为闽越王，都东冶。到了汉武帝元鼎年间（前116—前111），无诸裔孙余善拥兵反叛，在闽北修筑六城拒汉。六城即在建阳大潭山修筑的大潭城，在武夷山市城村修筑的古粤城，在浦城县修筑的汉阳城、临浦城、临江城，在邵武市修筑的乌坂城。上古的“城”不同于现在意义的城市，它多半为了军事防御或进攻的需要而修筑。余善在闽北修筑大潭城等六城，实际上就是在上述六处修建了军事要塞，用于抵御汉朝的军队。

余善对国家统一的反叛分裂行为，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失败的下场。汉元鼎六年（前111），汉武帝派出军队征讨余善。尽管余善在大潭山等六处筑城作了顽抗的准备，还是被部下所杀，反叛被平定了。但是，闽越族人也因此被汉武帝迁徙于江淮之间，八闽土地上一段很灿烂的闽越文化因此也被划上了一个句号。

东汉建安十年（205），孙权在大潭置建平县，这是建阳立县之始，县治即在大潭山下，称做大潭城。晋太康元年（280），建平县更名为建阳县，算起来，建阳立县的历史已近1800年了。

现在，要在大潭山寻找两千多年前闽越族人所修筑的“城”，自然是无迹可寻的了。它作为上古一段历史，早被载入史志之中。今天的大潭山，已辟建为“潭山公园”，不知众多的游人身临其境

之时，是否会产生怀古之情呢？

（徐贯行）

东周青铜剑、矛与西周青铜斧

1982年初夏，建阳市（当时为建阳县）在全市境内开展文物普查。普查期间，在徐市镇（当时称徐市公社）后门山基建工地出土了青铜剑、青铜矛各一件。青铜剑剑首已残，残长29厘米，剑身有脊，剑格两面铸有不同形状的饕餮纹，青铜矛骹部残折，刃部较窄，中脊起棱，圆骹中空，最宽处3.6厘米，残长20厘米。这两件上古兵器，经当时参加普查的福建省博物馆林忠干同志鉴定，认为“具有中原地区东周时代流行的形式作风，属战国早期可能性比较大”。另外，普查期间还在徐市废品收购站征集到当地出土的青铜斧两件，经鉴定属西周时期兵器。

建阳在周时属“扬州荒服”范围，与中原地区没有大规模的交往，聚居在这里的主要是闽越族人，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夏官》中记载闽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赵世家》也称“夫剪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可见上古时闽越文化与中原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在建阳竟出土了西周与东周时中原风格的青铜剑、矛、斧，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其中奥秘进行探究的兴趣。

答案大概有两个。一是上古时中原已有小规模人口南迁入闽。关于这一点，有《周礼》注释为佐证：“叔熊氏族原居濮，迁移到闽，子系分为七种，故称七闽。”二是战国时，由于躲避战乱，一部分中原人口向南迁徙，进入闽北（建阳）。

其实，无论是何种答案，这四件周代中原风格青铜兵器的出土都生动地证明建阳作为闽越故地，其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往是源远流长的。正因为如此，它才成了后来中原文化进入福建的“文化走廊”，为整个华夏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过积极的贡献。

（徐贯行）

兔毫碗盏话建窑

……

道人绕出南屏山，来试茶点三昧手。

忽惊午盏兔毫斑，打出春瓮鹅儿酒。

……

这几句诗是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称赞“兔毫盏”而作的。那时，兔毫盏被视作“宝碗”，许多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都十分喜爱这种瓷盏，连皇帝也看中它，宋徽宗就在《大观茶论》中写道：“盏色贵有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因此，兔毫盏便成了“供御”之品。朱琰《陶说》记载：“按宋时茶尚敞碗，以建安兔毫盏为上品。”

这“上品”建安兔毫盏的产地，就在如今建阳市水吉镇后井和池中两个村子附近的山坡上。虽然，时间已经逝去近千年，但在那些山坡上至今还遗留着大量的废窑堆积，窑具匣钵、黑瓷残器几乎俯拾皆是，其范围面积约 10.4 万平方米。从这些遗址的规模就可以想见昔时的兴盛景象。

建窑为宋代八大窑系之一，它的制瓷历史可以上溯到五代之时，至两宋成为鼎盛时期。其所产的黑釉瓷器风格独特：大口小足，胎重釉厚，色亮如漆，呈现兔毫花纹窑变，在那乌金黑釉

中，浮现着大大小小的斑点或兔毫花纹，周围跃动着蓝晕色的光辉，灿烂的光辉随着人们观赏角度的变化而移动着位置，令人赞叹不已。

宋、元之世，建窑瓷器不仅在国内朝野上下风行一时，而且流传国外。据史书记载，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日本山城人加藤四郎、左已门景正等人随道元禅师来华，特到福建学习建窑烧制瓷器技术。五年后回国，开创了日本制瓷业的先河，加藤氏因此被后代尊为“陶瓷之祖”。建窑瓷器在日本被称为“兔毫天目”，至今被视为“国宝”收藏。

从50年代起至今，中央和福建省文物考古部门数次对建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研究，先后发掘出龙窑多座，其中一座全长135.6米，是全国已发掘的宋代龙窑中最长的一座。专家们估计，当年建窑每窑烧制的瓷器数量在10万件以上。

建窑及其烧制的黑釉瓷器，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骄傲，是华夏文化瑰宝之一。1985年10月，福建省人民政府已将建窑遗址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徐贯行）

“琅嬛福地”与“图书之府”

“琅嬛福地”是我国古代图书发展史上的一个优美的传说。相传著名的文学家、藏书家张华（232—300）在未担任西晋大臣之前，曾在建安郡（郡治在今建瓯）做过小官。有一次，他到野外游玩，途中遇到一人，邀他到一洞宫，石壁兀立之中忽有一道门，门内别有天地，但见宫室巍峨，气派不凡。张华被引进一室中，室

内陈书满架。此人介绍说："这是历代的史书。"又带到另一室，说："这是各国的志书。"这样，一室一室参观过去，每室都有奇书。其中有一室屋宇甚高，关闭得很严，且"有犬守之。张（华）问故，答曰：'此皆《玉京紫薇》、《金真七瑛》、《丹书紫字》诸秘籍。'……华历观诸室书，皆汉前事，多所未闻者，如《三坟》、《九丘》、《梼杌》、《春秋》亦皆在焉"。张华看了非常高兴，对此人说，能否让他在此借住一段时间，以便把这些书阅览一遍，此人婉言拒绝了，并命小童将张华送出。张华问此地名，回答说："此琅嬛福地也。"

"琅嬛福地"由此成为后代藏书之处的代名词。清代苏州的藏书名家张燮的藏书处，即命名为"小琅嬛福地"，扬州阮元有"琅嬛仙馆"，福州陈寿祺的藏书处名"小琅嬛"，典均出于此。这个传说，为闽中的藏书史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史料，表明地处建安的"琅嬛福地"可称为福建最早的"图书之府"。

如果说，"琅嬛福地"是以传说的面目示人，从治史的角度看，还有待于进一步论证的话，那么，数百年后，"图书之府"在建安一带果真出现了，这便是萌芽于五代，崛起于两宋时期的建阳刻书业。

建阳刻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宋、元、明三代是我国著名出版中心。南宋时，在朱熹、陆游、叶梦得等人的笔下，即已出现了建本、麻沙本的称谓。在祝穆《方舆胜览》一书中，将建本图书列入"土产"一门，摆在建盏、建茶之前，并称"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图书之府"。"图书之府"由此成为建阳的一大美称。

建阳地处闽、浙、赣三省要冲，交通便利，森林资源丰富，造纸业发达；"建阳七贤"朱熹、蔡元定等理学大师在此结庐讲学，书院林立，文风鼎盛。这就为建阳刻书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

件和文化环境。

宋代建阳刻书业繁荣的主要标志是刻书机构众多；刻书地点分布广泛；刻书数量居全国之首。官府刻书、私家刻书、书坊刻书三大系统已经形成。官府刻书，近为建阳县衙，远为建宁府署、福建省的官方机构委付建阳书坊刻书。私家刻书如蔡梦弼家塾、黄善夫家塾、刘叔刚宅等以“私宅、家塾”名号出现的刻书家即是，南宋时建阳的私家刻书有二十几家。

书坊刻书是建阳历代刻书业的主力军，势力比较雄厚的书坊多拥有自己的书工、刻工、印刷和装订工匠，并聘请编、校、撰者。有的书坊主人则自编自刻，集编辑、刻印、销售于一身，相当于现代的出版社和书店；有的书坊则接受委托印书，相当于今天的印刷厂。

历史上，建阳书坊以余、刘、蔡、黄、熊、叶、虞、詹诸姓比较有名。由宋至明，世代相沿，形成了刻书大族。后人甚至以“书林门阀”、“刻书世家”称之。宋代，两坊著名的刻书家，举其要者，有余仁仲万卷堂，刻印《春秋公羊经传解诂》；黄善夫家塾，刻印《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蔡梦弼家塾，刻印《史记集解索隐》；蔡琪一经堂，刻印《汉书集注》；刘元起家塾，刻印《后汉书》；黄三八郎书铺，刻印《韩非子》等。元代，有建阳虞氏，至治间刻印《三国志》等评话五种，为现存较早的小说刻本。余志安勤有堂刻印《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刘君佐翠岩精舍刻印《诗集传附录纂疏》，刘锦文日新堂刻印《揭曼硕诗集》等。明代，有熊宗立、熊冲宇种德堂，熊大木、熊龙峰忠正堂，余象斗双峰堂、三台馆，刘弘毅慎独斋，刘龙田乔山堂等，所刻书均多达数十种不等。

从内容上看，建本图书经、史、子、集、丛，靡所不备。宋元时期，以经、史、子部儒家、医书、类书和文集为主。传统的

经学著作和子部儒家类中，又以朱熹学派人物的著作居多。其原因一方面是宋代重科举，研经读史是士子求取功名、决胜科场的敲门砖；另一方面是建阳乃考亭故居，学者众多，这类书拥有考亭学派的大量读者。明代，经史之外，还刻印了大量的小说、戏曲以及日用通俗读物。据粗略估计，今存国内外大中图书馆的宋、元、明建本图书，至少不下千种，这就为今天的古籍整理和研究提供了可供比较的版本系列。

建本图书，南宋时就已流传到海外。朱熹就有“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的描述；熊禾有“书籍高丽日本通”的诗句。据有关著述，建阳书坊刻印的图书古籍，至今在日、韩、美、英、法等国图书馆均有珍藏。据《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所列，明代建阳书坊所刻小说仅《三国演义》一书在国外就有数十种之多。建阳古代劳动人民在保存、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方彦寿）

巍然屹立书林门

书林门坐落在今建阳市书坊乡高乐山上。这里，是古代朝野名流、名僧高道、骚人墨客、书商贩贾出入古书林的必经之所。离此门约数百米远，迄今还保留着一条鹅卵石铺成的古驿道，与书林门一起，昭示着书林昔日的繁华。

书林门始建于何时？县志失载，史家迄今无考。探求其渊源，需知“书林”之来历。在西汉文学家扬雄的《长杨赋》中，已出现了书林一词，文称“今朝廷纯仁，遵道显义，并包书林，圣风

云靡”。其本义为文人学者荟集之所，此后逐渐被引申为收藏图书众多的地方。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刻书中心，建阳在南宋时已有“图书之府”之誉。在南宋建阳祝穆《方舆胜览》一书中，图书之府是建阳麻沙、崇化两坊的并称；而以“书林”称之，大约稍晚于此，是元明时期人们对崇化书坊（不包括麻沙）的专称。这是“图书之府”与“书林”在建阳刻书史上的不同之处。

“书林”作为崇化坊的专称，今可考者，最早见于宋末元初民族英雄、著名诗人谢枋得避地建阳之时，在崇化书坊所写的《书林文笔》一诗。此诗首句即称“巍巍文笔光书林”。嘉靖《建阳县志》卷三中有所谓“书林十景”，书林文笔为其中之一。明正德间，建阳知县戚雄写的崇化《清修寺》一诗，则有“咫尺书林应万户”的描写，说明在元明时期，“书林”已逐渐成为崇化书坊的美称。据史家考证，元代的崇化坊，仍有刻书作坊数以十计，这众多的书坊分布在不过弹丸之地的崇化坊中，确有“书坊林立”之感，这便是崇化被称为“书林”之由来。

由于前有文人学者的推崇，在明初的建阳书坊中，刻书家们已将“书林”作为地名录入自己的刻书堂号之中。如“书林三峰刘氏日新书堂”、“书林叶氏三峰堂”、“书林刘氏安正堂”、“书林余氏”等。明中后期，类似以“书林×氏××堂”命名的刻书作坊不下于数十家。以此推之，书林门之建，最晚不迟于明中叶。

建立此门坊者，应为当地的书商和乡民，集资筹措而成，因此不为官方所重视，在地方志书中不见记载。相反，嘉靖十二年（1533）福建提学副使潘潢动用官帑，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字为序，在崇化书坊分别建立了崇孝、崇弟、崇忠、崇信、崇礼、崇义、崇廉、崇耻八坊，嘉靖《建宁府志》中却载此甚详。值得玩味的是，历史并不以一时的尊卑荣辱论英雄，此八坊早已化为尘埃，荡然无存，而“书林门”却至今巍然屹立。

书林门正面为“书林门”三字，背面为“邹鲁渊源”四字，书体遒劲有力，是建阳作为我国古代出版中心和朱熹理学发祥地之一的立体体现和历史见证。书林门之建，使“书林”成为建阳崇化书坊的一个特有标志，随着此地刻印的图书传播四方，在历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致明代著名的通俗小说作家施耐庵在《水浒传》中也借用了这个名词，在小说开篇“引首”即言：

试看“书林”隐处，几多俊逸儒流……

（方彦寿）

“书林门”与“积墨池”

从宋代到清初七百多年，建阳的崇化里（今书坊乡）和永忠里（今麻沙镇）一直是我国雕版印刷中心，被称为“建阳书坊”或“潭阳书林”。两坊“书市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这里出版的图书，“行四方者，无所不至”。

如今，在书坊乡高乐山上还矗立着一座古代坊门——书林门。它高约6米，在拱形门的上方，正面镌刻行楷“书林门”三字，背面镌刻行楷“邹鲁渊源”四字。书林门是崇化书坊曾经辉煌的标志，当年各地客商就是从这座坊门下的“官道”进出书坊贩书的。

有关书林门的来历，当地流传着一个传说：

古时候，崇化里众多印书作坊中，熊家和余家是最大的两家书坊。一天夜里，熊家和余家两位坊主，都梦见一位长着浓眉大眼、双目炯炯有神的仙人，来到书坊里试探他们的心事，见他们不为权势所动，就叫他们到高乐山后的仙亭岗去，送给他们三块大金砖，两位坊主依然见利无所动心。那仙人十分满意，便将三

块金砖抛向空中，变成了三匹金色的骏马，从仙亭岗飞向岗下的高乐山。仙人对两位坊主说："这三块金砖会使你们书坊名扬天下！"说完便不见了。两位坊主从仙亭岗下来，到了高乐山，只见眼前矗立起一座先前没有见过的坊门，坊门上方镌刻着"书林门"三字。从那以后，崇化书坊果然名扬天下了。

这座书林门历经七百多年风雨，一直安然无恙。"文革"时"破四旧"被拆毁。80年代初，书林门已在原地依原样修复，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从高乐山的书林门下山，沿着当年的"官道"进入书坊村，在村边稻田环绕之中，还有一处古迹——积墨池。据说当年崇化里各家书坊印书，都是从这口池井取水调墨，因为这池井的水印出的书籍字迹清晰，墨香扑鼻，而且不被虫蛀，可以长久保存。

积墨池的来历，也有一个动人的传说：

当年，崇化里有一位从京城汴京（今河南开封）来的长老，他立志要在这里办书坊印书，让天下人都能有书读。但是，他取遍崇化里100口水井里的水来调墨，那墨水都是一刷到纸上字迹就化开模糊了。长老十分苦恼，不知哪里能有好水可调墨印书。此时，有一条很灵性的"墨蛇"来告诉长老，只有它才能帮助长老解除烦恼——让它葬身离长老住处不远的一口池井之中，那池井的水就一定能印出好书来！长老不肯让"墨蛇"作如此大的牺牲，但"墨蛇"却义无反顾地投入池井去了！第二天，长老从这池井里取水调墨，印出的书页果然字迹清晰，飘出浓浓的墨香。从那以后，书坊各家作坊都是用那一口池井的水来调墨印书，人们便叫它为"积墨池"。

"积墨池"也经历了七百多年沧桑，在"农业学大寨"时被填没。80年代初，已重新修复，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徐贯行）

白塔山上漫流连

白塔山是建阳西部的名山，海拔1553米，坐落在麻沙镇溪头村境内，距市区70公里，与武夷山市交界。据传山上有岩石黑白分层，有如宝塔之状，在夜间还会发出光亮，所以被称为“白塔山”。

旧志书上记载着一则传说：唐朝时，有三位女子寻访修道之所，她们在武夷山望见白塔山上有“仙气”缭绕，便请一打猎人当向导，来到白塔山潜心修炼，果然得道，羽化成仙，就连那位猎人向导和他的猎狗，也得到了超度。后来，人们便在山上建庙祀奉这三位女子、尊她们为“三皇元君”。山上的“龙济道院”及“娘娘庙”，据说就是唐朝时辟建的，现存建筑为石木结构，系清代道光年间重新修缮。山顶最高处，还有一座小巧玲珑的石结构古建筑，俗称“烧香顶”，为道光十年（1830）修缮重建，已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白塔山山高林密，满目苍翠，别有风光。尤其盛夏时节，习习凉风扑面而来，加之林中百鸟和鸣，流泉叮咚悦耳，置身其中，就会感到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是一种纯真之美。过去人们上白塔山全凭脚力，由山麓至山顶，石径曲折盘旋，往往累得气喘吁吁，连说话的气力也没有了，故俗谚有“念如是（指建阳崇雒乡如是庙），偷白塔”之说，意思是说：去如是庙拜佛，要一路上念经便不觉得累；上白塔山进香，则需在路上少开口说话以保持体力才能上得了山。不过，现在汽车已可到达山上的林业工地，下车后只需再走一段石径便是龙济道院了。山上风景区范围颇广，方圆

约十华里，有飞来石、仙人洞、棋盘石、起身石、试心石、荡脚岩和前人留下的摩崖石刻等景观胜迹，每一处景观都有美丽的故事传说，使这座名山充满神话色彩。

前人传说，在白塔山顶看得见东海波涛。这话当然不足为信。不过，在白塔山顶观看日出，倒是可以领略一番大自然雄伟壮观的气象，那妙处简直就和在泰山顶上观日出一模一样。当一轮耀眼的红日，在被霞光染成淡淡玫瑰色的青山云海里缓缓跳动、最终从滚滚波涛般的云海里翻腾出来，射出了万丈灿烂的金光时，那气势的磅礴和景观的动人，一定会让你心潮如云海澎湃，震撼不已！

（徐贯行）

灵泉不涸说庵山

庵山在建阳城东，海拔1020米，为城区附近最高山峰，那巍峨挺拔的雄姿，在方圆几十里内一抬眼就望得见。不过从市区去庵山，却有20华里的路程，其中10华里是上山石阶，要登攀几千级石阶哩。

根据县志记载，庵山的得名始于后唐明宗之时，当时有一位叫做石湖的处士，在山上结草为庵修道，后人便称这座山为“庵山”了。

庵山上最奇的是，山顶有一口泉井，泉水天旱时不会干涸，雨季里也不会泛溢，终年水清见底，沁人心脾。如果将此泉水盛在杯内，水可高出杯口而不流溢，若再在杯上放一枚铜板或硬币，则铜板或硬币浮在水上不会下沉，也许这就是灵泉的妙处了。山顶

南峰的岩石龛中，以前还藏有“仙蜕”。所谓“仙蜕”即修道之人死后的遗骸，将其置于岩崖洞窟之中，是古代一种葬制，后来多用于修道之人。

庵山上的灵泉寺，历史悠久，供奉的主神为“三皇元君”，即在白塔山修炼成仙的三位女子。寺里还有关帝殿并供有其他神祇。灵泉寺依着峭峻的山势而构筑，远望有如凌空楼阁，很是壮观。山门外石阶之下，生长着十几棵数百年的柳杉，苍苍郁郁，依然显现出无限生机。

80年代后，庵山之巅建起了电视台。现代建筑与古寺庙相映成趣，成了庵山的新景观。近年人们将庵山作为假日旅游胜地，逐步开发出“庵山十八景”，登山游览的人络绎不绝。

（徐贯行）

拿坑小村十三桥

书坊乡的拿坑是个小自然村，一条小河从村中间流过，河上跨着一座又一座古朴的石拱桥。村中老人说，从村里到村外二华里长的河面上，过去一共有13座石拱桥，现在只剩下8座了。

根据石拱桥桥身上镶嵌的石刻记载，拿坑村这些石拱桥建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是由江姓人家募建的。村里河面上的3座石拱桥，在清乾隆十五年（1750）加造了石栏杆。所有的石拱桥均为单拱形状，每座桥长7至8米，宽5至6米，拱高2.8米，桥面厚0.5米。自石拱桥建成至今已有460多年，依然保持着原貌，且仍供人们通行，足见当时造桥工艺的精湛了。

民间传说，拿坑村过去是个有二里路长的大村庄，村里有个

大财主，占有着这里的山林和田地。财主雇了很多茶工佃农，为他种茶耕田。那时候村里河面上没有石拱桥，只有几座木头桥，因为走的人多，木头桥很快都烂了，不少行人从桥上跌下河去，跌得头破血流。但是大财主怕破了“风水”，硬是不肯出钱修桥。后来，有一茶工化装成风水先生，他对财主说：拿坑村是个算盘形，那条穿村而流的小河就是算盘梁，如果在河上修建13座石拱桥，就是算盘的13条档，那些在桥上来来往往的人就如算盘珠任由财主拨动，这样就有世世代代享用不尽的财富涌进家门。大财主听信了，便请来了造桥师傅，运来了上好石料，一口气建成了13座石拱桥。等石拱桥建好，大财主的“家当”也就花得光光的了。但是，13座石拱桥却永久保留下来，方便了当地百姓和过往的行人。

（徐贯行）

云谷路口“钦差庙”

过去，在莒口镇后山村去云谷山的路口，建有一座“钦差庙”；庙里奉祀着两位南宋时从京城奉命前来捉拿大理学家朱熹的钦差的神像。据说当地百姓十分敬重这两位钦差，所以庙宇虽然不大，但几百年来却香火不断。

捉拿朱熹的钦差，竟被百姓奉为神明，这是怎么回事呢？

民间传说，当年朱熹被皇帝请去当“侍讲”，就是当皇帝的老师。朱熹在皇帝身边讲课，常常规谏他要近贤臣、远小人，要他关心民间疾苦，准备收复失地。这样就得罪了当朝的大奸臣、宰相韩侂胄。韩侂胄不断向皇帝奏本，说朱熹的理学是蛊惑人心的

“伪学”，朱熹桃李满天下会对朝廷心怀不轨……那个昏庸的皇帝听信了韩侂胄的谗言，就把朱熹免职了，当时朱熹“立朝才四十日”呢。韩侂胄见朱熹被免职，并不善罢甘休，他又奏请皇帝向全国颁下了“伪学之禁”，缉捕和流放了一批与朱熹关系密切的官员和学者，最后还从京城派出两位钦差，来建阳捉拿朱熹。

朱熹得到朝廷要捉拿他的消息，并不理会，他继续在建阳乡间讲学和写书，传扬自己的理学思想。有时累了，也到外面走走，探亲访友，解解烦闷。

有一天，朱熹走在去云谷山的路口，知道了钦差已紧追而来。他正在为如何摆脱钦差犹疑不决之时，恰巧被路旁田中耕作的一位老农夫看见。老农夫停下活计，向朱熹问明情由后，就教朱熹用蜜糖水在云谷山路口的地上写下“日在云谷，夜落西山”八个大字，然后笑呵呵地对他说：“先生，有这八个字，那两个钦差再也抓不到你了！”朱熹不知老农夫葫芦里卖什么药，但也只好照他所说的去办。

等到两个钦差追到云谷山路口，向老农夫打听朱熹的行踪时，老农夫便对他们说：“朱熹这个人呀？他日在云谷，夜落西山，行迹跟着日头（太阳）哩，你们去抓吧！”这时，路口地面上聚来了千千万万的蚂蚁，蚂蚁爬在刚才朱熹用蜜糖水写字的地方，聚成了“日在云谷，夜落西山”八个大字。两个钦差看见了这八个大字，以为是有神仙帮助朱熹，就撞死在云谷路口的大树下了！

后来，附近乡民为了纪念这两位钦差不抓朱熹的节义之举，就在后山村往云谷山的小路边建起了“钦差庙”。民国23年(1934)，修建建阳——邵武公路时，小路扩成公路，原在路边的“钦差庙”成了路当中的建筑物，便被迁至公路边。新中国成立前几年，老百姓日子苦不堪言，钦差庙便也毁圮了。

（徐贯行）

“千柱落地”与“一夜巷”

水东村与建阳城只隔着一条崇阳溪，从前这个村子不大，村里多数人家姓沈。“千柱落地”与“一夜巷”的掌故，说的就是水东沈家祖上的事。

很早年间，水东有个沈郎二，他从小失去爹娘，靠为人家打帮工过日子。村里的大户人家都看不起沈郎二，他们家里如果有人生病，把吃过的药渣倒在门口路上时，都要说一句：“把这药渣倒给沈郎二吃吧！”

有一天晚上，沈郎二睡在自己的破草棚里，梦见一位白发老人对他说：“明天崇阳溪做大水，会流来十八缸银子，你去把它捡回来吧。”第二天，沈郎二到河边一看，果然河水猛涨，浊流滚滚。不久，从上游漂来了十八只大缸，沈郎二便一只一只把它打捞上来。不过那缸里并没有银子，只有一缸一缸满满的清水。沈郎二是个“犟”人，他连清水也舍不得倒掉，叫来打帮工的同伙，把18只缸连同清水一同抬回破草棚。

刚抬回缸，门口就来了个年轻的讨饭女子，向沈郎二讨钱。沈郎二对那女子说：“我和你一样穷，有什么钱给你？”那女子说：“有一位白胡子老人在梦中对我说，你有十八缸银子呢！”沈郎二苦笑道：“哪里有十八缸银子？只有刚从河里捡回来的十八缸清水。”年轻女子叫沈郎二再回头看看，沈郎二一回头，那十八缸清水竟变成了十八缸白花花的银子了。沈郎二想：我梦见白胡子老人，年轻女子也梦见白胡子老人，这一定是神仙在帮助我们两个人哩！于是，沈郎二就向那讨饭的年轻女子求婚，那女子就嫁给了沈郎二。

沈郎二有了这么多钱，日子就好过了。夫妻俩请来许多工匠，先修建了一座从水东村横跨崇阳溪到城里的大厝桥，起名叫“五福桥”。接着，他们就开始建一座大厝，沈郎二要这座大厝有一千根“栋柱”，叫做“千柱落地”。

县官听说沈郎二建的大厝是“千柱落地”，心里就嘀咕开了：只有皇宫才能千柱落地，沈郎二也要千柱落地，莫非他想当皇帝么？于是赶紧向朝廷写上奏本，说沈郎二要造反，已在修建“皇宫”了！皇帝见了县官的奏本，便立即派出官兵，要捉拿沈郎二斩首示众。

消息传到水东村，沈郎二夫妻俩一商量，当即决定在大厝的当中隔出一条小巷，这样就变成两座厝，每一座厝只有五百根栋柱，不满“千柱”之数，便构不成罪名。他们请工匠连夜施工，隔出了一条小巷。到了天亮官兵赶到时，小巷已经完工，看见的是两座大厝，每座厝只有五百根柱，便没有“罪名”抓沈郎二了。这条小巷便被叫做“一夜巷”。

这事过后，沈郎二夫妻将剩下的银子都分给了村里的穷苦人家，他们二人就不知去向了。有人说他们去庙里修行，有人说他们到外地谋生，反正谁也不知他们的归宿。

很多年后，水东村有一块很大很大的厝基坪，坪上的地面都铺着四方的斗面砖。沈家的后人说，那就是“千柱落地”的厝基，可见当年那座厝真的是很大的了。

（徐贯行）

衙坪“剥皮亭”

建阳城关民主北路市人民法院宿舍一带，新中国成立初至60

年代曾是县人民政府大院。民国前这里即为建阳县的县衙。县衙大门前是个大坪，俗称“衙坪”，衙坪上长着几棵粗大的老樟树。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衙坪上建有一座亭子，亭内立着一块大石碑，上面刻着“剥皮亭”三个大字。据城里现在60多岁以上年龄的老人说，他们小时候都见过这座“剥皮亭”。

堂堂县衙大门之前，偌大一个衙坪，为何会有一座不雅的“剥皮亭”？方志不见记载，民间却有口碑，它警示封建社会那些“为民父母”的官吏，不可太黑了良心。

传说，乾隆皇帝微服下江南，这天来到建阳城，恰好建阳知县在审案子。乾隆便连随从也未带，就跟着众百姓到衙门大堂下看审案去了。

公堂上站着一原告，跪着一被告。原告向县官说被告偷了他家的银子，被告连连叩头申辩说没有偷。知县也不传人证物证，就硬要被告招认。被告不肯招，知县就传令衙役动大刑，把个被告打得死去活来。堂下众百姓见知县如此不公，喧哗起来。乾隆见状，便从人群中挤出来，当众指责知县不该如此草率审案。那知县见有人竟敢在公堂上指责他，恼羞成怒，喝令衙役把乾隆拿下重责20大板，然后关入大牢。

乾隆在牢房里伤痛难忍，怒火中烧。有个小狱卒对这个新“犯人”十分同情，愿意为他给亲属送信。乾隆见这小狱卒十分忠厚，便让小狱卒带上自己的一枚小玉印章，连夜去建宁府（今建瓯市）送口信。小狱卒漏夜赶到建宁府，知府一见是乾隆的印章，立刻带着大队人马，在天亮之前就赶到建阳，从狱中救出了乾隆皇帝。到这时，小狱卒才知道要他连夜送信的人是当今“万岁爷”哩！

乾隆出狱后，亲自御审知县，发现他自上任以来，贪赃枉法，中饱私囊，冤枉无辜，草菅人命，已经引起当地百姓极大不满。乾隆愤怒地对那知县道：“长此下去，朕的江山就要被你这样的人断

送了！”

当下，乾隆御判：将这个民愤极大的知县就在衙门前大坪剥皮示众！并在行刑的地方立碑建亭，还挥笔为碑亭写下一副对联：“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副对联，便镌刻在亭柱之上，让以后的“父母官”一见就“触目惊心”呢。

“剥皮亭”毁于新中国成立前的民国时期，那时政治腐败，贪官污吏横行，他们怎么敢面对“剥皮亭”呢？

（徐贯行）

《长坂坡》欢迎太平军

每年的春节至元宵期间，建阳的民间音乐爱好者，就会聚集在一起，上街演奏《长坂坡》乐曲。他们一边行进一边奏乐，那激昂的乐曲旋律和着铿锵的锣鼓，不但引起人们的赞叹，而且许多年轻人还会一直跟在这支民间乐队后面，和他们一起游遍全城。如果举行民间文艺踩街活动，则这支《长坂坡》乐队更是不可缺少，有《长坂坡》在踩街队伍之中，倍增节日欢快热闹的气氛。

这支鼓舞人们激情的乐曲《长坂坡》，已经在建阳传承了一百五十多年，它表达着建阳百姓对太平天国起义军的爱戴和敬佩之情，是当年建阳百姓欢迎太平军入城的“迎宾曲”。

清朝道光三十年（1850）农历正月十一日，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农民起义。起义很快得到广大贫苦百姓的热烈响应，太平军所向披靡，于咸丰三年（1853）二月攻克南京。洪秀全将南京定为国都，改名天京。咸丰

六年夏，太平天国发生内讧，自相残杀。翼王石达开率所部20余万人离开天京。石达开的部下石镇吉的部队和辅王杨辅清的部队转战在江西、福建、广东等地。

咸丰七年，杨辅清率领的太平军首次攻入建阳县城。县志载："发军（指太平军）……三月二十一日，由江西入建阳，无人与敌，亦不焚掠，从西门入城，知县王华弃城走。"连官修的县志都记载着太平军是英勇善战和纪律严明的部队，老百姓当然会发自内心地热烈欢迎了。当时，建阳城乡百姓纷纷以红枣、灯芯、公鸡犒赏太平军，意思是祝愿太平军"早（枣）登（灯）基（鸡）"。太平军入县城时，市民夹道欢迎，民间吹打乐队演奏起自制乐曲《长坂坡》，兴奋地欢迎义军的到来。

《长坂坡》的曲调并不复杂，它是由《长坂坡》、《平讲》、《茉莉花》等民间乐曲组成，过门配以锣鼓。主要乐器有京胡、二胡、中胡、月琴、三弦等，适合于一边行进一边演奏。其中《长坂坡》激越昂扬，《平讲》欢快轻松，《茉莉花》优美抒情，加以锣鼓，组合成颇具特色的演奏曲，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庆贺胜利、鼓舞斗志的愉悦心情。

一百多年来，《长坂坡》作为建阳民间乐曲的"保留曲目"，传承不衰。

（徐贯行）

乡间最爱"采茶灯"

每年农历正月，闽北茶乡在闹花灯的时候总少不了那一盏盏的采茶灯，那经过民间艺术加工，糊扎得极为精致的采茶花篮，由

漂亮的“采茶姑娘”拎着，翩翩起舞，表现出浓郁的茶乡生活情趣，让人赞叹不已。

建阳是闽北水仙茶的故乡。有资料记载，最初的水仙茶源于小湖镇大湖村的祝仙洞，称“祝仙茶”，后来才传种到武夷山和整个闽北地区。因当地方言“祝”与“水”谐音，后来便叫成“水仙茶”了。

种茶的地方少不了采茶女。每年清明前后，是“头春茶”的采摘季节，漫山翠绿的茶园里，遍布着身背茶篓的采茶女，她们双手在茶丛中飞舞，片片嫩绿的新茶不断被采摘入竹篓之中……

忙完春、夏、秋三季茶事，快到过年之时，许多人家便开始糊扎采茶灯。待到正月，便高高兴兴地“玩”起采茶灯来。

采茶灯实际是一种民间舞蹈，它由十几至二十几位女子妆扮采茶女，每人手拎一盏采茶花篮灯，分成二队，各由一位手持蒲扇的“茶婆”带领，边走边舞，演示出门、上山、采茶、下山等舞蹈动作，艺术地再现了采茶女的劳动生活，极为风趣与优美，深受群众欢迎。

建阳的采茶灯舞，在许多农村广为流传。50年代时，曾作为代表节目，参加全省农村文艺会演。近年有方家说，如果当初省文艺采风团不是先去闽西而是先来闽北，则后来参加世界青年联欢会并获奖的有可能就是闽北的“采茶灯”了。

（徐贯行）

暨南大学驻文庙

文庙，就是奉祀孔子的庙。建阳的文庙最初建于宋代，后来

曾数易庙址，到清朝重修于童游崇阳溪畔，是当时建阳最恢宏的建筑。

抗日战争时，校址在上海的暨南大学校舍被日寇炮火所毁，随着战事的日益扩大，1941 年该大学撤至建阳，迁入建阳文庙。

暨南大学迁来文庙之前，这座古老的建筑早已年久失修，殿堂上蛛网密布，庭院里杂草丛生，满目破败荒凉。自从暨大迁入，这里便被修葺一新，屋瓦重新翻盖，墙壁再度粉刷，清除杂草，重铺道路，一派欣欣向荣景象，来自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以发愤攻读的琅琅书声，打破了孔老夫子千年“守庙”的寂寞。

往昔空旷沉寂的文庙，因为暨大的到来，虽然“蓬荜生辉”，却也显现出空间的狭小：大成殿被作为大学的礼堂，明伦堂和东西两庑改建为教室和办公室以及宿舍，崇圣祠办成了图书馆。尽管作了这样紧凑的安排，房屋还是不够用，因此在文庙附近的一些其他寺庙和祠堂，也都被改成了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宿舍。

那时候，条件相当艰苦，破旧古老的建筑，虽是被“修葺一新”，但无非是以杉木板、毛竹片搭盖或相隔，再以烂泥和着稻草涂抹，便是墙壁了。屋顶用瓦片或茅草铺盖，窗户只是用薄薄的毛边纸粘糊了。到了晚上，自然也没有电灯，只能以桐油灯或菜油灯照明。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就是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工作和学习。不过，他们那炽热的爱国之情，孜孜不倦的求学之心，并不因条件的艰难而减弱半分。

历史上，建阳因朱熹长期在此讲学而被称为“理学名邦”，后更誉为“南闽阙里”，可见文风之盛。但到了民国时期，民不聊生，文化的氛围早已极其衰微。暨南大学内迁建阳，重新使建阳的文化兴盛起来。当时东南各省的许多进步的文化名人陆续来到建阳，汇聚在这座高等学府里。他们不但承担着教书的工作，也义不容辞地挑起了以进步思想育人的重任。暨大师生组织的剧社和歌咏

队在建阳经常演出，宣传抗战的报刊也在建阳出版，各种形式的抗战宣传活动在建阳轰轰烈烈展开，一时间建阳成了东南地区一座文化名城。

暨南大学在建阳文庙办学5年，直至1946年才迁回上海，但留下的影响，却相当深远。

建阳文庙这座有纪念意义的古建筑，现在已经无存。其旧址新中国成立后曾是建阳地区农校所在地，现在已新建为建阳市立医院生活区。

（徐贯行）

“高照”彩灯甲四方

过去，在建阳城关、将口、童游等地，从春节至元宵期间，不但有闹花灯、妆春台、舞龙、踩高跷、划旱船等民间文艺表演，还有一种很特殊的花灯——“高照”。那十几米高的彩灯，极为壮观，让人见了就会情不自禁地发出由衷的赞叹。

“高照”灯俗称“竖高照”。表演竖高照时并配有表演排字的花钵舞。每年将近春节时，由灯会组织专门扎糊“高照”的民间艺人开始制作，“高照”主灯是由一根10米长的大毛竹作为轴心，在这根大竹上精心扎糊起许多能活动的规格相同的精美花灯。“高照”在游行中横扛时，这些花灯各自成盏；“高照”在表演竖起时，这些花灯组合成一座“灯塔”。主灯扎糊好后，还要扎糊一个3米多长的“高照尾”，“高照尾”上悬挂着许多小彩灯。

竖“高照”的日子，盛况空前。前有舞龙队一路舞龙行进，接着是大鼓（由两人抬着）大锣的十番锣鼓队，再接下来是“春

台”队。每座“春台”由四人抬，台上是妆扮的刘备、关羽、张飞、薛仁贵、杨宗保等历史英雄人物。后面便是横扛着的“高照”队伍和花钵舞队了。整个队伍在锣鼓和鞭炮声中徐徐行进，十番锣鼓队中还不时吹响“嘟嘟”的海螺，气氛十分隆重热烈。当行进到街道宽敞地段或丁字路口（过去建阳城没有十字路口）时，大商家会特别燃放一挂要求竖“高照”的鞭炮，这时队伍停住，先由舞龙队表演，还要将龙舞进这户商家的店堂里转一圈出来。之后，“高照”队开始竖“高照”，他们先将“高照”和“高照尾”接好，然后十几位头戴竹盔、手握木杈的青壮男子将“高照”很快撑竖起来。顿时，有如灯塔一般的“高照”，上下光芒四射，四面放出异彩，“高照尾”上的许多小灯笼迎风摇曳，好像在向观赏的人们致意。随着竖“高照”人脚步挪动，“高照”缓缓转变角度，叫做“打照面”，观赏的人们在原地就可以看到“高照”的每一个面。与此同时，花钵舞队的姑娘每人双手各持一盏花钵灯，在“高照”之下翩翩起舞。她们将“花钵”排成“五谷丰登”、“天下太平”、“招财进宝”等字样，与“高照”交相辉映，令人叫绝。

竖“高照”的历史已相当久远。旧《建阳县志》载，清朝乾隆年间，江苏人蒋元枢任建阳县令，在元宵节看到建阳的花灯和竖“高照”，赞叹道：“纱灯以吾苏州为最，纸灯甲天下则莫如建阳。”可见当时就颇负盛名。

新中国成立初期，建阳城关还竖过“高照”，后来逐渐失传。90年代初，在有关部门重视下，童游镇彭墩村重新发掘出这一宝贵的民间艺术。“高照”不但多次进城表演，还赴南平市参加全区民俗表演，受到热烈欢迎。“高照”正以它璀璨的艺术形式，成为建阳极具特色的民间文艺之花。

（徐贯行）

江为的绝命诗

明初有个叫孙蕡的，担任过翰林典籍、苏州经历等官，因牵涉到一桩文字狱中，被皇帝朱元璋以谋反罪处死。临刑前，孙蕡口诵了一首诗："衙鼓侵人急，西倾日欲斜。黄泉无旅舍，今夜宿谁家？"后来，据说朱元璋知道了这件事，指责监斩官，说孙蕡能作这样好的诗，你竟然隐瞒不报告就把他杀了？于是，一怒之下也将监斩官赐死。

朱元璋哪里知道，孙蕡只不过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而已。这首诗的真正作者是五代建阳人江为。江为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青年时曾游学庐山。当时，闽县有一位很有名气的诗人陈贶在庐山隐居，江为就拜他为师，前后达20年之久，得其真传，所到之处，诗名鹊起。南唐中主李璟极为赏识江为的才华，屡次下诏欲起用他，江为不就，始终以一介布衣吟咏江湖。后主李煜当权时，江为因借事讽喻朝政，被借此邀功的小人告发，判以死罪，临刑前作了前面提到的那首诗。按常理来说，被人诬陷而死，应是满腔悲愤，但江为此诗，心境却极为平静，他甚至把死看成是一次旅行，以至发出"今夜宿谁家"这样纯真的疑问。然而，在平淡从容的诗句后面，读者不难体会到诗人对封建文字狱悲愤又无奈的心情。

对江为的诗，南宋建阳诗人陈洙体味颇深。他有一首吊江为的诗："处士亡来二百年，旧居牢落变祇园。诗名长伴江山在，冤气欲摩星斗昏。台榭几人留好句，渔樵何处问曾孙？旧时泉石生涯地，日暮寒云绕寺门。"从江为冤极而不怨的诗句中体会出"冤

气欲摩星斗昏”，可谓江为此诗的知音。

江为的诗风清逸流丽，与其族叔江文蔚、浦城杨徽之齐名，撰有诗集，惜已散佚。其作品今散见于《全唐诗》、《唐诗品汇》、《文苑英华》、《诗人玉屑》等书中。所作五律《江行》是其羁旅怀人之作。诗曰：“越信隔年稀，孤舟几梦归。月寒花露重，江晚水烟微。峰直帆相望，沙空鸟自飞。何时洞庭上，春雨满蓑衣？”颇有唐诗韵味，曾传诵一时。

（方彦寿）

“吾道南矣”与“程门立雪”

坐落于南平市王台乡凤池村的游定夫书院厅堂内，分别挂有“道南堂”和“立雪堂”两幅匾额，是为纪念北宋著名理学家建阳游酢而立的。游酢是建阳人，他的书院怎么会建在南平呢？匾额中的“道南”和“立雪”又是什么含义呢？要弄清个中原委，需先从游酢从学谈起。

游酢（1053—1123），字定夫，号豸山，少年时就以文行知名。宋熙宁五年（1072），游酢20岁时，以乡荐赴京，与河南洛阳的程颢（1032—1085）相遇。程颢对其资质大加赞赏，认为“其资可以进道”。“道”，指的是宇宙万物的规律、原理或本原、本体，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程颢与其弟程颐都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世称“二程”，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所开创的学派被称为“洛学”，他认为游酢“其资可以进道”，对青年游酢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和激励。这年八月，程颢官河南扶沟知县，为兴办县学，还特意邀请游酢前往管理学务。游酢从此成为程氏入门弟子。元丰

四年（1081），游酢又荐举将乐杨时拜程颢为师。两人学成南归之日，师生依依惜别，程颢目送他们远去，高兴地说："吾道南矣"！意思是说，有了游、杨二君，我的道学（理学）思想就可以传播到南方去了。

元祐八年（1093），官太学博士的游酢仍好学不辍。这时，其师程颢已逝世八年，为了进一步钻研理学思想，游酢又偕学友杨时同赴洛阳从学于程颐（1033—1107）。游、杨两人于这年冬天冒着大雪来到程家，正逢程颐闭目静坐，两人不忍惊动先生，恭敬地侍立门外静候。程颐发觉时，门外已雪深一尺，留下了"程门立雪"的千古佳话。

游酢学成之后，元符元年（1098）曾在家乡建阳麻沙长坪豸山之麓建豸山草堂，从事著述和讲学。乾道二年（1166），为纪念这位促使理学南传的著名学者，建阳知县肖之敏将草堂扩建为书院。嘉熙二年（1238），宋理宗御赐书院匾额。乾道七年（1171），游酢五世孙游严从建阳迁居南平凤池。元延祐四年（1317），十世孙游以仁为使后世子孙不忘祖宗德业并发扬光大，仿照豸山书院旧式，在该村修建了游定夫书院。岁月无情，建阳的豸山书院在历史上几经重修，今仅剩遗址；而南平的游定夫书院却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1998 年 7 月，南平游氏后裔联络八闽以及台北等地的海内外游氏后裔，集资将书院修复一新，使之成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场所。"道南"、"立雪"也成为今天散居八闽以及台北等地海内外游氏宗亲的家训家风，成为联络海内外游氏宗亲的精神纽带。同时，也为海峡两岸同根同源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

"吾道南矣"反映的是北宋以来理学思想从北方中原一带向南方传播，在游、杨之后最终形成了以其后继者朱熹为代表的"闽学"这一过程；而"程门立雪"则为中国教育史上尊师重教树立

了一个典范。

南宋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朱熹，对其前辈学者游酢的好学精神和尊师重教的学风甚为赞赏，为此撰联云：

道南首豸山，学共龟山同立雪；

理窟从洛水，本归濂水引导源。

（方彦寿）

“考亭书院”与“南闽阙里”

考亭地处建阳城西南面，距建阳城关约五华里。这里背负青山，三面临水，景色清幽。据当地史料记载，考亭之来历，源于唐咸通年间（860—873）建阳陈望葬父于此，并在河对岸盖一亭，以远望其考，故名“望考亭”，后逐渐演化为地名。

南宋绍熙三年（1191），理学家朱熹承父遗愿，定居于此。在此建书院，广招门徒，聚众讲学，初名竹林精舍。绍熙五年（1194）十二月，因生员日多，便将精舍加以扩建，更名为沧洲精舍，并自号沧洲病叟。自此，考亭沧洲精舍成为朱熹继建阳寒泉精舍、云谷晦庵、武夷精舍之后创建的第四所书院。

精舍建筑分为朱熹宅与沧洲精舍两个部分。其宅名“清邃阁”，得名于其父朱松“考亭溪山清邃，可以卜居”之遗言。精舍分前堂后室。前堂为诸生课业之所，后室为诸生饮食起居之处。由于受到资金短缺的困扰，这时的精舍建筑比较简陋，仅够课业和日常生活使用而已。曾有人误认为，考亭书院是宋代我国的四大书院之一。实际上，以当时的规模而言，考亭书院远不能与四大书院（通常指白鹿洞、岳麓、嵩阳、睢阳这四所书院）相比，但

若以其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影响而论，考亭书院则足以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座书院相提并论。

从绍熙三年至庆元六年（1192—1200）前后约八年，朱熹大部分时间都在考亭讲学和著述。朱熹的《孟子要略》、《韩文考异》、《楚辞集注》、《楚辞辨证》、《仪礼经传通解》、《周易参同契考异》等一系列重要著作都在这里撰就。这时，曾先后就学于寒泉、云谷、武夷的蔡元定、黄榦、叶味道、蔡沈等一大批门人弟子，又聚集考亭。据学者考证，至今仍有姓名、生平仕履可考的考亭朱门弟子尚有二百多人。在考亭，他们研经读史，探讨社会人生，寻找济世良方，穷究理学奥秘，积极开展各种学术文化活动，使当时的建阳成为继承和发展孔孟原始儒学，开创朱子新儒学的大舞台。中国理学史上著名的“考亭学派”由此形成，并走向成熟。以朱熹为代表的“考亭学派”及其创立的理学思想体系，极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并从此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数百年。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教育史上树立起一座巍峨的丰碑，也在建阳的历史上写下了最为辉煌的一页。

南宋宝庆元年（1225）秋，刘克庄任建阳知县，在考亭沧洲精舍内建文公祠，次年落成。祠中主祀朱熹，而以门人黄榦配祀。新祠落成之日，刘克庄写祝文云：“巍巍文公，宋之夫子；翼翼考亭，建之阙里。”文中的“夫子”即孔夫子，儒学的开山祖师；“阙里”是孔子故里，即山东曲阜。刘克庄在此把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比作南宋的孔夫子，把建阳考亭与山东曲阜相提并论，这就为以后逐渐形成的“北孔南朱”奠定了基础，为建阳日后逐渐被称为“南闽阙里”留下了伏笔。

淳祐四年（1244），宋理宗表彰理学，御书“考亭书院”四个大字以赐额，此为“考亭沧洲精舍”易名为“考亭书院”之始。咸淳九年（1273），官府在县城通向考亭书院的西关路口建“文公阙

里”牌坊。此牌坊显然是得名于刘克庄的祝文，由于牌坊形象直观的立体效应，其产生的影响则要比一篇祝文大得多。

此牌坊在明代几经重修，曾易名为“南州阙里”。万历二十四年（1596），知县吴天洪又改为“南闽阙里”。历经漫长的历史演变之后，“南闽阙里”从此成为建阳的又一美称。

考亭书院由宋至清，曾十几次重修或扩建，历经沧桑和历史巨变，今仅存嘉靖十年（1531）御史蒋诏所建的“考亭书院”石牌坊。牌坊造型古朴典雅，是珍贵的历史文物。为纪念朱熹这位伟大的理学家和教育家，1998 年，建阳市人民政府在海内外朱子后裔的资助下，在书院旧址重建了文公祠，成为“南闽阙里”一处新的人文景观。

（方彦寿）

朱熹悔作广告诗

理学家朱熹长年在建阳、崇安一带讲学、著述。由于南方空气潮湿，加之他开设的书院如寒泉、云谷、武夷精舍等多在大山深处，天长日久，不幸得了非常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他自称为“病脚”、“脚气”、“气痞”等等。到了晚年定居建阳考亭之后，此病越加严重，双腿疼痛不已，平常必须拄着拐杖才能行走。

有一天，一位自称是“程道人”的游方郎中来到考亭，自称有奇术能治愈此病。朱熹闻之甚喜，即请他把脉施治。稍后，程道人取出几枚银针为其针灸。此针果然神奇，不过三针扎下，已觉疼痛大为减轻，再扎几针，疼痛居然全部消失了。朱熹此时心情异常高兴，纠缠了他十几年的“病脚”竟被这道人三下五除二

就治好了！从此，他也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健步如飞了。一首七言绝句顿时从他口中吟出：

十载扶行恃短笻，一针相值有奇功。

出门放步人争看，不是前来勃窣翁。

吟毕，吩咐家人拿出银两重谢道人。岂料道人却谢绝收此银两，而仅要求朱熹把他适才所吟之诗写下来送给他。朱熹问其何故，答曰："先生大名。天下谁人不知？有此诗和先生手迹相伴，远胜银两多多矣！"在道人的一再请求之下，朱熹不及深思，遂援笔疾书，一挥而就。上加诗题为《晦翁足疾得程道人针之而愈戏赠此诗》，诗末落款为"晦翁"。

道人拿着赠诗，得意地走了。不料数日之后，朱熹的病脚又再次发作，疼痛之状似乎比以前更重。于是命人去寻找那位道人，然而此人早已不知去向。至此，朱熹方知上了此人的当，连连对他的家人和学生叹息道："晦翁失察，遭人算计。此人必拿着我的诗做招牌四处招摇。这该如何是好？这该如何是好……"懊悔之情，溢于言表。

据有关资料显示，朱熹的风湿性关节炎相当严重，至死未能治愈。南宋绍熙三年（1192），他在写信给友人赵汝愚的信中提到自己的病状："熹一春病脚，至今未能出入，医药杂进，灸灼满身，殊未见效，只今两胫细弱，饮食减少，自度非能久于世者。"庆元六年（1200），朱熹逝世后不久，他的学生蔡沈在《梦奠记》一文中追记说："先生频年脚气，自入春来尤甚，以足弱气痞，步履既艰，刺痛间作，服药无效。先生谓沈曰：'脚气发作异于常年，精神顿衰，自觉不能长久。'"

朱熹逝世后，他的学生为他整理文集，整理到他写给程道人的这首诗时，面临着一个难题——这首诗该不该收入文集？明知有此诗不收人，他的文集岂非不全？若收人集，似乎这首诗的写

作又并非出自本意。再三斟酌之后，决定还是收进去。理由是，朱熹病逝，皆因足疾而起，当时人人皆知，道人再拿此诗去张扬，已毫无意义，反而只会砸自己的牌。而收入此诗，则可以此警示后人，当心上当受骗。这便是现存于《朱文公文集》卷九《晦翁足疾得程道人针之而愈戏赠此诗》的由来。

（方彦寿）

“风飘罗带”与“龙归后塘”

黄坑镇后塘村的大林谷，曾经是一片郁郁苍苍的大森林。大森林后面，迤逦排列着九座湛蓝的山峰，当地人叫它“九峰山”。从远处望去，以九峰山为屏的大林谷，就像是被风吹动着的罗带一般。

相传朱熹在建阳的时候，曾梦见一位异人对他说：“龙归后塘，乃先生归藏之所。”以后，他就和自己的高足弟子蔡元定一起来到黄坑（宋代称“唐石里”），寻找梦中异人所说之地，寻找自己百年之后的“归藏之所”。他们寻到后塘大林谷，看见这个地方果然和梦中景象相同。朱熹很高兴，说这个地形是“风飘罗带”啊。

淳熙三年（1176）十一月，朱熹的夫人刘氏病逝，次年二月，朱熹葬刘氏夫人于大林谷。他是准备自己死后要与夫人合葬的，所以先把亡妻安葬在此。庆元六年（1200）三月，朱熹病殁于建阳考亭沧洲精舍（即后来的考亭书院），十一月归葬大林谷。当时，朱熹理学被贬为“伪学”，朝廷“伪学”之禁森严，许多与朱熹理学有关联的人受到迫害。尽管如此，却仍有许多弟子和友人不顾个人安危，前来为朱熹送葬，人数达到几千人。长长的送葬队伍

从考亭出发，走了六天，才将这位先贤的灵柩送到大林谷，使“龙归后塘”。

朱熹墓坐西北朝东南，周壁以鹅卵石垒砌，中央封土，后立大石碑，上面刻着：“宋先贤朱子　刘氏夫人墓”字样。墓前有石香炉、石供桌及石华表一对，均为明代所置。20世纪80年代后，朱熹墓被列为福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国内外朱子后裔经常前来祭祀，并捐资在后塘建起“思源亭”。

（徐贯行）

蔡氏九儒美名扬

建阳蔡氏，世代业儒。在南宋时，出现了一门四代九位名儒，其声名在闽学发展史上广泛流传，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九儒依次为蔡发、蔡元定（蔡发子）、蔡渊（元定长子）、蔡沆（元定次子）、蔡沈（元定三子）、蔡格（渊子）、蔡模（沈长子）、蔡杭（沈次子）、蔡权（沈三子）。其中较重要的人物是蔡发、蔡元定和蔡沈。

蔡发（1089—1152），字神与，号牧堂。博学强记而不以功名利禄为意，以布衣终。他秉性刚毅，曾游学四方，学识广博，尤精于易象、天文、地理之学。晚年曾与青年朱熹交往，朱熹为其书室手书“牧爱堂”匾额，今西安碑林仍存此手迹石刻。蔡发教子甚严，蔡元定十岁时，即教元定读《西铭》等文。此后，陆续教以北宋理学诸子二程、邵雍、张载等人的著作。晚年时，反复叮嘱蔡元定为人要忠厚诚实，不可浸淫于功名利禄之间。朱熹赞扬他“教子不干利禄而开以圣贤之学，志识之高远，固非世人所及”。著作有《天文星象总论》、《地理总论》、《地理发微》、《河洛

发微》等。据有的学者考证，蔡发在《天文星象总论》中提出的地动说，比哥白尼早了近四百年。

蔡元定（1135—1198），字季通，人称西山先生，易学家、音律学家。他自小聪颖，八岁就能写诗。从父学习北宋理学诸子的著述，青年时已精通儒学。后相继从学朱熹于建阳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武夷精舍和考亭沧洲精舍。其学识颇得朱熹的赞赏。在朱熹数百位门人中，蔡元定处于助手兼门人的地位。在朱熹的许多著作如《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易学启蒙》中都吸收了蔡氏的部分见解。“南渡四大家”中，尤袤和杨万里都在朝多次推荐过蔡元定，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庆元党禁”中，朱熹的学说被诬为“伪学”，蔡元定作为朱门大弟子，首当其冲地受到株连，被贬谪到湖南道州编管，后死于贬所。蔡元定的著作有《律吕新书》、《燕乐原辨》、《洪范解》和《大衍详说》等。其中，《律吕新书》是一部乐律学方面的专著。在我国音乐史上，该书首次提出了“十八律理论”，即在传统的十二律有较大音差的各律之间，排进六个变律，以调整十二律之间因旋宫（变调）之后长短不齐的关系。这在音乐史上是一个创新。朱熹对此有“超然远览，奋其独见”的评价。这个理论，至今音乐史界仍在深入探讨。

蔡沈（1167—1230），字仲默，号九峰。与其兄蔡渊均内事其父、外事朱熹，为朱熹晚年在考亭沧洲精舍最得意的门生。在学术上，蔡沈以攻研《尚书》见长。“庆元党禁”期间，其父被贬谪，蔡沈随之至贬所，日夜相伴。父逝，徒步护丧还。从此隐居建阳崇泰里九峰山，专心著述。庆元五年（1199）冬，即朱熹临逝世的前几个月，朱熹将其来不及完成的《书集传》一书嘱托蔡沈。十年后，即嘉定二年（1209），蔡沈不负师望，终于圆满地完成了这部书的写作。《书》，又称《尚书》、《书经》，相传由孔子编选而成，是我国最古的一部史书。所记上起尧舜，下迄秦穆公。蔡沈的

《书集传》就是专为这部被封为儒家经典的著作作注释的。由于文中吸收了其先师朱熹，其学友潘时举、李方子、李相祖、陈埴、林夔孙、谢诚之，黄榦等人的一些研究成果，同时各卷中又区别今文古文，注明“今文古文皆有”者28篇、“今文无，古文有”者25篇，故名“集传”。这部书继承了朱熹的理学传统，在解说中摒弃汉唐以来的烦琐考据，而注重于以浅明的文字解经，立足于义理，即封建伦理三纲五常的阐发，以此达到告诫“后世人主，有志于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于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的目的。元朝皇庆年间，本书与朱熹的《周易本义》、《诗集传》、胡安国的《春秋传》等并列为官书，为科举考试的必备之书。数百年来，在封建文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蔡沈的著作还有《洪范皇极》五卷，书中集中反映了其父蔡元定的学术思想。

蔡氏九儒中，其余诸儒，也在各自的学术领域有所建树。如蔡渊（1156—1236）专习《易》学，著有《周易训解》、《易象意言》等书；蔡沆（1159—1239）专攻《春秋》，著有《春秋五论》等书；蔡格（1183—1252）著有《至书》；蔡模（1188—1246）曾任建安书院山长，著有《易传训解》等书；蔡杭（1193—1259）历官工部侍郎、参知政事，著有《久轩集》；蔡权（1195—1257）著有《续近思录》、《参同契论》等。

（方彦寿）

七贤过化之乡

建阳在历史上曾被誉为“七贤过化之乡”。有人认为，七贤过化是建阳“邑中百姓代代相传的话题”，其意思似乎认为“七贤”

本源于建阳民间自发的崇祀，其实不是；也有人稽考过历代《建阳县志》，认为“其典故出自民国18年编纂的《建阳县志·序言》：‘建阳乃七贤过化之区’”，其实也不是。

“七贤”所指何人？今人多以为是指朱熹、蔡元定、刘爚、黄榦、熊禾、游九言、叶味道这七位南宋理学家，也不甚准确。其中，游九言和叶味道乃出于后人讹传，本应为闽学先驱游酢和朱熹的门人蔡沈。

朱熹在建阳讲学之时，只是一介寒儒，仕途坎坷，生平不得志。但在他逝世以后不久，他的理学思想在维护封建统治方面的作用越来越被当权者所认识，以他为首的闽学派也逐渐得到封建统治者的推崇和褒奖。从南宋嘉定二年（1209）宋宁宗赐朱熹谥文，称朱文公开始，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又下诏肯定朱熹的《四书集注》“有补治道”，于是特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封徽国公，诏祀孔子庙等一连串封赠都在此后逐渐降临到朱熹头上。元仁宗皇庆间，朱熹、蔡沈、胡安国的一部分重要著作被并列为官方科举考试的标准教科书。朱明王朝时，由于皇帝与朱熹是同姓本家，朱熹的思想更是得到无以复加的推崇，甚至泽被子孙。建阳理学诸贤的子孙均有优免田赋、减免差役劳役等优待。

在此历史大背景下，作为“南闽阙里”的建阳的父母官也无不以此为荣。明嘉靖元年（1522），知县项锡在建阳童游双溪交汇的沿岸，建了一座大儒祠，祀奉对理学发展有突出贡献，而且与建阳有比较密切关系的“七贤”。按其原排列顺序，依次为朱熹、游酢、黄榦、蔡元定、刘爚、蔡沈、熊禾。这便是“建阳七贤”的由来。所以，七贤并非源于民间自发的崇祀，面是历代统治者崇祀理学先贤的结果。由于大儒祠中的七尊大儒塑像的立体效应，“建阳七贤”也从此流传开来，“七贤过化之乡”也由此成为建阳的美称之一。

七贤中，朱熹和黄榦曾在建阳居住过很长时间，可以算半个建阳人。其余五位则都是地道的建阳人。七贤中游酢是闽学先驱，是朱熹的前辈学者，其余五位，均为朱熹的弟子或续传弟子。他们的共同特点为：都是理学家和教育家，都曾在建阳创建书院，讲学著述，推行教化，使建阳成为“家有法律，户藏诗书”的“彬彬然道义之乡”，这便是“过化”的含义。

七贤的事迹，朱熹、游酢、蔡元定、蔡沈已于上文有所介绍，此不再重复。其余三位，以下略作介绍。

黄榦（1152—1221），字直卿，号勉斋，闽县人，是朱熹的弟子和女婿。先后从学朱熹于武夷精舍和考亭沧洲精舍。朱熹逝世后，他曾在建阳创建环峰书院，传授弟子，阐扬朱熹的学术思想。在论证朱熹的道统观和促进朱子理学的北传方面，黄榦均有重要的贡献。主要著作有《勉斋集》、《仪礼经传通释续卷》。

刘爚（1144—1216）字晦伯，号云庄。先后为朱熹寒泉精舍和武夷精舍的弟子。历官连城和闽县令。庆元党禁期间，复随朱熹读书讲学于武夷山中，并创云庄山房于武夷五曲。嘉定四年（1211），入朝任国子司业，奏告皇帝，请罢“伪学”之禁、又请刊行朱熹的《四书集注》，以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颁行太学。在为朱子理学恢复名誉、存统卫道方面，刘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故居建阳马伏，有其创建的云庄书院。

熊禾（1247—1312），字去非，号勿轩，又号退斋。历官汀州司户，宋亡不仕，建洪源书院于武夷五曲，讲学12年，学者云集。晚年回到建阳梓里复创鳌峰书院，讲授朱子理学。他是朱熹的三传弟子，在学术上继承了朱熹的思想并有所发展。在传统经学和教育学上均卓有贡献，是宋末元初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著作有《勿轩易学启蒙图传通义》、《勿轩集》等。

（方彦寿）

宋慈和《洗冤集录》

宋慈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法医学家，在中国和世界法医学史上均有崇高的历史地位。他所撰著的《洗冤集录》是我国也是世界现存的第一部法医学专著，比国外同类著作早了三百多年。

宋慈（1186—1249），字惠父，建阳童游里人。宋慈青年时曾就学于朱熹的门人吴雉。南宋嘉定十年（1217）举进士，历任信丰主簿、长汀知县、南剑州通判、广州提刑等职。为官清正，勤政爱民，刚直不阿，断案清明，雪冤禁暴，所至皆有政声。

宋慈广泛地搜集了历代有关司法检验的著作，总结了宋以前的法医工作经验，结合自己的检验、断案实践，撰成《洗冤集录》。这是一部广泛地总结法医学尸体外表检验经验的专著。现代法医学的大部分内容，这本书中都已有所涉及。在尸体现象、损伤、现场检查、尸体检验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科学的分析和归纳。此书撰成后，淳祐七年（1247）刻印于湖南宪治，为宋慈自刻本。当时宋慈正值湖南提刑充使行府参议官任上，故后来的翻刻本、重刻本多将此书题为《宋提刑洗冤集录》。

该书的出版，为我国法医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在法医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该书也成了历代法官办案的必备参考书，对现代的法医实践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该书的宋慈自刻本，与宋代的其他版本均已无存，现存最早的刻本为元代刻本。宋慈的故乡也曾多次重刻此书。如元代有建阳著名书肆余氏勤有堂刻本，明嘉靖和万历年间有建阳书坊无名氏曾前后两次重刻了此书。从本世纪80年代起，北京、上海、福

建、辽宁等地的出版社则先后出版了该书的点校、校释、译释、校注等诸多版本。

《洗冤集录》流传至国外，对世界法医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据不完全统计，该书在海外的汉文版本和外文译本有：朝鲜三种、日本八种、法国三种、德国二种，越南、荷兰、英国、美国各一种，计八国二十种。版本种类之多在我国医学典籍的国外译本中是极为罕见的。

1986 年 12 月，在宋慈诞辰八百周年的日子里，宋慈故乡的建阳人民举办了热烈而隆重的“纪念宋慈诞辰八百周年大会”，来自国内十几个省市的七十多位法学、法医学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盛会，共同缅怀这位世界法医学的鼻祖。

为了更好纪念这位文化伟人，建阳潭山之巅，建有巍然挺立的“宋慈亭”，与纪念理学家朱熹的“朱子阁”遥遥相对；童游故里则辟有“宋慈路”，与坐落在建阳崇雒的“宋慈墓”一道，构成了建阳又一道独有的人文景观。

（方彦寿）

昌茂山中“访”宋慈

宋淳祐九年（1249），法医学家宋慈以进焕章阁知广州，任广东经略安抚使。不幸染病，卒于任所。归葬故里建阳崇雒乡（宋代称洛田里）昌茂坊山中。

尽管当时的皇帝宋理宗十分器重宋慈，特御书墓门作为旌表，尽管宋慈所著的《洗冤集录》此后作为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被各国所推崇，但是宋慈的墓地却渐渐被人们淡忘了，以至于为

荒烟野草所掩蔽。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和有关专家学者高度重视宋慈及其开创的法医学事业。1955年，医学史专家上海宋大仁先生委托建阳县人民政府调查寻找宋慈墓。5月间，崇雒乡工作组在附近山中寻找，并召开老人会调查了解，可惜没有结果。7月间，县人民政府文教科派出文化馆王治平，卫生科派出李忠群、黄启唐等同志与崇雒乡政府进行第二次调查寻找，在崇雒卫生所一位姓苏的老医生及许多群众协助下，终于在距崇雒一里多路的昌茂村旁山坡上的丛林中，找到了宋慈墓。当时墓地实在凄凉，在灌木杂草丛中只立着一块饱受风霜侵蚀、且已破断的墓碑，上面刻着："慈字惠父宋公之墓"。

人民政府立即拨出专款，按照宋代墓制重新维修了宋慈墓，并镌刻一大墓碑立于墓前，碑上醒目地刻着："宋慈字惠父之墓"。1961年，宋慈墓被福建省人民政府列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现在，宋慈墓周围绿树掩映，稻田环绕。墓前建有保护碑亭，公路从不远处通过，一派恬静和盎然景象。宋慈墓已经成为人们凭吊伟大法医学家的必到之处和旅游观光的一个景点。

（徐贯行）

江湖诗人宰建溪

刘克庄是南宋著名的文学家，江湖诗派的重要诗人。《后村先生大全集》中存诗二千多首，以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和民生疾苦为主要内容。写景、言情、论事无一习见之语，绝句尤能别开生面。词作受辛弃疾的影响，磊落抑塞，雄迈豪放，多感慨时事之作，

充满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辛弃疾之后最有成就的词人。刘克庄崇尚理学，曾从学于当时的大儒、朱熹的私淑弟子浦城真德秀。

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号后村居士，兴化军莆田县人。嘉定二年（1209）以荫补官。宝庆元年（1225）至绍定元年（1228）知建阳县。刘克庄在建阳任知县期间，重修了朱熹遗留下来的考亭书院。他在《建阳县厅续题名记》一文中说："巍巍考亭，为宋阙里，两坊坟籍大备，比屋弦诵。"这是最早将朱熹闽学与建阳刻书看成是相互关联的两件文化盛事而加以相提并论。

数十年前，经朱熹倡议而修建的建阳社仓，到此时所存皆空，邑中百姓遇饥荒无米可籴。刘克庄想方设法斥资三千余缗，购米四千余斛入藏社仓，以解饥民之忧。为了使后来的执政者能将此项善政继续下去，他在社仓大门上亲书一副对联："聊为吾民留饭碗，岂无来者续心灯？"表现了他强烈的爱民之心和忧患意识。

刘克庄在建阳，曾以己资刻印建安（今建瓯）黄铢的《谷城集》五卷，这是历代建阳知县刻书中至今可以考见的最早记载。

在此期间，刘克庄又刻印自选诗集《中兴五七言绝句》一书。因《落梅》诗中有"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一联，《黄巢战场》中有"不是朱三能蹴踘，却缘郑五欠经纶"一联，被指摘为"讪谤"，绍定元年（1228）九月在建阳任上被罢归，史称"落梅诗案"。

刘克庄在建阳，曾多次到麻沙和崇化书坊，或因刻书，或为购书。他曾写下一首《崇化麻沙道中》的诗：

经行爱此人烟好，面俯清溪背负山。
半艇何妨呼渡去，小桥不得负薪还。
远闻清磬来林杪，忽有朱栏出竹间。
此处安知无隐者？卜邻容我设柴关。

诗中对麻沙、崇化两坊的风光赞赏备至，致使诗人发出愿在此归隐的念头。

刘克庄在建阳，与邑中骚人墨客如陈敬叟、刘圻父、游季仙等往来唱和。他们的诗集在建阳书坊出版，刘克庄则为他们一一作序。建阳刘淮，字叔通，号溪翁，是朱熹的弟子，撰有《嘉禾县图经》，这是建阳县最早的县志，刘克庄为此写了《嘉禾图经序》。此书现已无存，今人赖刘克庄此序，方知此书的编刻原委。

莆田方子默，字阜鸣，是一位藏书家，与刘克庄家是世交。他从江西归途经建阳，特地留下一大笔钱给刘克庄，委托其购买建阳书坊刻本。

由于刘克庄在建阳推行文治教化，颇有政声，深得县民的爱戴。他离任后，多次途经建阳，均受到县民的欢迎。他自述说："余行天下，尝谓建溪俗尤近古。余去官久，每出其境，城郭村落，父老子弟必幡华迎饯，追随不置。"（《后村大全集》卷九十）刘克庄对他在建阳的这段经历也是久久难忘，在他的《文集》中，"余宰建溪"、"昔宰建溪"之类的回忆比比皆是。

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诗人，南宋建阳书坊刻印出版了他的文集《后村居士集》。这个刻本曾被后来的藏书家誉为"南宋麻沙椠之最善者"，共五十卷。其中《诗集》十六卷、《诗话》二卷、《诗余》二卷、《文集》三十卷。

（方彦寿）

谢枋得桥亭卜卦

重庆市博物馆珍藏着一方"桥亭卜卦砚"，是宋末元初抗元英

雄谢枋得遗物。这方貌不惊人的古砚，却蕴藏着一曲气贯长虹的爱国主义颂歌。

谢枋得（1226—1289），字君直，号叠山，别号依斋，江西弋阳人，是南宋末年著名的爱国诗人。他学识渊博，文章奇绝，学通古今，著述丰富。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登第，与文天祥为同科进士。历官抚州司户参军，不久弃官。德佑元年（1275）任江东提刑、江西招谕使，知信州，率兵抗元，兵败。南宋亡后弃家流亡到建阳，隐居在建阳唐石（今黄坑乡）和云谷茶坂。元兵将其妻李氏及二子搜捕入狱，李氏不屈而死。家国之恨，使谢枋得情不能遏，每天穿着麻衣、草鞋向东而泣。

谢枋得隐居建阳．因举目无亲，又要逃避元兵追捕，屡屡改名换姓。不久，设卜肆于建阳驿桥，以替人卜卦算命为生，招榜曰“依斋易卦”，这便是他别号依斋的由来。建阳驿桥即今水南桥，宋时名濯锦南桥，又名朝天桥，立于麻阳溪和崇阳溪交汇处，石墩木梁，有桥洞13孔，桥上用砖砌了72间房，俗称桥亭。谢枋得的卦摊设在驿桥南端。据《建阳县志》载，前来求卦问卜者拿钱给他，谢枋得一律不受，而只取大米和草鞋。取大米，容易理解，为一日三餐之计。但为什么要草鞋呢？原来，谢枋得在兵败后曾经发誓说：“不见南朝不着鞋！”“南朝”，在此指的是兵败之后向南方广东、福建一带逃窜的南宋政权。自此誓之后，谢枋得一直是身着麻衣，足登草鞋。在着装这件事上，也寄托着谢氏的爱国情思。

在谢枋得卜卦必用的器具中，除了龟甲、笔、墨外，还有一方跟随着他多年的龙尾砚，他为此砚题名为“桥亭卜卦砚”。砚左壁有其草书题刻：“砚虽非铁，难磨面平，心虽非石如其坚，守之弗失道自全。咸淳九年十月三日君直铭。”又自题云：“此吾石友也，不食而坚，语友之；人心如石，不如石坚，谁似当年采薇不

食，宋义也。”从其题刻可知，他早已抱定了忠贞不屈、以身殉国的坚定决心。

在建阳期间，谢枋得与建阳著名学者熊禾结下了很深的友谊。熊禾（1248—1312），号勿轩，是朱熹的续传弟子，宋咸淳十年（1274）进士，授汀州司户参军。宋亡后归隐建阳莒口鳌峰，重修其祖上留下的鳌峰书院，并在此讲学。熊、谢二人相见恨晚。“共诉宋亡之恨，因相与抱持而哭。既而曰：‘今天下皆贼也，所不为贼者，惟足下与我耳’”，拳拳赤子之心，溢于言表。

建阳的崇化里，在南宋就有“图书之府”之誉。谢枋得在建阳期间，曾到过这里，为此地的“十景”一一题诗。这组被称为《书林十景》的组诗见于嘉靖《建阳县志》卷三，而为谢氏《叠山集》缺载，应为谢氏佚诗。其一《书林文笔》云：

巍巍文笔光书林，插空屹地皆天成。
尖齐不假云烟敛，圆健何劳雨露深。
椽墨太阿窥砚小，书天不动龙蛇走。
何用蒙恬制作工？五色光芒焕牛斗。

自谢诗流传于世后，书坊的名气为之大增。书坊的刻书家们，对这位诗人怀着敬慕之心，相继为之出版了《叠山文集》、《文章轨范》和谢编《千家诗》等著作。嘉靖《建阳县志》中列有《书坊书目》352种，上述谢氏三书均名列其中，可备查考。

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世祖诏召天下人才，集贤殿学士程文海荐举宋遗民22人，以谢枋得居首。谢枋得坚辞不就，并写下了著名的《却聘书》：“人莫不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若逼我降元，我必慷慨赴死，决不失志。”福建行省参政魏天佑急于邀功，将其强行押解至大都，谢枋得宁死不屈，于1289年4月5日绝食而死。

为了纪念这位爱国诗人，明正德年间，建阳人民在朝天桥南

端即原谢枋得卖卜处建了谢叠山祠，并每年春秋两次致祭。当时的知县浙江东阳人邵瓛在建祠掘地时，偶然发现了谢枋得当年埋藏在此的“桥亭卜卦砚”。此后，在漫长的岁月中，此砚曾几经辗转易手，终于在1983年被重庆市博物馆珍藏，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珍贵文物。

此砚之流传，清代著名学者纪昀、洪亮吉、钱大昕、彭元瑞等人均先后有诗记之。而以彭元瑞的《谢文节桥亭卜卦砚歌》颇值一读。节录于下：

……

云是桥亭卖卜时，曾渍孤臣泪和墨。
一声白雁江南飞，三日江潮俱辟易。
更无赵家半块土，唯见先生一片石。
崖山破碎已十年，臣心不转如石坚。
……

（方彦寿）

“南渡四大家”与建本

“南渡四大家”是南宋四位著名诗人的并称，指的是尤袤、杨万里、陆游和范成大。由于南宋时期，建阳麻沙和崇化书坊刻印的图书已是“无远不至”，加上当时的文人多喜藏书，因此，这四位大诗人对建本图书的态度虽不尽一致，但与建本均有较密切的联系。

尤袤（1124—1194），字延之，号遂初居士，无锡人。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历官礼部尚书等。尤袤的藏书极为丰富，曾

据其藏书编成《遂初堂书目》，这是我国藏书史上最早著录版本的目录。其中除收录了川本、京本、监本、杭本图书外，可定为建本的有《游定夫易说》、《了斋易说》、《朱氏集传稿》等数十种。朱熹在建阳，还送了很多建本图书给尤袤，其中就有蔡元定刻印的《诗集传》一书。

杨万里也是一位藏书家，也经常与陆游、尤袤书信往来，讨论图书的收藏等问题。当时的建州茶使吴德华曾送给他一套建阳书坊新出版的苏东坡诗文集，杨万里对这套书赞不绝口，援笔写下了《谢建州茶使吴德华送东坡新集》一诗："富沙枣本新雕文，传刻疏瘦不失真。纸如雪茧出玉盆，字如霜雁点秋云。""只逢书册佳且新，把玩崇朝那肯去。"对这样的好书，老诗人终朝把玩，不忍释手了。

南宋四大诗人中，陆游是唯一到过福建，且在宁德、闽北担任过地方官的人。他不仅是一个大诗人，著名藏书家，也是一位在当时出版界声望很高的刻书家。他曾刻有《岑嘉州集》、《剑南诗稿》、《刘宾客集》等书。由于他是刻书的行家，对当时的所谓麻沙本颇不以为然，认为质量欠佳。他在《老学庵笔记》中说，有一麻沙刻本，把原为"乾为金，坤为釜"刻成"乾为金，坤为金"，一字之差，结果害得一位用了这个麻沙本的先生在他的学生面前出了洋相。陆游还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了另外一则麻沙本的故事。他说："尹少稷强记，日能诵麻沙版本书厚一寸，尝于吕居仁舍人座上记历日，酒一行记两月，不差一字。"从这个故事看，陆游虽然自己也刻书，而且也不一定就看得起麻沙本，但他还是收藏了不少麻沙本。麻沙本在当时实际上成了刻本的代名词。

"南渡四大家"中，范成大是以"田园诗"而著称于世的。范成大与当时的建阳诗人游次公过从甚密，范成大知静江府（今桂

林）时，游氏为其幕僚。范成大阅读的一部分建本诗集，就是通过游氏得来的。

（方彦寿）

建本《史记》的故事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我国二十五史中最早也是最优秀的一部通史。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逆境中忍辱负重，发愤著书，撰成此煌煌不朽之作。

两宋时期，刻书业繁荣，为《史记》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其中，闽北民间的刻书家们为此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迄今可考的建本《史记》就有：建邑王氏世翰堂刻本，南宋初建阳无名氏刻本，乾道七年（1171）建阳蔡梦弼刻本，以及绍兴丁丑（1157）建宁府刻本等。

南宋绍兴十年（1140），离建阳书坊仅数十里之遥的邵武，也刻印了《史记》。这便是邵武东乡朱中奉宅刻印的《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现代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先生称赞此刻本为“铁画银钩”、“是南渡初建本之精者”。此刻本卷三十三后行款格式逐渐趋密，每行字数增多，大概是以私家刻书，财力并不宽裕之故。此刻本今国内已无存，唯日本尚存一部。

宋代刻印的众多的《史记》建本中，最有名的是建阳黄善夫刻本。黄善夫，字宗仁，宋庆元间（1195—1200）刻书家，所刻《史记》，是现存最早的合集注、索隐、正义“三家注”为一

书的刻本，为明代廖铠、汪谅、王延喆、朱惟焯四种刻本的祖本。

明代王延喆在翻刻宋建阳黄善夫本《史记》时，留下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见于清代王士祯《池北偶谈》一书中，说的是明尚宝少卿王延喆，系王文恪的小儿子。母亲张氏，是寿宁侯张鹤龄的妹妹，昭圣皇后的同胞姐妹。延喆因此得以出入皇宫之中，生性豪奢。有一天，一个书商拿着宋黄善夫刻印的《史记》到王家求售，出价是黄金三百两，王延喆对他说："书暂且放在我这儿，一个月后你再来拿钱。"等书商走后，王氏急忙召集技术好的刻书工匠，按黄善夫刻本的原样依样画葫芦地摹刻下来．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这个书商前来取书款时，王延喆故意对他说："书我不要了，还给你吧。"书商不辨真伪，拿着书走了。过不久书商又来了，对王延喆说："这部书也是宋刻本，但纸张比我的那一部差，是不是你拿错了？"王延喆大笑，告诉他这件事的原委，又取出新刻本数十部，放在大堂上，对他说："你的本意不过只是要黄金三百两罢了，现在我如数给你，并且把你的书变成千百个化身，岂非功德无量？"书商大喜过望，拿着书款高高兴兴地走了。由于王氏刻本的行款、格式、字体均照建阳黄善夫本仿刻，几可乱真，所以后人常以此本冒充宋黄善夫本。

这个故事说明黄善夫《史记》刻本的价值，早在明代就成了书商追逐的对象。后来的刻书家也纷纷据此翻刻。黄善夫本《史记》国内仅北京图书馆存残帙六十八卷，本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史记》，即据黄善夫本影印。1958年8月商务印书馆又重新缩印出版。读者从影印本中约略可以体味出黄氏刻本的风采。

（方彦寿）

版权文告此为最

版权观念形成于我国南宋时期，它是我国科学技术进步、文化发达、印刷业繁荣的产物。宋代全国有四川、浙江、建阳三大刻书中心，这三处历史上都屡屡发生盗版、翻刻现象，因此，有关禁止翻刻的版权文告在这三个地方前后都相继出现。据清代学者叶德辉《书林清话》记载，现存最早有明确年代可考，并借助当时政府的力量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版权文告，是南宋嘉熙二年（1238）祝穆在建阳麻沙刻印《方舆胜览》、《四六宝苑》二书时，两浙转运司颁布的榜文和福建转运司的牒文。

文中强调了《方舆胜览》等书是作者“数载辛勤”的劳动成果，而“嗜利之徒”未经许可私自翻刻是侵权和盗版行为，因此，请求官府出面予以“约束”，以绝此患。否则，作者将有“陈告”，由官府出面“追人毁版”。此文当时除了在刻书处四处张贴之外，祝氏还将其印入《方舆胜览》的卷首，故能随原书保存到今日。

祝穆（？—1256），朱熹表侄，从朱熹学，晚年定居建阳麻沙水南，从事编书、刻书。祝穆所以申请此由官方颁布的保护版权、禁止翻刻的文告，与朱熹在世时，书稿经常被建阳书坊盗印翻刻有关。

淳熙四年（1177）朱熹在建阳编成《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十四卷，在推敲未稳的情况下，被书坊窃出刊行。朱熹曾说：“《论语集注》盖某十年前本，为朋友传出，乡人遂不告而刊。及知觉则已分裂四处，而不可收矣。”

此外，朱熹的《论孟解》、《伊洛渊源录》等书也被书坊盗刊。《朱子年谱》记此事时，称“时书肆有窃刊行者，亟请于县官追索其

版”。追回书版后又如何呢？以能拿到朱熹书稿而言，此“乡人”与朱熹一定具有某种比较接近的关系，最后恐怕也只能是不了了之。

以朱熹这样的大学者，其著作竟接二连三地被盗版，只能徒叹奈何，表明当时的盗印侵权现象是十分普遍的。因此，祝穆在刻书时，接受了朱熹当年只是被动地追稿的教训，采取主动出击、先发制人的办法，借助官方的力量发布文告。在学术上，祝穆的成就远逊于其师朱熹，但在版权观念上，学生则较先生进步。

《方舆胜览》的版权文告，是我国、也是世界最早的版权文告，比《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认为“现代版权观念诞生于十五世纪末期”，早了二百多年。它的出现，表明版权观念在我国已经基本形成，这在出版史上是一件大事。

（方彦寿）

麻沙本《王右丞文集》

王维是我国盛唐时期以山水田园诗而知名于世的著名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山水画家。他的诗和画，被北宋苏东坡称赞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王维诗集现存的最早刻本，是南宋时期建阳麻沙刻印的《王右丞文集》。这个刻本，也就是清代著名学者顾广圻在《百宋一廛赋》中所描述的刻本，被称为：“王沿表进，移气麻沙。秀句半雨，夙假齿牙。”这十二个字，高度地概括了王维诗集流传的过程。

王维的诗文集是唐代宗宝应二年（763）由其弟王缙编辑的，共十卷，收诗文四百多篇。此书编成后，献给唐代宗，前有王缙《进王右丞集表》，此即“王沿表进”之意。南宋时，建阳麻沙的

一家无名书坊刻印此书，集中有一首题为《送梓州李使君》的诗，其中有一联，通行本作“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而此麻沙刻本则作“山中一半雨，树杪百重泉”。一个“半”字，将深山里明晦相半，东边日头西边雨的景象描写得淋漓尽致，意境远胜通行本，被学者称为“山中一半雨本”，为后来的藏书家、版本学家所津津乐道。这便是“移气麻沙。秀句半雨，夙假齿牙”的含意。

这个宋麻沙本，最早为清初著名藏书家钱曾述古堂所收藏。钱氏曾为此书作跋，并手抄此书，今国内所存本，即清初钱氏述古堂抄宋麻沙本，现存北京图书馆。而钱氏所藏宋麻沙原刻本，则在此之后又先后经过著名藏书家季沧苇、徐健庵、黄丕烈和陆心源等收藏。清光绪年间，陆心源的藏书被其不肖之子陆树藩以贱价售与日本财阀岩崎氏的静嘉堂文库，此宋麻沙本《王右丞文集》也在其中。至此，这个珍贵的刻本国内再无原本收存，而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竟成孤本。

（方彦寿）

“四大奇书”的建阳刻本

“四大奇书”是我国文学史上四部著名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的合称。此说源于清代文学家李渔。他在《三国志·序》中将此四部小说称为“四大奇书”。此外，他还将此四部小说合刻，称“芥子园刊四大奇书本”。

建阳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出版中心。明后期，建阳书坊从这以前的以刻印经史著作为主转为以刻印小说、戏曲等通俗读物为主，因此，“四大奇书”在建阳分别有许多刻本问世。

《三国演义》是我国长篇通俗历史演义的开山之作。作者罗贯中，是《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门人，明洪武年间，曾到过建阳。明王道生在他所撰《施耐庵墓志》中说："得识其门人罗贯中于闽。"曾有人据此撰文说，罗贯中此行是到建阳，准备刻印他的《三国演义》和施耐庵的《水浒传》，但建阳没有一家书坊敢承担（事见曹洪朱《施耐庵与〈水浒传〉》）。但史志于此并无只字记载，此说大致上只是一个合理的推论而已。

在所有的通俗小说中，《三国演义》是明代建阳书坊刻印最多的，仅现存海内外大中等图书馆的，就有万历二十年余象斗双峰堂刻本；万历间刘龙田乔山堂刻本；明书林熊冲宇种德堂刻本；万历二十四年熊清波诚德堂刻本；万历三十年云林郑世容和万历三十一年忠正堂东涧熊佛贵刻本。此外，还有郑少垣联辉堂、闽斋杨春元、瑞我郑以桢宝善堂、书林杨美生、书林笈邮斋、潭邑黄正甫、建阳吴观明、富沙刘荣吾、敬堂王泗源刻本，以及明崇桢间熊飞雄飞馆的《英雄谱》"三国"、"水浒"合刻本。清初，还有三槐堂刻《毛宗岗批评四大奇书》第一种本，现存于日本东京大学附属图书馆。可以说，在现存的《三国演义》古刻本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建阳刻印的。建阳书坊刻印的如此众多的珍贵版本，使得《三国演义》的版本研究，几乎就是建阳刻本的研究。过去，学者多认为建本的《三国演义》是罗贯中原作的节本。书坊偷工减料，砍头去尾，以图速售。这种观点，已被《三国演义》研究的最新成果所推翻。北京大学周兆新先生通过对众多版本的认真比较和细致甄别，得出了与此截然相反的结论：明万历间《三国演义》的建阳刻本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而刻印时间较早的嘉靖本则对原作做过修改和增补（见《三国演义考评》，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12 月版）。

《水浒传》是英雄传奇小说的领衔之作，除"四大奇书"之称

外，又被称为“第五才子书”。现存的《水浒传》建阳刻本，有万历间余象斗刻印的《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和《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余象斗，名文台，号仰止，三台山人，其刻书处名双峰堂、三台馆，是明代建阳刻印通俗小说最多、最为著名的刻书家。仅《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他就分别刻印了两种不同的版本，其他小说刻本至今可考的尚有数十种之多。《水浒传》的建本，还有明天启间建阳杨氏四知馆刻本《钟伯敬先生批评水浒忠义传》；崇祯间富沙刘荣吾藜光堂刻本《鼎镌全像水浒忠义志传》；富沙刘兴我《新刻全像水浒传》，以及熊飞雄飞馆的《英雄谱》“三国”、“水浒”合刻本。

《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言情小说。此书明代建阳无刻本，现存的建本为清代福建如是山房木活字印本，卷首有清康熙乙亥（1695）谢颐序，现存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全书100回，二函22册。这是《金瓶梅》建本硕果仅存的记录。但此刻本是否在建阳刻印，尚值得探讨。

吴承恩是神魔小说创作的第一人。他的《西游记》问世后，建阳书坊曾多次刻印。现存的主要有明万历间杨闽斋清白堂刻本《鼎锲京本全像西游记》、书林刘莲台刻本《鼎锲全像唐三藏西游传》、书林熊云滨刻本《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以及余象斗的《四游记》合刻本。

（方彦寿）

熊氏医书传东瀛

中国古代医书东传日本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南北朝时就随

宗教典籍一起传入东瀛。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为印本书向海外传播创造了条件。宋末元初，建阳学者熊禾在为书坊同文书院写的《上梁文》中已有“书籍高丽日本通”的诗句。而日本最早开始翻刻中医典籍，是日本医家阿佐井野宗瑞于日本大永八年（明嘉靖七年公元 1528 年）刊行的《新编名方类证医书大全》。这部中医典籍的编撰者和原刊行者就是熊禾的后人，明代建阳著名的刻书家和医学家熊宗立。

熊宗立（1409—1482），字道宗，号道轩，又号勿听子，建阳崇化书坊人。其曾祖熊天儒、祖父熊彦明均为医学名家。熊彦明还编有医方类书《南北经验医方大成》一书。熊宗立承其祖业，又向同里刻书名家刘剡学习校书、刻书，结合自己的祖传医术，从而成为一位专刻医经典籍的刻书家。熊宗立在中医临床上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历史上曾以医学方面的成就载誉书林，是一位兼刻书家医学家双重身份的历史人物。

熊宗立从明正统二年（1437）至成化十年（1474）共 37 年间，以鳌峰熊宗立、熊氏种德堂、熊氏中和堂等名号刻印医书 20 多种，内容以自编自刻居多，是福建历史上自编自刻医书最多的人。主要刻本有《王叔和脉诀图要俗解》、《妇人良方补遗大全》、《新刊袖珍方大全》、《伤寒必用运气全书》、《类编伤寒活人书括指掌图》、《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

熊宗立所刻医籍，多以类编、俗解、注释等形式刊行，并广泛运用了图要、图括、指掌图等插图示意形式，明晰易懂，便于初学，对明代医学的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熊宗立刻印于成化三年（1467）的《新编名方类证医书大全》二十四卷，后附《医学源流》一卷，是一部中医临床医方的类编，是熊宗立在元孙允贤《医方大成》、熊彦明《类编南北经验医方大成》诸书的基础上，进一步博采众方，分门别类，编辑而成。此书出版后，广为流传。东

传日本后，深受欢迎，对日本汉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熊氏刻印此书约50年后，由日本高僧月舟寿桂作跋，并由当时的日本富商兼医家阿佐井野宗瑞翻刻，成为日本历史上首次自行刻印出版的医学典籍。日本当代学者小曾户洋认为“这是日本医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要事”；并对熊宗立其人有如下评价：在15—16世纪给日本医学以重大影响的人物中，无人可与熊宗立比肩。……较之中国国内，熊宗立在日本医界要更具声望。他兼具儒医以及出版家的多栖形象，被阿佐井野宗瑞奉为人生典范。

熊宗立的另一代表性著作和刻本是《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是学习《难经》的入门书之一。《难经》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年代久远，在传抄或刊刻过程中难免鲁鱼亥豕之误，且文字古奥艰涩，给后世学者造成学习上的困难。熊氏据《难经》原文逐条注解，文字通俗浅近，释义中每参以己见，且于卷首冠图28幅，便于初学，至今仍有一定参考价值。此书东传日本后，也于1536年被日本谷野一柏翻刻，成为日本印刷出版的第二部中医典籍。今熊氏原刻本已不存，所存即日本翻刻熊氏本。中医古籍出版社曾于1983年9月据日本翻刻本影印出版。

（方彦寿）

健笔纵横写英雄

古往今来，杨家将抗辽、岳飞抗金的悲壮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历史上最早描写杨家将和岳飞英雄事迹的长篇通俗小说就产生在闽北，其作者是明代的建阳人，这两部小说最早也都是在建阳书坊刻印出版的。

这两部小说就是明嘉靖时期建阳的通俗小说作家熊大木编撰的《北宋志传》和《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熊大木（约1506—1579），名福镇，号钟谷，又号鳌峰、鳌峰后人等，大木是他的字。建阳崇化书坊人，是明正统间（1436--1449）著名刻书家熊宗立的曾孙，元代理学家熊禾的后人。熊大木承其祖上刻书之业，以熊氏忠正堂名号也刻印了不少书籍。同时，他也是我国小说史上继《三国演义》、《水浒传》之后出现的较早的编撰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的作家。

《北宋志传》是熊大木的代表作，与其另一部历史小说《南宋志传》合刊，通称《南北两宋志传》，各十卷五十回。《北宋志传》是作者在广泛搜集宋元时期民间流传的杨家将故事、宋元话本和元杂剧中的有关剧目的基础上加工整理而成。作品从北汉主刘钧屏逐忠臣、呼延赞出世而后复仇写起，到杨业归宋、杨六郎镇守三关、杨宗保大破天门阵、十二寡妇征西夏得胜为止。通过杨业一门世代抵抗契丹侵扰的事迹，表现了反抗外族入侵，歌颂抗敌英雄，谴责奸佞卖国的爱国主义主题。

作品较好地塑造了杨家几代人的英雄群像，叙述了杨家“一门忠勇尽亡倾”的英雄事迹。老将杨业，身经百战，威震四方，号称“杨无敌”。后因潘仁美的陷害，在陈家谷战役中身陷重围，在潘不发援兵，突围无望的情况下，慷慨悲壮地撞李陵碑而死。少年英雄杨宗保15岁就执掌帅印。他不但能上阵与敌人刀枪相搏，而且还能运筹帷幄，善于调兵遣将，指挥千军万马。以佘太君为首的杨门女将，一洗封建女子弱不禁风的脂粉气，个个都是能舞枪弄棒、驰骋沙场的巾帼英雄。这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除了北朝乐府《木兰诗》塑造的替父从军的木兰形象独步于前之外，像《北宋志传》这样塑造了女英雄群像的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是现存最早描写岳飞抗金事迹的小说，

成书于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共八卷八十回。作品以靖康元年（1126）金兵大举南侵开篇，先写主战派李纲筹谋抵御金人，本打了胜仗，由于徽、钦二帝一意妥协求和，反而割地赔款，终于酿成了靖康之难的惨祸。接着才是岳飞出世、脊背刺字、从军报国、大败金兀术，一直到风波亭就义等岳飞一生事迹的描写。

作品中的岳飞，是一位爱国统帅和民族英雄的形象。他自幼好学，见胡骑纵横，立誓精忠报国。从军后，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善于出奇制胜，敌军闻风丧胆，惊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金兵统帅金兀术与岳飞交战屡战屡败，锐气丧尽。正当岳飞欲率兵直捣黄龙之际，被秦桧借宋高宗十三道金牌召回，最后遭奸臣陷害，惨死在风波亭上。

熊大木之后，又有邹元标编订的《岳武穆精忠传》、于华玉《岳武穆尽忠报国传》问世。这两部小说实际上都是熊氏小说的删节本，情节上没有发展。清乾隆年间，钱彩、金丰在熊大木小说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创作与加工，撰成《说岳全传》二十卷八十回，在艺术上较熊氏的原作有所提高。此后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岳飞故事，就是这个改编本，而熊氏原作，反而几乎湮没不传。但就创作者的实际情况而言，后来者的参考资料多，后出转精，不足为怪。而熊大木草创此书，也功不可没。

（方彦寿）

武夷春秋



闽越王城博物馆（武夷山市）

人杰地灵武夷山

武夷山市（旧称崇安县）历史悠久。据考古资料表明，境内4000年前已有先民聚居。从武夷山山北景区观音岩取下的第一号架壑船棺，经科学测定它已有3840年的历史。

战国时期，被楚灭国后逃亡到闽北的越王无疆后裔在现今被称为城村的地方辟土创业，至秦汉时期，王城已具规模，城郭内外，闽越族人民安居乐业。秦统一中国后，闽北列入闽中郡管辖。平定闽越王余善叛汉之乱后，加强了对闽地的管辖。当时，建阳县管辖着如今武夷山市（旧称崇安县）的区域。

崇安县的建置始于北宋淳化五年（994）。建置崇安县之前，还经历了三次过渡阶段。分别是：

唐初，建州人彭迁由提督建州的任内辞官还里，“捐资雇募民力垦荒，上括信州（今江西管辖），下析建平，斩草除莱，引水溉田三千余顷，筑室崇岭”。“聚集民居约万计，遂名其乡新丰”。这就是崇安县的雏形——新丰乡；

唐垂拱四年（668），彭迁之子彭汉奏准新丰乡为温岭镇，升了一格；

唐会昌五年（845），彭迁的玄孙彭玙奏请将温岭镇升为崇安场，获准。这是第一次出现“崇安”的地名。崇，高峻貌；安，安定也。“崇安”寓“崇地安宁”之意。此时，崇安县的诞生已呼之欲出了。

但唐末时局混乱，五代十国，战伐交替，建阳县管辖的崇安场先后隶属于闽国、南唐国的版图。直至宋太宗平定战乱之后，

才在建立崇安场149年之后于北宋淳化五年（994）正式建置崇安县，隶属于建州。此后天下大治，崇地安宁，名人辈出，北宋的柳永、南宋的胡安国叔侄、刘子羽昆仲、吴玠昆仲等比比皆是，而长期定居武夷山的朱熹更是使武夷山荣膺“人杰地灵”的盛誉。

明清时期，崇安县均隶属建宁府管辖。民国1年至3年，崇安分属于北路道与建安道，民国16年至民国21年为省辖县。民国23年属福建省第十行政督察区。1949年5月9日，崇安解放后隶属于福建省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其后分别隶属于建瓯、建阳、南平专区和南平市。

1989年8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崇安县，设立武夷山市（县级），原崇安县的行政区域划归为武夷山市的行政区域。从此，武夷山市就成为福建省惟一的以旅游胜地命名的新兴旅游城市。

（方留章）

走向世界的武夷山

1999年11月底至12月初，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第二十三届会议在摩洛哥的历史名城马拉喀什举行。会议将审议包括中国福建武夷山和四川大足石刻在内的48处世界各国申报的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和文化自然双重遗产，其中只有武夷山和西班牙的伊比萨是申报双遗产，机会珍贵是不言而喻的。

在11月29日至30日的审议大会上，出现了十分激烈的辩论场面。在唇枪舌战中，有不少国家申报的项目均因没有达到三分

之二以上的赞成票数而未获通过。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却是充满了自信，因为武夷山的确是一处自然瑰宝和文化珍藏相互媲美、珠联璧合的好地方。早在1998年9月，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专家亨利就来过武夷山，对远古时代的古闽族船棺、中古时代的西汉闽越族王城遗址和近古的朱子理学胜迹进行过全面的考察，对武夷山丰富的古文化遗存赞赏不已。1999年4月，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专家莱利斯·莫洛伊博士也来武夷山考察，对山水的自身价值和保护管理水平给予很高的评价，并表示武夷山可以作为人类永续利用自然资源的典范，在全世界广泛宣传。1999年7月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武夷山也取得与会国家的好感，但是能否闯关树帜，通过世界“双遗产”申报，关键还是这次第二十三届大会。

1999年12月1日上午，当地时间10时5分，大会开始审议武夷山“双遗产”的申报。会场上放映了武夷山的8片幻灯片资料，分别是“九曲奇秀”、“玉女娉婷”、“五曲儒风”、“船棺传奇”、“王城遗址”、“兴贤书院”、“总规示意”、“景区全图”。随着图景的映现，联合国考察官员声情并茂的解说词深深打动了全体评委。一声“Thank you”，解说词结束了，这时会场时钟恰是10时13分。当大会主席杜里征询大家意见时，令人惊奇的是，通常唇枪舌剑、反复辩难的情景不见了，整个会场鸦雀无声，人们仿佛仍然沉浸在8片幻灯片所展示的美好图景之中，并发出“Beautiful”“OK”的赞赏声……2分钟过去了，此时大会主席杜里庄严宣布：中国武夷山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通过。铿锵有力的声音响彻四周，顿时全场欢声雷动。人们永远记住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1999年12月1日当地时间10时15分！

新华社记者分别于12月1日、2日从摩洛哥拉巴特发出快电，报道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记者潘永明在电讯里写道：“武

夷山位于中国福建西北部，自然景观独特，素以‘奇秀甲东南’著称。它的动植物种类十分丰富，是尚存珍稀、濒危物种的栖息地。武夷山古文明可追溯到3800年以前，‘古闽族’、‘闽越族’遗存是业已消逝的古文明的历史见证。它还是影响中国社会近千年的程朱理学形成与传播的中心区域之一。”

截至20世纪末为止，中国获得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的殊荣的遗产地只有4处，即泰山、黄山、峨眉山、武夷山，而全球获此殊荣的也仅仅22处！

（方留章）

秦砖汉瓦古王城

在武夷山市南部兴田镇的城村，有一处占地48万平方米的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它就是距今2000多年的闽越王城遗址，它是武夷山市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战国时期，群霸纷争，杀戮四起。公元前334年左右，越国国王勾践卧薪尝胆开创的江山，传到无彊时瓦解，为楚国所攻占。越王的子孙们避走“南山”（武夷山）之后，先后在这里开创基础，他们励精图治，建立了闽越国。历经70余年之后，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随后秦兵占领闽越地，废除闽越王，把福建一带纳入闽中郡。于是，以闽北为活动中心的闽越人，纷纷逃遁于山林之中，待机再起。秦朝末年，闽越族首领无诸等收罗旧部，走出山林，与众诸侯一道反秦，又协助刘邦打败了争霸的项羽，功劳显赫。刘邦为了奖励有功人士，于高祖五年（前202）“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冶”。复立为王的无诸回到武夷山一

带之后，在城村原有的城郭基础上大兴土木，拓建王城，规模之盛，如今在发掘的遗址上可见一斑。

无诸数传至闽越王余善，他野心勃勃，颇有叛汉自立为王的预谋，成了汉武帝的心腹之患。元鼎五年（前112），汉军陈兵闽越国，余善发兵拒汉，与汉军激战。由于闽越国内乱，越繇王与人合谋诱杀余善，举国投降，闽越国覆灭，闽越王城被付之一炬。遗址深埋地下2300余年之后，于20世纪50年代末被发现，经挖掘整理，这一段独特的历史才显露在世人面前。

闽越王城应是勾践后裔在越国灭亡后，南逃武夷山之时始建的，约在公元前334年左右。王城大规模兴建应是无诸被复立为闽越王之时进行的，时在公元前221年，相隔113年，最后毁于公元前112年，距始建之时大致220余年。在长达200多年跨越战国时期、秦王朝、汉代初期的长时间里，王城复建、扩建了多少次？没有文字记载，但留下的丰富文物却给人们提供了历史的见证。经国家文物保护部门对遗址木柱炭屑进行C14放射鉴定，结果论定古城历史为距今2355年（±70年），证实了勾践后裔南逃武夷后始建王城的这个史实。王城上的秦砖汉瓦、城墙垛楼、刀枪箭弩、犁耙锄斧、玉石印信、古井柱础等文物，既说明了闽越国强盛的国力，也从某些侧面证实了无诸的不肖后裔余善僭越违制、私扩王城、擅建皇宫的叛汉逆举。

走进按照当年宫殿的样式仿建的闽越王城博物馆，巨幅的油画展现了当年闽越王无诸受汉高祖刘邦册封回到武夷山之时的盛况，山民箪食壶浆，以迎王者，极一时之盛。展馆里的文物之多，质量之高，也令人们叹为观止，其中有目前中国所发现的最大空心砖，砖长2米，高30厘米，宽32厘米，厚6厘米，是用以砌筑宫殿陛阶的。板瓦和筒瓦之上都有监督烧制陶瓦官员的印信。瓦当图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瓦当竟有“万

岁”、“常乐万岁”、“乐未央”、“常乐”等违制僭越的图案，证实了余善私刻“武帝”玺、自立为帝的野心。陶制器皿类则瓮、罐、盆、盘、钵、壶、盅、釜、盒、杯、甑、缸、熏炉、提筒齐全，风格迥异 。青铜器有弩机、箭镞、龙纹镜、蛇纹铎、鸟纹钟、帐钩、印章以及鎏金或包金的伞柄箍、盖弓幅、装饰品等，在福建文物考古发现中首屈一指。出土的铁器更是美不胜收，其中有许多都是全中国首屈一指的文物，如长达 82 厘米的铁矛头，为当时我国最长的铁矛头。出土的铁犁铧重 15 公斤，也是我国当时绝无仅有的。

徜徉于闽越王城遗址，只见残存的城墙蜿蜒飞驰，复原的城门巍然屹立，鹅卵石道路直通王殿基址之前。人们还可以从残存的柱础、宫廷浴池、供水管道、花纹铺砖以及 2000 余年古井等文物中领略到当时王宫“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勾心斗角”的盛貌。余善的骄奢淫逸，铸成了王城的灭顶之灾。人们不禁联想到杜牧的《阿房宫赋》：“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方留章）

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在武夷山市、建阳市、光泽县的交接处，有一块极为难得的生物资源调查研究基地，这就是享名国内外的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的总面积达 85 万亩，是我国东南部保存最为完整和典型的中亚热带森林系统。武夷山市在保护区内的面积占总面积的

44.7%，共38万亩。

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部分在武夷山市桐木村的黄岗山和挂墩。保护区的管理机构——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设在桐木村。武夷山市划入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的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号称“世界生物之窗”、“天然植物园”、“蛇的王国”、“昆虫世界”、“鸟的天堂”、“研究亚洲两栖和爬行动物的钥匙”，是人们进行科学探奇、旅游观光、避暑疗养的理想去处。

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1979年7月3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批复文件指出：“武夷山自然保护区位于亚热带地区，又是动物地理分布区的过渡地带，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重点管理好这个地区，对于保护和繁殖各种珍稀动植物资源，开展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而促使成立这个世界瑰宝级区域的人物，是福建省著名的生物学家赵修复先生。他是研究昆虫学的专家，特别精通于蜻蜓的研究，自号“点水翁”，既有“点水蜻蜓”的自谦，又寓有努力繁殖科学成果的深意。早在1978年初，他考察了往昔经常来往之地——崇安县（今改为武夷山市）桐木村挂墩，痛感生物资源由于乱砍滥伐，受到严重破坏，于是奋笔上书党中央，请求保护这一块宝地。当年11月21日，光明日报社内刊《情况反映》刊登了该报记者白京兆摘录赵修复的文章，题为《福建农学院教授赵修复紧急呼吁：保护名闻世界的崇安县生物资源》。次日，邓小平同志在《情况反映》上写了眉批：“请福建省委采取有力措施”，并在该文标题“保护”两字的下方划了两条粗杠。福建省委闻风而动，立即抓紧时间筹建保护区，不到一年，保护区在欢呼声中诞生。20多年来，保护和科研硕果累累，赢得了联合国考察世界遗产专家的交口称赞。

走进生物聚宝盆挂墩和它的毗连地区，珍稀生物迎面扑来，令人目不暇接。攀登上华东大陆最高峰黄岗山，只见万山匍匐峰下，

放目远眺，心旷神怡。登山途中，随着海拔递增，依次分布着常绿阔叶林带、针叶阔叶过渡林带、温性针叶林带、中山苔藓矮曲林带、中山草甸等五个植被带，分布着南方铁杉、小叶黄杨、武夷玉山竹等珍稀植物群落，几乎囊括了中国中亚热带所有的植被类型，且结构稳定。珍稀动物在保护区的武夷山市范围之内也是多不胜数，尤其以两栖爬行类和昆虫类分布多而著名于世，许多新种得到国外专家的普遍青睐。呈送给邓小平批阅的《情况反映》中曾记述了一件轰动世界生物界的事。它写道：大竹岚、挂墩一带是生物标本采集胜地，闻名全世界，已有100年以上的历史。1873年一个名叫大卫的外国神父来到挂墩，采去很多动物标本，送给许多脊椎动物专家研究，发现当地特有动物甚多，从此挂墩开始闻名于世。随后又有一个名叫波甫的，于1925年和1944年两次来到挂墩。他在193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记载了爬行动物14个新种，两栖动物6个新种。此人及同事称誉挂墩为研究亚洲两栖和爬行动物的"钥匙"。这一地区昆虫种类也极为丰富，新种甚多。有些外人从挂墩采集的昆虫标本现藏于国外博物馆……

现在，已有更多绚丽多彩、令人目眩眼花的生物新种都展现在武夷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博物馆内，供游人参观欣赏。

（方留章）

众说纷纭话武夷

武夷山流传着许多奥秘的神话，就像它常年披着奇妙的云雾一样，凡人鲜能解密。据清董天工《武夷山志》载，远古陶唐时

代，有一位养生有术的贤人姓籛名铿，曾向尧帝进献雉羹（野鸡汤），使这位远古的华夏君主得以祛病延寿，因此被封邑在彭城（今徐州），遂称彭祖。随后，彭祖携两子彭武、彭夷前来南山（今武夷山），隐于幔亭峰山下，并率领山民开山浚流，驱兽植茗，造就了闽地一方乐土。后人为纪念彭祖，遂以其二子之名为南山命名，称为“武夷山”。董天工为之描摹肖像，撰写赞文：“在昔彭祖，献尧雉羹。幔亭峰下，遁迹养生。茹芝吸露，颜如舜英。阙有二子，武夷得名。”传说彭祖在770岁时仙蜕于幔亭峰下。他的隐居之处，俗称彭祖居，后人在彭祖居原址兴建云龙道院，原址现为三星级宾馆——武夷山庄绿茵之坪。坪上竖立有彭祖的半身雕像及铭文。为纪念神话中彭祖父子“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勋劳，武夷山市人民政府于1993年在市区建立城雕一座，雕像主体为彭祖及其二子彭武、彭夷。白髯老者彭祖慈目善眉，凝视远方，似对开发中的碧水丹山寄以无限神往之情。彭武、彭夷则膂力强壮，筋健臂粗，孔武有力，阳刚之气四溢。三人群雕本身就酷似一座挺拔峻峭的山岗，象征着威镇南天的武夷山魂。雕塑家盛扬的杰作和百龄艺术家朱屺瞻的“武夷魂”书法题字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神话往往是多元的。武夷山的另一则神话则记载：“相传昔有神仙降山中，自称武夷君，受上帝命，统录群仙，授馆于此，汉武帝时遣使祀之。宋绍圣三年，祷雨获应，现相云中。”武夷山神话传说中的“幔亭招宴”，更进一步演绎了此神降临山中的故事：秦始皇二年中秋之夕，武夷君会同皇太姥、十三仙等，大办酒席于幔亭峰顶，召男女乡民二千余人赴宴。是时，虹桥跨空，人群鱼贯而上。乡人至幔亭外，闻鼓声。少顷，空中有赞者呼乡人为“曾孙”，使男女分东西依次进拜。随之，鼓乐四起，乃命行酒……既下山，风雨暴至，虹桥飞断。回顾山顶，寂无一物，但葱翠峭

拔如初耳。乡人感幸，因相与立祠于山下，号“同亭”云，盖取“同宴幔亭”之意。由此可见，武夷君一向被山民尊为地方神祇和祖先。汉武帝时，他曾与黄帝、太乙等尊神一道，享受京郊祭祀的殊荣，祭品为干鱼。汉武帝还曾遣使到武夷山封祭武夷君，今汉祀坛犹在幔亭峰腰，明朝另在幔亭峰麓建有汉祀亭和拜章台，每年中秋之日由知县率吏民等祭祀武夷君，其典章制度等俱备载于地方志。

人们注意到，彭祖隐居之处在幔亭峰麓，武夷君宴请“曾孙”之处在幔亭峰顶，历代祭祀武夷君之处也在幔亭峰麓。这些似有相互联系之处。对此，南宋哲人朱熹在《武夷山图序》中明智地加以诠释：“武夷君之名，著自汉世，祀以干鱼，不知果何神也。今崇安有山名武夷，相传即神所宅，峰峦岩壑，秀拔奇伟。清溪九曲，流出其间。两崖绝壁人迹所不到处，往往有枯杙插石罅间，以庋舟船棺柩之属……颇疑前世道阻未通、川壑未决时夷落所居，而汉祀者（按即武夷君）即其君长，盖亦避世之士，为众所臣服，而传以为仙也。”

按照此说法，神话中的彭武、彭夷也好，武夷君也好，似都是本地先民所臣服的部落首领。神话源于现实，于此可获佐证。

关于武夷名称的来源，现代考古学家石钟健教授另有一说。他在《悬棺葬研究》中论证：武夷就是越国人的始祖“无余”的谐音。《史记》中提及，越为“先禹之苗裔”。越属夏后氏，东南地区是夏文化的发祥地，武夷越族是其中的一支……在众说纷纭之中，人们总应该肯定这个事实：世界双遗产地的武夷山，它的肇兴始祖应是数千年前在这里披荆斩棘的武夷先民和他们所臣服并传以为神的可敬可畏的部落长。

（方留章）

“三三六六”甲东南

南宋名相李纲在《武夷长歌三十二韵》的开篇，就放声高歌：“武夷古洞天，奇峰三十六。一溪贯群山，清浅萦九曲。溪边列岩岫，倒影浸寒绿……”诗中所说的三十六奇峰和九曲清溪，与当代文豪郭沫若游武夷时所咏唱的“三三六六疑道语，崖崖壑壑竞仙姿”前后相应。三三得九，指九曲溪；六六三十六，指三十六峰。李纲咏唱的“武夷古洞天”指明了武夷山是道教三十六洞天中的十六洞天，即升真元化洞天，三三、六六都是道家八卦学的术数。因此，武夷山水除了自然属性的惊世秀丽之外，又平增了一股仙风道骨的神韵，山水珠联璧合，奇秀甲于东南。

武夷风光是山与水完美结合的典范。曲折萦回的九曲溪发源于武夷山东部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西向东经平川（今星村）流至武夷宫汇入崇阳溪，其中从星村至武夷宫一段称为九曲溪，流程9.5公里。它受到不同方向断裂构造的控制，形成九曲十八弯，弯曲系数达1.9，溪中有八滩、五潭。两岸峰岩夹峙，武夷山最著名的三十六峰多在溪畔两侧，构成了“曲曲山回转，峰峰水抱流”的碧水丹山的景色。古人游览九曲溪，多是乘舟逆水自一曲流至九曲，今人则是乘竹筏从九曲起点顺游至一曲。坐游名山，侧耳闻溪声，伸手濯碧波，举目观赏两侧形态各异的秀丽山色，武夷山水的形象美、色彩美、听觉美、动态美、朦胧美，尽能收入耳目，令人陶醉。两岸的古今摩崖石刻又组成了奇特的文化景观，令人赏心悦目，应接不暇，而筏工应和着潺潺水声娓娓而谈的民间故事，又使游客平添若干奇趣，欢声笑语不绝。

九曲溪畔峰岩中最吸引游客的要算玉女峰了。她像一位少女，亭亭玉立于二曲之畔，倩影倒映在溪流中的浴香潭中。玉女峰的岩面红润光滑，如玉石精雕而成，峰顶花卉锦簇，恰似少女山花插鬓，临水梳妆。与玉女峰隔溪相望的是一曲的大王峰。民间衍化的玉女、大王相恋而被王母娘娘阻断两岸的故事脍炙人口，而玉女峰也就成为武夷山的品牌形象。

武夷山水的景观形象丰富多彩，变化无穷。南宋理学家朱熹曾在畅游九曲溪时徜徉山水之间，写下传唱近千年的《九曲棹歌》，每曲喜赋七绝一首，各镌于曲畔山崖。棹歌巧思隽永，令人神往，后人荟萃其中奇妙之处：一曲，雄伟豁达（大王峰）；二曲，幽谷丹崖（玉女峰）；三曲，虹桥奇观（大藏峰船棺）；四曲，茗茶飘香（御茶园遗址）；五曲，书声遗响（武夷精舍遗址）；六曲，天游揽胜（天游峰、云窝）；七曲，三仰挺拔（三仰峰）；八曲，奇峰怪石（双乳峰）；九曲，锦绣平川（白云岩、星村镇）。古人游罢九曲登岸，必漫步平川（今星村镇），观赏遍地稻粱桑麻的农家耕种之地，享受与农同乐的兴味。今则在星村登筏之前，抽暇游览设在三号码头的武夷碑林，欣赏当代书法名家书写的古人游武夷的诗文杰作，从中先行领略一番武夷山水的无穷奇趣。

美哉，武夷山水！书画名家潘主兰写得好："如此名山宜第几，相当曲水本无多！"

（方留章）

武夷山架壑船棺

武夷山九曲溪两岸的悬崖峭壁上，如今仍可清晰地看到深藏

在岩洞中的船形棺木，人们称之为船棺。而半露在洞外的船棺，则多数用皮板承载其外露部分，使之不致坠落，这些皮板，人们称之为虹桥板。据考察，武夷山现存船棺19具，虹桥板45块。此外，已取下以供考古研究的有2具，称为武夷1号船棺、武夷2号船棺。

武夷1号船棺取自山北景区观音岩，其年代距今3840年左右，为夏末商初遗存。现珍藏于武夷山博物馆。武夷山2号船棺取自山北景区莲花峰的白岩，距地表51米，棺木全长4.89米，宽0.55米，高0.73米，经考证，距今约3500年左右，为商代遗存，现珍藏于福建省博物馆。从白岩取下的武夷2号船棺的棺内遗物颇为丰富，有人骨遗骸，棺底竹席、竹片、竹棍，棺内的棉、麻、丝织品，鱼、鸟类遗骸以及枕于死者头部的龟形木盘和棕团等。其中随葬品之一的棉布残片，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棉纺织品实物。武夷船棺以年代的最为久远而成为人类悬棺葬的发祥地，其实物是研究我国先秦历史和已消亡的古闽族文化的极为珍贵的资料。

对于武夷架壑船棺的研究，目前正热烈地开展着，虽然众说纷纭，但比较接近的看法，都认为它应属于古代居住于中国大陆东南的某一个土著民族的葬俗。实行这一葬俗，与祖先崇拜、灵魂不灭等信仰观念密切相关。有趣的是，800多年前的南宋理学家朱熹认为传说中的仙灵武夷君实际上就是葬于悬崖峭壁上的武夷部落酋长（部落长），他的历代继承者（历任部落长）或拥有权势者也跻身于船棺，高悬于悬崖，才形成了古代史籍志书中所载的山中多达数百具船棺的场面。朱熹在《武夷山图序》中断言，武夷部落长“为众所臣服，而传以为仙也”。朱熹还进一步考证认定，大王峰就是武夷君的象征：“今山之群峰最高且正者，犹以大王为号。”对于大王峰升真洞内肉眼可以见到的船棺，朱熹则认为是武夷君仙蜕后的居宅。他写道：“……半顶有小丘焉，岂非（武夷）

君之（仙）居耶！”推而论之，如今大藏峰、小藏峰、莲花峰、玉女峰、双乳峰、仙钓台等处的船棺，也当是武夷君（部落长）的历任继承者仙蜕（亡故）之后的安身之地了。

为了纪念从山北景区的莲花峰白岩取下武夷2号船棺的考古创举，为了纪念在考证、研究武夷2号船棺过程中的丰硕成就，也为了纪念朱熹在论证武夷船棺中的真知灼见，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于1999年春鸠工搭架，在白岩硕大的岩壁上刻下四个擘窠大字：“白岩仙舟”。四字是集朱熹墨宝而成，数里之外清晰可见，形成一道自然和人文互相辉映的景观。

（方留章）

绝壁遗存古崖居

1999年春天，北京专家为指导武夷山景区申报加入“世界遗产名录”，多次进山考察。他们实地观赏了岩壑间众多的崖居遗迹，惊喜地指出：这是武夷山文化遗产的一大特色。专家们还解读了楼阁岩的一方摩崖石刻，刻文曰：“（宋）景定庚申（1260）三月游一线天，有崖居者可怪！”他们高兴地说：“这方崖刻就是738年以前有关武夷山民崖居乡俗的权威文字记载。崖居不仅令古人啧啧称奇，现代人也要大叫‘怪哉’呢！”

崖居是远古山民居住的原始形式，它既能起着防兽、防盗的作用，又能巧化天然山体为屏障，利用天然岩罅为居室，节约建筑材料。武夷山民生前的古崖居与死后的洞穴船棺葬，可谓人生中的配套构建，共同组成古代山民生死的风俗文化。

人们津津乐道的丹霞嶂“天车架”，就是古崖居的典型代表。

它嵌于崖壁半腰一条东高西低，长约百米的岩洞中，上下各数十米，巧如空中楼阁。崖居者通过木制的“天车”（辘轳）上下升降传送物件。此处崖居为木构建筑，东端为膳食区，遗有石臼、舂杵等物，均良好无损。中部是起居区，深广各数十米，建有两层木楼房，横梁和柱子尚完好。西端装有4副辘轳，木架和绞盘仍可使用。崖居各区之间有木梯相连．形成一个完整的居住群。崖居遗址石壁上有一段摩崖石刻：“北斗峰旁有铸钱场焉。岩起壁立，虽戎马纷来，攀越莫上。时发逆（按：崖居者对太平军的污蔑称呼）扰崇，予乃择险至此，架天车，开旷石，接泉饮。其门户侧、广、深各五丈有奇……”据查志书，当在清咸丰七年（1857），而岩刻所记的在这之前的民间私设铸钱场，则远不知哪年哪月了。此处崖居直到1900年后仍然有人居住，石砌矮墙上还嵌有“蔡义礼智房，光绪二十六年月立”的刻石，考古工作者在这里检出“洪记衣箱第十八号”的竹制行李牌、乾隆通宝铜钱和绣花鞋等。

山北龙井坑的金鸡洞古崖居的建筑规模虽比丹霞嶂的小，但其奇险更胜过丹霞嶂。此处崖居距离地面约70余米，距崖顶约40米，以挡墙半封洞口。挡墙分石、土两部分，右侧为块石堆砌，留有两处石门；左侧为泥土夯成，宽约10余米，墙高5米，距洞口上沿则不盈一米，几乎将洞口全部封住。洞内的建筑结构、生活陈设则不如丹霞嶂的古崖居可以一目了然，其中奥秘仍待探索。

杜围寨的古崖居则设防重重。第一道寨门为“土国在”，意为乡土之国永恒常在，寨门内茶园耕地零星散落，可耕可植。第二道寨门建在形似巨鳄怒张的上下两片突出的石崖中间，寨门两侧筑成一道长6米、高约5米、厚约0.7米的石寨墙，把上下两片突出石崖的中间部位密密封住，只留寨门可供来往，下临深渊，上架一根独木，惊险万分。险上加险的是，第二道寨门之内还有一道横额题为“不二门”的第三道寨门。隔壑张望对面，双重寨门

相叠映入眼帘，数步之间，恍若隔之万里。

俗称“七十二板墙”的古崖居，其构筑规模令人惊奇。寨居凭借一处岩顶斜覆、岩腰收敛的山麓构筑土墙。土墙自岩麓夯起，直耸而上，衔接岩顶边沿，形成一个封闭性的寨堡式民居。因筑墙时共用七十二次模式夯墙板筑成墙体，故称七十二板墙。寨居面积72平方米，高12米，分为四层。顶层部分的墙顶与崖体之间横架10根杉木，当年是作为铺覆顶篷之月。寨居为19世纪中叶乡民躲避战乱时所构筑，可居住百余人，附近还设有哨台等，以为报警之用。

建于武夷山的寺庙也多摹仿崖居形式，狭长的岩罅依次辟建了知客厅、山门、大殿、后殿和香积厨等。寺庙虽小，但神佛罗汉等一应俱全，香火旺盛，正应了一句老话：“螺丝壳里做道场”。

世界文化遗产专家、古建筑学家罗哲文教授对此赞赏有加，1999年春在山北“天车架”古崖居亲题“古崖居遗址”，并将它郑重介绍给外国研究中国建筑的专家们。

（黄胜科　方留章）

清献渠与吏隐亭

今武夷山市的清献渠是北宋崇安令赵抃在庆历二年(1042)主持兴修的水利工程。它北起陈湾坡，引水经石雄入城，南至郊区，渠道长6里，宽、深各4～5尺，灌溉农田万余亩。赵抃去世后，谥清献，这条贯穿城区的灌溉渠便称作清献渠，百姓延用至今。

赵抃，字阅道，今浙江衢州人。他名列崇安县名宦之首，施

益于崇安人民，为崇安人民所敬仰。

武夷山是我国东南的道教名山，唐末就开始在这里修建道院，而最著名者莫过于冲佑观。赵抃在公事之余，常游武夷山，写下了《武夷行》："武夷之山千万峰，溪水诘曲流其中。喷云涌雪可舟楫，一棹抚览仙人踪。白鹤昂昂写峭壁，雕虎长啸来清风。悬崖蜕骨造化外，绝壑架船神鬼功。寒岩鼎灶失鸡犬，盘石松桧腾蛟龙。行行自喜浣尘俗，萧散玉宇超樊笼。当年此日是高会，左仙右仙曲未终。紫皇飘然上天去，曾孙虹桥路已穷。我生丹心涵太冲，欲脱缰锁追鸿濛。上邀轩辕宴元圃，手摘日月相游从。"

赵抃的这首诗作于农历八月十五。这天是民间的中秋佳节，也是古书所说的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武夷仙人置酒会乡人于幔亭峰顶，即幔亭招宴的纪念日，赵抃将这一宴会称作高会，以为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赵抃是历史上第一位真正了解武夷胜景的内涵的文人，是他首先发现了武夷山的游览价值。当年武夷山中惟一的游览设施是道观。道观供游人宿食，道士为游客带路导游。至于供游客憩息或眺览的亭台是没有的，赵抃第一个建了专供憩息游览之用的吏隐亭。吏隐亭选建于四曲宴仙岩上。这里无陆路可通，仅能泊舟登岸而至。宴仙岩隔溪与仙游岩相望。仙游岩左旁有金井涧，游人可深入金井坑探胜。宴仙岩右是三曲小藏峰，宴仙岩左是四曲大藏峰。小藏峰、大藏峰上都有神秘莫测的虹桥板和架壑船，还有大藏峰半壁的金鸡洞。总之，这一带是武夷山中最为神秘的地方。赵抃在这一带"抚览仙人踪"，却没有驻足观览的亭台，因而他在这里的宴仙岩上建吏隐亭，便于游人驻足观览。亭虽名为吏隐，但赵抃并非主张吏隐，而他本人也是积极进取的。他在崇安令任上，为民办了许多好事，政声大著，后被提为殿中侍御史，人称他"铁面御史"。宋神宗熙宁初，他升任参知政事，成了朝廷重臣。

为纪念赵抃，南宋乾道初年，崇安令诸葛廷瑞建祠祀赵抃和南宋理学家胡安国。明朝万历年间，在武夷冲佑观右边建四贤祠，祀赵抃、胡安国、刘子翚、朱熹。

（徐学仁）

朱熹纪念馆

朱熹纪念馆建在古代道教名观冲佑观的原址上，它是武夷山的著名文化景观。冲佑观始建于唐天宝七载（748），史称名山巨构，1200余年以来历经兵燹、火毁，屡经修复、重建，最后一次的修复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末，是为纪念朱熹诞辰860周年而动工的。

朱熹是中国南宋的一个伟大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他诞生于1130年，逝世于1200年，享年71岁。

朱熹是与孔子并称的儒学思想的代表者。朱熹在世的南宋时期，中国的北方被女真贵族侵占，南宋朝廷偏安于临安（杭州），国家的文化重心随着政治、经济而向南转移，贤哲、文人遂荟萃于武夷山这座东南名山之中，武夷文化应运而诞生。朱熹活动于武夷山地区50余年，他创建书院，授徒讲学，著书立说，培养人才，重新树立起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儒家思想的正宗地位。他所创立的学派史称朱子学(闽学)，汇集了当时主要的儒学学派濂学、洛学、关学之大成。他始创“四书学”，即把儒教创始人孔子、孟子和他的学生曾参、子思的经典论著《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汇成一个系列，加以权威性的阐述、论述，名之为《四书集注》，促使它成为官方科举取士的标准教科书。元朝统一中国之

后，朱子学自南向北传播，由朝廷定为一尊，成为国家的正宗思想，武夷文化也成为国家的正统文化。迨至明清两代，朱子学一直成为国家文化的正宗，达七八百年之久。它成为历代理学家讲述伦理学、政治学、哲学的基本纲领和政治家治理国家的基本指导思想。朱子学的精华部分还广泛地影响着当代思想界，继续为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贡献。

纪念馆用文字、图片、实物简介了朱熹的生平，突出展示了他在武夷山自童年受教直至老年讲学、终成大儒的不平凡经历，还简述了他的学说贯通古今、远播海外的盛况。图、文、物相互对照、印证，从而使观众加深直观印象。

纪念馆展出的重要实物，有福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刘公神道碑”。它是朱熹为他的义父、军事家刘子羽建立的墓碑，他亲撰并书写的3000余字碑文详细叙述了刘子羽的抗金战功和向投降主和派作不屈斗争的经历。重点文物中还有刘子羽立朝45天用过的朝笏、手稿墨宝以及皇帝御赐给理学前辈杨时、李侗的题词等。朱熹的墨宝也制成大字巨碑，如“忠孝廉节”、“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和诗碑《九曲棹歌》、《四季读书诗》、《潭州城南二十景》等，它们展现出大理学家朱熹同时还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书法家的风采。

展出实物最多的是卷帙浩繁的、版本各异的朱熹理学巨著，朝代自宋一直到当代。弥足珍贵的还有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的《论语集注》课本。现代新儒学学者的著作，包括美国、日本、韩国和欧洲、澳洲学者的专著，则集中了海内外论著的精华。此外，某些文章还介绍了活跃于海内外的朱熹后裔的概况。

纪念馆还展示了最近十余年来共召开五次国际朱子学研讨会的概况，展出了当代名人赞颂朱熹的诗文、书画等。

（方留章）

朱子故居紫阳楼

1999年初冬时节，武夷山市五夫镇却是一片春意盎然。屏山之麓、潭溪之畔人声鼎沸，人们伫立在松桂翠竹拱卫着的一处古朴的民居前，等待着一个期盼已久的时刻。今天在这里将举行朱子故居紫阳楼修复竣工的典礼。

在鞭炮声中，红色的帷幕徐徐揭开。紫阳楼的匾额在冬日照耀下熠熠生辉，人们热烈鼓掌，欢呼南宋理学家朱熹定居近50年的故居终于修复。

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14岁的朱熹遵亡父朱松的遗命，奉母由建安（今建瓯）北迁，定居于崇安五夫里（今武夷山市五夫镇），投靠义父刘子羽。刘为抗金名将，时为奸相秦桧陷害，蛰居乡里。他不负好友重托，为朱熹母子构筑楼宅于潭溪之畔、屏山之麓。朱熹遂侍奉慈母安居此地。因为朱氏的祖籍徽州婺源有紫阳山，朱熹为表示不忘先祖，故名新宅为紫阳楼，匾其厅堂为“紫阳书堂”。

紫阳楼于民国初年毁于兵燹。如今修复重建的紫阳楼，构体为歇山顶的闽北民居格式，内中的厅、堂、室、斋、轩等均按朱熹自撰的《名堂室记》进行布局。修复后的紫阳楼仍坐落在南宋初建的原址上，楼宅两廊的厢房现为“朱熹在五夫”图片展览，图片展现了他定居紫阳楼期间的史迹。楼前一片青翠扶疏的毛竹，间杂着十数株高大挺拔的松桂，并有几畦青圃镶嵌着半亩方塘，仍是宋人当年所云，“麓可以树，有圃可蔬，有池可鱼”的幽静环境。当年朱熹手植的古樟早已成为拱材，数百年来香气飘逸，流芳

万古。

南宋绍熙三年（1192），63岁的朱熹受谗于奸佞之臣，被迫辞别五夫家祠，南迁建阳考亭，但他仍时刻心系五夫。去世前数年，他又返回旧居，将父墓从鹅子峰麓迁至卜吉之地——内五夫里的寂历山，并命第三子朱在的后裔留住紫阳楼，一面庐墓守业，一面教学著述。朱氏教泽绵长，五夫乡民至今铭记不忘。

（方留章）

摩崖石刻“道南理窟”

武夷山晚对峰上有一处引人注目的摩崖石刻，文曰“道南理窟　易斋马负书题”。前四个擘窠大字每字两米见方，苍郁古雅，内涵深奥，既有艺术价值，又概括了武夷山作为“理学渊薮”的深厚历史沉积。

摩崖石刻的书写者马负书，号易斋，清乾隆元年（1736）状元。据志书记载，他是“镶红旗汉军人，乾隆十八年（1753）任福建陆路提督总兵官”，驻司泉州。乾隆三十二年（1767），病逝于泉州任内。马负书在世时，曾畅游武夷山，他对秀丽的山川不仅叹为观止，且对荟萃于名山的理学鸿儒也倾慕不已，遂立下志愿，要在名山勒石题刻，“欲以理学渊薮，发山川之秀灵”。为此，他预先题写了“道南理窟”等字，后因军务倥偬，未能如愿。病逝后，其子马应壁谨记父训。十年后即乾隆四十二年（1777），马应壁任崇安县游击，遂鸠工将乃父遗墨镌刻于朱熹构建之武夷精舍隔溪的晚对峰上，同时加刻了自己写的跋，叙述他完成乃父遗愿的始末，两年后全部镌刻完工。

“道南”源于北宋理学家程颢的一句赞语“吾道南矣”，当时，他的得意门徒游酢、杨时辞师从河南颍川南归武夷，在送行时，他以此表达了他的学术思想南传有人的欣慰之情。“理窟”意为理学家荟萃之宝地。的确如此，游酢、杨时后来又从师于程颢之弟程颐，因虚心求教和勤勉从学，赢得了“程门立雪”尊师重道的美名。二人南归闽地后，首先就在武夷山讲学，杨时的二传弟子罗从彦和三传弟子李侗都在武夷山游学授徒。而游酢则在山中的云窝胜地结庐讲学，庐名“水云寮”，如今石刻手书犹在隐屏峰的岩壁上。寮侧迄今还有他当年的生活用具岩臼等物，这给后人留下了理学先辈安贫乐道的崇高风范。南宋淳熙十年（1183），杨时的三传弟子朱熹在与晚对峰隔溪相望的武夷隐屏峰下构筑武夷精舍，聚徒讲学，并以此为中心，向东南各地传播理学数十载。在此期间，他的弟子蔡元定、刘爚、蔡沈、蔡抗等都如众星拱月似地围绕在武夷精舍附近，构筑书院，讲学授徒，以弘扬师道为己任，形成了传播理学的学术基地。从元至清，理学薪火相传，斯文一脉相承，元代的杜本，明代的湛若水、王阳明、李材以及清代主编《朱子大全》的李光地等等，或长期隐居此地授徒讲学，或数度在山中传播理学，或倡修朱子讲学胜迹，弘扬先贤之道，或为朱子理学所感染，积极上书朝廷，促使朱熹列为配祀孔子的“十哲”之一，把朱熹的地位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峰。摩刻的作者有感于此，于是恭书“道南理窟”四个擘窠大字，以此揭示福建的历代学者在武夷山合力继承师道，创造理学辉煌的不朽业绩！

由于“道南理窟”四字既高度概括了以朱熹为代表的历代理学思想家在武夷山所创建的历史功绩，同时也揭示了武夷山在中国古代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从而使其成为武夷山人文景观的一个重要徽志。

（方留章）

武夷茶的魅力

英国19世纪著名诗人拜伦的长诗《唐璜》，曾经提到世界名茶——武夷红茶。拜伦是这样写的：

我觉得我的心儿变得那么富于同情，
我一定要去求助于武夷的红茶；
真可惜酒却是那么地有害，
因为茶和咖啡使我们更为严肃。

在这里，拜伦对男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感到无比激愤。诗人陷入极端忧愁与苦闷之际，于是求助于武夷红茶。他在浓郁的茶味中严肃地思考着当时英国残酷的现实问题。

武夷红茶早在17世纪初就已畅销欧洲，进入英国上层社会。拜伦在名著中提到它，可以窥见武夷红茶在当时的特殊地位。

其实，武夷红茶仅是武夷茶的一种。它的闻名于世是在17世纪，而武夷茶的历史和初负盛名还要早得多呢！

武夷茶在距今1500年前的南朝就以“晚甘侯”之名而闻名。到了唐朝，盛名益彰，唐代诗人徐夤《谢尚书惠腊面茶》诗中，便有“武夷春暖月初圆，采摘新芽献地仙”之句。当时武夷茶以研膏茶的形式出现，后来发展成为腊面茶，开始少量进贡皇宫，为皇帝所宠爱。北宋时武夷茶仍为贡品。北宋太平兴国初年（976），朝廷特置龙凤模印，遣使到建州和武夷山一带，监造团茶以别于一般的庶饮，龙团凤饼从此诞生。文人墨客品饮之余，雅兴大发，争相咏赞。民国《崇安县新志》载：“宋时范仲淹、欧阳修、梅圣俞（尧臣）、苏轼、蔡襄、丁谓等从而张之，武夷茶遂驰名天下。”

宋朝南渡以后，武夷山成为理学名山。著名学者荟萃山中，斗茶品茗，以茶促文，以文论道，极一时之盛。而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武夷山，又成为僧道竞相建寺造观的场所。僧道凭借武夷茶之魅力参禅悟道、修静炼丹，且僧道们大多能躬耕茶园，精于茶叶制作，茶事由之大兴。元朝，武夷茶名闻遐迩，朝廷创建御茶园于四曲之畔，“岁贡二十斤，采摘户凡八十”，武夷茶进入鼎盛时期。明初茶贡照常，但贡茶须按新的制作方法，即废除制作龙团凤饼，改制成芽茶入贡。嘉靖三十六年（1557），废止四曲御茶园。明清两朝，少量茶叶仍作为贡品献给朝廷。《武夷山志》编纂者董天工为此赋诗写道：“武夷粟粒茶，采摘献天家……”明末清初，武夷茶独特的制作技术脱颖而出，出现介乎红茶与绿茶之间的乌龙茶（即现在所称的武夷岩茶）。全国其他茶区群起效尤，武夷茶名声大起，遂大量出口境外。先是从分水关出境，辗转北行到中俄边境的恰克图城进行边境贸易。这条道路史称“茶叶之路”，与丝绸之路同享盛名。茶叶到达恰克图之后络绎进入英国和北欧各国。鸦片战争之后，武夷茶大量从福州、厦门两个海岸出口，年产量在光绪年间达35万公斤。

武夷山水之间，层叠的茶园点缀着，散布着，为秀丽的景色添辉增彩。珍贵名种大红袍的原株产地甚至成了一个著名的景点，高雅的武夷茶艺表演，也成了武夷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方留章）

老外杰作《武夷图》

武夷山市志委的资料档案库中，珍藏着一幅155年以前英国

画家创作的《武夷图》复制品（立轴），它是1998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武夷山加入《世界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名录》的过程中被挖金矿似地挖掘出来的佳品。

英国画家绘制的是九曲至四曲、小九曲一带的溪山胜境。纵览全图，只见九曲溪流淌而下，两岸丹嶂列立，争奇竞秀；屋宇僧舍，珍树异草，历历在目。佳作层次分明：远处，一桥横穿清溪，桥上建有顶盖，应是当时廊桥式的九曲桥。按顺流方向依序精心描绘的有仙掌峰、天游峰和隐屏峰。三峰占据画轴上中部，十分引人注目。天游峰上的道观建筑虽仅略露一隅，但已可管窥其盛貌；仙掌峰的岩壁上绘的三个掌痕清晰如凿；隐屏峰上险梯倚崖……都尽显画家独具匠心的写实画技。位于隐屏峰麓处的茅舍、屋宇显然是武夷精舍。隔溪而立的是晚对峰，画家在峰麓处精心绘制了朱熹三传弟子熊禾构建的洪源书堂，使人顿生“隔溪遥瞻，高山仰止”的崇圣心态。

立轴近景是高耸的大藏峰。峰巅稍下绘有虹桥板和架壑船棺。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画家画了仙机岩。对于岩洞里珍藏的三具船棺，画家做了略为夸张的处理。隔溪绘制了仙钓台，即现在筏工通俗解释的“万吨巨轮”。仙钓台下一张竹筏正拟迂回转向四曲。仙钓台的邻壑，画家精绘了一组楼舍，旧称泊庵，今辟为庞公茶馆，并在附近高处建有观棺台，可以隔溪眺望大藏峰金鸡洞内的秘藏。观赏此画，“按图索骥”，对照今景，倍感亲切！尤其使人感兴趣的是溪流中间的笠盘石、水龟石和茶灶石等都历历在目，令人叹为观止。

立轴近景的小九曲，也是九曲溪的一个渡口。有两艘篷船正在撑渡，水光岚影，和煦清柔。好一个老外，他钟情于武夷山水，精绘了如此美妙的九曲溪山图。此幅立轴具有中国画的独特布局和传统构图法，又融入了西画素描的表现手法，可以说是一幅完美的中西结合的艺术品。

画家是英国人罗伯特·福琼(1813—1880)。他还是一位植物采集专家。1843年，当时他年届而立之年，前来武夷山采集植物标本，忙里偷闲，慕名畅游了九曲溪，并攀登峰岩揽胜探险。也许他感到西画构图无法表达如此深邃广阔的武夷景观，于是他大胆采用了中国画传统的散点透视法，且用西画中罕见的立轴式来精绘武夷山水。他的画作，与清朝董天工《武夷山志》中收集的横幅武夷山水图各逞奇绝，珠联璧合。

这幅立轴被收辑入英国作家查尔斯·里特于1983年著述的《植物采集》一书中。作家在介绍这幅画时，写了一段话，译文如下：九曲溪，曲折萦绕地穿过奇秀的块岩和峰峦。她那绘画般的、中国典型园林式的美妙景观吸引着罗伯特·福琼，使他如醉如痴地历尽万险而猎奇其中。

（方留章　黄胜科）

武夷最早的隐士顾野王

顾野王，字希冯，原籍苏州，出生于南朝梁武帝天监十八年(519)。他自幼聪颖过人，7岁能读《五经》，9岁便会写文章。12岁时随其父举家迁居建瓯城东，在建瓯他遍览经史诸书，并在学术研究中培养了多种才能。他不仅擅长于绘画，而且精于文字学。至于天文地理、筮龟占卜，也无所不通。

梁大同九年（543），25岁的顾野王便崭露头角，撰写出我国文字学史上的巨著《玉篇》。这是继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之后，第一部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字学著作。《玉篇》共30卷，比许慎的《说文解字》多收542字，尤其是在字的标音方面开创了运用反切

标音的先河。他在给字作训诂时，每字都先用反切标音，而后广泛援引群书，解说颇为详细。直至千余年后，后人编撰《康熙字典》时，仍沿用这一编撰体例。到了近代，拼音标音法才取代了反切标音法。

怀才不遇的顾野王曾与南朝名士王褒同为梁宣城王的宾客。宣城王起斋致祭、顾野王画古贤人像，王褒写古贤人像赞，时人称之为“双绝”。他还任过梁临贺王的记室，长期得不到重用。由于梁武帝安置北齐叛将侯景于内地，招致侯景之乱。在国难来临之际，顾野王毅然投笔从戎。最终，梁武帝被侯景拘禁，梁亡，年已 40 岁的顾野王受召仕陈。陈天嘉年间（560—565），顾野王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光禄卿，奉使福建。年近半百的他回到第二故乡——建瓯，前往武夷山，泛舟九曲溪，遍览武夷泉石之胜，情不自禁地赞叹道：“千峰竞秀，万壑争流，美哉河山，真人世所罕觏也！”从此，他失去了对仕途进取的信心，弃官隐居崇安讲学著述，在武夷山区传播文化知识。因此《崇安县志》说“崇人知学自野王始”，并记载了顾野王宅在崇城的方位。

顾野王作为武夷隐士居崇安讲学著述近 20 年。他的著述有《舆地志》、《瑞应图》、《玄象表》、《分野枢要》、《续冥洞记》、《建安地记》、《顾氏谱传》和《文集》等。他临终时还在撰写 120 卷的《通史要略》，但“未就而卒”。

（徐学仁）

高僧扣冰与武夷佛教

武夷本是有着悠久历史的道教名山，但在唐朝末年，却出了

名僧扣冰，是他首先奠定了佛教在武夷山区传播的基础。

扣冰本姓翁，祖籍长安（今陕西西安）。其父翁承钦，曾任河西节度推官，只因唐末中原战乱，入闽择居今武夷山市的吴屯。扣冰出生于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农历二月初六。据传，扣冰出生之前，翁承钦梦见一个老和尚手持锡杖前来家中求宿，这个和尚的侍者对承钦说老和尚是辟支佛。一觉醒来，扣冰便在翁家降生了。这时，满室异香，承钦大喜，认为儿子是辟支佛转世投胎。因为这个孩子生来特异，能在冬天扣冰而浴，所以号扣冰。扣冰长到10岁便闹着要出家当和尚，父母想起儿子出生前那个梦，便也就答应了儿子的要求。于是，他便成了扣冰和尚，去云游四方，拜师学佛。

当时，福建闽侯雪峰山有座崇圣寺，为高僧义存所创建，常驻僧人达一千多人。扣冰慕名前往崇圣寺参拜义存。义存为探知扣冰的造诣，厉声喝道："进则死，退则亡"，扣冰不慌不忙正色回答："横行数步又何妨？"义存终于接受扣冰，让高弟神晏会见扣冰。这个神晏便是福州鼓山涌泉寺的开山祖师。他向扣冰说佛，两人成了好友。

唐朝的佛教分成两个流派，即佛教北宗和佛教南宗。北宗主张通过打坐、念经、持斋的途径而成佛；南宗则认为天下无佛，我心即佛，学佛贵在诚心，不一定要打坐、念经、持斋，同样可以成佛。在我国佛教史上，佛教南宗创始人、慧能的高弟南岳怀让禅师与北宗禅师马祖道一在南岳衡山进行过一场关于"磨砖成镜"的辩论。通过辩论之后，北宗的马祖道一终于皈依南宗，后来竟成为佛教南宗的大师。公元9世纪中期，马祖道一禅师到建阳县崇泰里（今莒口镇）佛迹岭开创福建禅宗。唐咸通年间（860—873）翁郜疏请建佛迹寺，说明佛迹寺有千余年的历史，比扣冰生活的年代稍微早一些，扣冰学佛有可能受南宗大师马祖道一的影响。

扣冰云游四方之后，皈依南宗，回到武夷寻求僻静之处学佛。

他为磨炼自己学佛诚心，常自问自答："惺否？""惺！"经过如此反复自问自答，诚心向佛，竟连双虎侍立身旁也不知。因此，唐末名僧贯休在《怀武夷山禅师》一诗中，以"红心蕉绕屋，白额虎同禅"称赞扣冰武夷学佛的诚心。扣冰武夷向佛名声渐大，前来从师学佛的不少。僧徒对佛教南宗不甚了解，问他："为什么不念经？"答道："我心里常常想着它！"又问："为什么不礼佛！"答道："我心里常常敬着它！"再问："你为什么不开堂说法？"又答道："我心里空空，没什么可说的。"也许正因如此，有人把进禅门叫做入空门。

扣冰晚年名声大振。笃信佛教的闽王王延钧以隆重的礼节，请扣冰到福州。扣冰对王延钧说："要以百姓为念啊，千万别伤害生灵！"王延钧把扣冰安置在鼓山涌泉寺。不久，年过八旬的扣冰在鼓山圆寂。后唐天成间（926—929），吴屯乡民前往鼓山涌泉寺，将扣冰的肉身请回吴屯，将扣冰肉身佛供奉于扣冰生前创建的瑞岩禅寺中。千年以来，为纪念扣冰，每年农历二月初六（扣冰诞辰日）全民秉烛迎奉扣冰肉身。这一庆祝活动从吴屯发展到全崇安，形成规模空前，延续整个农历二月的"蜡烛会"。"蜡烛会"，民间又称之为"柴头会"。解放后，破除迷信，人民政府改"蜡烛会"为物资交流会，为迎接春耕生产开展农贸活动，使千古以来世代相传的"蜡烛会"延续至今。

（徐学仁）

李商隐首开武夷诗风

武夷山以道教名山著称于世。汉武帝迷信神仙，曾派使者千

里迢迢到武夷山，以干鱼祭祀武夷君。

然而，神仙之有无，历来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唐朝帝王李姓，尊崇老子为太上老君，甚至御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朝末年，帝王都迷信神仙。李商隐活着的47年间，宪宗、敬宗、武宗三个皇帝都因求仙服食丹砂而丧命。生不逢时的李商隐虽然弱冠就中进士，才华横溢，但仅任过县尉、秘书郎之类的小官吏，终生失意困顿。在他逝世的前几年，因原幕主柳仲郢的荐举，李商隐前往江南东道任盐铁推官。可能在这时，他游览了闽浙名胜。他此时所作《龙邱道中》一诗有“溪声怯建溪”之句，就是他游历武夷的明证。

李商隐身处唐末乱世，才能得不到发挥，慨叹社会的不公平，孕育了他的叛逆精神。他以诗歌为武器，揭露神仙的虚妄，谴责封建帝王的迷信神仙。他的《瑶池》一诗：“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八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这首诗否定神仙乐事，嘲讽误国的穆王。他的《咏武夷》一诗，敢向神仙挑战，开了一代武夷诗风。诗曰：“只得流霞泛一杯，空中箫鼓当时回。武夷洞里生毛竹，老尽曾孙更不来。”这首诗是说，求仙的结果仅仅得到一杯满满的流霞（即所谓的仙酒）。武夷仙人在幔亭峰上招宴的乐事在适当的时候停歇了（否定神仙乐事）。正如陆羽《武夷山记》所载：“武夷君因少年慢之。一夕，山心悉生毛竹如刺，中者成疾，人莫敢犯，遂不与村俗往来”，说明武夷仙人实属乌有，“曾孙”的后裔不再与神仙往来。李商隐在诗中所用“流霞”之典故出东汉王充的《论衡》，说的是河东蒲坂有个项曼卿好道学仙，离家三年后回来，说仙人给我流霞，每饮一杯，可以几天不用吃喝。这就是说求仙的结果仅仅能够解数日之饥罢了。李商隐借用这个典故来否定武夷仙人在幔亭招宴的神话，无情嘲讽唐朝统治者求仙的愚蠢，这无异于投向统治者一把利刃。

李商隐首开武夷诗风，向神仙挑战，他的气魄和胆量是难能可贵的。唐以后的诗人进一步发扬武夷诗歌的战斗传统。宋陈梦庚作《汉祀坛》一诗云："苔老坛荒扫不开，汉皇多欲岂仙才？乘龙人去真灵失，万里空劳一使来。"直接把矛头对准西汉最高统治者、迷信神仙的汉武帝刘彻。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深受佛道思想影响，但他在《过武夷作》一诗中也发出了"不学飞仙术，垒垒丘冢多"的感慨。明朝金玉赞作《天游观》一诗有"逍遥即是神仙宅，徐福空求海上山"之句，讽刺秦始皇派徐福海上寻仙的愚昧。清朝著名诗人朱彝尊游武夷时，作《仙蜕岩》一诗，反世俗而吟唱道："莫唱人间可哀曲，山阿遗蜕亦堪悲"，也是继承李商隐开创的武夷诗风，向武夷神权挑战的檄文。

（徐学仁）

福建最早的词集

柳永是我国北宋前期最负盛名的词人。其人其词，在中国和福建的文学史上创造了好几个第一。他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专业词人，也是第一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取得卓著地位的福建作家。在形式上，他创制了许多慢词长调，是北宋第一位大量创作慢词的作家。在艺术风格上，他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第一位大师。他还是当时闽籍词作家中存世作品最多的一位，留有福建历史上最早的词集——《乐章集》，传世的作品200多首。《乐章集》主要内容是反映都市的繁华，倾诉男女相思之情，描写羁旅行役，抒发离怀别绪，表现失意文人的感受，以及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等。在表现手法上，柳永善于以浅显平易的民间口语入词，描写上尽情

铺展舒张，融情入景，从而产生了深婉含蓄、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

《乐章集》惟一的宋刻本，是仅见于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的九卷本，现存的版本，单刻本已甚为罕见。所存或为明清抄本，或为丛书本。通行本有明毛氏汲古阁《宋名家词本》、清朱氏《彊村丛书》本、《四库全书》本、《四部备要》本等，有三卷本、二卷本、一卷本等区别。诸家版本比勘，可得柳词200多首，但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九卷本相比，现存柳词只是柳永原作的一小部分而已。

（方彦寿）

李纲梦游武夷

李纲是两宋之际积极领导抗金，具有民族气节的英雄，历史上有“出将入相，南渡第一名臣”之誉。北宋宣和七年（1125），李纲任太常少卿，在金人毁约、大举南侵之际，他刺臂血书写奏疏，请宋徽宗禅位太子，以号召天下。宋钦宗即位后，他官兵部侍郎，反对南迁，积极抗战，迫使金人撤退。南宋建炎元年（1127），李纲任宋高宗的宰相仅75日，因力主抗金，受投降派的排挤而被解职。

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李纲曾两次游武夷。也许与其慷慨悲壮的一生有关吧，他两次入武夷正好都在萧瑟的冬季。

宣和元年（1119），李纲因上疏要求清除弊政，革新政治，加强国力，以备外患，被贬谪至南剑州沙县任监税。这年冬天，李纲在赴沙县任时，途经武夷，宿于冲佑观观妙堂内。观中道士引

其“乘小舟，泛九曲”，只见沿途“奇峰怪石，顾揖不暇”。在四曲，他见到了相传是被控鹤仙人一剑所击，应声而裂的试剑石，不禁豪气勃发，口占一诗：“炼气为金铸剑成，且将顽石试青萍。光芒郁郁冲牛斗，斩尽妖魔若发硎！”

当他登上天游，到达晞真馆时，天上纷纷扬扬竟下起了大雪。但见“琼花巧缀岩端树，玉屑飘随洞里风”，武夷诸峰，在纷飞的雪花中若隐若现，此情此景，似曾相识，恍若梦中！

原来，李纲虽然是离武夷山仅数十里之遥的邵武人，但他“因游宦四方”，在此之前，并没有到过武夷，他经常为此而深感遗憾。这年夏季的一天，他在睡午觉时，做了一个奇异的梦。在梦中，他乘舟穿行于乱石之间，纵目四望，“峰峦奇秀，有如玉色”、“瑰奇不可摹状”。其情其景，美不胜收。醒来后，他觉得这一定是非人世间所能有的仙境。而眼下，他站在天游峰上，眼前所见，居然与其梦中所见极其相似。他不由感慨万端，惊呼“斯游清绝，已先兆于梦寐，虽欲不到不可得也”。

回到冲佑观后，他兴奋不已，一口气写下了《武夷山赋》一篇，《大王峰》、《幔亭峰》、《仙机岩》、《题晞真馆三十二韵》等诗50首。在《武夷山赋》的小序和《记旧梦并序》中，他详细记载了此次游武夷山以及他曾在梦中游武夷的情景。其《记旧梦》诗则云：“清梦先曾到武夷，万山如玉倍幽奇。而今带雪寻归路，恰似翛然梦觉时。”

李纲二游武夷是宣和七年（1125）冬。这时，金兵大举南下，进逼汴京，宋徽宗在情急之下才想起忠心报国的李纲，复任他为太常少卿。李纲在北归经武夷时，“复寻旧游，泛舟仙溪”。这一次，因军情急迫，李纲已无心在山上多加逗留，写诗的灵感被奔赴前线的心情所代替。与第一次游山时写下50首诗相比，此次他只留下了《武夷行》一诗。因又住在观妙堂内，于是将此诗与前

所作 50 首汇集成册，命人誊录一遍，将其赠送给冲佑观的观妙法师。

次日，李纲吟诵着他的《武夷行》一诗中的最后几句："征鞍欲去更从容，仙境灵踪岂易逢。他日追思不可到，梦魂还过七闽中！"回过头来朝武夷山深情地望了一眼，带着对武夷梦中的眷恋之情，踏上了烽烟滚滚的征程！

（方彦寿）

理学先驱者的武夷情

武夷山有深蕴禅机的佛光，也有仙风道骨的神采，而散发着书卷馨香的朱子理学文化更是山中瑰宝，是武夷山申报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但是人们深深知道，树有根，水有源，朱子理学自有它的根源，那就是早在朱熹之前的北宋理学先驱者，他们在武夷山构筑精舍、书院，留下讲学处、过化处，无不为肇建、开启理学文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诞生于北宋末期的五夫里人氏胡安国，就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家，他的传世之作《春秋传》一直作为封建王朝的科举必读的课本。他后来偕儿子胡宏隐居南岳衡山，埋头著述教学，使南岳成为湖湘学派的发源地，使岳麓书院成为驰名全国的四大书院之一。胡氏父子离乡赴湘之前，多次入武夷山游览抒怀，写下动人的诗篇。胡安国的儿子胡寅和侄儿胡宪也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胡宪还是在五夫里亲授朱熹的师尊之一。胡安国和子侄胡宏、胡寅、胡宪被乡人尊为四贤，立祠于崇安县（即今之武夷山市）孔庙之侧。现孔庙旧址仍保存着明代镌刻的四贤图并诗赞的石碑。据《武夷

山志》记载，胡安国、胡寅、胡宪等先后归隐武夷山。胡安国自号武夷翁，年65岁，清康熙皇帝赐以“霜松雪柏”的匾额。胡寅曾构筑夺秀亭于五曲之罗汉岩，去世后朝廷谥之为文忠。胡宪晚年辞官回乡后归隐武夷，每日与朱熹的另外两位师尊刘勉之、刘子翚探究学问，人尊之为籍溪先生。朱熹成名后自言：遵父命从游胡、刘三君子，而事籍溪（即胡宪）最久，得其学最多云。

比胡氏家族更早进入武夷山奠定理学基础的学者，要算是北宋的建阳人游酢和将乐人杨时了。距今900年以前，这两位学者联袂进入武夷山。他们把理学开山祖师、河南程颢、程颐二兄弟的学问首传武夷山，使这座东南名山成为理学南传的第一驿站，也为这座名山诞生朱子理学奠定了基础。这两位以“程门立雪”而享誉千秋的闽籍学者对武夷山情有独钟，他们认定武夷山是一方潜心修业的宝地。杨时当即写下长歌赞美武夷：“武夷山深水清泚，避世合有高人踪……”诗中蕴含着欲隐山中潜心著述之意，惜未能如愿。他的师兄游酢却在云窝安然住下，在铁象岩构筑了水云寮，矢志著述，着力授徒。一介寒儒为后人留下了当年脱粟素食的岩臼遗存，也留下了“君子固穷”的安贫乐道形象。

品罢“水云寮”三字古拙的岩刻，穿过游酢把书院谦称为“草寮”的石坊门，来到了另一座石坊门“叔圭精舍”。这是一位早于朱熹进山的理学名人江贽（字叔圭）的书院。坊门是北宋徽宗皇帝敕令建立的，江贽的家族传人后来又在附近创建淮阳书院，还立了奉先祠以奉祀江氏先辈，并继承家学。清雍正年间，崇安县令还为奉先祠立碑，彰扬江氏裔孙克绍箕裘，延续家学达600余年之久，奉先祠碑如今还矗立在云窝之腹地。

12世纪中叶，游酢、江贽进山之后约40余年，旷世哲人朱熹

悄然进山了。他在垂髫之年随师刘子翚进山授业，弱冠之年喜中进士，脱颖而出，嗣后无意仕途，在五曲之畔办学创业，书院名曰武夷精舍，一时弦诵不绝，桃李芬芳。他在精舍潜心著述，完成了诠释孔学经典著作的巨著《四书集注》、《书集传》、《诗集传》、《易本义》等，成为继孔子之后的儒学集大成者，一代理学巨人，他的学派后人称之为朱子理学。

（方留章）

爱国诗人刘子翚

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三月，朱熹的父亲朱松临逝世前，将其家事托付给崇安五夫的“武夷三先生”。这三先生后来就成了帮助少年朱熹完成学业的启蒙导师。爱国诗人刘子翚即“武夷三先生”之一。

刘子翚（1101—1147），字彦冲，号屏山，又号病翁。父刘韐，靖康间出使金国，金人强迫其投降，刘韐宁死不屈，以忠义气节闻名于世。当时刘子翚为真定（今河北正定）幕府，山河破碎，人民受难，父执喋血疆场的残酷现实使他不堪重负，以致哀哭成疾。建炎年间，通判兴化军（今莆田），有政绩，但身心日衰，自知难以承担吏责，终于在绍兴二年（1132）八月以疾辞归。

刘子翚的诗效法陶渊明、韦庄的萧散冲淡，同时由于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又形成其嫉世愤俗的沉郁。其诗崛起于南宋初期，对后来斐声诗坛的“南渡四大家”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代表作《汴京纪事》20首，追记靖康之难汴京沦陷的历史，沉痛哀悼都城的沦陷，尖锐斥责权奸误国。

如“空嗟覆鼎误前朝，骨朽人间骂未消。夜月池台王傅宅，春风杨柳太师桥。”表现作者愿为收复祖国大好河山而建功立业的愿望，以及壮志难伸的愤懑。又如“何当矍铄渡河去，一洗塞北烟尘空”、“只应壮士忧时泪，洒向枝头点点红”。既有“亡国之音哀以思”之沉痛，又有令乾坤倒转、江河断流、勇士拔剑而起的昂扬。

《金人莫窥江》一诗借用了民歌体的复沓形式，一唱三叹，向入侵中原的金人庄严宣告：“国势如衡有低昂，犬戎岂得称天王。暴兴恃暴必亟亡，乘蛇古谶开其祥。中兴将士材无双，抚剑气已驰龙荒，金人莫猖狂！”

《怨女曲》一诗则通过描写一个被金兵掳掠的良家女子，表现了她“干戈漂荡身如寄，绿鬓朱颜反为累。朝从猎骑草边游，暮还戎王沙上醉”的悲惨遭遇，表达了这位女子“贫贱思家心更苦”的思想感情。末句作者笔锋一转，“女身软弱难自主，壮士从胡不如女！”诗中将不得已而身陷贼营的女子与心甘情愿投敌卖国的“壮士”作了对比，使作者对后者的轻蔑之情表现得尤为强烈，使作品的爱国主义主题得到了升华。《防江行》组诗五首则从正面描写抗金将士“男儿觅封侯，赴敌如饥渴”，“低头拔胡箭，却向胡军射”的英雄形象。

刘子翚的诗作现存于其诗文集《屏山集》中，共20卷。最早刻本是南宋乾道九年（1173）其子刘坪所刊，朱熹为之作序。现存最早的是明弘治十七年（1504）建宁（今建瓯）重刊本。

刘子翚还是一位长于《易》学研究的理学家，朱熹少年时在刘氏家塾中学习，一直到绍兴十七年（1147）刘子翚病逝。刘子翚的洁身自好，不与世俗同流的处世哲学，反对和议、坚持抗金的政治倾向，均给少年朱熹以深刻的影响。

（方彦寿）

陆游提举冲佑观

武夷冲佑观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道观，位于武夷一曲，即今朱熹纪念馆所在地，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原名武夷观、会仙观，宋真宗时，御书赐额“冲佑观”。南宋时，“东南三贤”朱熹、吕祖谦、张栻，抗金名将胡世将、辛弃疾等均担任过冲佑观提举。

冲佑观既然是道观，为什么要政府官员来任职呢？这是因为当时朝政腐败，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不图恢复，往往以“佚老优贤”的名义将一些正直的官员罢免官职，而后将他们安置到道观担任这种有名无实的“提举”，称为宫观官。武夷冲佑观仅南宋一代先后就有 200 多位这样的官员任提举或主管，其中以陆游任期最长。

陆游是我国南宋杰出的爱国主义诗人，曾担任过福建宁德主簿、枢密院编修官、四川制置使司参议官、提举福建常平茶盐公事等职。宋代福建的提举常平司设在建州（今建瓯），陆游在此任职约有半年时间。在这一时期，他对闽北的山山水水，特别是武夷山的美丽的自然风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篇。

陆游一生始终坚持抗金，故每每为当政者所不容，多次被罢免，先后担任过台州崇道观、成都玉局观、武夷冲佑观的提举，而以提举冲佑观的时间最长。

淳熙十六年（1189）冬，陆游任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时，接连上了几道奏章，劝勉新即位的宋光宗赵惇励精图治，轻徭薄

赋，以利恢复中原。昏庸的宋光宗听信谗言，竟以“嘲咏风月”为罪名，罢免了陆游的官职。陆游此次被罢，闲居山阴老家约十一二年，其中有八年任祠官，共四任，均为提举武夷冲佑观。在此期间，陆游写下了大量有关这方面内容的诗歌，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一阶段陆游的奉祠生活，以及加深对武夷冲佑观的历史认识。

陆游被罢免之后，即向朝廷请求祠禄，但迟迟未接到批文。为此，他写下了《乞祠久未报》、《乞奉祠未报食且不继》等诗。“出户风霜欺短褐，读书父子共昏灯。”就是他在这一时期贫困生活的写照。经过一年多的煎熬，约在绍熙二年（1191）六月，提举武夷冲佑观的敕文终于下来了，他写下了《拜敕口号》一诗：“黄纸如鸦字，今朝下九天。身居镜湖曲，衔带武夷仙。日绝丝毫事，年请百万钱。恭惟优老政，千古照青编。”按照宋代的宫观制度，任者可以从便居住，不到任所而领取祠俸，因此陆游方能身居山阴老家镜湖之畔，而“衔带武夷仙”。在这首诗中，陆游还自注云：“祠奉钱粟絮帛，岁计千缗有畸”。千缗即诗中所说的百万。宋代货币，一缗为一千文，千缗即百万。这就是宋代提举冲佑观的年俸，为在职官员的一半。祝穆《方舆胜览》记载冲佑观奉祠者的年俸为“听秩二千石”，与陆游的注文对照看，宋代官员的俸禄及物价，已约略可知。

两年后，首任冲佑观提举届满，陆游写下了《上书乞再任冲佑》一诗。这一年，陆游正好七十岁，诗中有“高标不可揖，七十忽已到”、“寄声幔亭云，行拜散人号”等句，表达了他虽身在山阴，但对武夷山水仍寄予深切的怀念之情。上书不久批复，他又写下了《十一月十八日蒙恩再领冲佑，邻里来贺谢以长句》、《被命再领冲佑有感》诸诗。

庆元五年（1199）五月，屈指算来，“东归忽十载，四忝侍祠官”，陆游已连续四次担任冲佑观提举。在这“僵卧孤村”十年之

中，尽管“天书四降”、“祠庭八载”，但他的拳拳报国之心丝毫没有减弱。他对“剡曲东归日醉眠，冰衔屡忝武夷仙，恩如长假容归里，官似分司不限年”的生活感到厌倦。“自笑书生无寸效，十年枉是枕雕戈”，他渴望驰骋疆场，为国捐躯，“扫尽烟尘归铁马，剪空荆棘出铜驼”，“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然而，如今却是“平生扬历半宫祠”、“唤作朝官却自疑”，为此，他决定不再续任，并写下了《病雁》、《祠禄不敢复请作口号》等诗。这年五月七日诏书下，准其所请，予以致仕（即退休），陆游终于结束了长达八年的宫祠生活，“今年高谢武夷君”、“别裁要作退居装”了。

一位充满爱国激情的诗人，一位踊跃求战、誓死报国的志士却被长期搁置在一旁，请缨无路，报国无门，“心在天山，身老沧洲”，这本是历史的悲剧，而武夷冲佑观却因为这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诗人增添了无上的光彩，每令后人追思遐想。

（方彦寿）

辛弃疾四主冲佑观

辛弃疾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抗金将领和爱国词人。他的词作，风格悲壮激烈，沉郁顿挫，充满强烈的爱国激情。他的词和陆游的诗，汇成了南宋文学中的爱国主义主流，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不朽的丰碑。陆游一生曾四次提举武夷冲佑观，巧的是，辛弃疾也曾四次担任武夷冲佑观主管。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居士，山东济南人。淳熙八年（1181），辛弃疾在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任上，因言

官王蘅论劾而落职，退居上饶的带湖。《宋史》本传记载这次落职后很久，方“主管冲佑观”，时间约在淳熙十四年至绍熙元年（1187—1190）。

绍熙二年(1191)，闲居十年的辛弃疾被起用为福建提点刑狱。绍熙四年任福州知府兼福建安抚使。庆元元年（1195）十月又因谏官何澹论奏而落职，复主武夷冲佑观。到了次年九月十九日，据《宋会要》记载，就连这个挂名的虚职也被罢免了。

辛弃疾第三次主管冲佑观，是在庆元四年（1198）。经过近两年的罢官生活后，这一年恢复其秘阁修撰的职务，又一次主管冲佑观。他为此写下了《鹧鸪天·戊午拜复职奉祠之命》词一阕：

> 老退何曾说着官，今朝放罪上恩宽。便支香火真祠俸，更缀文书旧殿班。　扶病脚，洗衰颜，快从老病借衣冠。此身忘世浑容易，使世相忘却自难。

这首词，极为梁启超所赞赏，称为“此种怀抱，此种意兴，岂是作‘看贤王高会，飞盖入云烟’等语人耶？”按照宋代的宫观制度，任者可以从便居住，不到任所而领取祠俸。这首词中所说“便支香火真祠俸”，说明辛弃疾前后数次主冲佑观，确曾到武夷山任职。朱熹《稼轩谱序》说：“戊午，公复起，来主冲佑观，益相亲切。”戊午即庆元四年，说明辛弃疾此次主冲佑观，曾与朱熹在武夷山相聚。《宋史·辛弃疾传》记载：“弃疾尝同朱熹游武夷山，赋《九曲棹歌》。熹书‘克己复礼’，‘夙兴夜寐’，题其二斋。”辛弃疾主冲佑观期间，还写下了《幔亭峰》等一系列赞颂武夷山水的优美诗篇。

嘉泰三年（1203），韩侂胄弄权，欲以对金用兵来提高自己的威望，起用了一些抗战派人物来装点门面，辛弃疾被起用为浙东安抚使和镇江知府。在镇江，当辛弃疾在招募兵士、训练部队、准备抗战小有所成时，韩侂胄又轻易地将其罢免，于是辛弃疾第四

次奉祠归。但这次不再是主管，而改换了一个名目，称为“提举”武夷冲佑观，时在开禧元年（1205）七月。《稼轩词》中有《玉楼春·乙丑京口奉祠西归》、《瑞鹧鸪·乙丑奉祠归》二词，就是这一次贬官奉祠归途中所作。两年后，辛弃疾逝世，提举武夷冲佑观实际上成了他生前的最后一个职务。

辛弃疾生活在一个忧患交织、山河破碎的时代。他空有满腔爱国热情和抱负却难以施展，正如他自己所说，“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只能在“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致使“廉颇老矣”，英雄白头，满怀壮志，抑郁难伸！然而，在他坎坷的一生中，四主冲佑观的事迹，却将永载武夷的丹山碧水之中。

（方彦寿）

飘逸如仙白玉蟾

武夷山既称道教名山，当然就会有许多著名的道士在此修道传教。如南唐有李良佐，北宋有知微子、徐熙春、陈冲素，南宋有江师隆、白玉蟾、陈洪范，元代有金志阳、陈华隐，明代则有蔡双髻、王广等。而其中声名最为显著的，应数南宋的白玉蟾。

白玉蟾（1131—?），字白叟，号琼琯。原名葛长庚，闽清人。生于琼州（今属广东），父死母改嫁，随继父姓白。

白玉蟾从小聪敏颖慧，七岁能诗赋。十岁应神童科，主考官以“织机”为题命赋诗，他应声而出：“大地山河作织机，百花如锦柳如丝，虚空白处做一匹，日月双梭天外飞。”但屡试都未能及第，于是看破红尘，入罗浮山修道。曾遍游名山大川，最后隐居在武夷山止止庵，自称：“千古蓬头赤脚，一生服气餐霞，笑指武

夷山下，白云深处吾家。”嘉定年间（1208—1224），被召入京，诏封为紫清真人。

白玉蟾是道教南宗五祖之一。他才思敏捷，知识渊博，诗文中，常有儒家民本主义思想。他著述丰富，著有《道德宝章》一卷、《琼琯白先生玉隆集》六卷、《琼琯白玉蟾武夷集》八卷。后二书，今存有元建阳余氏刻本。

白玉蟾曾在武夷山冲佑观讲道传教。冲佑观内的法堂，相传因白玉蟾说法于此而得名。他还在冲佑观留下许多优美的诗文。诗如七律《清虚堂》：

月移花影来窗外，风引松声到枕边。
长剑舞余烹茗试，新诗吟罢抱琴眠。
酒醅初拨青螺髓，香篆常烧紫马鞭。
九曲溪头冲佑观，清虚堂里有神仙。

全诗描写诗人在冲佑观清虚堂中的“神仙”生活。虽离群索居，却颇不寂寞，窗外花影探头，枕畔松声入耳，吟诗舞剑，品茗弹琴，自得其乐。前两联四句由于全部采用了双动词法，使得全诗流动灵畅，引人入胜，确给人一种飘逸如仙的感觉。

这位“神仙”虽身居山中，但似乎并未忘记天下苍生的疾苦，有时在诗中也会表现出这一方面的主题。这主要反映在他描写冲佑观门前一方一圆的两口龙井的七言绝句中：

山腰石有千年润，海眼曾无一日干。
天下苍生望霖雨，不知龙在此中眠。

除了诗之外，白玉蟾还应道士陈洪范之请，为冲佑观橘隐堂写了一篇《橘隐堂记》。文中以柑橘喻金丹，表现了道士为炼丹而不辞辛苦的精神，体现出人生奋斗的一种境界。全文辞采斑斓，佳句叠出，也是一篇优美的散文。

（方彦寿）

翁合上书驱奸邪

读过明末通俗小说作家冯梦龙所编的话本小说“三言”的人，大概都会记得，其中《喻世明言》中有一篇《木绵庵郑虎臣报冤》的小说。小说说的是南宋末权奸贾似道，因其姐贾玉华为宋理宗宠妃而得宠，累迁为两淮制置使，后又排挤代相吴潜，自任右丞相。蒙古忽必烈兵围鄂州、襄阳，贾似道率军与蒙人交涉时低声下气，称臣奉贡，和议告成，上表夸功，加封为少师。度宗时，又加封为太师。咸淳十年（1274），蒙军又围襄阳、樊城三年，贾似道隐瞒不报。元军大举南下，贾出师大败而躲人扬州称病。后终遭弹劾贬谪，由郑虎臣押解。郑与贾有杀父之仇，经漳州木绵庵时，郑虎臣用大槌将其击毙，报了父仇。

这篇小说叙述的故事情节主要取材于《宋史·贾似道传》，宋人笔记小说《齐东野语》、《山房随笔》，以及宋元戏文《贾似道木绵庵记》等。由于冯梦龙小说的铺陈演绎，今福建尤其是闽南一带的人对此故事可谓耳熟能详。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在郑虎臣押解贾似道之前，贾曾被贬谪至建宁府（今建瓯），后因翁合上书，贾似道驱逐出建宁，接着才有“木绵庵”故事的发生。

翁合，字叔备，崇安黄柏里人。七岁能文，嘉熙二年（1238）举进士，历官中书舍人、国子监祭酒，出知赣州，与文天祥结为知己。当时文天祥方退居文山，翁合荐之于朝，起用为湖南提刑。不久翁合被任命为江西提刑，文天祥也移知赣州，接任翁合旧职。在任上沿用翁合的旧政，在当地传为佳话。

景定年间（1260—1264），翁合官侍讲。德祐元年（1275）七

月，贾似道谪居建宁府城，翁合当时已还朝，他认为此事处理极为不妥，因此上书太后，说贾似道的恶行比起唐代的李林甫、西汉的王莽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贾）罔上卖国，召兵专利虐民，滔天大罪。陛下迫于众怒，仅谪之建宁”，这是远远不够的。“建宁实朱熹讲道之阙里，虽三尺童子亦知向方，闻似道名，咸欲呕吐，况见面乎？”因此，翁合认为，应将贾似道贬谪至边远荒服之地，以伸国法。当时，贾似道已带着数十名妻妾、奴仆，暂住在建宁府开元寺内，太后读了翁合的奏折后，认为所言有理，于是下诏将贾似道改置循州（今属广东），由当时任会稽县尉的郑虎臣押解。其后，才发生了“木绵庵”的一段故事。

（方彦寿）

武夷昆仲二诗人

在清朝乾隆年间编纂而成的《四库全书》中，有两部武夷山籍昆仲诗人的诗集也被收在其中。这两部诗集在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中虽然犹如浩渺沧海中的一滴水珠，但却辉耀着夺目的光彩。

《四库全书》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大型丛书，许多人以为它是见书即收。其实不然，以诗而言，《四库全书》所挑选的都是有一定水平的作品，一般诗人之作是不入其法眼的。即使被收入的诗集，能得到好评的也是少之又少，武夷山籍昆仲诗人的《二蓝集》即其中之一。

“二蓝”者，即元末明初武夷山籍诗人蓝仁与蓝智。蓝仁字静之，著有《蓝山集》，蓝智字明之（一作性之），著有《蓝涧集》。

二蓝早年跟随福州名儒林泉生学《春秋》，又跟随武夷山隐士杜本学《诗经》，四明任松卿教过他们写诗方法。蓝氏昆仲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后人评价他们的诗风类似盛唐．兼有中晚唐诗人优点．既学唐人，又不失自己的个性。蓝仁的诗和平雅淡，蓝智的诗清新婉约，都是上佳的作品。

蓝氏兄弟中，蓝仁的经历比较曲折，元末他任过武夷书院山长。明军进入福建后，他的儿子被充军成都，死于途中；他的女婿早丧，女儿带着几个子女守寡；他自己也被强令迁居两淮，不久遇赦还家。因此，他晚年所做的诗哀婉动人，有杜甫“三吏”与“三别”的风韵。例如《有感》组诗之二：“嫁女先邻近，谁言有远征？长号辞母去，无力逐夫行。颜貌销前日，忧郁送此生。遥知青野草，青冢只虚名！”

蓝智的一生较为平淡，他在元末没有任官职。明初被选任广西按察司佥事，居官以清廉称著。他以五言古诗享誉诗坛，其实，他的七言古也作得很好。明末福建名诗人徐燉曾在建阳朋友处看到蓝智的一首《铜雀台瓦》，称赞该诗“可泣鬼神”。该诗曰：“曹瞞骋志吞刘社，铜雀台高瞰中夏。徒知扼腕有卧龙，岂料垂涎已司马。万里河山尚出师，九原魂魄归何时？清秋风雨满陵树，落日笙歌绕德帷。翠娥仁袖恩情绝，废冢荒台狐兔穴。空余片瓦落人间，千载英雄磨未灭。”

二蓝是明初福建诗坛上独树一帜的诗人，《四库全书提要》称赞他们对闽中诗派影响极大，开风气之先。然而，二蓝的诗集很早就散佚了，福建诗人多方搜寻，都没有结果。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清廷词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失散四百多年的《二蓝集》才重见天日。

蓝氏昆仲的诗作也博得了现代有识之士的赞赏。福建长乐籍的文学家、藏书家郑振铎（西谛）对他们评价极高。他写道：

“（二蓝）老成熔炼，似在十才子之上。”“十才子”是指以林鸿为首的明代闽籍十位诗人，史称“闽中十子”。

二蓝原寓所在星村镇前蓝村。该村多为蓝姓聚居地，位于武夷山国家风景名胜区范围之内，风景优美，山川奇秀。二人居住原址附近的岩壁上还留有古人的摩崖石刻“赤壁洞天”，昆仲二人联袂在丹崖赤壁的洞天仙府里逍遥自在，脱尘吟和，留下了许多佳作，也给武夷子孙留下了热爱乡土的自豪感。至今星村镇一带的人民还流传着蓝氏兄弟隐居讲学、诗名远播的佳话，还记得他们裔孙所居大宅门前曾经有过的楹联：“闽中才子尊诗派，元末高人焕史篇。”

（方留章）

戚继光勒石武夷山

在武夷山九曲溪第一曲之畔，有一方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策勋勒石，文曰：“大丈夫既南靖岛蛮，便当北平胡虏，黄冠布袍，再期游此。奉敕官都督同知、定远东牟戚继光应召北伐题，时隆庆丁卯冬既望。”文辞慷慨激昂，气冲斗牛。戚继光对八闽人民来说，可算是家喻户晓、如雷贯耳的人物。风靡八闽的特色小吃——光饼，就是当年戚家军的干粮，饼以主帅简名称之，令人倍感亲切。

戚继光的这一方勒石，是在他驰骋闽省五年、全面平定倭乱之后，奉调卫戍京畿途经武夷山的岩刻杰作。当他在福建都司曹南金的陪同下游览武夷山时，眼前的大王峰、勒马岩、兜鍪岩陆续闪现，令他忆起五年闽省征倭的难忘情景。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闽省倭寇猖獗。担任浙江都司、参将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奉召援闽。首战宁德横屿，大获全胜，继之征战福清、莆田，倭寇闻风丧胆，闽人欢喜若狂，牵羊担酒以迎戚家军。时仅数月，戚继光即凯旋抵达福州，在于山痛饮庆功酒，并在平远台醉卧山石，后人在石上榜书“醉石”，还建戚公祠以志功勋。戚继光遂由参将晋升为都督佥事，当年班师回浙镇守海疆。

嘉靖四十二年四月，戚继光被任命为福建副总兵官，再次入闽扫荡继续骚扰八闽的倭寇。在再次攻克莆田之战中立下首功，升为都督同知、总兵官。次年，他又在仙游、漳浦、福清狠狠打击了流窜的倭寇，甚至劳师征战广东，所至披靡，前后威镇闽疆五年。南方倭乱彻底平定之后，戚继光遂于隆庆元年（1567）奉调蓟门，捍卫京城的门户，抵御北方女真族俺答部落的侵扰。这一天，他北上途经武夷山，饮马于九曲溪畔，军旅倥偬，次日他就要攀登闽赣交界的分水关，驰马北上了。面对碧水丹山，他既欣慰于“南靖岛蛮”的赫赫战绩，又寄托他日“北平胡虏”的拳拳豪情，于是挥毫写了这一段摩崖雄文。

戚继光兴犹未尽，来到一曲溪畔的冲佑观之际，又挥毫写下一首抒怀的题壁七绝。诗曰：“一剑横空星斗寒，甫随平北又征蛮。他日觅取封侯印，愿向君王换此山。”

戚继光北赴蓟门任职共16年，武功显赫，俘获胡将，大败敌兵，逼使俺答依旧朝贡。朝廷先后晋升他为右都督、左都督、加太子太保、少保，实现了他在武夷山题诗中预言的“他日觅取封侯印”的愿望。但他却没有“愿向君王换此山”，也没有“黄冠布袍，再期游此”。他太忠于职守了，还在戎马倥偬之中，写下了传世的兵书《纪效新书》、《练兵纪实》等，为华夏留下军事著作的瑰宝。他在年逾花甲之年退隐，病逝于原籍山东蓬莱。

（方留章）

曹学佺月夜泛舟九曲

曹学佺（1574—1647），字能始，号石仓，侯官（今福州）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南京户部郎中等职。天启六年（1626）因撰写《野史纪略》得罪宦官魏忠贤一党，被削职，书遭禁毁。遂家居二十年，著书石仓园中，所著《海内名胜志》、《石仓十二代诗选》，皆盛行于世。清兵入闽，留下“生前一管笔，死后一条绳”的绝命诗，悲壮地自缢身亡。

曹学佺“平生于名山胜迹靡不探陟，尤爱武夷，每留连眺咏”。曹学佺的武夷诗，今存《武夷山志》中有16首。其中，有写于一曲的《大王峰观仙蜕》；写于五曲的《登接笋峰》、《云窝赠陈司马》；写于六曲的《重登天游》、《陷石堂》；写于山北的《水帘洞》等。他描写武夷山冲佑观的《游武夷》其一，将武夷山十三仙的传说，以及宋朝帝王下诏投放金龙玉简的史实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抒发其仙人难遇的感慨。《春暮游武夷》三首写于暮春时节，《重登天游》描写其二度攀登天游峰的心境。由此可知，他曾多次畅游武夷山。

由于到武夷山的次数多了，一日，他突发奇想，如在月夜泛舟游九曲溪，一定可以领略到一番与白日不同的诗情画意。于是，一个月明之夜，他泛舟从一曲出发，开始了他的别出心裁的游玩。当他到达二曲，见到了月夜下的玉女峰，娉娉婷婷，与白日所见又别有一番风韵。于是，在他的诗中，出现了一个别具一格的月光下的玉女形象——

玉殿遥辞下太空，衣笼积翠佩瑶红。

月明清影应笑语，不在妆台在水中。

在诗人的笔下，玉女犹如月中仙子下凡，着翠装，佩红玉，婀娜多姿。九曲溪上，月夜之中，犹闻其莺声燕语。玉女的形象，在朱熹《九曲棹歌》中是插花临水，亭亭玉立娇美的形象；在白玉蟾的笔下则是“玉骨冰肌”的处女之容；在谢肇淛的诗中，则是“玉女妆成幻作峰”，有如现代电影技术中瞬间的由动入静的“定格”。曹学佺在前人众多的大手笔已用尽人间妙语，写尽玉女万种风情的情况下，独辟蹊径，写出了与前人截然不同的新的玉女形象，这就不能不说是他此次武夷月夜泛舟的最大收获。

曹学佺游完九曲，回到万年宫时，已是夜半时分，他仍沉浸在月夜泛舟的兴奋之中，久久不能入睡。于是，乘着诗兴，他又援笔写下了《宿冲佑观》一诗，以纪此行：

归舟半夜月，寂寂万年宫。
两岸欲深合，前山如不通。
寒星印沙白，林火杂花红，
笑杀幔亭宴，人间曲未终。

（方寿彦）

桐城武夷文脉相连

方姓为安徽桐城的望族，其族裔方苞是清朝桐城文派的创始人。桐城与武夷的文化联系十分密切，此中佳话隽永有趣。

方苞的先辈方孔炤就是捷足先登武夷山的一位名人。他在游山时，曾在朱熹创建的武夷精舍附近的云路石留下一方摩崖石刻：“重洗仙颜”，落款为“皖桐方孔炤，万历四十六年”。查《明史》，

此时正是他喜中进士后的第三年，风华正茂，挥斥方遒，因而对流传山中的仙佛诸说不以为然。他在一首《武夷歌》中对这四字岩刻作了诠释，明显含有“贬释道、独尊儒”的见解。诗载清董天工《武夷山志》：

武夷三十六支笔，大峰泼墨小峰出。
许我一叶寻支矶，半云游人半秘密。
峰表铿翁二子能，曾孙有术多凭陵。
鸡犬白云何缥缈，应是玄黄怪未了。
独有考亭数字存，其中重洗五百仙人颜。

诗中用了一些武夷山的神话典故，因而比较含蓄。大意是：武夷山三十六峰好似插天之笔，书写出无尽的故事。作者驾着一叶扁舟，顺着萦绕诸峰的九曲溪去寻秘问踪。啊，长寿翁彭祖（名籛铿，尊为铿翁）曾率二子彭武、彭夷来此开辟大业，他们的功绩是不朽的，但裔孙们凭借道术却多有侵凌他人之处。这座名山的各种仙佛传说我看都是缥缈无稽之谈，天地玄黄之间鬼怪妖魅之事就这样没完没了地演绎着！只有朱熹夫子（又号考亭先生）在山中的遗训尚在，他在六曲溪畔的石刻“逝者如斯”给人以启示，足以一扫山中那些宣扬五百罗汉之类的仙佛玄风！

方孔炤后因受冤被劾，下了诏狱。其子方以智伏阙讼父冤。两年后方孔炤谪居绍兴。后复官，任金都御史等职。明亡，南奔归隐终老。方以智博学多才，通晓中国传统的自然科学和当时刚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科学，更精通中国文史学、理学。明亡后拒不降清，弃家为僧，号无可，人称无可禅师。康熙年间，曾与桐城同乡钱澄之联袂入武夷，并分别在亡父旧勒壁处附近的仙掌峰、响声岩和琅玕岩镌刻了手写的“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大字。三声虔诚的礼佛，三声无奈的叹息！其中“无可奈何”的叹息，人们自可意会。方以智此次偕友登临武夷山，意欲在山中选胜栖隐，有

钱澄之的《孟冬同无可禅师、李磊英居士游武夷山》的诗句为证："大师选胜思栖隐，劝我休心老此中。"但未果，后因"粤难"被捕，卒于由庐陵押赴岭南途中。

第三个登山的是方以智的长子方中德。他是理学家，能秉承家学。他登临武夷山的年月已不可考。他为挚友王梓（曾在康熙朝两任崇安县令）所著的《武夷宦游稿》写的序言，称："武夷山水之胜著于天下……徜徉九曲间，宜其逸兴遄飞，留连写心而有合也。"序言后署"桐山督叟方中德撰，时年七十有四"。

登临武夷的压台重戏由方孔炤之曾孙、方以智之孙方正玠承担。他追寻着前辈三代的足迹，漫步山中溪畔，写了十余首诗。清《武夷山志》就收录了五首。当他看到曾祖、祖父两代的岩刻遗迹掩埋在荒苔中但尚未泯灭时，既伤感又欣喜，随即写了一首《云路石观先曾王父暨先王父题字感赋》的七律。（按：王父即祖父，曾王父即曾祖父。）

武夷胜处溯渊源，大隐屏高精舍存。
为傍晦翁瞻故迹，如闻太姥唤曾孙。
几经仙腊犹弹指，暂扫荒苔欲断魂。
八十余年谁护惜，清泉白石旧乾坤。

诗中的大隐屏即隐屏峰。精舍即宋朱熹（晦翁）建于峰麓的武夷书院。"太姥唤曾孙"句借用武夷山中"幔亭招宴"的故事，即皇太姥宴请乡人，并昵称乡人为曾孙。诗中借用这个典故还带双关之意，意即曾祖方孔炤提示曾孙切不可忘记八十余年前的家训：尊宗朱子，弘扬理学！

崖刻至今保存良好，昭示着桐城、武夷两地文化的源远流长。

（方留章）

南浦梦笔



越王台上越王亭（浦城县）

话说“福建北大门”

浦城位于八闽上游，福建最北端，地处闽浙赣三省边陲，素有“福建北大门”、“闽北重镇”之称。据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南浦溪及其支流两岸，已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

浦城置县前，夏商属扬州，周属七闽地，战国周显王三十五年（前334）七闽为楚所灭而属楚，秦属闽中郡。汉高祖五年（前202）立无诸为闽越王，浦城地属闽越国。汉建元六年（前135）封余善为东越王，都冶，有人说冶在今浦城。汉元鼎五年（前112）余善拥兵叛汉，汉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灭闽越，“徙其民于江、淮间，虚其地。后裔遁逃山谷者颇出”，汉始元二年（前85）立冶县，东汉建武初，改冶县为东侯官，浦城地均属之。

置县后，浦城沿革及其隶属，据清嘉庆《新修浦城县志》载：“东汉建安初，分东侯官之北方，置建安、南平、汉兴三县为会稽南部都尉。”汉兴即今浦城，县名以国为号，是福建最早建立的五县之一，其后，随朝代更替，数易其名。三国吴永安三年（260）改汉兴为吴兴，隋开皇九年（589）并入建安，唐武德四年（621）改名唐兴，后又一度并入建安，唐载初元年（689）复置县，仍名唐兴，武则天登极后于天授二年（691）改名武宁。唐神龙元年（705），唐中宗李显登极，复名唐兴。唐天宝元年（742），以东越王余善筑城临浦定名浦城，至今未变。

浦城的异名有南浦、柘浦、汉阳、渔梁等。这些异名有它的来历和历史渊源。南浦：因南朝一代文豪江淹为吴兴令时，境内

主干流取其《别赋》中“送君南浦”之句命名南浦溪，县治驻地在南浦溪北岸故名；柘浦：因南浦溪的发源地为县北忠信的苏州岭，其岭上多柘树，又名柘岭，其下河流故名柘溪，因此，县又一异名为柘浦；汉阳：据《史记·东越列传》载，西汉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用兵东越，“越衍侯吴阳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兵于汉阳”，汉阳是福建见于正史的第一城，在浦城县北仙阳镇管九村溪东一带，因此，汉阳也成为古代浦城的异名；渔梁：因浦城地处中原入闽的主要通道，宋时在渔梁设驿站，驿址在渔梁山下，《洞天记》称：“天下十大名山，渔梁其一也。”诸多文人墨客，官宦商贾经此，留下诗文，声名远播，渔梁因此成为名驿，渔梁也因此成为县的异名之一。此外，浦城的简称尚有柘邑、浦邑、浦等。1988年7月21日，县人大十一届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正式通过“浦”为县名简称。

浦城置县后的隶属，三国吴永安三年（260）废会稽南部都尉，置建安郡，吴兴属之。晋太康三年（282）属晋安郡，元康元年（291）改属江洲，梁普通六年（525）属东扬州。陈永定（557—559）初，属闽州，后属丰州。隋开皇九年（589）并入建安。唐武德四年（621）复县后，属建州（治所在今建瓯）。其后，建安州改郡，复改州、军、府、路，后又改府、道，其隶属均未变。民国17年（1928）废道直属福建省。1933年11月至次年1月，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浦城属延建省。1934年8月17日全省设10个行政督察区，其第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于浦城，专员兼浦城县长，辖建瓯、建阳、崇安、浦城、松溪、政和6县。1935年10月1日，全省改为七个区，设在浦城的第十行政督察区改为第三区，辖区增加寿宁、邵武两县共8个县。1938年6月，第三区专员公署，从浦城迁到建阳，浦城属之，直到解放前夕。

1949 年 5 月 13 日浦城解放后，浦城属福建省第一专区（驻所在建瓯）。1950 年 3 月 14 日，第一专区更名为建瓯专区。1950 年 9 月 2 日专区迁建阳，更名建阳专区。1956 年 6 月 9 日，建阳专区与南平专区合并，称南平专区，1968 年专区改称地区。1970 年地区迁建阳，改称建阳地区，1989 年，地区迁南平，改名南平地区，后改南平市，浦城皆属之。

（蒋　仁）

余善筑城拒汉

秦朝末年，陈胜、吴广在安徽大泽乡起兵反抗暴秦。被秦始皇废为君长的闽越王无诸，率闽越军北上加入反抗暴秦行列，成为反秦一支劲旅。在楚汉战争中，佐刘灭项，立下汗马功劳。西汉王朝建立，以其有功，于汉高祖五年（前 202），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统治闽中故地。闽越王故都，一说设在浦城（见 1988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陈国强、蒋炳钊、吴绵吉、辛土成合著《百越民族史》）。闽越国虽是汉廷“藩臣”，不向汉廷进贡，不效力，不听调遣，汉廷颇为不满。当时，凡反汉廷者，往往暗中勾结闽越，企图借助闽越力量与汉王朝抗衡。汉景帝三年（前 154），吴王刘濞反汉失败，率残部逃到东瓯国。东瓯王受汉廷收买，杀濞于丹徒（今属江苏）。濞子子驹，流亡到闽越国，汉廷派遣冯中郎率兵追至闽越国。冯病殁于浦城县北茗坑（后人立冯中郎庙纪念）。子驹“怨东瓯杀其父，常劝闽越出击东瓯”（《史记·东越列传》）。汉建元三年（前 138），无诸死，子郢继位，发兵围东瓯。东瓯王向汉廷告急。汉廷派严助发会稽之兵救援，闽越即引兵自

退。此次汉与闽越之战引而未发。建元六年，南越王赵佗卒，闽越王趁机发兵攻南越。南越依约报告汉廷，汉廷派兵救援。郢弟余善及其宗族对郢擅自发兵不满，又为形势所迫，余善联络“三王之众”杀了郢，将其头献给汉将，并向汉廷谢罪。汉武帝即罢兵，立无诸孙繇君丑为王。

余善对汉武帝立丑为王不满，仗其杀郢有功，“威行于国”，遂自立为王。汉武帝面对现实，为权宜之计，“立余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共处”（《史记·东越列传》）。余善拥兵自重，在境内筑汉阳城、临浦城、临江城，闽北其他地区还有汉城（在武夷山市），大潭城（在建阳市）、乌阪城（在邵武市）共6城，对汉廷阳奉阴违，暗中罗织反汉力量。

汉阳城，在县北仙阳镇管九村以东，柘溪西岸黄塘山，接近中原入闽的古道。城址约40余万平方米，城依山建筑，东南北三面临柘溪及其支流，中间一道山岗，地势平缓。

浦城，在今县治东隅粤山，即今仙楼山，山巅设烽火台，山麓设行宫（今天心胜果禅寺址），东南柘溪环绕，北靠横山岗，西为开阔平原，与汉阳城相距30华里。

临江城，在县城南30余里，临江溪西南侧，地势平坦，有五座矮山拱卫。临江城，曾称旧城，后更名锦城。

三城在高处均设有烽火台，遥相呼应，余善坐浦城居中指挥。

汉元鼎五年（前112）三月，南越反汉，汉武帝派楼船将军杨仆率军讨伐。余善认为有机可趁，上书佯称愿出八千兵配合作战，闽越兵到揭阳却按兵不动，而暗中派密使给南越通风报信。杨仆识破其阴谋，遂向汉武帝表示“愿引兵击东越”。汉兵屯集豫章、梅岭（今属江西）待命。

余善闻汉兵压境，知阴谋败露，于汉元鼎六年（前111），来

个先发制人。擅刻玉玺，自号“武帝”，以煽动百姓。一面派兵据守要道，以拒汉军；另一面封驺力等为“吞汉将军”，主动出击，先后攻下白沙（今江西鄱阳县西）、武林（今江西余干县东之武林山）、梅岭（今江西宁都县东北），杀死守卫这里的三个校尉。汉廷大怒，向闽越国发起进攻，兵分四路进军。余善先已占领险要隘口，因此，在阻击汉军时取得一些胜利。汉越两军，经过一年多的战斗，终于在汉元封元年（前110），汉军击败闽越阻击部队，全面攻入闽越国活动中心——浦城。

当时，闽越国经余善25年的惨淡经营，有一定的军事力量，且有一定粮草储备，山高水险，利于固守。汉廷为取胜这场战争，最终还是通过瓦解闽越统治阶级内部的工作来完成。

元封元年，汉廷派已投附的越衍侯吴阳回闽越，劝余善投降，余善不从。是时横海将军韩说的军队，越过仙霞岭，首至浦城境内。吴阳即作内应，率其旧属700人倒戈，协助汉军攻破汉阳。余善退守泉山（即福罗山，《浦城县志》有山川图、汉营遗址），此地险要，一人守关，千人不得上。汉阳失守八闽震动，吴阳同闽越统治者建成侯敖和繇王居股，策划杀余善降汉。于是，闽越族统治阶级内部协力杀了余善，率领其众向韩说投降。闽越守将多军，见汉军到来也丢下所部向汉将投降。至此，闽越国灭亡。据明万历《浦城县志》载：“余善杀于居股，浦城人遂在清湖里（今临江锦城），余善的临江城故址后，立越王庙纪念。”

余善在浦城所筑的汉阳城、临浦城、临江城、行宫、泉山汉营等故址及出土文物尚存，以上三城皆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蒋　仁）

九牧流芳折桂岭

在福建的最北部，近于浙江、江西的三省交界处，有个九牧村，千百年来村人都以“九牧流芳”而自豪。

九牧村地处中原入闽的第一个孔道。相传唐代名士林披曾在此村居住。林披有九个儿子，皆官至州牧，此村也因此而得名，称九牧村。唐贞元七年（791），林披的第五子林藻、六子林蕴双双中进士归来，心情激动，就在村后的梨岭题一首《折桂诗》，诗云：“曾向岭头题姓字，不穿杨叶不言归。弟兄各折一枝桂，还向岭头联影飞。”（《浦城县志·诗赋》）。岭因此更名为“折桂岭”。明洪武（1368—1398）间，岭腰建五显庙，故此岭又因庙名而称五显岭。

折桂岭地形险要，山高岭险。明初，浦城县知事张鹏举，在岭凹建关，称梨关。中原入闽经仙霞、枫岭二关，进入福建境内，梨关也是入闽的重要一关。关的两侧墙上书写“全闽锁钥”，“吴越砥柱”八个大字。历代中原与闽境有关的军事活动，大多从此岭经过。故有“一旦有警，戎马必经之道，战争必及之区”的说法，历来也确实如此。唐代陈元光、黄巢，五代南唐查文徽，宋代韩世忠追击苗傅、刘正彦等也都经此入闽。1933 年蒋介石调大军镇压“福建事变”，也从此入闽。1949 年国民党刘汝明第八兵团败兵从此南窜；是年入闽的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和三野十兵团也大多从此入闽。

九牧村物产丰富，盛产毛竹，竹制品远近驰名。清乾隆、嘉庆间还出产过贡米，送入宫廷。

1934 年浦城至江山公路开通后，公路从此经过（即今 205 线国道），梨关被拆除，遗址石级尚存。1994 年在山腰贯通公路隧道

称“五显岭”隧道。

（蒋　仁）

“黄巢寨”内屯兵马

唐乾符六年（879），黄巢起义军从浙江衢州入闽，经仙霞岭刊山修道700里，直趋建州。途经境内，屯兵仙阳。在仙阳镇东百向山（又名八面山）的山巅建二寨，其寨称黄巢寨。《太平寰宇记》云，“山有八面，形势秀丽，因名”。西临柘溪，南与油果山对峙，北为汉余善所建的汉阳城故址。一寨今尚存寨门，插旗石。寨门用块石垒成，高约2米，门宽1.05米，寨前后均有石级台阶。插旗石为一平坦的巨石，约200平方米，在石的中心处，有人工凿成的方形小坑4个，成正方形排列。坑深10厘米，边宽20厘米，各坑相距约1米，是放置旗架的地方。一寨与二寨之间，有片开阔地，约2000平方米，可用于操练兵马。由此可见，此二寨是黄巢设指挥机关的地方。

黄巢义军入仙阳境时，驻仙阳县尉文昭率兵抵抗，被义军击溃，文昭被杀。

（蒋　仁）

闽北相思鸟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唐代著名诗人王维的这首题为《相思》的五绝，几乎从其一问世起，就为世人所广泛传诵，成为人们表达相思之情的千古名篇。产于南国的红豆，又名“相思子”，也成为人们所熟知的爱情信物。但人们也许并不知道，地处“南国”的闽北，还有一种名为“相思”的鸟儿，可称为自然界动物中忠贞于“爱情”的典范。

相思鸟，闽北建瓯话称为“双双鸟”。红喙，青紫色间或缀以翠绿色的羽毛，故又称红嘴相思鸟。雌雄小鸟双宿双飞，形影不离；闲时细语唧唧，犹如有说不完的情话。古时浦城、建瓯、建阳一带的地方史料中对此均有记载。今仅武夷山挂墩大自然保护区中有此珍禽。

清顺治、康熙年间，著名学者、文学家周亮工官福建布政使时曾到过浦城，得到相思鸟一对，养于笼中。据其所撰《闽小纪》载，他为了考验相思鸟对“爱情”是否忠贞，对它们进行了一场有趣的试验。他先把其中的一只从笼中放出，鸟儿飞走不久，又复飞回，婉转哀鸣，似乞人打开笼门让其入内。此鸟进了笼后，原居于笼中之鸟则跳跃呼鸣，喜迎其归。这样多试几次，则未出者喜悦之情渐趋平淡。周亮工在此打了一个比方，这样就好像农夫外出耕作，对其归来，其妻可以预期，故以平常心处之；而不像流落在外的游子，难得回家，而一旦归来，其家人必定是喜出望外，喜悦之情也就更加浓烈了。相思鸟的睡姿也很有趣，二鸟相拥而眠，将头相互埋入对方的羽翼之中，显得亲密无间，周亮工戏称此为增进二者的“伉俪”之情。

无独有偶，约在清中叶，福州人氏林伟在建瓯买到一对相思鸟。他听人说，如果放出雄鸟，留下雌鸟，则雄鸟会飞回；如放出雌鸟，留下雄鸟，则雌鸟就不会飞回了。因此，民间甚至据此流传女人的爱情不如男人忠贞，就连鸟类也是如此。但林伟通过

反复试验，事实并非如此。他气愤地指出，前人以讹传讹，有以此“厚诬闺中”即轻视、诬蔑妇女的嫌疑。因此，在建瓯旧的志书上，还记载了清人毛鸣鹭的一首题为《相思鸟》的诗：

顷刻离还合，无分雄与雌。

散抛红豆子，何处不相思。

（方彦寿）

浦城是肉燕的发祥地

肉燕，是传统食品，无论婚丧喜庆，过年过节，招待宾客，都是不可缺少的上等佳肴，誉称为“头碗燕丸”。喜庆筵席，燕丸上桌，鸣放鞭炮，表示筵席正式开始，宾客方能饮酒、下筷。800多年来成为福建及邻省一些邻近县市的一种名优特产。

浦城是肉燕的发祥地。据记载，南宋徽猷阁待制真德秀（1178—1235）于绍定间知福州。有一年清明节回故乡浦城祭扫祖茔，其间设宴招待亲朋好友。随行厨师林阿荣（系闽县今福州市人）想做一道他的拿手好菜，吩咐临时助厨徐小春（富岭东湖人，真德秀表兄）将鱼捣烂做鱼丸。因福州方言与浦城方言不同，徐小春误听为捣肉丸，他剔精肉捣烂拌地瓜粉。阿荣见之无奈，将其压平如薄纸，切成丝，用开水汆熟，放在盆里，不料色质晶莹，味道可口，犹如燕窝，初称“水晶燕”。此后仿制，切成丝的称“燕丝”，切成方块的称“燕皮”。后来又发展为用瘦肉、荸荠、葱（或蒜）剁碎作馅，用燕丝包的称“燕丸”亦称“龙须燕”，用燕皮包的称“燕扁食”。

厨师林阿荣回福州生产这种燕皮，开店营业，生意兴隆，名

声大震，工艺很快在福州闽清传开。生产和食用的人越来越多，其招牌悬挂“浦城上白肉燕皮”或“清水肉燕皮”。销往外省简称“福建燕皮”或“闽产燕皮”，外省生产的则悬挂“正宗福州燕皮”，而历史悠久的“浦城上白肉燕皮”反被遗忘了。

（蒋　仁）

浦城特产桂花茶

桂花茶，又叫木犀茶。历史悠久，产于浦城全县各地。始于何时，无从稽考。桂花茶的原料，由桂花和白糖制成。每年秋天，大约农历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桂花盛开时，用谷席铺在树下，人攀树上，用竹竿把桂花打落在谷席上，拿回家用鹅（或鸡、鸭）的翅膀毛剔去其中的杂物，再用开水浸泡、滤干，加白糖拌匀，装入罐中密封保存，即成桂花茶。饮时用茶匙舀到盅里，加开水冲泡，桂花即开，入口又甜又香。如做汤丸、蒸糕、八宝饭，用适量桂花茶铺在表面，既美观又香口。

桂花茶的原料，只用丹桂（红桂花），每年只秋季一度，时间仅一周左右，逾时即消失。故制作桂花茶，必须抓紧时机。其他桂花，如黄桂（又称金桂）、四季桂等都不能用。

桂花茶是款待客人的上乘饮料，客人来访，大多要先泡一盅桂花茶奉上，以表示热情和尊重。尤其是春节期间，不论是远亲近邻、常客贵宾，还是天天见面的大人小孩，都一视同仁地敬上一盅桂花茶。大年初一，你如果到十几户人家拜年，就可喝上十几盅桂花茶。春节宴客也是先奉上一盅桂花茶，然后再斟酒开筵。

80年代初，一位久离故乡的海外游子回浦城探亲，离浦时要

带上一种浦城地方特产，以向海外乡亲证明他确实回到家乡，想到桂花茶最合适，携带也方便，便委托所住宾馆购买。回到海外，遍邀乡友，每人一盅桂花茶。乡友们饮了桂花茶，一股浓浓的乡情顿时涌上心头，思乡之情倍增。

桂花飘香茶更香。1988年，浦城县人大作出决议，确定桂花为“浦城县花”。

（蒋　仁）

贺齐与汉兴之战

自汉武帝于元封元年（前110）平定闽越，将闽越贵族集团迁往北方后，那些躲避战乱的闽越百姓纷纷走出深山老林，重新选定河流两岸的盆原谷地聚居，这些人历史上称为“山越”。自西汉元封至东汉建安，历三百余年间，居住福建的“山越人”倒也相安无事。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先是黄巾起义，继而群雄割据，形成三国鼎立，福建为东吴的势力范围。建安八年（203），汉兴、建安、南平等县的闽越族酋领洪明、洪进、苑御、吴免、华当等五人各率万户之众，云集汉兴；吴五率六千屯大潭（今建阳城西南隅）；邹临率六千屯盖竹（今松溪与浙江交界处），他们内定所有人马一齐跨岭取道江西余干，进而北上安徽，与浙江的“山越人”汇合。东吴上下为之震动。其时孙策已死，孙权继位。征服“山越人”已成为东吴当务之急。值北面曹、刘无暇南顾，为先解除后顾之忧，孙权即派遣贺齐统领会稽南部各县人马进击汉兴。

贺齐会同各路人马，总计不过一万人左右，由于兵力悬殊，恐

怕深入无援，粮草被切断，令松阳县令丁藩留守江西余干，以为后援。丁藩不肯留，贺齐斩丁藩，军中乃震悚，无不从命。便分兵一部留守以作后援，贺齐亲率主力进击。

东吴兵临汉兴，见其地势险要，四面山峰拱卫，城西一道河流从西北转南流去，依山阻险，营寨林立。汉兴城的越王山（今仙楼山）、吴山、后洋一带，均为洪明、吴免诸军占据，居高临下，三山鼎立，互成犄角之势。南浦溪上，戈船麇集，其城易守难攻。贺齐认为“山越人”强悍善战，非智取不能胜，遂设疑兵之计，实则虚之，虚则实之。白天两军交战，教兵马向深谷森林茂密处退却，夜间则遣小分队精兵，骚扰敌营。如此反复，山越将士，疲于奔命，遂以各寨自守，互不接应。贺齐认为时机成熟，即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先攻洪明之军，在吴山南面阵中斩洪明，其余山越军闻之溃散。吴免、苑御、华当、洪进等四人，拱手称降。贺齐乘胜进军大潭、盖竹两处，吴五、邹临投降。交战中“山越军”被杀六千多人，汉兴战乱平息。贺齐从“山越人”中挑选万余人，充实东吴军队伍。

清光绪《续修浦城县志》载：“后洋城在县东隅募泰里，相传即故浦城地，城垒、县治遗址犹存。”后阳坂有七平方公里平原，四面群峰拱卫。出土文物考证，当系汉兴县城治所。

（蒋　仁）

江淹与梦笔生花

梦笔生花梦笔山，笔花灿烂山花闲。
是花是梦终难解，剩得晴岚夕照间。

这是近代浦城诗人滦南题为《梦笔晴岚》的一首诗，诗中描述了浦城历史上一个流传极为广泛的传说。

梦笔山在浦城西郊三公里处，山势在平畴田坂中突兀而起，海拔225米，相对高度50米，原名孤山。《建安记》中记载说，孤山四周“其地平坦，悉是沟塍阡陌，以此山挺然孤立，因名焉”。相传南朝宋元徽年间，河南济阳考城人江淹任吴兴（今浦城）令时，在此山梦见神人赠给他一支五彩神笔，此后文思泉涌。孤山也因此改名为“梦笔山”。

江淹（444—505），字文通。原在刘景素麾下任京口（今镇江）镇军参军，因事触犯了刘，于元徽二年（474）被贬为吴兴县令。他时届而立之年，血气方刚，总想将来在仕途上有一番作为。在吴兴令上，足迹遍及全境，既为遍访民情风俗，同时也迷恋吴兴的山光水色。有一天，他步入西郊的孤山，只见山前的田畈中间有三块奇石，一块平坦呈长型，似砚；一块竖立呈长条型，似墨；一块细长型，似笔。山多古松，茂密参天，景致迷人，他不由流连忘返，留宿于山中小庙内。夜里梦见一位白发老人，从云中飘忽而来，自称是郭景纯（郭璞），赠给他一支五色彩笔。从此，江淹诗思敏捷，文名大振，成为一代文豪，其“梦笔生花”的传说也成为千古传颂的著名掌故。

据浦城旧志记载，江淹在吴兴留下的诗有《渡泉峤出诸山之顶》、《迁阳亭》、《游黄檗山》、《邑中草木颂十五首》；骚有《构象台》、《访道经》、《镜论语》、《悦曲池》、《爱远山》；赋有《青苔赋》、《赤虹赋》等。《赤虹赋》是游览风光秀丽的九石渡时写的。赋中序言里写道：“东南峤外，爰有九石之山，乃红壁十里，青嶂百仞；苔滑临水，石险带溪。……”

梦笔山，也因江淹的梦笔生花，被誉为闽北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历代文人墨客有不少到此结庐讲学。五代，佛教界在此山

建等觉寺；宋理学家真德秀在此建梦笔山房授徒讲学，弘扬程朱理学。邑人将此山作为名人纪念地，先后建有江文通祠、碧草亭等。

（蒋　仁）

练隽大义救芝城

五代保大元年（943），闽国内部王氏兄弟为争夺继承权，互相残杀。王延政据建州称帝，国号殷。保大三年，南唐趁闽国发生内讧之机，发兵进攻，以安抚使查文徽为帅，以边镐为先锋招讨使，以王建封为先锋桥道使，起兵先取建阳。八月，兵临建州（今建瓯市，又名芝城）城下，此城墙高且厚，连攻数日，没有攻克。后来城虽攻破，南唐兵将却也伤亡不少。边镐和王建封决定要屠城三日，以报阵亡将士之仇。王建封忽然记起，恩人练氏（即练隽）居于城内，绝不能让救过自己性命的恩人也被误杀，便将本部人马留在建阳，星夜赶到建州，下令暂缓屠城。他派手下军吏在居民坊中找到练氏住所，令随从解下盔甲，持金帛、礼品和白旗，自己更衣执笏，步行拱立居民坊外，说是为夫人祝寿，请夫人出来接见。练氏闻知，只遣儿子出来回话，说："你奉命讨伐，建州城破，百姓老幼受戮，夫人命在旦夕，怎敢受你礼拜呢？"王建封再三请求夫人出来一见。夫人出来时，建封伏地再拜，请夫人受礼，并请夫人将白旗挂于门口，可保全家安全。练夫人将旗和礼品全部还给王建封，并说："你待我恩厚，我今不死大歉于义，况我已老，望汝从我杀起。"又说："我所知者，芝城与汝对抗者不过三十几人，城中居民不下数万，他们何罪之有？全城受戮，不

先杀我，我怎对得起城里人呢?”

王建封听后想道，夫人不以救我命为私人恩典，却愿以死来谢城里百姓，我怎能忘义而屠杀百姓呢!于是，下令禁止屠城，只杀那坚持对抗的三十几人。建州百姓因练夫人大义而获救，深感她救命之恩。

练氏名隽，生于唐咸通十四年(873)，福建浦城练村人氏，嫁浦城章仔钧为妻，因姓练，世称练夫人。

章仔钧（868—941）年逾40不仕，谢绝不少藩王慕名延请，自甘晦迹田园。王审知镇守福州，为使福建得以繁荣安定，要在北大门浦城物色人才以镇守，故出榜招贤。仔钧见榜即献《攻、战、守》三策，审知一见大喜，奏请朝廷封章仔钧为高唐州刺使、检校太傅、西北面行营招讨制置使，选步骑卒五千屯戍浦城。

仔钧兵屯西岩山，其山海拔570.7米，山巅设指挥机关，山腰建营寨、练兵场。他治军纪律严明，爱护士卒，体恤民情，驻扎三十余年，福建北部边陲得以安宁。

有一次，南唐将卢某，佯称借道过浦城，仔钧未知有诈。南唐兵刚到西岩山下，突然鼓噪攻击仔钧营垒。仔钧一面指挥抵抗，一面派校尉边镐和王建封急赴建州搬兵救援。二校尉逾期方回，按军法误期者当斩。其妻练氏知道后，认为边、王二校尉系仔钧心腹，颇有才干，搬兵误期是因山洪暴发，归途受阻，情有可原。便对仔钧说：“敌患未解，奈何杀壮士?”又说：“法固不可废，不若纵之，使自逸耳!”仔钧采纳夫人意见，让边、王二人解甲归田。练氏赠给金银送行。边、王二人挥泪告别。

永隆三年(941)，仔钧卒，练夫人随其子迁入建州城内居住。

边镐、王建封回乡后，又投入南唐查文徽麾下。此次进攻建州，以边、王二人曾在仔钧部下任职，熟悉闽国内部地情、军情，故查文徽委任边、王二人分别以先锋招讨使和先锋桥道

使之职。边、王二人攻破建州城后，得知练氏居于建州城内，不忘练氏救命之德，从而演绎出“练氏夫人大义救芝城”的悲壮故事。

后周广顺二年（952）八月，练氏在建州病逝，全城举哀，破例葬城内芝山。墓碑书“芝城之母练夫人墓”。宋仁宗追封练氏为“越国夫人”，寇准，王禹偁、朱熹、明成祖朱棣相继都有题诗赞颂。明成祖诗云：“曾将厚德结人心，岂料翻成报德深。肯使一家同日死，全城宁与却黄金。”

练夫人死后，在其故乡——浦城仙阳练村建练氏夫人庙。昔日建州城与练村，年年清明节前往练氏墓前与练氏夫人庙祭扫的人们成群结队，络绎不绝。惜“文革”期间，其墓与庙均被毁，其故址、墓碑犹存。民间千余年来一直传颂着她。1991年建瓯县人民政府在城内芝山练夫人墓旧址铸一座练夫人铜像，供人们纪念凭吊，以激励后人。

（蒋　仁）

浦城“八宰相”

浦城历代人才辈出，历史上有“上相名邦”之誉。据《浦城县志》记载统计，由宋至清，从七品以上的官员有488人。其中又以宋代居多，著名的“八宰相”就出在这时期。他们分别是北宋的章得象、吴充、吴育、章惇、章粢，南宋的真德秀、徐荣叟、徐清叟。其中章得象、吴充、章惇、徐清叟为正宰相，其余四位为副宰相。

章得象（978—1048），字希言，咸平五年（1002）进士。历

官州县时，杨亿认为他有宰辅之才，向朝廷举荐，任直史馆安抚京东、礼部侍郎兼侍讲学士、同知枢密院事，后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章得象居相位八年，宗党亲戚一概抑而不用，其侄章望之，求举“贤良方正”，他为避嫌而制止。但他却推荐了许多经国济世的人才。宋仁宗对他有如下评价，“清忠无所附，且未尝有所干请”，“智谋深博，可以运筹帷幄之中；声誉骏隆，可以折冲庙堂之上”。

吴充（1021—1080），字冲卿，与其父待问、兄吴育世称“浦城吴氏三贤”。宝元元年（1038）吴充中了进士，不久入朝任国子监直讲、吴王宫教授。吴充与王安石是儿女亲家，但政治主张不一，他不赞同王安石变法。王安石罢相，吴充接任其职。他向神宗建议，将司马光、吕公著等被斥退的十几人召回朝任职。司马光回朝后，要求罢青苗、保甲、免役等新法，吴充却未予采纳。

吴育（1004—1058），字春卿，吴充胞兄。天圣五年（1027）进士。历官大理评事、礼部侍郎、参知政事（副相）。为官清正刚直，体恤民情。在朝中，对朝廷与元昊、契丹的关系及整理边务等，都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实际的主张。宰相之子向绶不法，逼死人命，诸大臣都因他是宰相之子，企图从轻处理，吴育据理力争，由于他的坚持，向绶最终受到贬谪的处罚。

章惇（1035—1105），字子厚。博学善文，嘉祐四年（1059）进士。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执政，实行变法。王安石看重章惇的才能，任命他为编修条例官。元丰三年（1080）任参知政事。元祐八年（1093），哲宗亲政。次年，章惇以“有定策之功”被任命为左仆射（宰相）。他执政后，起用了蔡京、蔡卞等人，重新推行新法，并以“诋毁先帝，变易法度”的罪名，剥夺司马光、吕公著的赠谥。又以朋党之罪，对当时的大臣吕大防、范纯仁、苏

轼、刘奉世等人一概排斥，并株连甚众。所以，在浦城“八宰相”中，章惇是声名最恶的一人，《宋史》甚至把他列入《奸臣传》中。

章粢（1027—1102），字质夫。治平二年（1065）进士。他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曾先后历任提举陕西常平、庆州知府，江淮转运使等职。在经略西北边境，平定西夏的入侵方面有过卓著的功绩。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宋徽宗命其为同知枢密院事（副相），次年病逝。

真德秀（1178—1235），字景元，更字希元，号西山。庆元五年（1199）进士，曾担任泉州、福州等地的知府，所至均有显著的政绩。后官至户部尚书、参知政事（副相）。真德秀还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家。“庆元党禁”，理学被诬为“伪学”，理学家被当作逆党，纷纷贬逐。宋理宗即位，真德秀以经筵侍读的身份讲明理学，说动君主，使理学取得正宗的地位。他的理学著作很多，最著名的有《大学衍义》。

徐荣叟（1180—1246），字茂翁，嘉定七年（1214）进士，初历官州县，后入朝任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参知政事（副相）。为官正直，不畏权贵，因不愿与奸相史嵩之同流合污，奉祠而归。

徐清叟（1182—1262），字直翁，号章一。与胞兄荣叟为同榜进士。曾在广西、福建、广东等地任地方官，后入朝历任礼部尚书、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宰相）。他为官刚直不阿，体恤民情，曾奏请“示正义，进人才”，召用真德秀、魏了翁等人。淳祐十年（1250），各地水灾，他令学士院遣使分郡赈恤。福建水灾之后，百姓生活困难，他奏请皇上免除赋税。徐清叟父徐应龙（1147—1224），也是一位名臣，故史书上说：“清叟父子、兄弟皆以风节相尚。”

（蒋　仁）

章惇、胡寅险遭溺杀

两宋时期，闽北曾有两位颇有名气的人物，在他们出生后不久险遭家人溺杀，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这却是史书记载的史实。这两位人物，一是北宋浦城的章惇，一是崇安的胡寅。

章惇（1035—1105），字子厚。嘉祐四年（1059）进士。他博学善文，在任编修三司条例官时，积极参与和协助王安石变法，为王所器重。元丰三年（1080）升任参知政事。哲宗初即位时，由高太后听政，他知枢密院事，与司马光力辩免役法之不可废，被贬出京为汝州知府。哲宗亲政后，起用他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他就此恢复了青苗、免役等法，同时也起用了蔡京、蔡卞等一干人，并伺机报复，排斥元祐党，株连了一大批人。所以，章惇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有功有过，毁誉参半，不可一概而论。

胡寅（1098—1156），字明仲，胡安国侄儿，养为己子。宣和三年（1121）进士。靖康初，为秘书省校书郎。当时著名学者杨时在同朝官祭酒，胡寅得以从学于他。张邦昌建伪楚，他弃官而归，隐居武夷读书讲学。建炎三年（1129），张浚荐举他为驾部郎官，升起居郎。他上书高宗，慷慨陈词，呈献抗金大计。绍兴间任中书舍人，官至礼部侍郎，因忤逆秦桧遭贬。秦桧死后复官。学者称他为“致堂先生”。朱熹少年时，他是朱熹在理学上的启蒙导师之一。

据《道山清话》记载，章惇“初生时，父母欲不举，已纳水盆中，为人救止”。《宋史·胡安国传》则记载，“（胡）寅将生，弟妇以多男欲不举，安国妻梦大鱼跃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文

中的“举”是哺育、抚养的意思。生子不育，宋代俗称“不举子”，不举子，乃至弃婴、溺婴、杀子，是宋代流行于南方各省的一种恶习，其中又以福建最为盛行。朱熹的父亲朱松在《戒杀子文》中说：“闽人不喜多子，以杀为常……虽有法而不胜。”章惇、胡寅的父母之所以“欲不举”，实际上是当时这种流行习俗中的两个典型案例而已。若非二人后来比较有名，他们在婴儿时期的这种特殊经历，也就没人提起，后人也就无从所知了。幸好，章惇及时地“为人救止”，胡寅则被其伯母“取而子之”，否则，《宋史》的部分内容恐怕就得改写了。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宋代福建社会这种生子不育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在此不能不简略地补叙一笔，以释众疑。一是宋代福建的人口比汉唐时期增长了一倍多，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生产力的增长速度，民众赖以生存的最低生活资料难以保障。这便是《宋史·食货志》所说的“福建地狭人稠，无以赡养，生子多不举”的原因之一。二是宋代的丁赋，即人口税是广大人民的沉重负担。按照宋代的簿籍制度，20至59岁的男子为丁，需承担各种丁税和差役。北宋名臣蔡襄在一道奏札中说：“南方地狭人贫，终年佣作，仅能了得身丁，其间不能输纳者，父子流移，逃避他所。又有甚者，生子往往不举。”由此可知，封建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也是生子不育现象日趋严重的重要原因。

（方彦寿）

真德秀树廉诚邑宰

真德秀（1178—1235），字景元，更字希元，号西山，福建浦

城仙阳人。他是朱熹的私淑弟子，也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家。宋庆元五年（1199）中进士，历任军直少监，右文殿修撰，著作郎，江东转运副使，知泉州、福州、隆兴、潭州，著作郎，礼部侍郎，户部尚书，参知政事。真德秀深得理学真传，才华出众，为官清廉正直，爱民勤政，“宦游所至，惠政深洽”。

宋嘉定十六年（1223）真德秀知潭州安抚湖南。当时潭州的积弊严重，真德秀到任后，首先是“罢榷酤，除弊政”。潭州当时民家有自己酿酒的习惯，只缴少量税金。自从刘珙知潭州安抚湖南后，因要组织一支庞大的军队去镇压宜章农民起义军，军费开支浩大，就增加家酿酒的税金来补充军费，从此有增无减，民怨沸腾。真德秀了解情况后，即上奏皇帝罢免了多增的税金，潭州百姓欢欣雀跃。

在潭州另一件事就是废除“和籴”。所谓“和籴”，就是官方出钱购买百姓的粮食，以供军用。名义上是对余粮户双方议价交易，实际上是按户摊派。真德秀奏请皇帝废除了“和籴”。为了减轻灾年和青黄不接时粮食之短缺，真德秀设立惠民仓，储稻谷五万石，再积九万五千石稻谷，分给所属12个县的社仓，以备缺粮时出售。

潭州惯例，每年元宵节晚上官吏们要集中到长沙定王台上，宴饮取乐，令百姓高举火把以供欣赏。真德秀认为这是劳民伤财，下令废除，以后没有人再敢这样做了。为了使廉政之风能长期坚持下去，真德秀把所属的12个邑宰，集中到长沙湘江亭上宴请他们，要求他们各位切实做到“廉、仁、公、勤”四字，不准以权谋私，当场作诗告诫，诗云：“从来官吏与斯民，本是同胞一体亲。既以脂膏供尔禄，须知痛痒切吾身。此邦最号唐朝古，我辈当如汉吏循。今日此亭一杯酒，便吹散作十分春。”这就是著名的《长沙宴十二邑宰诗》。

真德秀在长沙任上，还特别留心农政，劝谕耕稼。他的长沙《劝农诗》写得情真意切，诗云："闻说陂塘处处多，开工修筑莫蹉跎。十分积取盈堤水，六月娇阳奈尔何。""田里工夫著得勤，翻耕须熟粪须匀。插秧更要当时节，趁取阳和三月春。"他理政公平，百姓受惠。他在潭州任期虽短，深受百姓爱戴，当地人民为他立生祠，愿他健康长寿。祠堂落成，一天晚上，有人在他画像旁边的墙壁上大书诗一首，诗云："举世知公不爱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极今成两寿星。几百年方钟间气，八千春愿祝修龄。不须更作生祠记，四海苍生口是铭。"

（蒋　仁）

葛寅亮隐居岩顶山

葛寅亮，字冰鉴，号屺瞻，杭州钱塘人。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天启（1621—1627）间，督学闽中，署布政司事。后官至户部侍郎。在闽任职期间，曾巡视至浦城，被邑中美丽的山川风光，悠久的历史文化所打动。故在崇祯十七年（1644）明亡后，隐居于浦城东乡岩顶山。

岩顶山，位于县城东北，离城30公里，海拔868.4米，为匡山山脉的延伸，在此突起而得名。其形似纱帽，又名纱帽山。山顶空旷，山道陡峭如云梯，有千余石级，有寨门，寨前有一、二关和两道隘门，地势险要，称"岩关峻极"，有"一夫当关，万夫不得上"之势。顶部昔有圆通寺，今废，故址、古井、寨门、隘口、石级尚存。其山风光秀丽，有石马槽、跑马道、马蹄迹、神仙床等自然景观，山多阔叶林和天然古松和竹林，四时云雾缭绕。

站在山顶香坛远眺，辽阔平原，众山叠嶂，河流似带，尽收眼底。

葛寅亮隐居岩顶山期间，曾与邑人讲论濂、洛、关、闽之学，著有《柘浦行语》传世。

（蒋　仁）

才思敏捷的外交家潘赐

明永乐年间，浦城出了一位外交家，他曾应乡人之请，一夕撰联四百多对，堪称才思敏捷。他就是曾三次出使日本，全节而归的潘赐。

潘赐，字文锡，又名容庵，福建浦城人。明永乐二年（1404）中进士后，初授行人之职，肩负外交使命。首次出使日本，庄重谨慎，日本国王谦恭地接待他，并对约束国民不严，致使海盗劫掠中国，表示歉意。潘赐归国向明成祖朱棣献《德化书》、《永乐大典颂》，皇帝大喜，提升潘赐为礼部郎中，鸿胪寺少卿。

潘赐第二次出使日本时，带去朝廷赐给日本国王的冕服、钱钞、锦绮等，将日本海盗交由日本国自行处置。并规定日本每10年向中国进贡一次、每次只能带200人两艘船，不能携带兵器，否则以海盗论处，两艘船由中国赐给，专供进贡之用。回国后，官升右参政。

明宣德（1426－1435）间，潘赐奉旨第三次出使日本，不负外交使命，到日本申定前约。

他“三度出使东洋，全节而归”。明宣宗朱瞻基给以慰劳和奖励。

潘赐才思敏捷，才华横溢，著有《竹梅篇》、《皇华胜览》、

《容庵文集》等。有次出使日本归来，途经故里，适逢南浦桥修建落成，应邑人约请，一夕写桥联424对，其内容概括本邑山川景色、文物古迹、名人轶事，颇具地方特色。如描写南宋大儒真德秀的“上相名邦，百族自知朝北阙；真儒继统，千秋谁复并西山”；描写南朝江淹“梦笔生花”典故的“画角声中，彩帐题诗思梦笔；青灯影畔，玉壶携酒想观澜”；描写邑中风景名胜的“乔木参天，半点云香生大石；悬岩笼雾，千寻瀑布出高泉”；描写浦城民风世俗的“四野无虞，诗礼竞推长乐里；庶民有庆，讴歌争出太平坊”等。

（蒋　仁）

郑芝龙弃守仙霞关

仙霞关，位于浙江省江山市之南部，为人闽第一雄关。明末，朝廷派郑芝龙率重兵驻扎，镇守此关，不让清军直下闽中。

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入京，崇祯帝朱由检在石景山自缢身亡。不久，清兵入关占领京城，建立清朝。清顺治二年（1645）闰六月，唐王朱聿键逃往福州称帝，国号“隆武”。

朱聿键南下福州途经浦城时，见浦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福建之北大门，为使福州得以安宁，除仙霞关旨令郑芝龙加强防守外，又让随行的后军都督洪祖烈留守浦城。洪祖烈是江苏吴江人，明万历进士，崇祯在位时，任京营神枢参将，是皇家赖以信任之武将。朱聿键于同年八月，封原镇江总兵郑鸿逵（郑于顺治元年以勤王之师先抵浦城），以大元帅之职权，率兵数千（号称数万）出师浙东以抵抗清兵南下。隆武二年（1646），又升任浦城县

知事郑为虹为御史，浦城百姓对这位清廉的县官，舍不得他离任，上奏唐王“十不得离去”。朱聿键改郑为虹为御史之职巡视仙霞关，视察仙霞岭之防务，以防清兵入闽。不久，又命郑为虹以御史巡抚上四府兼领关务之重任。

隆武二年，仙霞关守将郑芝龙对南明王朝心怀异志，与洪承畴暗中勾结，尽撤仙霞守关将士，致使仙霞岭路二百里间无一人守险。驻守浦城的勤王总兵郑鸿逵屯兵仙阳，以待饷为名，逗留不进。将士士气低落，毫无斗志。一天军中传言，清军已到，郑鸿逵捷足先逃，余自溃散。同年八月，清大将贝勒博率清军逾仙霞关，直逼浦城。时任巡抚御史郑为虹驻守浦城，眼看清军将临城下，让百姓出城逃走，他与给饷兵科给事中黄大鹏、延平知府王杰、后军都督洪祖烈等共守浦城。清军攻破浦城，郑、黄、王、洪等被擒遇害。

（蒋　仁）

李光地题名万寿桥

在浦城西门外，有座石拱桥横跨新溪之上，称“万寿桥”。为何称“万寿桥”呢？据清光绪《续修浦城县志》记载，它是清康熙间李光地命名的。

万寿桥始建于清康熙十六年（1677），初名“西关大草桥”。此桥屡修屡毁。康熙五十五年（1716）六月，上游山洪暴发，桥被冲毁，邑人募捐重建，改为石拱桥，用五个石墩，上砻以岩石，覆盖桥屋，边建护栏，桥宽二丈二尺，长二十一丈四尺，桥中建亭，宽三丈八尺。竣工时，适有康熙间进士，官任文渊阁大学士李光

地（1642—1718）回福建安溪故乡，途经浦城，应邑人请求，题写桥名。这天正逢康熙帝诞辰之日，为纪念皇帝寿辰，遂命名“万寿桥”。桥虽历经沧桑，几度修葺，桥名至今未变。

（蒋　仁）

梁章钜及其北东园

梁章钜是清后期著名的文学家、金石学家，他学识渊博，著述宏富。在他传世的几十部著作中，有许多是在浦城北东园撰著的。

梁章钜（1775—1849），字闳中，号退庵，福建长乐人。清嘉庆七年（1802）中进士。嘉庆十年授礼部主事，入仪制司行走。嘉庆十二年至十五年主南浦书院讲席，在这期间，辑《东南峤外诗文钞》、《夏小正通释》四卷、《南浦诗话》四卷，并征考文献，补阙订讹，搜集整理浦城史料，协修《新修浦城县志》，称“此邦掌故八九在胸，不是虚言”。嘉庆十六年为福建巡抚张兰渚延入幕府而离开浦城。不久，又赴浦城为南浦书院讲席，校补《仓颉篇》三卷，选辑《闽文典制纱》四卷，将其女兰省嫁给浦城祝昌泰之子祝普庆。是年，次子梁丁辰在浦城出生。至嘉庆十八年冬，才进京赴任。后官至江苏巡抚。清道光十二年（1832）告病回乡，是年六月，小住浦城，辑《蓟江别话》四卷，八月，回福州。道光十五年，又进京赴任。道光二十二年，章钜已68岁，告病回乡。同年六月底，抵达浦城暂住，是年，辑《楹联续话》四卷，《巧对录》四卷。次年，购花园弄荒地，起造新屋，称“北东园”，四月建成。此处地基原系宋状元章衡花园，故名花园弄。

章钜在北东园撰写《归田琐记》，书中载："癸卯六十九岁，购花园弄荒地一片，起造新宅，左右池半亩，遂环池略缀屋宇，榜曰北东园。"其宅占地面积1100平方米，有南屋、东西两厢、花园和池塘，北为土墙，大门开于南屋东侧。梁在此居时，雅爱浦城山水，曾写诗云："屋后青山辟洞天，闲来选胜续前缘。仙坑那及仙楼好，释我相思五十年。"又一首诗云："第一名区梦笔山，三年胜地未曾攀。暗中恐惹山灵笑，鸟自高飞云自闲。"

（蒋　仁）

"留香书室"留书香

清嘉庆年间（1796—1820），浦城出了一位闻名遐迩的刻书家祝昌泰。他的刻书堂，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留香书室"。祝昌泰字躬瞻，号东岩。家富资产而乐善好施，热心于乡邦的文化、教育事业。曾将祖上遗产数万捐赠给福州鳌峰书院和浦城的南浦书院。祝昌泰特别留心于浦城地方文献的搜集和流传，曾与南浦书院的讲席著名学者梁章钜一起搜辑浦城宋、元、明先儒遗书14种共107卷，捐资刻印出版，名为《浦城遗书》，又称《浦城宋元明儒遗书》。这是一部极为罕见的以当地历代名人的著作为主的地方文献丛书。其中，有宋代杨亿的《武夷新集》、《西昆酬唱集》，何去非的《何博士备论》、《忘筌书》，何薳的《春渚纪闻》，詹体仁的《詹元善先生遗集》，真德秀的《四书集编》和《西山文钞》，元代杨载的《杨仲弘集》，明代徐浦的《春秋四传私考》等。这套丛书的刻本，今北京、上海、福州等国内近20家大中图书馆均有收藏，是珍贵的清刻善本。祝昌泰留香书室还于清嘉庆十七年

(1812) 刻印了梁章钜的《南浦诗话》八卷，同年又刻印浦城祖之望的《皆山草堂诗钞》十二卷。此外，还刻印了《格言书》，达10种之多。

祝昌泰刻书极注意选择好的底本。宋代浦城人何薳的《春渚纪闻》一书，曾由清代著名校勘学家江苏黄丕烈用宋刻本校对过，是一部高质量的名家校本。祝昌泰辗转通过黄丕烈的友人杭州何梦华借到黄氏校本，刻入《浦城遗书》中。黄氏曾有跋语记载此事。

祝昌泰虽然刻印了大量的图书，但他的自著书《留香室诗抄》、《留香室文抄》、《留香墨林》、《留香别集》等却没有刻印，以至今日大部分书稿遗失。瓯宁（今建瓯）人蒋蘅在《云寥山人文抄》中说："予见其所刊《浦城遗书》……而自著诗稿不自收拾，其用心非近名者所可及。"对祝氏的刻书事迹及其人品都予以很高的评价。

岁月倏忽，一百八十多年过去了，祝昌泰的留香书室早已不存，但他为后人留下来的文化典籍，却仍然散发着翰墨书香。

（方彦寿）

悠悠古琴伴书香

清朝道光、咸丰年间，地处闽北山区的浦城县出了一位以演奏古琴而知名的音乐家，名叫祝凤喈。

祝凤喈（约1805—1864），字桐君。自幼研读经书，19岁时，向其兄祝凤鸣学琴，精研琴艺三十余年，成为著名的古琴演奏家。他曾担任过浙江东阳同知的官职，宦游江浙一带时，以琴相随，技艺超绝，名噪一时。古琴，又称七弦琴，西周时已有之，定型于

汉代。汉魏六朝时是伴奏相和歌的乐器之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演奏艺术，有多种流派，各具特色。祝凤喈的演奏自成一家，成为清代闽派古琴的代表人物，闽派与浙江派、江苏派、四川派并称古琴四大流派。

祝凤喈不仅是一位古琴演奏家，也是一位刻书家，还精通星相之学。他曾于咸丰六年（1856）刻印南宋建阳人蔡沈的《书集传》六卷。蔡沈是朱熹的学生，研究《尚书》的专家。《书集传》一书，元仁宗皇庆时，与朱熹的《周易本义》、《诗集传》，崇安胡安国的《春秋传》等并列为官书，是科举试士的标准注本。祝凤喈刻印此书，为本书的清代善本，曾据明正统五经四书本精心校对。祝氏还刻印了《造命辏要》四卷，这是祝凤喈的自著书，属于星相学方面的著作。当时刻印后，风靡一时，现已罕见，在研究地方民俗史上，此书有一定价值。

咸丰五年（1855），祝凤喈刻印出版了自著的《与古斋琴谱》四卷，另有《补义》一卷、《指法字母简明表说》一卷、《商集曲谱》一卷、《角集曲谱》一卷、《羽集琴谱》一卷。这是祝氏自著自印的一部论述古琴演奏理论、演奏方法和技巧的专著，该书从打谱、制曲、演奏几个方面，对琴曲音乐的基本要素进行了分析，对古琴的演奏方法进行了论述，对闽派古琴的发展，在理论和方法上提出了重要见解。这部书是祝凤喈在古琴研究方面最重要的贡献，也是闽派古琴发展史上的代表性著作。

据光绪《续修浦城县志》载，祝凤喈“家有园林之胜，藏古琴数十张，择其尤者筑十二琴楼以贮之。伯倡仲和，怡怡如也”。此十二琴楼，也是祝氏的书斋，他所编所刻的几部书就是在此写成编就的。琴声悠悠，书香缕缕，构成一幅令人神往的琴书自娱图。他还在此接纳天下名士、诗家、琴师。据传说，当年林则徐途经浦城，曾到祝家花园与祝凤喈相聚，吟咏唱和。

岁月倏忽，一百多年过去了，祝凤喈的十二琴楼至今尚留存下来两座，坐落在浦城南浦镇五一三路上。祝凤喈刻印的《与古斋琴谱》尚有完帙存世，成为研究我国古琴发展史的珍贵史料。

（方彦寿）

崔世孔寻父蒙冤

清代康熙年间，有位福建浦城柏山人氏，姓崔名启泰（1658—1719），又名显明，以做纸为业，常在浙江、江西两地经营土纸和笋干等特产生意。有次，途中遇江西省玉山县青年马子荣，两人结识，相伴同行。子荣对启泰非常热情，关怀备至，逢人自称是父子关系，出入客栈，起居饮食，形影不离。一天，启泰售完货物，决定回家。子荣一再恳求启泰到玉山家中作客，启泰感其一路相伴照顾，便同意前往。当来到玉山县茅村口过渡时，马子荣看左右无人遂起歹心，乘水深浪急，挤启泰于河中，将其行李财物，悉数卷走。数日后，启泰尸浮河面，玉山知县闻报，以无主尸着人收埋。

启泰原有信回家，告知家人回家日期。今超过时间已久而人未回，其子世孔心慌，便赴发信地浙江兰溪查询。闻悉父亲已于半月前去了海宁县。世孔遂转向海宁查找。在海宁遍找各家客栈，均不见踪影。偶遇一位福建到此经商的人告诉他，某月某日其父与玉山县马子荣一同离去。此时世孔盘资已尽，即行乞到玉山县，一路访问，找到马子荣的家。询问子荣，子荣却佯装不知，经再三追问，马子荣就说“启泰已溺死了，因他无子，故认我为子，又有什么人敢再来冒认呢？是想来图诈吗？”

世孔无奈，又悲又愤，便到玉山县衙告状，知县以世孔没有人证，判他诬告，杖责后逐出衙门。

世孔因沿途跋涉劳累，心情又极度悲愤，加之有病又遭杖刑，生命垂危。其时幸遇福建漳州客商王某，慷慨解囊资助，延医治疗。病稍愈，世孔即速赴广信府（今江西上饶市）告状，广信府又移文玉山县详讯。玉山县讼魁姜齐芳，受马子荣贿赂，勾结官吏。玉山知县以崔世孔冒认死者为亲属，系“图诈罪”关进监狱，并移文浦城县衙。浦城县衙派人调查，世孔确系启泰所生，并非冒认，覆文玉山县衙。玉山知县仍然不理，仍坚持定世孔为冒认死者为亲属的“图诈罪”，并行文江西广信府及省有关部门。当时江西的巡抚姓白，人称白巡抚，他对此案有疑问，亲自到玉山县衙提审崔世孔，世孔详细哭诉冤情，曾三次死去活来。白巡抚更怀疑此案有诈，便严讯马子荣，经几次审讯，子荣无法抵赖，只得如实说出真情。白巡抚遂判启泰骸骨归世孔领回，谋财害命的马子荣绑赴市曹斩首，玉山知县革职，讼魁姜齐芳杖责四十。白巡抚亲笔书“孝行可嘉”四字赠给世孔。浦城县知事将这四字立匾悬挂在世孔家之大门，以示表彰。

（蒋　仁）

熊城漫话



英节庙古戏台（政和县）

政和建县一千年

政和县地处闽北东部，城北有一座黄熊山，故别称“熊城”。政和建县于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至今正好一千个年头。然而，政和的文明史却远不止一千年，据新中国成立后多次文物普查和考古的资料表明，早在史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及商周时期，在政和境内已有闽越族先民广泛地活动着。从数十处商周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石器、印纹硬陶及青铜器，证明了在政和这片土地上，也有灿烂的史前文化。

拂去岁月的烟云，回眸历史的陈迹，夏商时代，八闽大地和苏、皖、浙、赣一样，皆在荒服的范围内。《左传》云：“茫茫禹迹，划为九州”，政和属扬州。其时大禹把国土按距京城的远近分为五服：侯服、甸服、绥服、要服和荒服。所谓“荒服”即是京城二千里以外的荒僻处，政和在其内。

周朝：《周官》：“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故其时政和属七闽地。不过那时的七闽，实际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区划，似乎只是部落的总称。

春秋战国：政和属越。公元前 334 年越亡于楚后，越王族中一部分人入闽，政和蚌山商周遗址出土的青铜剑、矛，可能就是这一时期越族子孙使用之武器。

秦朝：秦统一全国后，于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立闽中郡，政和属之。

西汉：先是越王后裔无诸从诸侯反秦，后又助刘邦击项羽，刘

邦建立汉朝后，因立无诸为闽越王。武帝平定余善的反叛后以“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后“遁逃山谷者颇出”，立冶县，属会稽郡，政和在其辖区内。

东汉：改冶县为侯官，永和六年（141）立南部都尉，政和属之。建安十二年（207），分析侯官之地立建安郡。其时政和之地分属二县：西部之东平、石屯、星溪、铁山及外屯一部分隶建安；东部之西、南二里仍隶侯官。

三国：政和地属吴国。永安三年（260）改会稽南郡为建安郡，政和除西、南里外，大部分地区仍属建安。

晋至南北朝：太康三年（282）分立建安、晋安二郡，政和西、南里属温麻县，其余部分仍属建安。

隋朝：开皇九年（589），改丰州为泉州（今福州），废温麻县，政和西、南里之地属泉州，余地仍隶建安。

唐朝：武德元年（618）改建安郡为建州；六年（623）将温麻废地置长溪县。开元十三年（725）改泉州为福州。开成元年（836）以长溪、古田属地各一部分立感德场。其时政和西、南里之地隶感德场，属福州，余地属建州。

五代：后唐长兴四年（933），升感德场为宁德县，政和西、南里隶宁德，余隶建州。天福六年（941），以宁德县东、西、南、北四里之地立关隶镇（镇址在今政和县镇前镇天王寺北），辖10个都，其范围包括今天政和县之镇前、杨源、澄源及外屯四个乡镇以及寿宁平溪、周宁泗桥等乡镇。关隶镇隶宁德县。

宋朝：太宗端拱元年（988）改建州为建宁军。真宗咸平三年（1000），升关隶镇为关隶县，此为政和立县之始，其辖地除原关隶镇所辖之地外，另从建宁军辖地中划入东平、高宅、长城、东衢及感化等五个里归之，县治也从镇前移至感化里东岸口，即今

城关。徽宗政和五年（1115），改关隶县为政和，此为政和县得名之始。但令人费解的是，关隶县更名为政和县后，竟依旧使用关隶县印达135年之久，直到绍兴六年（1136）方正式使用政和县印，这在中国行政史上实属罕见。绍兴三十二年（1153），改建宁军为建宁府，政和隶于建宁府。

元朝：改府为路，政和隶建宁路。

明朝：洪武元年（1368）复将建宁路改为建宁府，政和仍隶之。景泰六年（1455）从政和所领之南、北、东三里划出五个都及福宁府部分属地立寿宁县，同隶建宁府。

清朝：沿袭明制。

民国：元年，改建宁府为建安道，政和隶之。1926年改建安道为建阳专区，政和属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初沿旧制，1956年改建阳专区为南平专区，政和属南平。1960年1月，政和与松溪县合并为松政县，改隶福安专区。1962年7月，松、政分县，恢复政和县。1970年7月，松溪、政和再度合并为松政县，至1975年3月第二次分县，恢复政和县。1994年9月撤南平地区建南平市，政和属南平市，迄今未变。

（熊源泉）

“琅嬛福地”洞宫山

道教是中华汉民族固有的传统宗教。道教崇信神仙，讲究修炼之术，其最高境界是得道升天。据唐人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记载，道教传说中神仙真人所居住的地方称作“洞天福

地”，皆是名山胜境，有所谓“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之说。而道教经典《云笈七签》中则详细记载了“洞天”、“福地”的方位及仙主，其中第二十七福地为洞宫山。《宗教名胜事典》则更为具体地载明：“第二十七（福地）洞宫山，在福建政和。”

洞宫山位于政和县东南杨源乡境内，《八闽通志》、《建宁府志》均载：“洞宫山，去县治一百四十里，道家谓二十七福地……古时尝有魏、虞二真人于此炼丹，丹成飞升，因号魏虞洞天，一号无为神化洞天。”《玉真经》也云：“魏夫人以罗浮、天台、大霍、洞宫四山为栖真之所。”《九域志》则曰：“洞宫山号无为神化之天，真人魏骞、虞冲之所理也。”可见洞宫山自古以来就被视为道教胜地而享名八闽。

那么，修炼于洞宫山的魏、虞二真人为何许人耶？据《舆地广记》云：“魏王子骞、大夫虞冲于洞宫山同日飞升。”魏骞即箴骞，乃彭祖之第三子。据姬威《浑兴经》：彭祖名铿，姓籛氏，因受封于彭城，遂称彭氏，号彭祖，后追谥为魏侯，汉武帝加谥为魏王。彭祖有子三：籛武、籛夷及籛骞。彭祖归气，籛武嗣封于彭而籛夷佐之，商纣将以为卿士，籛武、籛夷咸不义于纣王而亡入闽，后人因名其所隐之山为：“武夷”。籛武、籛夷人闽之初，魏无君，大夫虞冲谋立彭祖第三子籛骞为嗣，籛骞不允，遂躬入闽地，欲迎其兄籛武、籛夷归戴之。而适逢周武王举兵伐纣，杀纣王，籛骞遂入洞宫山隐焉。又据明永乐版《政和县志》卷三《山川》中引《杂志》载：“魏王子骞初隐洞宫时，大夫虞冲从而求之，骞辞不归，冲亦不去，遂相与炼丹于石室。尝养白鹤一，白狗一。丹成，二人骑鹤、狗登云而去。”

至于洞宫山何以又称为“琅嬛福地”，《政和县志》卷七《名胜》引述元人伊世珍《琅嬛记》的一段记载云：西晋时张华（字茂先，范阳人，曾任中书令等职，著有《博物志》十卷，分类记

述了异境奇物及古代琐闻杂事）在建州任职时曾游洞宫山。一日，他在山中遇一老翁，议论超然。老翁引他至一石壁前，忽见有门洞开。进入洞中，便见陈书满架，有二犬守之。张请教老翁架上都是何书？老翁告之曰皆是《玉京紫微》、《金真七瑛》等丹书秘籍。又指二犬曰："此龙也！"张华甚异，求老翁容其在洞中读书数日而被拒，即命童子将其送出洞外。张又请教此处地名，老翁告曰："此琅嬛福地也！"可见早在西晋时，洞宫山已以"琅嬛福地"而闻名。

洞宫山既以道教胜地闻名于世，除了风光秀丽外，自然更多的是道教文化遗迹。如今宝台峰景区的宝丰岩，峭壁下有二洞，相传即是魏、虞真人当年修炼之所。宋时崖前建有"魏虞真宫"一座，宫前立有朱熹女婿黄榦所书之："魏虞洞天"匾额，后圮，今遗址犹存。在麒麟峰景区的九孔岩，悬崖之上有并排九个岩洞，远望犹如琼楼玉阙，便是两位真人当年炼丹之所。而峰顶高耸处，有叠石如塔，称飞升坛，相传即是二真人道满升天的地方。最为奇特的是麒麟峰下有一条虹溪，数华里长的河床，像是在一块绵长的红色岩石上刀削斧砍出来一般，平整得如同水磨石。当地民间传说，此溪是当年魏、虞真人为排除洞宫山水患，用道法驱使神牛犁出来的。此外，在洞宫山风景区各景点中，诸如蛇头岩、龟岩、宝剑峰、萱草涧等等，无不与道教传说相关，就连那闻名遐迩的花桥，也蕴含着道教文化的深刻内涵。

（熊源泉）

花桥——古代建筑的瑰宝

地处政和县著名风景区洞宫山门户、海拔近千米的杨源乡坂

头村，是一个有近千年历史的山村。也许是洞宫山的灵秀，造就出这个小山村独具特色的文化风貌。尤其是村头蟠溪上的花桥，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洞宫山秀美的画幅中，以它那绚丽的倩影，吸引着无数南来北往的游人。

花桥是一座造型独特的石拱木构风雨桥，始建于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它的创建者是该村苏坑人陈桓。陈桓，号盘溪，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十七岁中秀才，正德六年进士及第，初授户部主事员外郎，中转庐州知府，再擢九江兵备副使。陈桓居官清正，勤政爱民，深为武宗所器重，曾下特诏表彰陈桓父母教子有方，这道诏书至今为其子孙所珍藏。花桥就是这位显赫人物金榜题名、衣锦还乡时创建的。

从构造上看花桥是一座楼阁式风雨桥，单孔跨度 10.7 米，高 16 米。桥长虽仅 40 米，但却独具匠心地设计中央主楼和南、北两座偏楼。主楼三层翘檐，偏楼二层翘檐，错落层叠，宏伟壮观，整座桥外观宛如一群展翅欲飞的金凤。桥内共有桥柱 80 根，分 6 排而立，设神龛 9 座。桥内东侧辟一条隔离走廊，古时为妇女通道，今则专供牲畜行走。似此构造的风雨桥，在省内实不多见，它不仅反映了建造者的显赫地位（据说古代桥柱一般均为 4 排，最多 5 排，6 排桥柱则须经朝廷特许），而且反映出我国古代桥梁建筑技术的高超水平。

最令人惊叹的是，在中间主楼的每个翘角上，都悬挂一只风铃，风吹铃铛，叮当作响，初看与普通古建筑上的风铃无异。其实不然，其奇妙处在于它竟能预测当地天气的晴雨变化：在多数情况下，东侧铃响天气将由好转坏；西侧铃响则由坏转好，数十年来这个规律一直不变。其奥秘在于它的铃铛不是普通的小圆锤，而是依据当地的地理环境，设计成一片巴掌大小的薄铁片，这就增加了它有效的物理受力面，从而提高了它测报风力风向变化的

灵敏度。同时，风铃分别悬挂在花桥的东、西两侧，处在蟠溪河谷风向、气流变化的敏感带上，因而能起到预测天气变化的作用。对此游人无不惊叹，深为古代能工巧匠的智慧所折服。

花桥又是一座文化长廊。首先，在桥顶的每个斗拱和桥廊的各个神龛里，分别绘有“桃园结义”、“岳母刺字”、“水漫金山”以及“金鱼戏水”、“鸟语花香”等戏曲故事和花鸟壁画数十幅，从而使这座古桥成了令人目不暇接的画廊，一座名副其实的“花桥”。同时，在数十根桥柱及横梁上，有木刻及书写的楹联30余幅，不仅内容意蕴隽永，而且书法古朴多姿，或苍劲，或柔媚。在主楼的西壁上，保存有民初湖北书法家徐庆澜题写的唐王勃诗一首。

洞宫山是道教胜地，花桥曾是道教的重要活动场所，至今在桥中心的神龛里，供奉着修炼于洞宫山的魏、虞二真仙；而北侧的神龛则供奉着闽、台人民共奉的三位女神——临水夫人三姐妹。清末民初，这里曾活跃过一个诗社，现存花桥上的楹联许多就出自这个诗社成员之手。深厚的传统文化哺育了一代代花桥人，同时又反过来促进花桥地域文化的发展。清代，花桥人编纂了一部《六音字典》，这是一部当地方言的教科书，是研究福建方言的重要资料，更是一部宝贵的区域文化遗产。

1992年花桥被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熊源泉）

铁坑殿——临水第三宫

在我国，神缘与地缘有密切的关系，故在古代，各省区往往

有自己特别信奉的神祇，诸如山西人崇奉关帝，江西人崇拜许真君等等，不过他们多是男性。而在福建最具影响、最受崇敬的神灵却多为女性。其中特别重要的有二位：一是被奉为“海上圣母”的妈祖林默娘。二是被誉为“陆上妈祖”的临水慈济夫人陈靖姑。这一独特宗教文化现象，是区域人民潜意识的反映，且与当地的历史和社会发展紧密相连。据专家研究，福建的女性神灵崇拜，植根于古越族人男女社会分工有殊于中原汉人，从而形成“重女轻男”的习俗环境。

临水夫人信仰发端于唐末五代，宋明时期进一步发展，清代鼎盛。其信仰圈初时仅为闽江流域，随着福州方言区人们的南迁北移，其信仰圈也不断扩大，北至浙江南部，东至台湾，南至广东及东南亚。在台湾现今就有临水夫人庙近 20 座，其中较早的有创建于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的高雄大社碧云宫和创建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的台南临水夫人庙等。

临水夫人属道教神灵，其信仰的一大特点是：在所有宫观中供奉的主神，除临水陈夫人（靖姑）外，还有她的二位师妹，即护国林夫人（九娘）和平闽李夫人（三娘），俗称三位大奶夫人。她们受闾山大法而同为护国佑民、救产佑童之法主和女神，并形成道教净明派中的“净明闾山三奶派”。而另一方面，三位大奶夫人又各有一座自己的祖殿，其中临水、转水二祖殿在闽东之古田和宁德，惟铁坑殿在闽北之政和县。此三座道宫也称临水三宫，它们都各有来历。

铁坑殿坐落在政和县杨源乡杨源村与大溪村交界之铁坑山麓（古时又称下湖山），始建年代已无可稽考。据道教传说，唐末，陈靖姑闾山道成后，与林九娘、李三娘结为姐妹，共同斩妖安民。一日，三人云游至政和下湖山，遇雌雄二蜘蛛精而被困盘丝洞，靖姑即用龙角和指血请来闾山五雷神兵，灭了雌蜘蛛精，但雄蜘蛛

精躲在洞中不出，故陈夫人即命李夫人在此山坐镇，后人遂于此建殿以祠（《福建民间文学探讨》第9期）。据此，铁坑殿当始建于唐末或五代。而确切的记载则是《政和县志》卷二十二《祠祀》中“临水宫”条：“铁坑为李夫人祖殿”。“铁坑未建殿之先，相传此处有乌鸦为灾，后见有三女经过杨源村，行状甚异，乡人从后窥伺，直至此处，有群鸦聚噪，遂收而灭之，从兹鸦患悉平，乃知其为夫人显灵也，因建庙祀之”。但因“年远庙坏，于康熙元年（1662）重新建造……乾隆五十九年（1794）修而廓之”。此后又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和民国6年（1917）两次扩修，形成目前的建筑格局。

铁坑殿的主体建筑基本上按古田临水宫的形制设计，由正殿、偏殿（“梳妆楼”）和殿前戏楼组成，总建筑面积约350平方米，规模不大，结构完整。特别是与正殿相对的戏台，面积近35平方米，为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临水夫人诞日庙会时，演戏祀神之所，颇具特色。

由于临水夫人信仰远及海外，其祖殿的威仪便格外引人注目。1997年农历八月，台湾高雄市北极殿和峰月宫管委会主任委员陈二郎先生，在组团拜谒武夷山之时，专程驱车到政和，寻访铁坑祖殿，经考证后颇为兴奋地表示，将在适当时机组团再来朝拜，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熊源泉）

独具特色的东平“跑龙”

每年元宵节前后，政和县东平村照例要举办传统的“跑龙”比

赛。这是一种独特的集健身和娱乐于一体的群众性活动，至今已延续了三百余年。

东平村是东平镇的所在地，有东、西、南、北四条街。“跑龙”以街为单位，每街出龙一条。比赛采取对手循环的形式进行，一般在农历正月十二至十五日晚上举行，地点通常选在宽阔的晒谷坪或操场。各龙队参赛的选手必须选身强体壮的小伙子，身着鲜艳的服装，英姿勃勃，以体现“龙”的雄姿。每当龙队的锣鼓敲响，村民们便从四面八方涌向赛场，无须指挥，人们就会各自为阵，成为自己那条街龙队的拉拉队。

东平“跑龙”赛所用的龙与通常的龙不同，它是由七盏竹编的圆筒形灯笼加上龙头和龙尾组成，每盏灯笼即为一节龙身。灯笼外糊彩纸，内燃蜡烛，大小像农家的一般鸡笼，故当地人俗称“鸡笼龙”。每盏灯笼的腹部中心安一手柄，长仅盈尺，故只能举而不能擎。比赛时各节灯笼及龙头、龙尾由一条彩色绸带依次相互连结，即成一条长龙。龙手舞龙时举着极短的手柄而要仿照巨龙腾挪翻滚的身姿，互相照应地做立、蹲、跪、伏各种动作，难度颇大，不仅要有很强的体力，而且要有娴熟的技艺。

“跑龙”赛的竞技形式独特而有趣。赛场一端划出一块边长各8米的正方形起跑区，在这块正方形的四个角上，各立一根带枝叶的毛竹，枝叶相连结扎成两座拱形彩门，叫“龙门”。与“龙门”相对的另一端，也用同样的毛竹扎一拱门，在拱门中央距地面3米处，悬一盏形同龙珠的红灯笼以代表龙珠，故称为“珠门”。“龙门”和“珠门”相距100米。

每场“跑龙”赛在两支龙队之间进行。比赛开始前，两条龙各占据一座“龙门”，哨声一响，锣鼓齐鸣，欢声雷动。龙先绕自己的“龙门”上下翻腾三圈，然后疾速朝“珠门”冲去，当到达

“珠门”时，龙首腾空撞龙珠，先撞中者为胜。如此反复循环进行，最后以积分多少决定胜负。此时正值元宵之夜，“跑龙”赛激发的昂扬情绪，伴随着节日的喜炮和锣鼓，构成了山乡特有的热烈和祥和的气氛。

“跑龙”这种独特的民俗活动，所以能在东平历数百年而不衰，这与当地的历史文化有关。东平在宋代以前是隶属于建安县的一个里，素有文运昌盛之称。到了明代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人口稠密，商业繁荣。可在明末，一场灾害几乎毁灭了这个人口辐辏的市镇。相传在天启年间，瘟疫在东平蔓延，夺走了无数生命，有的人亡户绝，有的远走他乡，偌大的市镇数年间竟变成鬼哭狼嚎的荒野。再加上时隔不久清兵入关，战乱绵延，改朝换代，社会动荡，往日繁华的闹市，二三十年间仍然没能恢复元气。村民们更是谈疫色变，精神不振。到了清朝康熙年间，有高僧为霖禅师，不愿为耿精忠所用，从福州鼓山来到闽北，先后驻锡于政和及浙江庆元的一些著名寺庙。当他来到东平时，见村民大多精神不振，市面萧条，心中十分难过。他深知要复兴东平的繁华景象，首先要振奋民心民志，把人们的精神从那场历史灾难的阴影中解脱出来，但他苦思冥想却想不出一个好办法。

康熙十七年（1678），禅师为重建政和古刹宝福寺而奔走于城乡间。这年端午节，他在政和城关目睹了一场龙舟比赛。参赛者那种同舟共济，奋勇向前的精神；旁观者那种万众一心，精神振奋的场面，使他大受启发。他想这种竞技活动既可健身防病，又能振奋精神，是一种凝聚民心民力的好活动。可惜东平远离溪河，无法开展这种活动。但禅师从“龙”上得到启发，决定把“水龙”变成“旱龙”。同时，他又从一位编鸡笼的农民那里得到启示和帮助，设计了制作“鸡笼龙”的方法。于是禅师高兴地来到东

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村民和地方上管事的乡绅，立刻得到大家的赞同。于是各街分头准备，商订了比赛的种种事宜。因为正月是农闲季节，正月十五日又是传统的大奶庙会，所以就把“跑龙”定在庙会前几天开始举行，一直进行到元宵节以增加节日气氛，从此成为定例。直到今天“跑龙”依然是东平群众喜好的一项节日活动。

（熊源泉）

千古绝唱四平腔

80年代初，从闽北山村爆出了一条惊人的新闻：在偏僻的政和县高山区杨源村，发现古老剧种四平戏。

这条消息在戏剧界不胫而走，立刻引起了省内外戏曲史家的极大关注，他们纷纷前往考察，一时间竟把个沉寂了数百年的山村搞得沸沸扬扬。人们终于明白，流传在政和县杨源、禾洋一带的四平戏，原来是明代古老剧种四平腔的遗响，是中国古代戏曲的“活文物”。

四平戏是明代嘉靖年间弋阳腔传入安徽徽州（今歙县）一带后，与当地民间艺术相融而产生的一个声腔剧种。它在明末清初之际发展很快，甚至流布全国各地。但到了清代后期，由于雅部昆曲等新兴剧种的兴起，四平戏逐渐走向衰亡乃至绝迹。故长期以来戏曲史界多持四平戏绝迹论。就连《辞海》的释文也说：“清中叶以后，四平腔为某些剧种所吸收，成为其常用腔调之一，而不作为独立剧种存在。”正因为如此，杨源四平戏的发现，才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戏曲界引起极大轰动。

据专家考证，四平戏系于明末清初传入政和杨源一带的，至今已有近400年的历史。在当地现在还有两个四平戏业余剧团在坚持演出，他们活跃在偏僻山乡，深受山区群众的欢迎。

四平戏是在宋元南戏和明代传奇的深刻影响下形成的，在声腔系统上它属弋阳高腔，是“稍变弋阳而令人可通者”，是对弋阳诸腔“改调而歌”的一种新声腔。考察杨源四平戏，令戏曲史家们感到既惊奇又兴奋，因为杨源四平戏的传统剧目十分丰富，尽管在“文革”中遭到严重破坏，但经过老艺人的挖掘整理，如今他们能演出的整本戏尚有《苏秦》（《金印记》）、《刘文锡沉香破洞》（《宝带记》）、《蔡伯喈》（《琵琶记》）、《王十朋》（《荆钗记》）等10多个剧目。折子戏就更多，有《蟠桃会》、《芦林会》、《红太袄》、《别嫂》、《抢伞》（《拜月记》）等30余出。这些剧目中包含了“荆、刘、拜、杀”及《琵琶记》等五大南戏，从中清楚地看出杨源四平戏与宋元南戏之间的历史渊源。此外，他们至今还保存有清代道光及光绪年间的3个古抄本和数件300多年前的古戏装，为研究四平戏早期的艺术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在音乐唱腔上，杨源四平戏依然保留着固有的“字多腔少，一泄而尽”及“一人启口，众人接腔”的鲜明特色和后台帮唱演唱形式，并且依然沿袭不用弦乐，只用锣、鼓、钹和鼓板等打击乐器，这都是直接继承了弋阳腔的传统。

在角色行当上，早期分为生、旦、净、末、丑、占、外、夫（老旦）、礼等，此即是《宫音汇解释文》中所说的“做九角，唱四平”。到了后期有所发展，生分为正生和小生，旦则分为正旦和小旦，净也分大花和二花，这又符合了“江湖十二脚色”的说法，都是南戏的衣钵。

在表演形式上，杨源四平戏至今还保留着古老的“副末开

场”和“检场”制度，这也是与宋元南戏一脉相承的。

总之，杨源四平戏无论从它的传统剧目、音乐唱腔，还是从它的角色行当和表演形式来看，无疑都完整地保留了明代四平戏的古朴面貌。它为研究我国古代戏曲提供宝贵的活标本，因此，它引起省内外戏曲史家的极大关注也就十分必然了。

（熊源泉）

别具风味的“新娘茶”

悠久的历史文化形成了我国丰富多彩、南北各异的民间习俗。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一些古老的习俗逐渐消亡了，而有些习俗却深深地在民间植根，得以延续。至今在偏僻的政和山区杨源、坂头一带山村流行的端午请“新娘茶”习俗，便是其中的一种。

所谓请“新娘茶”，就是在每年农历端午节的前一天，也即农历五月初四，村里所有在这一年内（从上年端午到本年端午）娶新媳妇的人家，都要备办丰盛的“端午茶”招待众乡亲。“端午茶”的形式类似酒席，但又不同于酒席。第一，是以茶代酒，用自家生产的上等高山云雾茶叶，泡制出清香扑鼻的茶水，由新媳妇逐一斟敬客人。第二，上桌的也非鱼肉菜肴，而是各种各样的“茶料”，其中大都是自家腌制的各种菜干、咸菜以及豆子、花生等等，常多至二三十种，数量越多则越能显出主人的热情及新娘子的手艺精巧。为此，新娘子一过门，就必须跟婆婆或其他老妇人学会制作“茶料”的手艺，以免被人取笑。第三，喝“新娘茶”与喝酒不同，喝酒必须客人“满桌”方能开席，而喝“新娘

茶”则是随到随喝。客人也不会坐太久，多是茶过数巡即起身告辞，再赴另一家之茶席。主人则随时添加或更换“茶料”，直到招待完所有客人。

作为客人，喝“新娘茶”是无需主人特意邀请的，全村人都可以随意到办“新娘茶”的人家赴席，而且不需带任何礼物。

当然，喝“新娘茶”也有一些颇为有趣的例规。60年代以前，每年五月初四请“新娘茶”日子一到，村里事先要选一头健壮的水牛，披上大红绸花和绸带，邀请一位德高望重且“福气”好的老人，牵着牛到办“新娘茶”的人家登门贺喜，意在祝福主人家人丁兴旺，五谷丰登，然后客人才可入席喝茶，近年来这一程序已被简化。

办“新娘茶”时，主人事先要准备许多红喜绳，且这种喜绳有一定规格，每根长九尺九寸。客人喝完茶将离去时，新娘子即给客人送上红喜绳一根，多由新娘子亲手披挂在客人肩上，客人笑纳后则频频表示恭喜。这一习俗的民俗文化意义在于：“九”与“酒”谐音，表示主人以茶代酒感谢乡亲们在其娶媳妇时所给予的关照和帮助；同时，九属阳数，祈盼新媳妇来年能生男孩。而对客人而言，带走这根红喜绳，则意味着是从主人家“借”到了“喜气”，讨到了吉利，一年中便能合家平安，万事如意。

请“新娘茶”的习俗在坂头一带由来已久。据当地老人说，这一习俗从明代起就已盛行，可见其历史之久远。数百年来尽管朝代更迭而此俗不变，足见其在民间影响之深。透过这一古老习俗，我们更可以看出山乡人民古朴忠厚的情感，以及他们和睦相处、互相帮助的融洽人际关系。

（熊源泉）

颜真卿后裔定居赤溪

1987年4月17日，《光明日报》在第二版显著位置登出一则消息，报道了在福建省政和县境内千米高山区的澄源乡赤溪村颜氏宗祠内，发现了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的族谱——《鲁国序谱》及颜真卿使用过的玉带等文物。这一消息立刻引起研究颜氏的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纷纷前往考察探究，一时间这个沉寂的偏僻山村，突然显得热闹非凡。

颜真卿，唐代著名学者颜师古的五世嫡孙，祖籍琅琊（今山东临沂），先祖颜之推，自高齐入周，迁家于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是为万年人。太宗即位，师古官中书侍郎，曾奉命考订《五经》文字，撰《五经定本》。五世孙真卿，字清臣，生于武则天景龙三年（709），卒于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开元进士，官至殿中侍御史、太子少师赠太师。因遭杨国忠排斥，出为平原太守。后因平息安禄山反叛有功，受封为鲁郡开国公，故世称“颜鲁公”。其书法遒劲郁勃，自成一格，世称“颜体”。然而，令人疑惑的是，如此中原望族，其族谱因何会保存在偏僻的闽北山区？其奥秘究竟何在？

福建基本上是个移民省份，自汉代始中原入士便开始入闽。西晋“永嘉之乱”，八姓入闽，成为福建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移民。唐代大批黄巢部队入闽作战，其中也有不少人留在福建。而王审知入主福建，随之入闽的中州人士则成为福建居民的又一来源。这一次次的中原豪族入闽，足迹几乎遍布福建各地，其中当然也包括闽北。《八闽通志》卷三《风俗》引《建安志》称：自五代乱离，

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避乱于此，故建州备五方之俗。这就是说自五代以来，闽北地区就是中原人士入闽的定居首选地，其时政和隶于建州，自然也不例外。

赤溪村位于政和县城东北 80 公里处，与浙江庆元县毗邻，人口 800 余人，大都为颜姓，是颜真卿嫡系后裔的一支。他们至今完好地保存着的祖传族谱，称作《鲁国序谱》。该族谱启修于北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八月，清康熙七年（1668）重修。在此次重修前的顺治四年（1647），进士刘中藻休官归籍，路经赤溪，观《鲁国序谱》，深为颜氏后裔仁孝所动，并闻其拟续宗谱，欣然为之撰写《鲁国郡历谱序》，从而为我们研究颜氏后裔定居闽北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史料。

刘中藻，福建福安人，明崇祯进士，授行人。后南还事唐王，继事鲁王。清兵入关后他在闽东北一带抗清，卓有战绩，移驻福安与清兵鏖战，城破，撰文自祭，吞金屑死，名节重东南。据其《鲁国郡历谱序》考证，颜氏后裔族众散居各州县者颇众，而由常山（今浙江常山）入闽者为颜元浩，居柘浦之南。元浩生有二子，长曰庠，次曰祁。颜祁有子三，其第三子名从信。从信生子名虬松。故颜虬松乃颜元浩之四世孙。虬松仕后汉隐帝朝（948—950）为通事，以此推算颜虬松当是颜真卿之第八代孙。

五代时期朝代更迭，战乱频仍，进入后周之后朝政更加腐败，颜虬松厌弃仕途，进而崇信道家修炼之术，于是弃官南游。当他来到政和境内望浙山（在石屯镇西津村，系道教名山）时，巧遇与他具有相同思想而弃官的谏议大夫吴十七，两人十分投契。吴十七曾得异传幻术，便悉以授虬松。后吴十七定居于瑞应场（今政和岭腰乡锦屏村），而虬松则与浙江庆元吴丙六演法于百花岩，过赤溪，见其峰峦挺秀，溪水潆洄，林木蓊蔚，泉声上下，十分惊喜，曰："惟此可以家焉！"就这样一代书法大家的嫡裔便定居

于赤溪，其子孙繁衍至今已40代，其中有一支迁居宁德霍童，现也繁衍到数百人。他们珍藏的祖传宗谱及真卿遗物，现已成了珍贵文物。

（熊源泉）

“三诏先生”陈朝老

当年欲杀尚怜才，奏稿流传独转哀。
一寸丹心朝士愕，十分白头道州回。
汴京今日犹豺虎，陵寝多年没草莱。
圣主不胜尝胆恨，先生无用鹤书催。

上面这首七律是北宋政和年间国子祭酒，曾于徽宗、钦宗及南宋高宗、孝宗四朝任太子左庶子兼太子伴读，后除龙图阁直学士的邵知柔，为悼念太学生陈朝老所写的谒墓诗，诗中对陈朝老的人品胆识给予很高评价，对他的坎坷遭遇寄予深深的同情。

陈朝老，字廷臣，政和县高宅里（今石屯镇石门村）人，生于北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八月，卒于南宋高宗绍兴十七年（1147）。朝老自幼聪慧，7岁时即以咏雪诗“拥炉莫言冷，世间行路难”之句惊四座。青年时就读于瓯宁北岩寺中，潜心研读，20岁入太学，与陈东等交谊甚厚。他们不但研读圣贤之书，而且十分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北宋末年，朝政腐败，奸相蔡京、童贯等相继把持朝政，排除异己，陷害忠良，执行投降路线，致使大片国土沦亡。面对这种情况，陈朝老不顾自己仅是一个太学生的卑微身份，在元符三年（1100），利用宋哲宗求直言的机会，剀切陈言，历数时弊。这

一举动，被权贵们视为狂妄，自然也毫无结果。但陈朝老并不气馁，依然为国事深深忧虑和不安。徽宗继位，朝老再次上书，历指蔡京等“罔君父”、“结奥援”、“滥爵禄”、“钳台谏”、“炽亲党”、“穷土木”等12条罪状，但也未引起徽宗的重视。大观三年（1109）六月，旨擢何执中为尚书左丞，代蔡京为宰相。执中秉性奸诈，善于钻营，一向追随蔡京，渐踞要津。赵佶登基后，他又事事迎合帝意，粉饰太平，故颇受徽宗赏识，登上宰相宝座。对此尽管朝野哗然，但多数人畏于权势，敢怒不敢言。更有一些宵小之辈，趋炎附势，巴结逢迎，致使执中更加有恃无恐。然而，身为太学生的陈朝老却不畏权势，拍案而起，上书徽宗皇帝，其奏疏中写道：“陛下即位以来凡五命相，有若韩忠彦之庸懦，曾布之脏污，赵廷之蠢愚，蔡京之跋扈。今复相执中，何为者耶？是犹以蚊负山也。蚊虽不能负山，也无损于山；若以斯人治天下，臣恐天下之堕甑矣！”并大声疾呼：“天下事败坏至此，如人一身脏腑受冷已深，岂庸庸之医所能起乎！”对徽宗的用人不当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谏诤。可惜他的忠直之谏仍然没受到徽宗的重视，反而为执中等所不容。

然而，深为国事而忧虑的陈朝老，并未因此而放弃与奸佞的斗争。宣和七年（1125）钦宗赵桓受内禅登基，陈朝老抓住这一机会，与好友太学生陈东等再次联名上书钦宗，“请杀蔡京等六贼，以谢天下”。奏疏言辞激烈，尽数蔡京等人的罪状，诸如蔡京之“为首乱阶，陷害忠良”，“包藏祸心，奸人并进”；王黼之“欺君罔上，蠹国害民”；童贯之“贪功冒赏，不悟事机”；李彦之“根刮民田，夺民资产，重敛租赋”；朱勔父子“侵夺东南之民，怨结数路”等等，指出“此六贼者异名同罪”，请求“远取六贼，肆诸市朝，传首四方，以谢天下”。不料这份顺应民心的奏疏却惹来了大祸，不仅何执中等把陈朝老、陈东等太学生视为眼中钉，恨之

入骨，昏庸的宋钦宗也不辨忠奸，竟将朝老、陈东贬谪到偏远州县。陈朝老被编置道州（今湖南道县），在那里度过了将近三年的流徙生活，直到南宋高宗赵构登极，改元建炎，朝老才遇赦，回到家乡政和县石门村。

朝老回故乡后，深感朝政腐败，国事日非，因此心灰意冷，遂深居简出，结庐躬耕，或耕或读，自取其乐。他自号常欢喜居士，将厅堂取名为寄怀堂。

绍兴初，宋高宗先后三降特诏，征召朝老入朝，其第三道诏书曰："朕久不闻问，良切倾思，缅维迩来，调护多贶。始命，卿以疾伛。再命，卿以甘于不仕为辞。今兹三命，合体古人所谓'一命为伛，再命为偻，三命仆仆而走'，庶以慰朕之愿望也！特赐白马一匹，金鞍绣勒一副，紫磨金八十两，卿其受之，能为朕用，异日子孙永膺多福。故兹诏示，可宜知悉。"

在那皇权至上，君为臣纲的封建时代，高宗给陈朝老的礼遇可谓颇隆了，诏书的措辞也着实诱人。然而，陈朝老并不为之动心。因为那时蔡京等人虽已得到应有的下场，但代之而起的却是比蔡京之辈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奸贼秦桧，故尽管高宗接连三降特诏征召，朝老却坚辞不出，表现出不与奸佞同朝列的高洁气质，因此为世人所重，称之为陈三诏先生。

（熊源泉）

黄华起义与"头陀军"

元至元十七年(1280)，在闽北政和县爆发了以黄华为首的畲、汉人民反元大起义。

黄华，政和县人，盐夫出身，他长期带领一帮盐夫奔走于闽东、闽北的万山峻岭间，这种艰苦的苦力生活，造就了他豪侠仗义、敢于斗争的性格。蒙古贵族对南方汉族人民的残酷压迫，激起了他的反抗情绪。至元十七年冬，他在一次运盐路途中率众起义，很快集结了三万余众。他们首先攻下了政和县城，屯兵于城南正拜山（后人因此称此山为黄华山）。接着又攻克了建宁，并与括苍畲族女首领许夫人联合，组成了一支畲、汉人民大联合的反元义军。这支义军与漳州陈吊眼义军南北呼应，声威震动东南。元统治者惊恐万状，连忙以完者都（即乌哲勒图）为“镇国上将军福建等处征蛮都元帅”，以高兴为副帅，统蒙、汉军数万人闽进剿，并授其“贼苟就擒，听汝施行”之权。于是完者都引兵压闽北，采取军事攻势和政治诱降相结合的政策对付义军。黄华势弱，屈膝归降。完者都为利用黄华，授其副帅之职，引军汀、漳攻陈吊眼，后再授黄华为建宁路管军总管。

但在异族统治下，作为一名汉人降将，黄华终难免受蒙古官僚的歧视；而人民群众强烈的反元情绪，又不能不唤醒他的民族意识。于是在人民反元浪潮的推动下，至元二十年（1283）十月，黄华再次起兵反元，且规模远远超过第一次，“众至十万，连营五十余寨”（《简明中国通史》）。义军将士一律剪发文面，号“头陀军”。为表示反元复宋的决心，改用南宋祥兴年号。这次黄华以政和为据点，四出攻伐，先后攻克了浦城、建宁、崇安以及江西的不少府县，畲、汉人民纷纷依附，东南为之大震。据《元史·记事本末》载，当时福建按察使王惲在给元帝的奏疏中就说：“福建归复之民户几百万，黄华之变失去四五”。由此可见黄华及其所率的头陀军所燃起的反元烽火，已在闽赣等省形成燎原之势，严重威胁元朝在东南地区政权的稳固，于是连忙遣大军进剿，先派浙西宣抚使高兴与黄华之头陀军大战于江西铅山，接着又诏征东行

省左丞刘国杰，会同江淮参政已延（即伯颜）及史弼等统兵分路入闽赣，围歼头陀军。

在元军强大的攻势下，黄华众寡不敌，退守赤岩寨，继续坚持与元军作战。直到至元二十一年春，赤岩寨为元军刘国杰部所破，黄华不甘受辱，投火自焚，余众渐溃，部分义军则化整为零，转入偏僻山区。轰动东南半壁的头陀军反元斗争，终于在蒙古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下宣告失败。然而，这一由畲、汉两族人民共同发起并团结战斗的反对蒙古贵族残酷统治的斗争，在福建乃至中国的历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熊源泉）

叶宗留揭竿锦屏银矿

明英宗正统十二年（1447）九月，在闽北遂应场（今政和县岭腰乡锦屏村），爆发了一次轰动全国的矿工大起义。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产业工人起义，它严重地动摇了明朝的统治政权，震撼了明朝东南半壁江山。叶宗留这个以采矿为业，在闽浙赣边界山区劳作了数十年的采矿工人，便是这次矿民起义的首领。

遂应场地处闽浙交界的深山中，地下蕴藏着丰富的金、银等矿藏，特别是银矿十分丰富，采矿的历史悠久。“文革”前该村吴土主庙门口有一木刻对联云：“矿冶初开，鼓铸金炉开宋代；财源首创，裕国利民遗至今。”这说明其处的采银业始自宋代。而《松溪县志》等地方文献更明确记载，该银矿始采于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封闭于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其间断断续续

采掘了 359 年之久。遂应场银矿初始系私采，宋隆兴二年(1164)，收为朝廷官采，在遂应场设坑冶转运司，派驻官员。至明洪武间，遂应场采银业进一步发展，永乐时发展到鼎盛时期，当时开采的坑洞已有上、下官坑、水龙坑、红朱坑、少亭坑等13处之多。采矿业促进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服务业及各类作坊应运而生，至今当地还流传着“三千买卖客，八万打银人”的民谚，可见当时的繁荣景象。

然而，这表面繁荣的背后，却是一幅采矿工人悲惨的生活史。遂应场地处崇山峻岭间，宋、明时期乃是“风雨昼夜之晦月，林莽虎豹之出入”之地，生产和生活条件都十分艰苦。特别是银矿自宋绍兴三十二年开采至明正统初，已先后采掘了 280 余年，“银苗”浅露处已很少，正如《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所描述的，大多要经过“凿石成洞，曲折之间数十百丈”的艰苦采掘方能有所获。而简陋的设备和毫无安全保障的生产条件，则经常发生矿塌人亡的事故，加之监矿官员和矿头的盘剥，从而引发起一场惊天动地的由叶宗留统率的矿工大起义。

叶宗留，浙江庆元叶村（今名草古地）人，出身于贫苦的矿工家庭，幼年丧父，十几岁便跟随叔父走南闯北并学武艺。曾当过处州府衙役，因在龙泉打抱不平犯了命案，遂入仙霞岭山区武装“盗矿”，与官府对抗。正统十二年初，他带领一批矿工到官办的遂应场银矿采矿谋生，由于他读过些书，且为人仗义有武功，因此深为矿工所敬重。这年八月，矿区发生严重崩塌事故，压死矿工数十人，坑冶司官员非但不予抚恤，反而借机扩征银税，大肆敛财，从而激起矿民愤怒。据《鸿猷录》载，叶宗留抓住此时机，号召矿民“与其等待死亡，不如起来造反，斩奸杀恶，夺回财富”，从而点燃了起义的烈火。九月间近千名矿工在叶宗留率领下，于少亭坑举起造反大旗，叶宗留亲手杀了朝廷派驻矿区的官员，揭

开了矿工起义序幕。

义军首先攻入政和县城，接着挥师北上攻占庆元、龙泉、云和等县，击败前来镇压的明浙江都御使李俊所率官兵。义军创造了一种竹制武器“狼筅”，坚利无比，官军闻风丧胆。十一月，义军回师闽北，相继攻占浦城、建阳等县，进攻建宁府，全歼守城官兵，打死福建左参政、掌建宁府事张瑛，义军队伍发展到10万余人，叶宗留即分兵入江西，控制江西入闽通道车盘岭，义军声威震动闽浙赣三省。

正统十三年二月，在沙县爆发了以邓茂七为首的农民起义，接连攻克了沙县、顺昌、邵武、光泽等县并进逼延平府。叶宗留立即与农民军取得联络，于是工、农两支义军协同作战，互为犄角。明廷大为震惊，英宗严令金都御使张楷、总兵都督刘德新、都督陈荣等，统南京、江西、浙江等地数十万官军，分二路入闽围剿。此时叶宗留正率部进攻处州，闻讯即回师车盘岭，在铅山黄柏铺与陈荣、戴礼所部官军遭遇，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浴血奋战了二天，双方死伤无数。叶宗留身先士卒，不幸中流矢阵亡。义军在叶希八率领下继续与官军作战，全歼陈荣所部2500余人，斩杀了陈荣、戴礼，终于取得铅山战斗的胜利，有力地支援了邓茂七义军。明廷对此惊恐异常，一面严斥张楷“进兵日久，全无实效”，警告“再不用心，必杀不宥”；一面又增派宁阳侯陈懋、保定伯梁瑶、平江伯陈豫等，统京营卫军和江浙之兵，在太监张瑾、曹吉祥监军下入闽围剿。正统十四年邓茂七牺牲，农民起义被镇压，明军得以集中兵力对付矿工起义队伍。他们除加强军事镇压外，更采取诱降政策，分化瓦解矿工队伍，致使叶希八叛变投降，“受抚顺者千余家，男妇二万余人”（《明书·列传》），少部分人在陶得二率领下虽继续奋战，但终因孤立无援，于景泰元年（1450）被镇压。中国历史上一场轰轰烈烈的矿工起义，经历了四年后终告

失败。

（熊源泉）

宋人杰与“枸侯笔”

解放前，在北京文具市场上有一种十分受欢迎的毛笔——枸侯笔。这种笔的毫锋十分特殊：既非狼毫，也非兔毫，而是以上等兔毫内裹鼠须制作而成，因此书写时能刚柔相济，运用自如，既为书法家们所爱重，也为一般文人学者所喜欢，成为当时北京市面上的畅销产品。时至今日，在老一辈人中对“枸侯笔”津津乐道者还大有人在。然而，知“枸侯笔”者有之，知其创制人者则甚少。

“枸侯笔”乃清末举人宋人杰所创制。宋人杰，字枸侯，晚年改名芑培，清嘉庆十七年（1812）出生于政和县东平里（今东平镇）一个翰墨世家。其父宋云峰是当地颇有名气的乡贤，对《易经》研究甚深。人杰自幼聪慧好学，《政和县志》称其“少沉毅有大志”。少年时人杰就酷爱诗文、书画，常以方砖为纸，清水为墨，练习写字，终岁不辍。又常于冰冻霜封之晨，到屋外用口中热气呵墨练写蝇头小楷，故其书法功力甚深，20岁之前便以书法闻名遐迩，登门求字者络绎不绝。至于他创制“枸侯笔”的经历，则颇有一番曲折。

道光十三年（1833），22岁的宋人杰乡试中举。他血气方刚，欲展宏图，决定离家赴京游学以博知闻。其父望子成龙之心颇切，临别谆谆教勉，希望他能做个“救时”之人。

人杰秉性刚直，到京后广交豪杰。他除了潜心研读经史诗文

外，十分留心探究“兵食吏治源流”。其时清朝政治已相当腐败，西方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人杰对此颇感忧虑，他在博览群书之时更加用心研究社会问题，期望有朝一日为国效力。

道光十八年春，人杰在京应会试。此科主考官是军机大臣穆彰阿，尚书单懋谦为分校官。穆彰阿乃道光帝的心腹大臣，臭名昭著的投降派，且为人专横跋扈。单懋谦校阅人杰的应试文章，甚为赞许，视为奇才，认为可取为榜首，即荐于穆彰阿。不料昏庸的穆彰阿对“人杰”之名甚为反感，斥之为狂妄，不予录取。人杰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就因为一个普通的名字便凭空惹下了祸，断送了前程。单懋谦深为人杰抱屈，以为人才难得，故在穆彰阿面前为人杰据理力争。孰料穆彰阿益发恼怒，责令将人杰除名。人杰虽然异常愤慨，却也以不出于穆彰阿门下而自慰。当然，通过此事使人杰进一步看到了朝政的腐败，忧愤之情郁结心头，他深深为国家的命运而担忧。

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廷在投降派的操纵下，向外国侵略者屈服，丧权辱国，主战派领袖林则徐也被谪戍伊犁，全国哗然。人杰失望之极，于是纵情诗酒，他与一班知交张之亮、郭芷舟、郑修楼等，常常借酒浇愁，讥评时政，更为权贵们所不容，从此无意仕进。他客居京都前后近二十年，主要以卖字为生。由于他书法渊源极深，享有很高的声誉，曾名噪帝都。他所创制的“栒侯笔”，也成了奇货可居的名品。

由于遭遇坎坷和忧愤折磨，咸丰元年（1851），年仅40岁的书法家宋人杰便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他留给后人的除了珍贵的书法墨迹和那早已失传的“栒侯笔”外，还有《易说》四卷、《知足知不足斋遗诗》二卷、《知足知不足斋杂著》二卷和《落花吟草》等著作。

（熊源泉）

湛卢逸史



渭田五福桥（松溪县）

分合析置话松溪

松溪位于福建省北部，东抵浙江庆元，东南邻近政和，西南与建瓯毗邻，西连建阳，北与浦城接壤。境内湛卢峰峙其南，蹲狮山展其北，七峰山耸其左，虹亭山列其右，中有双溪逶迤曲折，是一个风光优美、山川锦绣、历史悠久的好地方。

东汉时，松溪属建安县，旧称东平乡。三国吴永安三年（260）始置东平县，属建安郡。此为松溪首次建县，距今1740年。

南朝宋泰始元年（465），撤销县的建置，仍称东平乡，属处州龙泉县管辖。五代后晋天福二年（937），闽建安镇安军节度使王延政率兵占据吴越国之东平乡大部地方，天福六年（941）改东平乡为松源镇。五代后晋开运二年（945），南唐灭闽，松源镇隶属南唐永安军。

南唐保大九年（951），升松源镇为松源县，此为松溪第二次建县，上距撤销东平县时隔44年。县治所设今旧县乡政府所在地，隶属南唐忠义军。

北宋开宝八年（975），宋灭南唐，迁县治于今址。因境内水利资源丰富，有溪名“松”，为建溪三大水源之一，故改名为松溪县，隶属于福建道建州。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升建州为建宁府，松溪县之隶属不变。

元明两代，建宁或改为建宁路，或复称建宁府，松溪县的行政隶属均沿袭不变。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因避福王朱由崧之讳，曾一度改名为嵩溪县。次年十二月十四日，清军攻陷松溪县城，复名为松溪，属延建邵道建宁府管辖。

民国元年（1912），废府、州建置，福建省划分为4个道，松溪县属福建省北路道。民国3年，北路道改称建安道，道公署均驻南平。

1949年5月14日，松溪县解放，隶属于福建省第一行政督察区。次年6月，改称建瓯专区；9月，改名建阳专区。1956年3月撤销建阳专区，改属南平专区。1959年7月1日起划归福安专区管辖。1960年1月，松溪、政和两县合并，称松政县，县治设松溪城关。1962年7月恢复松溪、政和两县建置。1970年7月1日起再度与政和合并，复归于南平专区。1975年3月15日起再度恢复松溪、政和两县建置，隶属于南平地区（今南平市）不变。

（冯顺志）

天下第一剑——湛卢

被誉为天下第一剑的湛卢宝剑是春秋时越人欧冶子在松溪县湛卢山铸造的。此事在《辞海》及《中国地名大辞典》中均有记载："湛卢山位于福建北部松溪县境内，山高岭峻，四季雾凝，相传为春秋时欧冶子铸剑处，遂以剑名山。"

春秋时诸侯混战，闽越多山，不宜车战，而刀剑适用于短兵相接，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武器。据《越绝书》载：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命欧冶子铸剑，于是欧冶子与其妻朱氏及女儿莫邪首次选在湛卢山铸剑。据《松溪县志》载：唐贞观间，湛卢山断碑上备述欧冶子铸剑事迹，并载：山中有欧冶祠、欧冶洞、炉坪、冶炉、炭烬、剑池、试剑石等遗址，惜今已荡然无存。福州于山王天君殿旁碑林亦有类似碑文记载，可见欧冶子在湛卢铸剑属实。

其后欧冶子到浙江之秦溪山下，与其婿干将合制龙渊、泰阿、

工布三剑，继又铸纯钩、巨阙、豪曹、鱼肠，与湛卢并称五名剑，《龙泉县志》有此记载。

欧冶子为何首先在松溪湛卢铸剑，其原因是，湛卢位于松溪城南，海拔1230米，深山钟灵，玉女、剑峰、湛云三峰并列，形似笔架，蔚为壮观。山中灌木丛生，泉水清冽，地下有金属矿藏，可供铸剑之需，尤以清泉淬剑为最佳。

至于湛卢剑的神奇传说，古籍多有所载。《越绝书》载：欧冶悉其技巧，铸湛卢剑。晋左思之《吴都赋》谓：吴钩越棘，纯钩湛卢，天下之名剑。唐代诗人杜甫有“朝士兼戎服，君王按湛卢”之句。东晋《拾遗记》载：湛卢山为湛王铸剑处，今炉冶遗迹犹存。明末冯梦龙所编之《东周列国志》称：湛卢乃五金之英，太阳之精，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又云：湛卢剑献于越王，王宝之。其后越败，为吴王阖闾所得。一日，忽而不见，而楚王梦得此剑，及醒，剑在枕边，奇之。遂唤近臣风胡子审之，风胡子曰：“此剑乃越人欧冶所铸之湛卢剑，乃五岳之精，六气之英，炼为神器，电烨霜凝，虹蔚波映，龙藻龟文，断金切玉，威动三军。得此剑者恒昌。今吴王无道，杀王僚自立，又坑万人以殉其女，必失此剑。”此剑后传到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手里，飞如获至宝，可见其工艺之精湛。

80年代中期，松溪县恢复湛卢剑的制造生产，产品畅销国内外，古老的湛卢剑焕发出了新的光辉，备受人们的青睐。

（林英颐）

欧冶子铸剑传说

欧冶子铸的每把宝剑，几乎都有一段神奇的传说，而最富有

传奇色彩的当属“龙渊”、“泰阿”、“工布”三剑了。

公元前492年，越王出师伐吴，出征前派越臣文种为特使暗赴楚国，请楚昭王带兵在吴国西部边境起事，以牵制吴国兵力。楚王早闻越国盛产宝剑，乘机提出要给他一批宝剑，作为出兵的交换条件，越王只好命欧冶子再铸一批宝剑。欧受命后，就和妻子朱氏、女儿莫邪商量。他们当时一方面要铸造大批兵器供前方使用；另一方面要为楚王铸造宝剑，而当时的湛卢山的资源是不够用的，要完成这项艰巨任务，必须开辟新的铸剑场所，那么要转移到何处去呢？他们一家苦思冥想，一直发愁。

时值中秋之夜，他一家上湛云峰饮酒赏月，欧冶子心中烦愁，朦朦胧胧睡去了。这时，有位白发童颜老人，站在云间，高声叫道：“欧冶子，你铸剑报国，可到秦溪山麓去，那里有取之不尽的五金之英，用之不竭的寒冽龙水，还有亮石坑发光洞的宝石供你磨剑。”欧冶子忙作揖曰：“请问仙翁？秦溪山麓在何处？”白发老人手往白云深处一指，只见一双白鹤飞到欧冶子身边，白发老人道：“骑上白鹤去吧！”欧冶子骑上白鹤，像流星般飞去，最后在括州府黄鹤（今浙江龙泉）停下。欧冶子举目一望，四周古木参天，湖水清澈，环境幽静。欧冶子不觉大叫一声：“好地方！好地方！”朱氏闻声，忙把他推醒，欧冶子方知是一场梦，于是把梦境中的情况，一五一十告诉妻子。第二天早晨，欧冶子夫妇携女儿莫邪，挑着行李，按白发老人指点方向出发。他们日行夜宿，翻过八十一座山，渡过六十四条溪，才找到秦溪山，这就是浙江最高峰凤阳山的山麓，青山绿水，苍松翠柏，附近无鸡鸣犬吠，在两棵千年树下面，排列着七口井，像天上北斗星座，泉水寒冽。于是欧冶子结庐砌灶，取铁英铸剑。当第一把剑放在石墩锤打时，突然乌云四起，狂风大作，雷电交加，七条金龙从井口钻出，冲上云霄，尔后齐向剑坯上喷了口水就腾云驾雾而去了。这时雨过天

晴，只映得那把剑五彩缤纷。欧冶子举剑向巨石劈去，只听“啪”一声，巨石被劈成两瓣。欧冶子记得梦中白发老人指点的“亮石坑宝石可供你磨剑”，但不知亮石坑在何处？后来到九姑山访问一位采药老翁，老翁告诉他：“离城四十里处，有个发光洞，存亮石数以万计，若能得石磨剑，磨出的宝剑必定光亮无比；只是洞边有巨鹰把守，无人敢取。”欧冶子听后回家和妻商量，朱氏说：“不用怕，三人齐心协力就能战胜巨鹰。”于是他们各执一把宝剑，奔赴发光洞，果然有巨鹰凶猛无比，平时抓虎吃豹，力大无比，一见生人来拍动翅膀凶猛扑来，一双利爪就拦腰把莫邪抓住，飞向天空。欧冶子夫妇执湛卢剑杀来，搏斗几回合，这时莫邪虽被抓，但她一边挣扎一边持宝剑朝巨鹰的翅膀乱刺，结果鹰伤坠地，欧冶子上前补上一剑，结果了巨鹰的性命。三人齐进洞取回亮石，经过试用，宝剑果然锋利无比，斩铁如泥，就把这把宝剑取名为“龙渊”。

欧冶子铸了大批宝剑之后，又造了“泰阿”、“工布”两剑，连同“龙渊”由越王献给楚王，楚王大喜，答应帮助越国。

由于欧冶子铸出精良的兵器，越王很快得胜班师回国。欧冶子制造兵器有功，封为“湛王”和“大将军”等官衔。但欧冶子不愿为官，只求回归湛卢山和秦溪山重操旧业，后人在湛卢山建有“欧冶子祠”、秦溪山建有“欧冶子将军庙”。

（冯顺志）

湛卢三峰十六景

湛卢山，位于松溪县城南10公里，海拔1230米，山体由凝

灰石、花岗岩组成，山势雄伟，树木葱茏，流泉不息，终年云蒸霞蔚。二千多年前欧冶子奉越王允常之命在此铸就天下第一剑——湛卢宝剑，故以剑名山。山上人文及自然景观十分丰富，最富有代表性的有三峰十六景。

三峰即湛云峰、状元峰（又称剑峰）、玉女峰，三峰并列，形同笔架。过去玉女峰有顶，状元峰有普度石塔，现遗址尚存。湛云峰为湛卢山最高处，上有仙阁，供八仙塑像，并设仙枕，是古人许愿求仙之所，有欧冶子在此得梦驾鹤北上的传说。十六景中，较著名的景点有：

剑池：传说是欧冶子淬剑处。

试剑石：如一巨石，有剑斫石痕。在续贤庵上，剑峰下，为欧冶子试剑之处。昔人书“试剑”二字于石上。传说宝剑初铸成时，寒光灼灼，挥剑试之，巨石应声而裂，其痕迄今清晰可辨。

清凉寺：始建于唐神龙六年，后毁。宋元符二年，为纪念县人周才在山上祈雨，在旧址上重建，经历代扩建，有下、中大殿及偏殿、僧舍禅房数十间。殿中供奉弥勒、天王、三宝、观音、罗汉等佛像。

续贤庵（又称中庵）：为北宋理学家杨时的七世孙杨缨就任湛卢山长时所建，并撰有“续贤庵记”。

湛卢书院遗址：位于剑峰之下，在朱熹所筑“吟室”原址上修建。此书院历经风霜剥蚀，兵火战乱，几兴几废，现仅存废墟一片。

湛峰观日：在晴好的日子里，拂晓登上湛云峰可观赏旭日从天地间喷薄而出，冉冉升起。

炉坪：在湛卢山北，葡萄岩下，那里古树蔽日，涧泉清冽，为欧冶子铸剑之所。

木涧：古人以松木为桁，导水灌田或饮用。景点在吟室右，木

涧流水声如琴如瑟，恍若天籁之声。

断碑：唐贞观年间刻，以正楷书写碑文，记述欧冶子及湛卢剑、湛卢山名来由，是湛卢山最古老的文物之一。经1300年风雨侵蚀，现已字迹模糊，且石碑中部横裂，故称“断碑”。

棋盘岩：又称仙人棋盘。在清凉寺左，相传南极星翁和北极仙翁在此山修炼时，常在此对弈，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之说。

掌腰岩：在道侧，相传老人上山时，在岩石边手折树枝，即可使腰腿病消除。

狮子岩：在清凉寺左，状元峰下，该峰陡峭，山石嶙峋，兀立之石，呈狮子状，可谓湛卢山一绝。

陟岵台：在清凉寺下道，过香岩，此处山势险峻，密林丛生，下临深堑，古人题刻“陟岵台”。

香岩：登上岑岩古道，有异香阵阵袭来，道侧有一岩，因曰“香岩”。

此外，山中还有欧冶祠、仙姑洞、桃花洞和岑岩古道等一批景点。

（冯顺志）

白马山上“雄狮”吼

白马山是松溪境内一座著名的山峰，与湛卢齐名，位于松溪城东北，距县城20公里。自古以来，白马山就以其秀丽的自然景色，奇特的悬崖绝涧，吸引着众多的游客。

白马山风光最佳处，是那巍岩断壁形成的许多奇峰绝景。其

中最著名的是“十头狮子”，即十座山崖，十分雄伟壮观。崖顶多青松，郁郁苍苍，枝干挺拔，枝叶茂盛，好似雄狮鬣毛倒竖，昂首凌空，有奋然跃起之势。

大狮子岩为白马山主峰，海拔1031米，状似一头昂首腾空的雄狮，向天怒吼，岩顶狮鼻、狮嘴隐然可辨。山中景点有仙坛，又名仙阁，以石为原料，搭建而成。仙坛门口紧靠悬崖，有一块坦平如镜的岩石，长约一丈，宽仅二尺，俗称梦床。传说游人躺卧其上，便可入梦遨游仙境。若在山脚下仰视大狮子岩，又好似一柱擎天，状若一支点燃的红烛，故又称为蜡烛岩。

小狮子岩为白马山中风光最美的一座山崖，巨大的岩峰酷似狮头，面向长天，张口怒吼，游人至此，似可听见其吼声在山谷之中、云雾之外回荡，令人精神为之一振。

媒人岩是另一处小山头。山顶上挺立着一块岩石，似人形，眉眼须发可辨，栩栩如生。山上还有石室，名为老佛煜。高广数丈，冬暖夏凉，下为深谷，峭壁百丈，景色幽险。此外，还有弥勒岩、仙人晒谷岩等景观，也令人叹为观止。

白马山中还有一座古庙，叫久福寺，俗称白马庵，始建于元朝至正二十五年（1365），明洪武二年（1369）扩建重修。现该寺仍为境内著名旅游景点，每当夏秋季节，朝拜进香者络绎不绝。

（吴声洪）

中峰山与留洋寺

中峰山在松溪旧县乡，距县城约16公里，地处闽浙两省要

冲。从松溪至浙江庆元的龙泉古道蜿蜒从此经过。山峰奇秀，高耸于众山之上。山中有伏虎坛、乌石、达泉、虎溪、石梁、于菟岭六景。

沿山径行一公里多，即达留洋村。松溪境内年代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古刹留洋寺就在村舍不远之处，是县内主要名胜旅游景点之一。古时新县令上任，达官贵人过境，诗家名流到此游玩，必到寺朝拜，因而留下了许多诗文碑刻，留洋寺也因之成为佛教圣地之一。

留洋寺本名武当山中峰寺，初建于唐景福元年（892）。寺院山门前有伏虎坛，传说在唐景福元年，山中有猛虎出没，乡民聚集山中，欲捕虎除害，忽见一禅师骑虎而去，乡民震骇。消息传出后，四方乡民争相捐资建寺，迎禅师为住持，人称其为“伏虎禅师”。

留洋寺规模宏大，占地约五十余亩。有天王殿、观音阁、僧舍、客房、库房、斋堂、经堂、方丈室等建筑群在百间以上。今寺中殿宇多已圮废，而规模遗址犹存。现存的天王殿为清康熙五十年（1711）所建，有康熙年间所立“中峰禅院”木匾。殿宇为正方形纯木结构，四柱顶梁，斗拱舒托，飞檐画栋，气势雄伟端庄。抗日战争时期，杭州沦陷，浙江大学美术系曾迁至此寺中办学，为古朴的寺庙添上一抹浓重的现代艺术气息。

留洋寺后另有山峰，形如金钟，树木翳郁，一峰独秀。溪涧绕山下，流水激石有声。寺后为一片竹林，枝干扶疏，翠叶如玉，乔松数棵，错落其间。左右平岗环抱，环境清幽。出寺二百米外，有祀建寺祖师小庙一座。步出山谷，有一条缓坡石径，可见摩崖石刻多处。其中“达泉”、“於菟岭”等字，皆二尺见方，虽年代久远，字迹比较模糊，但凌厉奔放的笔势犹依稀可辨。

（吴声洪）

福建最早的纪年墓葬

1981年冬，松溪邻县政和铁山公社（今铁山镇）周屯洋村，一村民在盖房挖基时，挖出了西晋元康二年（292）古墓一座，出土了大量的西晋墓砖。砖边印有隶书阳文“西晋元康二年”字样，这是福建已发掘古墓中最早的墓砖，该墓葬也成为福建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墓葬，距今已1708年。

无独有偶，1973年12月，在松溪渭田尾村旁茶仓山西南坡下，也发现了一座西晋古墓。墓如卷顶砖室，分甬道、墓室两部分。全长8.6米，大部分的长形墓砖上部印有“永兴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的正楷阳文纪年。“永兴”是西晋惠帝司马衷的年号，永兴三年即公元306年，距今已将近1700年，比邻县政和的西晋古墓略晚了14年，也是福建迄今发现的最早有纪年的古墓葬之一。

由于年代久远，此墓棺木和尸骨已腐朽无存。墓室内淤泥厚约10至15厘米。出土器物共18件。其中瓷双耳罐、青瓷虎子、青瓷双耳盘口壶、铁马、三足铜盘、铜熏斗、铜盘各一件，铜镜二件，金手镯三件共重36克，银手镯二件重30克，银耳挖二件。

松溪县西晋古墓出土的金银器物，在福建尚属首次。从纪年和实物推断，这是西晋永兴三年葬于此地的一座女墓。从墓的结构和出土器物来看，它应是当时汉族早期入闽的上层人物的墓葬，或许是避乱到此的衣冠士族。再结合墓葬发掘地的村名“渭田”来考察，应是当年一部分来自北方渭水流域的移民定居于此后而命名的，以此来表达对家乡的怀念之情。这批移民的来历，与西晋元康元年（291）发生的“八王之乱”有密切的关系。由于当时战

乱纷起，人祸天灾肆虐，加上瘟疫流行，北方曾有一批移民流离失所，逃往南方；而松溪则是中土人士入闽的必经地之一，“渭田”因之成为移民群居的村落之一。

从福建出土的文物来看，魏晋时期的地下文物和墓葬，基本上是一个空白。其原因，与汉武灭闽越国后，将当地大批居民皆迁江淮间，其地遂虚有关。而松溪、政和两县发现的两座西晋墓葬，在福建的地下文物发掘和考古学研究上，就具有填补这一空白的意义。

（吴　鼓）

巨型圣旨绣幅

松溪县文化馆珍藏着一幅明代的巨型圣旨绣幅，原为松溪旧县乡游埠村年已八旬的农妇真玉姐家藏的代代相传的古工艺品。1985年秋，她把这件祖传了十几代的文物珍品无偿地献给了县文化馆。

这幅圣旨绣幅用整块黄缎制成，竖式排列，全长256厘米，宽135厘米。绣幅中共有七道诏书，分别是明神宗朱翊钧万历三十七年（1609）、熹宗朱由校天启二年（1622）和三年先后三次颁赐给松溪籍名宦真宪时的，主要内容是褒奖真宪时夫妇及其父母、祖父母等。

真宪时（？—1628），字法侯，号存古，松溪县庆原里（今祖墩乡）人，是南宋著名理学家真德秀的十二世孙。他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举进士，历官刑部湖广司主事、广东司员外郎、陕西司郎中等职，为政清廉，卓有政绩。任浙江恤刑官时，执法严

明。据其执法实践，参以历代刑法，著有《恤刑爰书》，成为此后恤刑之官执法的典型范例。天启四年任河南按察使，因弹劾权奸魏忠贤误国，遭魏诬陷被罢职回乡。魏忠贤垮台后，崇祯欲再次启用真宪时，但他已不幸病卒。

根据现存的这七道圣旨，其中除了褒奖、加官、晋爵、追封之外，还涉及到对真宪时父母的祝寿，故此巨型绣幅应是在天启三年真母寿诞时，真家特将七道诏书绣成中堂，悬挂在大厅上供贺客瞻拜，以此光耀门庭。七道圣旨共 2814 字，全用深紫色线逐笔绣成。虽历经约 380 年，迄今字迹清晰，丝绣完好，笔力针工，为世上罕见。

（吴　懿）

郑坱万前百年蔗

1959 年，《福建日报》报道了松溪县万前村有一片已生长了 230 多年的宿根甘蔗的消息，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前来考察、研究的农学、植物学专家学者络绎不绝。岁月流逝，转眼 40 多年又过去了，这一片扎根于松溪郑坱镇万前村沃土之中的“长寿”甘蔗，迄今已逾 273 年的“高龄”，仍然根深叶茂，生机勃勃。

据专家考证，万前百年蔗约种植于清雍正四年（1726），是万前村村民魏世早祖上作为“风水蔗”，一代一代精心呵护，留传下来的。

国内外许多农业专家对百年蔗很感兴趣，十分关注。六七十年代先后在广东顺德、广西百色县推广种植经验，获得了高产。我国著名的甘蔗专家、福建农业大学周可涌教授、华南农学院戚经

文教授，曾多次专程到郑墘万前村实地考察和研究百年蔗。周教授非常高兴地指出："这是一个罕见的奇迹！因为世界上的甘蔗宿根寿命都很短，一般只有三至五年。五十年代，曾传说古巴有16年的宿根蔗，斯里兰卡有25年的宿根蔗的最高纪录。而松溪万前村的蔗农，祖祖辈辈辛勤劳动，采取了一套独特的耕作技术，培植了二百多年的宿根甘蔗，确实是甘蔗栽培史上的一个奇迹。""这片百年蔗是我们先辈的创造，是我们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徐永平）

闽北现存最长的厝桥

闽北境内水路纵横，造桥的历史极为悠久。厝桥就是各种古桥中最具特色的桥梁之一。

厝桥，也称屋桥、桥亭。即在桥上架屋，既供行人交通之便，也供其休憩，或躲风雨，或避日晒。在市镇修建的厝桥，还往往成为当地或四乡居民进行集市贸易的场所。清初周亮工在宦闽时所撰《闽小纪》一书中，对福建的厝桥有专门的记述。他说："闽中桥梁最为巨丽。桥上架屋，翼翼楚楚，无处不堪图画。吴文中落笔即仿而为之。第以闽地多雨，欲便于憩足者。两檐下类覆以木板，深辄数尺，俯栏有致，游目无余，似畏人见好山色，故障之者。予每度一桥辄为慨叹。"他在文中，对闽中厝桥既有赞美之辞，同时也认为厝桥遮断了桥外的"好山色"，因之对此也颇有微词。实际上，作为古老的桥梁建筑，厝桥往往与当地的山水已有机地融为一体，厝桥也成为当地"好山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周亮工的观点，不过是立足点不同而已。

闽北现存最长的厝桥，是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松溪五福桥。这是一座结构独特装饰华丽的古桥，矗立于松溪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上。它也是松溪东路茶叶、笋干集市贸易场所，自古就有“安澜成砥柱，利济胜舟舆”之誉。

五福桥全长105米，宽5.2米。四墩五孔，墩上用松原木叠架，不用一枚铆钉。原木上横铺木板，以细沙作垫，面上铺石板和方砖。桥上为长廊式亭屋35间，桥中心是檐挑角丹漆彩绘的高阁，整座桥宛如长龙横卧在渭田溪上。桥厝门墙有砖雕花卉和八仙传说等神话故事的装饰，颇为古朴壮观。桥亭两侧翼以栏杆，排列松木大板凳供行人休憩。桥引护遮板三层，以蔽风雨；桥榭、亭阁雕梁画栋，金碧辉煌。长桥两厢绘满画幅，融文史知识于绘画艺术之中，供游人欣赏。桥两头则有石牌坊式石拱门。五福桥是闽北古代建筑艺术的瑰宝，现列为县级重点保护文物。

（吴声洪）

松溪的“挑茶担”

松溪是闽北的茶乡，茶乡人民爱茶，家家户户一年四季均备有茶水招待客人。就是很穷的人家，家里来了客人，也会向邻居要一些茶叶招待客人。对客人敬茶，是松溪民间淳朴的民风。每年夏天，在凉亭、村头、巷尾、店铺门口以及桥亭中都可看到茶水供应站，备有防暑凉茶，供过路人解渴。“挑茶担”就是反映松溪人民对客人敬茶的一种文艺形式。表演者有一人或两三人，有男也有女，女角多由男的扮演。茶担上面，每边摆着四个碗和一壶茶，茶担里面是空的，点着灯，茶担四周料丝扎成透明的图案，

料丝上贴着“恭贺新禧，恭喜发财”八个大红字。扁担是用两根竹片做的，挑起来弯弯的有弹性，表示茶担的重量。表演时边唱边舞，这种艺术表演，表面看很简单，演起来可不容易。首先一担两边八碗茶要斟得满满的，茶担里面的灯要点得亮亮的，挑在肩上走动时，不能让茶水流出来，也不能让风把灯吹灭掉，脚步要稳，速度要快，同时要表现出走大路，过小桥，上山岗，下山坡等等艰难的舞蹈步法。表演水平高的人，还能双手插腰，前后快步走动，有时还把头一低，脖子一缩，肩一扭，不用双手就能把茶担转过肩，真是绝技。观众这时会热烈鼓掌，高声赞扬。

过去，松溪县每逢正月十五元宵节和八月十五中秋节，均有“挑茶担”上街表演。传闻原先是每年正月，像舞龙灯一样到各家各户去拜年敬茶，东家要送红包的。敬茶时还要唱，唱词多数是恭贺发财长寿等方面的内容。机灵的表演者还能根据各家各户不同的对象，唱出各种不同的唱词。比如对老人家，唱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对商店老板，唱恭喜发财；对新婚姑娘，唱祝贺早生贵子等等不同的唱词，很受群众欢迎，各家各户都会高兴地给一个小红包。

“挑茶担”现已失传多年，至子它何时兴起，系何人创作，已无法查考。传闻很早以前，有一位唱戏艺人流落到松溪，在松溪入赘为婿。有一天，与一位道士在一起喝酒。闲谈中，道士诉说近来法事清淡、生活困难。艺人说：“我告诉你一个办法，包你赚钱。”道士听后高兴地问：“什么办法？”艺人说：“演戏。”“演戏？”道士惊奇地说，“你叫我去演戏，你简直是开玩笑！”艺人笑笑地说：“嗨，你不用怕，没叫你上舞台演戏。我问你，你有没有给人家做过法事？”“有！”道士点点头。“再问你，你给人家做法事时，不是有个‘挑经担’吗？”“是的。”道士点点头答道。艺人说：“那就好了，你把‘挑经担’的担子改一改，改为‘挑茶担’，照

旧按挑经担的步法表演，再把唱词改一改，岂不是成了一个拜年敬茶的好方法吗？到各家各户去拜年。你们乡间民俗，春节舞龙灯拜年贺喜，各家各户不是都有送红包的吗？只要我们演得好，唱得好，好话多说几句，我相信红包一定不少。”道士有点动心地说：“可我没唱过戏，怕唱不来。”艺人说：“这个你不要怕，我与你一起演。我过去是演花旦的，我扮女的，你扮男的，你表演挑担，我来唱，我来敬茶说好话，怎么样？”道士下了决心。经过半个月的训练准备，在第二年的春节演出。第一炮就打响，非常受群众欢迎，群众像接龙灯一样放着鞭炮接送。从此以后，这个文艺形式就在松溪流传下来。后来，不知因艺人老了，还是艺人回戏班到外地演戏去，找不到女角配唱，只由一个男角表演。这就是现在七八十岁的老人，在解放前所看到的单角“挑茶担”表演了。

（何俊年）

松溪方言话剧

松溪方言话剧，兴起于1938年。当时为了抗日战争宣传，县组织了抗日话剧团，由于当时群众普遍不会讲国语，为了使群众能听得懂剧中内容，于是话剧团自编自导了方言话剧《守财奴》。这场戏演得很成功，很受群众欢迎。从此后，松溪县各乡镇都流行方言话剧，据1940年各乡镇抗日宣传报告单统计，全县29个宣传队，队队均演出方言话剧。可见方言话剧确是一种有力的宣传工具，在抗日宣传工作中，对教育民众，唤起民众爱国爱家乡的意识，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

解放后，方言话剧更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各项政治运动，如

土地改革、镇反、婚姻法宣传、合作化运动、扫盲、参军以及每个时期的政策方针宣传等等，都利用方言话剧进行宣传。六七十年代，曾经演过《恶霸张枫廷》、《桂兰》、《毒辣婆婆》、《买卖婚姻害死人》、《巧嘴媒婆》、《没有文化的痛苦》，以及《邹小胡互助组》、《人民代表范冬如》、《张大娘送子参军》、《李小二忆苦思甜》等等方言话剧。方言话剧在形式上也更加活跃，有方言快板、方言小调剧、方言普通话混杂剧。方言话剧的队伍组织，一般都是业余的。

方言话剧的特点，一是群众自我教育自我娱乐。二是素材来自当地，当地人演当地事，群众看得懂，教育作用大。三是工人演工人，农民演农民，民兵演民兵，形象逼真。四是方言话说起来很生动，具有比较浓郁的乡土气息。五是简便节约，不要花什么钱，符合业余剧团办团的精神。只要买几斤煤油，点上两盏汽灯就可以演出，服装道具都是借用或自制的。

（何俊年）

湛卢书院与朱熹

湛卢书院原建于湛卢山剑峰之下。相传南宋大理学家、教育家朱熹仰慕这里的胜景古迹，曾多次来此地游览，后来选址剑峰之下，筑成寓所，署名“吟室”，住下来读书著作，讲学授徒，写了不少赞颂湛卢的诗文。后人把“吟室”改建为湛卢书院。

据松溪旧志载：朱熹因父韦斋公在政和县为官，其祖父朱森死后葬于护国寺附近山中，寺距湛卢数十里，朱熹来往祭扫，建“吟室”于剑峰之下，并寓居于城内，今湛卢书院及文公祠基即其

遗迹。又载：朱熹少时家穷，依父友刘子翬寓居崇安，后迁建阳考亭，又筑室于松溪湛卢山，名为“吟室”。朱熹一生，怀才不遇，弃官讲学，凡名山大川，奇峰胜境，无不登览，其目的并非游山玩水，而是“将以尽天下大观，以蓄见闻，以征著述”。而湛卢又以乃欧冶子铸剑之所而名著闽越之间。这么好的所在，对朱熹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据如今已八十高龄的我省政协常委李含阳同志回忆，他青年时游湛卢山，在“吟室”遗址，还看到一座石碑，文曰“朱子读书处”。还有一石匾额刻着“静神养气”四个大字，系朱熹笔迹，嵌在书院的门顶上，可惜现在都不见了。

湛卢书院的建筑规模虽然不像白鹿洞书院那样有亭、台、楼、阁等建筑物，但也颇具规模。书院屹立在剑峰之下，庄严肃穆，厅堂正中祀朱熹神像，两边配以黄榦、蔡沈、刘子翬、真德秀南宋四大儒。书院的大厅为讲堂，边房为学生宿舍，当时书院课程是教以濂、洛、关、闽之学。书院置有农田收租，作为办学经费和学生伙食费。从此，湛卢书院就闻名四方，远近士子咸集，不仅造就人才，而且使程朱之学传播天下。古人曾描绘当时学子在湛卢书院努力学习和传播古代文明的盛况，谓湛卢书院“乃藏修之得所，常抱膝而长吟。时而玩峰头之月，时而鼓洞口之琴，时而倚檐前之竹，时而听窗外之禽。文射北斗之光，一灯频燃黎火；山擅南天之秀，万象尽罗胸襟”。

湛卢书院自宋朝到现在，更历六个朝代，上下七百多年，兴而复废，废而复兴。每遇名师主持教学，书院就办得十分兴旺。元至顺四年（1333），杨缨担任湛卢山长（即书院院长）。问学者接踵而至，求道者摩肩而候。

元至正十六年（1356），因当时地方官每月初一、十五都要到湛卢山祭祀朱子，往返不便，因而把书院搬到城内县治之右并奏请朝廷赐额曰“湛卢书院”，此时山麓书院改为僧舍，称为

“下祠”。

书院在明、清两代几经兴废，有时在山下办书院，有时在城内设书院。清乾隆十三年（1748），知县潘汝诚好学尊儒，振兴文教，决定既保存在山书院，使好静士子，在那里深造学问，同时又恢复在城书院，使居家童生能就近入学。因此，先把山下“下祠”恢复为“湛卢书院”，又把城南石壁禅寺改为城内“湛卢书院”（即今松溪一中校址）。

湛卢书院历代都培养了大批著名学者或名宦。仅就宋明两代而言，松溪县就出过25位进士，明洪武十八年（1385）出了李俊、江观、易嶙等同榜三进士。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我县魏浚、真宪时同登进士榜。明朝时，松溪总人口不过3.5万多人，然而据不完全统计，宋明清三代松溪籍举人就有51名，进京师国子监的贡生就达345人。其中明朝一代出任为知县的达19人，知事5人，县丞10人。明清两代松溪人在全国各地为官的有355人。

清道光初年，湛卢书院仍十分兴旺。可是鸦片战争之后，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山麓书院逐渐衰败，开始还有残垣遗址，后来渐次湮没于荒草乱石之中了。

（冯顺志）

杨缨与杨氏书室

从松溪县茶平乡吴山头村沿山路走二里许，便到湛卢山剑峰下。这里诸山环列，岩石奇秀，花木交荫，恬静清幽，其中有一遗址——“续贤庵”，又叫杨氏书室。据《县志》载，乃元朝杨缨所建。

杨缨，字绵蚣，号钓溪，于元惠帝至顺四年（1333）从将乐县来松溪就任湛卢书院山长。他是北宋理学家杨龟山七世孙。杨龟山即杨时，他先后学于理学家程颢、程颐门下，同游酢（建阳长坪人）、吕大临（陕西蓝田人）、谢良佐（河南上蔡人）并称程门四大弟子。后人盛传朱熹是龟山先生的学生，其实杨时逝世于公元1135年，当时朱熹才六虚岁。虽然他没有直接受业于杨时门下，但是，杨时归闽后，受业者甚众，胡宪、罗从彦皆是其高徒，后来罗从彦传李侗，李侗再传给朱熹。他们是间接的师生关系。不过，宋代理学首创者是周敦颐，继承和发扬者是二程，南面传播者是杨时，集大成者是朱熹。他们一脉相承，学说基本一致，所以世称“程朱之学”。

杨缨的身世说明杨家和“程朱之学”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杨缨的父亲杨省三在元至正年间又是建宁府学丞，所以说，他们是“理学世家，书香后裔”。

杨缨秉性刚正，聪慧好学，对濂、洛、关、闽之学功底很深，与学者辩论经史，探微扶奥，评人品之邪正了如指掌。善草篆，有虬龙苍松之致。工词赋，有阳春白雪之调。加以教学有方，在他任湛卢山长期间，四方学子来院听道者甚众，有“如坐春风之喻”。杨缨寓居城内寿安坊，常到书院讲学，并捐俸创建“续贤庵”于湛卢山中，置田作为庵堂收入。因慕此山乃欧冶子铸剑之所，朱子杖履存神之地，故名“续贤庵”，俗称中庵，并勒石为记。他享寿82岁，死后葬于杉溪里。松人为纪念他对湛卢书院的贡献，奉祀其神像于中庵。杨缨有克孝、克忠、克思、克智、克廉五个儿子，除三子克思搬回原籍居住外，其余四子都在湛卢山周围繁衍。长子和五子住城内，二子迁东关里吴屯村，四子徙居黄屯、上坑村等。杨缨后代每年春、秋二季，必到中庵祭祖。

明朝正德年间，杨缨的九世孙杨茂，少年时代就以诗文闻名

于全县。当他考中举人，领回赐匾之后，就往湛卢山“续贤庵”发愤读书六年，学识更加渊博。到明正德九年（1514），又考中进士，官至评事，升江西佥宪。可年仅32岁就与世长辞了，著有《湛卢山人集》，现已失传。由于杨茂隐居湛卢山发愤读书，学有成就，对当时全县学子影响很大，大家认为湛卢山山明水秀，是读书求学理想的地方，因此，到湛卢书院和“续贤庵”求学者甚多，在明朝一代出现了许多名臣和学者。

“续贤庵”一直保存完整，但到清嘉庆六年（1801）失火，烧成废墟，仅留下金钟一个，钢炉一口，由吴屯杨姓保存下来。到清同治十一年（1872）四月，由杨钟铭等向本族劝募银元重建。到民国19年又一次再建，并改名为“杨氏书室”。1952年以后，因无人看管，书室遂渐残破，目前还留下一个大石缸、一口香炉和“杨氏书室”的石匾。

（冯顺志）

明末重臣魏浚

魏浚，号苍水，松溪县城关人，明代万历重臣，为官清正，政绩卓著，学问渊博，著述甚多。他出生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从小敏慧，才智超人，四岁能作字对，得到建宁府推官郭子章赏识，把他和晋江县才子苏浚合称“闽中二浚”。万历三十二年（1604）中进士，初任户部观政，后升河南清吏司主事，奉命督理河南、山西两省粮仓，任内革除贪官污吏，用标准衡器收粮，深受群众拥戴。万历三十七年（1609）朝廷赐“清廉宴”嘉奖，并提升为山西省郎中，后调任广西省提学佥事，主持修造桂

林学宫礼器，创办思恩州学。公余常深入山区抚慰瑶、壮等少数民族。不久升江西按察副使、南昌兵备兼管饶九道，当时朱氏皇室淮王在封地私设刑堂强夺民女，专横跋扈，与地方矛盾日益加剧。魏浚查明事实，依法惩办凶犯二人。一王室宗亲，白天公然在南昌大街上抢夺金银，他不顾情面，依法严办。他还四次写信规劝淮王，淮王为他的精诚所感动，终于悔悟改过。万历四十七年廷赐“卓异宴”，并提升他为山东布政司参议。同年他带兵驻防青州，整顿军风，士气振奋，确保地方安靖。天启二年（1622）调任湖广按察使，正遇湖南、贵州和四川边境的苗民与矿工发生冲突。魏浚派人疏导，晓谕大义，恩威并施，制止了一场暴乱。

天启五年，魏浚调任江西省左布政，不久升都察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此时贵州与广西边境告急，他冒暑巡视边境，训练士卒，加强戒备，稳定边境局势。八月他出巡途中，在一座“苍水使者”庙中憩息，见神像面貌衣着酷像自己，知道是当地百姓为他立的生祠。后来，在病中仍感于心不安，对同僚说：“国恩未报，语不及私。”八月二十日病故于公署，终年 73 岁。

魏浚一生俭朴，乐于救助贫困，奖掖后生。他喜读书著述，诗文有盛名，立论精辟，涉猎广博。著有《易义古象通》、《世略》、《武略》、《西事珥》、《峤南琐记》、《东粤事文摘》、《纬谈》、《太乙括元》、《方言据》、《黄颔臆》、《峡云阁草》前后集共十一部一百二十余卷。其中《易义古象通》八卷，被收入清乾隆钦定《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总纂官纪昀给皇帝奏章中对这部书的评价是：“论述精辟，有独特见解，研析颇深，非抄袭雷同者能比。”

为了纪念魏浚的历史功绩，明末松溪人民在松溪城东门头立有魏苍水先生祠，祠门有“三藩总宪”、“百粤文宗”等砖刻题额。该祠迄今保存完好，现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王彦英）

抗倭义士张德

张德是松溪县城关人，明嘉靖年间抗倭死节义士。

张德出生家境贫寒，为人勇武讲义气，胆略过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冬，倭寇自沿海入侵，窜犯松溪。倭寇头目认为松溪县乃一弹丸小城，唾手可得，下书责令松溪县衙，立即献交白银万两，良马200匹，还扬言如果拖延，破城之日，必将斩尽杀绝。城内军民得讯，群情愤慨，同仇敌忾，严阵以待，誓与松溪城共存亡。

倭寇发起强大攻势，凭借云梯、云车，蜂拥上城，且有倭寇数人呐喊舞刀爬上墙垛内，来势凶猛，城关守军惊慌避逃，几乎全线崩溃。在此县城即将陷落的危急关头，义士张德振臂高呼，抡起大斧率先冲向敌阵，将一员倭寇头目砍落城下，接着勇士李仕清、朱蓬毛等人，也同时挥刀冲上，各砍倭寇数人。一时杀声震天动地，敌人乱了阵脚。守城军民士气大振，个个奋勇拼搏，城墙上箭矢石头齐下，炮火猛轰，从早到晚，倭寇死伤惨重。

倭寇多次攻城失败，屡遭重创，佯言撤退。县令王宾信以为真，竟于河边三圣庙设宴送行。张德与范茂先等人深恐有失，一面以士兵扮作县令、主簿宴请倭寇，一面告诫守城军民严加防范。倭寇头目见城内戒备森严，不敢轻举妄动，匆忙献倭刀一把，退席撤围。

倭寇贼心不死，退到河东继续用火铳攻城。第三天，张德在巡逻中不幸中弹牺牲。元月十五日，倭寇探知我援军将到，放火焚烧东岳庙连夜遁逃，松溪军民乘胜追击，把倭寇驱出县境。松

溪城固守40余天，死难军民85人，不但保住了全城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阻敌深入，扭转了闽东北抗倭战局。松溪城得以保全，义士张德之功不可没。正如松溪籍名宦御史中丞魏浚的评价："是役也，摧锋却敌则义士张德……张公一斧，合城老少得保其首领，厥功懋矣！"明万历元年（1573），建宁府推官郭子章来松溪，深为义士张德的献身精神所感动，满怀激情写了《张德传》，将义士张德壮烈殉难的英勇事迹载于青史，永传后世。

（王彦英）

昭阳拾萃



聚奎塔（邵武市）

斗转星移话铁城

邵武，是福建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据1982年和1987年两次大规模文物普查以及考古发掘的大量资料证实，邵武境内有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人类活动遗址120余处，表明早在4000多年前的原始社会，先民们就已经在这块土地上开拓、生息、繁衍。

西周时，这里属扬州七闽地，春秋属越，战国属楚，秦属闽中郡，西汉属闽越国，东汉属会稽郡。

西汉初，东越王余善在闽北筑六城以拒汉，其一为“乌阪城”。“乌阪城”在今邵武市区东北约三华里富屯溪北岸的北平山上。旧志记载，“入闽三道：建州通浙为险道；漳州通海为间道；以邵武为隘道，盖山高水绕，为用武之地”。又记：“邵武地势高峻，山峦重叠，为北闽之咽喉，入赣之孔道”，“居高临卑，屏藩全闽，为古今战事必争之地”。因此，东越王在此筑“乌阪城”，屯扎重兵。

“北平山上越王城，猎骑如云此驻兵”。东越王将重兵屯扎在“乌阪城”以西约10华里的富屯溪北岸，并筑高台以操演和检阅兵马，后人名之为“越王台”，其地亦因之名“越王村”。

“荒台枕古丘，伊昔越王游。辇路今何在？凄凉草树秋。”世远事湮，“越王台”的台亭建筑早已不复存在，但其台址却保存了2000余年，其遗址还常可见汉时遗物。旧志载：“有牧子于此得古瓦，皆罗纹雁翅之状，叩之铿如金石。”1956年，我省考古工作者

对“越王台”遗址进行考察，发现并经考证确认了“越王台”台址。其文字说明颇详尽：“台址是一长方形土堆，高约2米，东西长27.5米，南北宽16米。台地上长满茅草……台址南半段及地表部分被农民垦荒，地表散列绳纹瓦、布纹瓦及一些印纹陶片……1956年4月，试掘探沟2条，得绳纹、布纹、印纹陶及瓦当等物。”

越王台虽已不复存在，但“越王村”的地名却一直沿袭至今。在越王村西面临富屯溪有一片沙洲地，开阔平坦，延绵数里，盛长野草，是当时越王军队放牧战马的地方，故名“养马洲”，至今仍未改名。

三国吴永安三年（公元260），立昭武镇，当年即升为昭武县，乌阪城为县治，属建安郡。昭武之得名，一说以其为无诸用武之地，一说以其地处武夷山之南。《元志略》云：“昭武，抑岂无诸用武之地而称耶？吴之取名，义或在此。”明《嘉靖邵武府志》云：“武者，以其地在武夷山南，古以南为昭，故曰昭武。”

西晋元康元年（291），晋惠帝司马衷为避其祖司马昭之讳，改昭武为邵武。东晋太宁元年（323），改邵武为邵阳（一作武阳）。南朝刘宋永初元年（420），复改为邵武。两晋、南朝时，邵武属江州。

隋朝，邵武先后属泉州、抚州、临川郡。

唐、五代，邵武属建州。

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置邵武军，属福建路，郡城亦由乌阪城迁建于紫云溪之南（即今市区）。翌年，析邵武县之财演镇置光泽县。邵武军辖邵武、光泽、建宁、泰宁四县。

宋建的邵武城西南郊有樵岚山，山麓有溪名“樵溪”，又称“樵岚溪”。《嘉靖邵武府志》：“樵岚之水东下，逾悟空山，逶迤城中”，“（郡城）南纳樵岚之水，曰樵溪”。樵溪水由城之西南入城，逶迤九曲，穿城而过（樵溪水在城内又称“九曲溪”），北出樵溪

门（即北城门），汇入富屯溪。故邵武又别称“樵川”、“樵阳”。

因“乌阪城”为宋以前之旧县治，故郡城迁建后乃被称为“故县”。“乌阪城”于南宋绍兴年间被范汝为农民起义军所毁，但“故县”这一地名一直沿用迄今。

元代邵武为路，属福建道行中书省。至正十八年（1358），改建邵武城，改宋代的土筑城垣为砖石构，但城池范围缩小很多：东、西、南三面均向内缩里许，唯北面临富屯溪一段依旧，仅辟四座城门。

明、清邵武均设府，管辖一如宋、元。

作为八闽屏障、闽北重镇的邵武，“屏藩全闽，为古今战事必争之地”，“自古赣边有警，必先扼守”，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其城池建筑。自元至正间改建邵武城，累石为基，砌砖为壁，明清两朝又不断加固、增高，城垣建筑之规模与坚固程度均为闽北诸城之冠。更兼北临大溪，泱泱天险，易守难攻。故明清时期民间流传一句俚语：“铜延平，铁邵武。”因此，邵武又号称“铁城”。据传说：当年石达开率太平天国军队攻打邵武城，久攻不下，感叹道：“真是一座铁城也！”

民国 2 年（1913）废府，为邵武县。

1983 年，撤县建市，为邵武市。

（傅唤民）

宝严寺大殿

宝严寺大殿，坐落于邵武市区新建路（昔城关北隅宝严坊）。

宝严寺是一座已逾千年的古刹。据《嘉靖邵武府志》载，宝严寺创建于唐大顺元年（890），始名“兴会寺”。五代后梁贞明元

年（915）易名“再兴寺”，龙德元年（921）改“太平兴福寺”。宋天圣元年（1023）为祝皇帝寿，更名“宝严寺”。元延祐间（1314－1320）重建，明嘉靖十二年（1533）重修。

宝严寺是唐代闽北佛教华严宗重要寺庙之一。它以主殿——大雄宝殿为中心，构成规模宏大的建筑群，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阁、经堂、斋堂、方丈室、僧舍及花圃等，殿宇恢宏，布局匀称，高低错落，井然有序。昔“昭阳续八景”之一的“遯园修竹”即在此。

宝严寺现仅存大雄宝殿。大殿建筑造型别具一格，保存了唐、宋、元、明几个朝代的建筑风格。大殿为重檐歇山顶，平面呈正方形，面宽进深各五间，面积400平方米。殿内36根大立柱，其中明间4根金柱的覆莲盆石柱础，系唐代原物，其余方形石柱础为宋代遗物。大殿结构全部采用拼合梁栿，铺作系单抄双下昂，柱头铺作用直昂，外檐补间斗拱里转用上昂，阑额转角出头。当心间藻井，其余各间系平棋藻井。部分大杉木柱及前檐梁栿保留宋代原件。全部斗拱和梁架结构均为明代改建，斗拱呈莲花拱托，具有明显的明代建筑的特征。外檐前两侧檐柱上的象鼻斗拱，是明代具有浓烈的邵武地方特色的建筑构件。殿内主梁上尚遗存墨书“上祝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和“大明嘉靖拾贰年癸己岁贰拾贰日己卯吉时重新鼎建”的题记。全部梁栿斗拱上均彩绘佛像、花草、飞禽走兽以及几何图案，至今仍清晰艳丽，保留着历史原貌。这些彩绘系明代著名画家严宗儒、上官伯达手迹。严宗儒、上官伯达均邵武人，名载《中国绘画史》。严氏工佛像。上官氏为宫廷画师，明永乐迁都北京时，他为宫中画一幅《百鸟图》，一百只鸟神态各异，无一雷同。民国期间，国民党邵武县党部曾设于此，用石灰将所有彩绘刷盖。1981年修缮时，乃小心翼翼将石灰层刮剥，使之重见天日。

宝严寺大殿气势嵯峨，雄伟壮观。其建筑结构严谨、巧妙，如此巨大一座建筑，竟然没有使用一颗钉子，完全依靠榫卯拼合而成，充分显示了建设者的高超技艺。宝严寺大殿是闽北仅存的代表江南风格的最古老寺庙建筑，在全省亦属罕见，也是我省古建筑保留宋、明纪年题记的惟一保存者，是研究闽北地区唐宋元明几个朝代建筑风格过渡的仅存实物例证，为研究我国南方古建筑艺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标本。

宝严寺还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邵武工农政权的旧址。1932年10月22日，中央工农红军一军团二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谭震林率部首次解放邵武，县革命委员会、县苏维埃政府即设于此。

正因如此，宝严寺大殿于1981年列为邵武县第一批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于1985年10月列为福建省第二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现为市博物馆馆址。

（傅唤民）

李忠定公祠

李忠定公祠，全称“丞相太师忠定李公祠”，俗呼“李公祠”、“李纲祠堂”，在今邵武市区新辟之“李纲路”，昔城内九曲溪（即樵溪）之五曲畔，为古“昭阳八景”之一的“五曲精庐”，奉祀抗金民族英雄、南宋开朝宰相，史称“出将入相，南渡第一名臣”的李纲。

李忠定公祠创建于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位于军学讲堂之东，为教授徐元德等人所倡建，朱熹撰《建祠碑记》并书匾“一

世伟人”，题联“至策大猷，奠宗社于三朝；孤忠伟节，垂法戒于万代”(原碑、联今俱已佚)。祠后毁于兵。景定间（1260—1264），移建于城东行春门外。元至正十六年（1356）又移建于樵溪书院。明洪武二年（1369）改书院为府学，祠废。正统四年（1439）复建于府学大成殿之东，学士王直有记。成化六年（1470），移建于樵溪四曲之滨，学士柯潜有记。嘉靖四十三年（1564），又迁建于南门上水寨之白莲塘。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复建于今址（五曲精庐原址）。乾隆三十年（1765）、道光十五年（1835）及1929年、1938年均修缮过。解放后，曾先后作为昭阳小学、实验小学、工农兵小学、六中校舍。1981年列为邵武县首批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由县文管会收回修葺，翌年竣工，保留清康熙间建筑的门厅、正殿、偏殿以及庭院等建筑原貌，辟为“李纲纪念馆”。1991年3月，该馆被福建省人民政府列为福建省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李忠定公祠”匾额系原全国版画协会主席汪刃锋题写，“李纲纪念馆”匾额由前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题写。

（傅唤民）

朱熹题写“鸢飞鱼跃”

邵武市博物馆收藏有一方木匾，镌刻着朱熹题写的“鸢飞鱼跃”四个大字，上下题款及印章都很齐全，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这方木匾是50年代县文化馆从城区天后宫一民宅中征集所得。当时，木匾的主人曾讲述了它的来历。

南宋淳熙年间，朱熹来到邵武，在邵武军军学讲学，同时，与

教授徐元德等人一起倡建“丞相太师忠定李公祠”(即李纲祠)，还亲自撰写了《建祠碑记》，并为李纲著作《梁溪集》作《序》。因为天后宫离军学很近，朱熹就寓居在天后宫一户姓朱的人家。这家人很钦佩朱熹的学问才华，对朱熹非常尊敬，朱熹待人又相当和气、热情，因此，他们之间关系十分融洽。由于同是姓朱，他们便联了宗，认了本家，可谓亲如一家人。

天后宫这户朱姓宅第有座后花园，满园奇花异卉，翠竹幽篁。园中一个大池塘，塘上水榭廊桥曲曲折折，塘边亭阁雕梁画栋，景色十分怡人。

一个秋日的中午，主人在后花园亭阁中宴请朱熹。酒酣之际，朱熹步出亭阁，走上水榭，凭栏四望，但见凉风习习，花香扑鼻，天上飞鸟翱翔，池中游鱼跳跃，令人心旷神怡、物我两忘。朱熹望着眼前的景致，沉吟了一阵，忽然雅兴大发，快步回到亭阁内，向主人索要笔墨纸砚，主人赶忙取来。朱熹趁着酒兴挥毫写下“鸢飞鱼跃”四个大字，题好上下款，然后取出几方图章，小心翼翼地钤盖妥当，把这幅字送给了主人留作纪念。主人得到朱熹手迹，如获至宝，马上请来工匠，挑选最好的木料制成匾，将朱熹题写的这幅字镌刻上去悬挂在亭阁中。

此后，这户人家子子孙孙都十分珍视这方匾。七百多年过去了，房宅建筑已不复存在，但这方匾却保存得相当完好。

（傅唤民）

严羽与钓鱼台、诗话楼、沧浪阁

钓鱼台、诗话楼和沧浪阁，都是南宋著名诗论家、诗人严羽

的遗迹或纪念建筑。

严羽，字仪卿，又字丹丘，邵武莒溪人（今拿口镇界竹村严坊）。因莒溪之上有条叫沧浪的小山溪汇入，严羽隐居不仕，故自号“沧浪逋客”。《沧浪诗话》为其代表作，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诗证”五门，极力推崇盛唐诗歌，主张以之为诗歌创作的宗法。他自成诗派，大胆地违背儒家诗教，以禅喻诗，强调“神韵”、“妙悟”，提倡兴趣、美感，针锋相对地抨击苏轼、黄庭坚及当时对文坛尚有一定影响的江西诗派注重说理而忽视意境的创作方法，托古改诗风，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沧浪诗话》见解清新独到，对明清两代的文学创作影响甚巨，与袁枚的《随园诗话》同为我国古代最有影响的“诗话”。故严羽以一介布衣而蜚声古今，名扬中外。

公元1232－1238年间，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的门生、浙东天台诗人戴式之任邵武军教授，严羽常与他论诗、酬唱于邵武城东北隅的“望江楼”。严羽治学严谨，品行高洁，邵武军知军王野站在江西诗派立场上反对严羽的诗论，作为布衣的严羽不避权贵，抗颜力争，“虽获罪于世人君子不辞也”。尽管严羽在学术上与王野意见分歧，但当王野为维护治安冒险犯难时，严羽却写诗赞扬王野。

严羽不满现实，隐居不仕，但“忧国忧民之意每见于诗”。他既习文，又习武，在元军入侵、民族危亡的关头，毅然投笔从戎，在两淮制置使杜庶（邵武人）的部将吴会卿部为幕僚，曾“三年走南复走北”，“杀强虏，举鞭直解扬州围”，立过战功。他也曾负伤还乡养病，嗟叹“宝刀挂壁无所施”，“壮心犹存兴寂寞”，幻想“吾将抱愤愬玉帝，手持此剑上天飞”，盼望中兴之情跃然纸上。

后因杜庶遭奸相贾似道挟私杀害，作为杜庶乡人、故友的严羽只得远逸方外，避地江楚，宋亡后竟不知所终。因此，严羽的

诗作大部散佚，元至元间邑人黄公绍搜而集之，仅存130余篇，辑为《沧浪吟》。

钓鱼台，亦名紫云台，东距沧浪阁约百米，石矶砌为平台，俯视清流，可坐以垂钓。严羽不满南宋朝廷的腐败无能，故意颠倒寒暑，于盛夏酷暑反穿羊裘垂钓于此。他自己亦曾赋诗咏记其事："郁郁驱俗流，悠悠叹乱离。羊裘终隐去，渔钓复何之？"今钓台石矶仍残存。

关于严羽于炎炎夏日反穿羊裘在钓鱼台垂钓，还有一则民间传说：

一天傍晚，严羽扛着鱼竿从钓鱼台回家，迎面遇上了县太爷。县太爷喝得醉眼蒙眬，拦住严羽，问："你是读书人，国难当头，不思报国，竟然六月天身穿羊裘，终日垂钓，是何居心？羊裘乃是胡人的服装，你一年到头羊裘不离身，是希望元兵早日到来吗？"严羽反诘道："老爷你是朝廷命官，吃的是皇家的俸禄，花的是百姓的银子，不思报效国家，不问百姓疾苦，只知道天天醉酒，是何居心？如今朝廷无能，官府腐败，以至于日月颠倒，寒暑不分，我六月天穿羊裘何错之有？"县太爷无言以对，只得悻悻而去。

诗话楼，原名"望江楼"，在邵武城关东北隅，高踞城墙之上，俯瞰富屯溪。楼高十余寻，登之可望十里。因檐牙三重，故又名"三滴水楼"。始建于南宋绍定年间。绍定至嘉熙间，严羽常与戴式之论诗酬唱于此楼。清顺治四年（1647），户部侍郎周亮工以按察使入闽，祀严羽于楼中，并以严羽著《沧浪诗话》而易名"诗话楼"。

沧浪阁，俗称"八角楼"，在邵武市区西隅熙春山东北麓的富屯溪畔，始建于明万历间，原系"万年桥"南端桥头堡。清雍正初，邵武知府周伟为纪念严羽而定名"沧浪阁"，为昔"昭阳八景"之一的"跨虹杰阁"。乾隆五年（1740），因重建石桥，原阁

随毁，十四年复建。1981年列为邵武市首批文物保护单位。

（傅唤民）

南宋黄涣“重见天日”

1998年11月上旬，邵武市水北镇故县村发现了一座南宋古墓，省、市文物部门进行了为期五天的抢救性清理，出土了一具古尸和一批珍贵文物。

这座古墓的墓主黄涣（1147—1226），字德亨，宋邵武军光泽县人，淳熙五年（1178）31岁时中进士。他世代都住光泽游塘，到他祖父时才迁到邵武城里。黄涣天资特别聪颖，从小读书就能心领神会。他哥哥黄谦，是朱熹的学生，受到朱熹的亲自教授和熏陶，回到家就把在朱熹那儿学到的知识给家里人讲述。黄涣不仅积累了兄长传授的知识，而且很早就拜在东莱太史吕祖谦的门下，吕祖谦一见到他就刮目相看。后来张轼（号南轩，抗金将领张浚元帅之子）担任严陵地方官，与吕祖谦一起讲论学问，黄涣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知识。

黄涣最初担任滁阳教授，后又升为太学博士。先后在赣州、婺州等地任职。他一到赣州任上就兴利除弊，坏人望风逃遁。他理政勤谨，冤案尽皆平反。在财政管理上，他首先减免赋税，节省开支，财政往往有节余。在婺州任职时，有七个县的小户人家多年积欠赋税累计几万缗，州里依旧催逼，他极力请求宽限，没有获准，就自己行文各属县暂缓，郡守也无奈，只得全部蠲免。嘉定二年（1209），由尚书汪逵、章颖、邹应龙和中书余崇龟等人举荐，他出任岳州知郡。他一到巴陵，就考虑到这地方濒临大湖，耕

地少，百姓贫穷，就先给郡县行文，计算出不必要的开支，杜绝浪费，同时放宽征税期限，有些赋税免掉。岳阳有些恶棍假借洞庭神祠恐吓行船的人，他把首恶分子逮捕绳之以法，得到当地百姓的拥护。侍郎赵彦曾上书赞誉他："穷益坚，老益壮。"

（傅唤民）

聚奎塔与袁崇焕

聚奎塔，亦称"奎光塔"，俗呼"聚光塔"，在邵武市和平镇东南三华里的天符山（水口山）。

聚奎塔平面呈六角形，五层，砖木石混构。砖木石混构的古塔殊为罕见，是古塔建筑艺术的奇葩。

聚奎塔每层均辟一顶门，各层门朝向各异，门楣均有题额，由上至下分别镌刻"层峦耸翠"、"雄峙中区"、"一洞玄朝"、"昼锦锁钥"，底层门额则是阴刻行楷，系袁崇焕题写的塔名，全文为："天启元年秋月吉旦　聚奎塔　赐进士第知邵武县事袁崇焕立"。各层的其余五面均外辟拱顶窗龛，龛内砖质浮雕神佛像，龛顶砖雕花草图案。每层塔檐均用麻石出水达2米，走出门洞可于石檐板上绕行一周。塔内沿壁嵌砌石磴旋梯达顶层。楼板及桁条均为木质。内壁亦每层各辟一朝向各异的壁龛，均有题刻，自下而上分别镌"一柱擎天"、"慈悲普渡"、"三元昭应"、"文昌拱照"、"玉铉上映"。

邵武市现存两座古塔。灵杰塔建于明万历年间，其建造始末，旧志记载颇详。惟聚奎塔的建造，旧志未见片言只字，故其创建和竣工的确切时间无法确认。1991年在修缮聚奎塔时清洗塔门门

额，现出天启元年袁崇焕的题刻，才认定该塔建于明末。据《邵武文史资料》载：聚奎塔始建于明万历四十四年，竣于崇祯初，系黄峭后裔黄六臣及其子黄穆生所建。

聚奎塔由于袁崇焕题写塔名而身价百倍，不断有各界人士前来观瞻，还引起了有关专家学者高度重视，多次专程前来考察。

袁崇焕，字元素，广东东莞人，明末著名军事家、民族英雄，生于万历十二年（1584），卒于崇祯三年（1630）。《明史》载：袁崇焕“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授邵武知县。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阨塞情形，以边才自许”。他在邵武任职时间虽不长，但政绩卓著，深得民心。清咸丰五年版《邵武县志》云：袁崇焕“知邵武县，明决有胆略，尽心民事，冤抑无不伸。素矫捷有力，尝出救火，着靴上墙屋如履平地”。天启二年（1622）正月，袁崇焕进京朝觐，由于御史侯恂举荐，被破格提拔为兵部职方主事。此后，他一直在北方戍守边关，战功赫赫，官至兵部尚书。由于崇祯皇帝听信谗言，将他以车裂之刑残酷杀害，天下之人尽皆为其鸣冤。袁崇焕死后，戍边无人，以致吴三桂大开关门，遂使清军长驱直入，明朝终于灭亡。

（傅唤民）

源远流长的傩舞

邵武的大埠岗镇与和平镇的一些乡村，流传着古老的民俗文化活动——傩舞。

傩舞是一种面具舞蹈。“傩”者，除也。古人在岁末迎神驱邪，傩舞是祭祀仪式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论语·乡党》中就有

“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阶阼”的记载。汉代傩舞演变为宫廷的“方相舞”、“十二神舞”等大型舞蹈。唐、宋之际，傩舞成为人们在迎神赛会中娱神和自娱的民俗活动。中原文化进入福建后，傩舞便在闽北各地得到传承，流传在邵武的傩舞即是这种传承的典型体现。

傩舞活动与宗教关系密切。过去经济文化落后，医疗卫生条件极差，农村经常瘟疫流行，人们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祈求神灵佑助。以傩舞娱神驱疫，虽然出于迷信，却也使得傩舞这一古老的民俗活动赖以保存下来。

邵武的傩舞，大埠岗镇河源村叫做《跳幡僧》、《跳八马》、《跳弥勒》，和平镇坎下村叫做《跳幡僧》、《跳弥勒》。此外，还有与之相邻的泰宁县朱口镇、建宁县溪源乡的《跳五神》、《跳八仙》等。傩舞的活动时间因所祭祀神的“生日”不同而异，有在农历正月初举行的，也有在元宵举行的，还有在五月和八月举行的。

傩舞的面具有两种，一种是由半片状木雕而成，一种由简状纸糊而成。《跳弥勒》的面具是一“弥勒公”，一“弥勒婆”，面目都笑容可掬；《跳八马》的面具是开路神二，弥勒二，黑脸绿脸各二，除弥勒外都是面目狰狞、獠牙外露的可怖形象；《跳幡僧》的面具是开路神一、弥勒一、唐僧师徒四，开路神与弥勒形象如《跳八马》，唐僧师徒则仿效舞台戏剧脸谱形象刻制而成。他们还要各扛一写有“经”字或钉有经书的布幡，以示取回真经可以驱邪。

傩舞的跳法以集体舞为主，个别领舞为辅，程式基本一致，以弓步、跨步转身为主，加有类似猫步的拗步行进，作八卦方位的队形变化。舞蹈伴奏只有锣鼓。锣只起烘托作用，与舞步无关。故有“你打你的锣，我敲我的鼓”之说。

邵武傩舞（乡民不称“傩”，面以节目名称直呼）过去都直接或间接与驱疫逐鬼有关，是人们战胜瘟疫的期望，是与古代的

“大傩”和“乡人傩”一脉相承的。过去在南平、建瓯、松溪、政和以及三明市的泰宁、建宁均有傩舞流行，现在多数地区已失传。如果对其进一步发掘整理，摒弃其迷信色彩，定然可以重新展现古代“大傩”神韵，成为闽北宝贵的民间民俗文化财富。

（杨慕震）

黄峭后裔满天下

黄峭（871—953），讳岳，又名峭山，字仁静，号青冈，邵武人。他初佐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为千夫长，因功擢为千户侯。后唐庄宗时任工部侍郎，因见复唐无望，乃绝意仕途，弃官归隐，在家乡邵武和平创办“和平书院”，造福桑梓。他娶三妻：上官氏、郑氏、吴氏，三妻各生七子，共二十一子。后周广顺元年（951），黄峭八十寿诞，大会姻亲，召命诸子：三位夫人名下仅各留长子侍奉晨昏，其余一十八子，俱各迁徙异地，自创家业。他告诫诸子说：“古人有多寿则多忧，多男则多惧的说法。你们兄弟二十一人，吾拟在三房子媳中，各留长子侍养双亲，余十八子各给马一匹，家谱一套，钱财一份，信马所至，择地而居。”并口占一诗以赠别：“信马登程往异方，任寻胜地振纲常。足离此境非吾境，身在他乡即故乡。朝暮不忘亲嘱咐，春秋须荐祖烝尝。漫云富贵由天定，三七男儿当自强。”此诗名《嘱子奔腾诗》，又称《谥子诗》，俗称《外八句》、《上马诗》。后各支派后裔均将此诗收入族谱，世代相传，并以此诗作为祭祖、认祖的凭据，故后人又将此诗称为《认祖诗》。海内外黄姓人士，凡系尊认黄峭为开基始祖者，大多能背诵此诗。

黄峭的二十一支子孙后裔遵从黄峭的遗训，散处各地，摒弃“富贵由天定”的唯心论，保持“三七男儿当自强”的优良传统，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断地在海内外开拓发展，创立家业，而今子孙后裔遍布海内外。香港奔马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的《黄氏统宗世谱·黄峭历史考证》云：“近千年来，黄峭后裔遍布江西、浙江、江苏、湖南、福建、广东、台湾、广西、四川诸省和东南亚各国，人口已达数百万矣！以上各支黄姓人家，公认黄峭为入闽开基大始祖。如福建、台湾著名的‘紫云黄氏’后裔，尤以峭公为传世祖而荣耀！”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的传统习惯总是子孙承袭和依靠父辈的福荫、父母为子孙营造安乐窝。“父母在，不远游”，是从孔夫子传下来的传统观念。而黄峭却能意识到“多寿多忧，多男多惧”，意识到“燕雀恰堂而殆，鹪鹩巢林而安”，摒弃传统观念，告诫子孙“漫云富贵由天定，三七男儿当自强”，教育后人自强自立，不袭父荫，放子孙远走他乡，自己去开拓发展。这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即使在今天也仍然不失其积极的社会意义。

邵武市和平镇坎头村上井，是黄峭的故里。和平，旧作禾坪，昔亦称昼锦。黄峭是闽、粤等省及东南亚各国诸多支黄姓宗族公认的开基大始祖，但其入闽始迁祖，则应追溯到黄峭的高祖黄膺。黄膺，字庆肇，原居河南光州固始，唐季随王潮入闽，卜居邵武仁泽乡平洒村，以五经课子，显传于世，号“五经先生”。三传至黄峭之父黄锡，由平洒迁禾坪鹧鸪（今和平镇坎头村一带）。

今黄峭桑梓地尚存黄峭墓、黄锡墓、黄峭三位夫人墓、“黄氏峭公祠”、“和平书院”等文物。

近年来，大陆各省和港、台以及东南亚各国不断有大批黄峭后裔前来寻根认祖，祭祠扫墓。尤其是每年清明前后，各省黄姓纷纷组织“谒祖团”前来，每年这几日通往和平的公路上车水马

龙，络绎不绝。

（傅唤民）

“上寺倒了金刚，下寺出了李纲”

李纲，字伯纪，号梁溪，谥忠定，邵武庆亲里人。其故里即今邵武市水北镇一都村李家坊，昔称李家弯，距市区东北约20华里。

宋时邵武县置左、右二“厢”、东、南二“尉”及永城、仁泽、昼锦、仁荣、富阳五“乡”，“乡”以下设“里”，庆亲里属仁泽乡。明洪武初开始设“都”，折二十一“里”为五十三“都”。《庆亲里李氏宗谱》云：“宋子巽公（李纲五世祖）仕闽至邵，退处樵东，其所居即今之一都庆亲里是也。”民国重修《邵武县志》载：一都辖二十一村，有故县、将军排、李家坊、上陂、将渠、谢家等。其中李家坊即昔之李家弯，今属一都行政村。

邵武民间流传一则“上寺倒了金刚，下寺出了李纲”的传说。

上寺、下寺，均在李家坊附近。上寺在李家坊往上不远的一座山上。距李家坊不及500米的一座土岗上也有座寺庙，名“兴圣院”，俗称“下寺”。传说李家弯有个土财主，仗着财多势大，欺压乡民，无恶不作。他借口上寺的一尊金刚托梦给他，要他每月向乡民收敛巨额香资。乡民们明知这是他编造假话搜刮钱财，却又奈何他不得，以至于家家绝粮，户户断炊，怨气冲天。太白金星云游经过李家弯，见到这股冲天怨气，决心查个水落石出，便化作一位过路的老翁，向乡民们打探。太白金星打探明白，正要处分这事，见一位星宿匆匆而来，太白金星与他非常稔熟，知道他是一位刚直不阿、一身正气的星宿。太白金星问道：“如此匆匆

欲往何处?”星宿告诉他：“此地李家弯有个叫李夔的，夫人吴氏身怀六甲，即将临盆。玉帝命我速去他家投胎，将来要救百姓于水火，解国家之危难。”他问太白金星为何在此，太白金星说了事情的原委。星宿听罢，怒不可遏，说：“我要投胎此处，将来就是我的家乡，我岂能眼看乡亲们受苦？待我了结此事，再去投胎还来得及。”他使出神通，但见霎时狂风暴雨，电闪雷鸣，一道闪电过后，“轰”地一声巨响，上寺那尊金刚倒地，成了一堆黄土。“没了这金刚，看你还如何敛财！”说罢，转身往那李夔家里奔去。那吴氏夫人正熟睡，梦见一天神撞入腹中，惊醒过来，但见红光满室，异香扑鼻，一阵腹痛，只听得“哇”地一声儿啼，一个男婴呱呱坠地。此时，外面已是雨停云散，红霞映天。李夔为这婴儿取名李纲。

上寺金刚倒地，下寺李家婴儿诞生，此事一传开，人们都惊异不已，于是纷纷传说：“上寺倒了金刚，下寺出了李纲。”

传说毕竟是传说。事实上，李纲并不是在家乡出生。北宋元丰六年（1083），其父李夔在秀州华亭（今上海松江）任县尉之职，是年正月十二日，李纲生于华亭官邸。

今李纲故里一都李家坊一带已没有多少李氏后裔住居，但尚存李纲祖父李赓、继祖母卢氏夫人、饶氏夫人和李纲妻子张氏秦国夫人的茔葬。

（傅唤民）

惠应祠李纲祈梦

邵武与光泽交界的大乾村，有一座古老的庙宇，是纪念隋朝

末温陵太守欧阳祐的祠庙。据史料记载，温陵太守欧阳祐于义宁初官满西归，船行至大乾，落水身亡，乡人收葬于大乾，并建了一座祠，名“欧阳太守庙”。很多当地人到这庙里祈梦，极其灵验，故又名“惠应祠”，也称“惠应庙”，宋朝嘉定年间加封为“福善王庙”。现在是邵武市文物保护单位。

民间流传着一个李纲到惠应祠祈梦的故事。

李纲小时候在邵武读书，听说不少人到惠应祠求梦，都很灵验，就和几个同窗好友一起来到惠应祠。他们各自点燃一炷香，然后默默祈祷一番。晚上，几个人就睡在庙里。夜里，李纲梦见自己用手抠下自己一颗眼珠子，使劲一甩，那眼珠子就贴在大殿的木头柱子上。他醒过来，不理解这梦是什么意思，问其他几个同学，谁也解不出。第二天早晨，李纲把梦的内容告诉了庙祝。庙祝微笑着说：“眼珠子是目，柱子是木，目加木是个相字。相公将来要当宰相。”果然，李纲后来中了进士，当上了宰相，抗击入侵的金兵，成了万古流芳的民族英雄。

这事流传开来，人们更加相信惠应祠的灵验，更多的人跑去求梦。因为大乾离城里太远，人们去那里求梦很不方便，于是又在邵武城西门外的熙春山上建了一座“惠应行祠”。成为熙春山上重要景观之一。

（傅唤民）

“油米石”的传说

邵武熙春公园大门内有一块形状怪异的黑色巨石，镌刻着“油米石”几个大字。关于“油米石”，有一则神奇的传说。

旧时，邵武城东有一座东岳庙，庙内供奉着一百零八尊菩萨。一副“好大胆，敢来见我；快回去，恶事莫做”的醒世楹联悬挂在庙门口。每年农历四月廿一、廿二日，虔诚的香客们成群结队前来朝拜，香烟袅袅，热闹非常。明朝时，邵武城守将张巡在庙内建“睢王殿”和“奈何桥”，掘土发现一块奇形怪状的黑色巨石，难以移动，于是就在这怪石的旁边种花植树，花木茂盛非常。一天，怪石的孔洞中忽然流出油和米，此后天天不断，每天都有油和米流出。每天流出的油和米恰恰够庙中的僧侣们一日之食，不多不少。人们都传说这庙里的菩萨灵验，从此香客陡增，香客们争着讨一些油米回家，家人都尝一点，以求得菩萨保佑，家人平安。讨要油米的香客一天比一天多，贪婪的庙主暗忖：“何不将洞孔凿大，油米倍出，自食有余，售与香客，换取银两。”于是请来石匠，凿大了洞孔。岂料，油米从此点滴不出，庙主后悔莫及。自此，东岳庙香客日少，庙景逐年衰落。为警戒贪得无厌者，人们将此石取名“油米石”，又镌刻了“油米石”三个大字。

民国期间，东岳庙被拆除建学校，东岳庙已不复存在。50年代建熙春公园时，油米石被移入公园，立于大门入口处供游人观赏。

（傅唤民）

望江狮子

邵武城南关外的鹿口溪畔有一尊石雕狮子，雕的是一只雄狮和一只幼狮，雄狮蹲坐着，爱怜地抚摸着幼狮，那神态真是活灵活现。这尊石狮叫“望江狮子”。它的来历还有一段挺感人的传说呢！

宋朝时，南关外住着一位员外。这员外读过一些书，凡事都讲究礼教，只是为人过于拘泥。一天，他和怀有身孕的妻子在床上睡觉，妻子睡在里边，他睡在外边。妻子醒来要起床，见员外睡得正香，不敢惊动，于是从员外身上跨过。员外还是被惊醒了，看见妻子从自己身上跨过，认为有损男人的尊严，妻子没有妇德，大怒。一纸休书，把妻子赶出了家门，任凭妻子怎样求情也无动于衷。妻子被丈夫休出家门，又羞于回娘家，走投无路，于是投河自尽，被一个江西木匠路过看见，救了起来，带到江西去了。这女人到江西不久，生下一个男孩。这孩子聪明过人，读书又刻苦用功。十年寒窗后进京赶考，金榜题名，中了进士，衣锦还乡，回到了江西。母亲告诉了他的身世，要他回邵武认自己的生父。他来到邵武，找到这员外。员外虽明知他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但自觉无颜，不肯相认。儿子无奈，只好仍旧回江西去了。员外虽然没有认儿子，但总是自己的亲骨肉，心里免不了时时想念。后来年纪一大，一个人过日子，孤苦伶仃，形影相吊，更加思念儿子。为了寄托这种思念之情，他雇请石匠，雕凿了一尊雄幼连成一体的石狮子，安放在河边，面对江西方向，并取名“望江狮子”，谐音“望江思子”，寓意远望江西，思念儿子。

现在这尊石狮已收存在邵武市博物馆。

（傅唤民）

邵武端午龙舟竞渡

端午龙舟竞渡，邵武俗称“划龙船”、“赛龙船”，是以城门区域或坊、铺为单位由民间自发组织的。邵武城有东、西、南、北

四座城门，因南门不临富屯溪，不通舟船，因而既没有龙舟，也从未参加龙舟竞渡。东、西、北三门和东关外的进贤坊、遵道坊以及码头均有置龙舟。龙舟都是特制的，专供端午节竞渡之用，分为龙头、龙身、龙尾三部分。船体为“龙身”，底部制成尖形，外部用油漆画龙鳞。龙头、龙尾系另外雕制而成，可以随时安装和拆卸。龙头雕有龙角、龙须，口中含有一活动的龙珠，其雕工精巧，栩栩如生。各艘龙舟都分别以三国人物命名并漆成相应的颜色：刘备、黄忠均为黄龙，关公为赤龙，张飞为黑龙（又俗称黑龙舟为“腌菜兜”），赵子龙为白龙。还曾有过以诸葛亮命名的龙舟，船体画八卦。邵武地方崇尚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尤其崇敬关羽的义气，称呼关羽为关帝。龙舟竞渡亦倡导友情、义气，犹如刘关张异姓兄弟情义笃深，故而以其人命名龙舟。

每年农历四月底，龙舟都要重新油漆。五月初一安装龙头、龙尾、龙舟下水。龙舟下水须“祭龙头”，也叫“拜三牲”，即点燃香烛，放鞭炮，以鸡、鸭、猪三牲和酒祭奉神灵。先是上水祭，即龙舟上行至河流转弯处的河滩上祭供，再下水祭，即下行到东门大石前祭供。每艘龙船两边船舷各配备十六名划桨手，船头一人敲锣，船中间一人击鼓，船尾一人掌舵，共三十五人。龙舟一下水即要开始唱号子，由击鼓者领唱，众水手附和，伴着锣鼓的节奏唱。划桨手们划桨的节奏统一和速度快慢也全凭鼓点的指挥。

初一至初四，各龙舟自己进行训练，初五正式竞赛。赛前，水手们要食“姜糖水”和“乌饭”。此外，还要准备糖水和凉粉（粉干）给念弥陀的老太婆们吃。

参赛的龙舟先要集中到北门龙王庙前祭龙王（北门外原有一龙王庙），念弥陀的老太太们集中在龙王庙念《龙王经》和《五谷经》。

《龙王经》仅只在龙王庙前念，《五谷经》则要随处去念。明

《嘉靖邵武府志·风俗》载：邵俗“力农重谷”。端午节祭龙王也要念《五谷经》，都是“力农重谷”、“以农为本”在节俗中的反映。

赛龙舟的地点在北门至东关外三公桥附近的关门滩一段河上。或顺水赛，或逆水赛，或先顺水下行到关门滩再调头逆水上行至北门，在河岸插旗为起始点的标志，设有裁判评定胜负。竞渡时龙舟上敲锣击鼓唱号子，龙舟竞渡除了速度竞赛外，还有称为“丢鸭子、抢鸭子”的博采：将鸭子丢入河中，龙舟划到鸭子附近，水手们跳入水中抢抓，抢得鸭子多者为胜。“抢鸭子”的博采都是在东门大石前一段河面宽阔水势平缓的地段进行。

端阳日龙舟竞渡正式结束后，初六至初九这几天则可随便自划自赛，初九卸下龙头、龙尾，将龙舟收存。

邵武属古越地，古越以龙为图腾。嘉靖《邵武府志》云：邵武“于楚为近”，“闽楚杂俗”，楚地五月初五龙舟竞渡以纪念屈原。古越族的龙图腾祭祀和楚地纪念屈原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内涵融合，又糅进祈求龙王保佑地方平安、免遭水患旱灾和祈求五谷神保佑五谷丰收、子孙繁衍等内容以及“以农为本”、“力农重谷”的思想，重友情讲义气的传统道德伦理观念，由此形成邵武龙舟竞渡的全部文化内涵。

（傅唤民）

“闽酒当以此为第一”

有这么一则民间传说：古时候，邵武城里有一位名叫田父的老翁，酿得一手好酒。铁拐李云游经过邵武，喝了田父的酒，到

王母娘娘的蟠桃会上再喝酒时，大叫："还不如田父的酒好喝！"王母娘娘命他与太上老君下凡向田父沽酒，田父送了一坛给他们。铁拐李要与田父叙几句旧，让太上老君带着酒先走，等到铁拐李回到蟠桃会上，那坛酒已被众神仙喝得差不多了。他大为恼火，抄起拐杖朝酒坛打去，坛碎了，坛中残剩的酒流下来，落入邵武城，变成邵武城内的九曲溪。

传说自然不足信，但邵武历史上出好酒却是有据可考。明末监察御史后仕清为户部侍郎的周亮工于清顺治四年（1647）以按察使入闽，著《闽小纪》，内有这么一段记载："予过邵武拿口，高主崇政馈余酒一经（注：经，酒瓶），淡而有致，与罗家错认水无异。闽酒当以此为第一。"

邵武农家素有自酿糯米酒的传统。凡遇婚庆寿诞，必预先酿酒，入冬后更是家家户户必酿酒，且多在冬至日酿造，以备春节之需。清咸丰五年版《邵武县志》载："邵武产酒，有时酒、中酒、冬酒，又有双夹酒，俗名窖酒。"清代宋祖谦有《闽酒曲》诗："双夹、邵春香味多，映卮未饮面先酡。家家岁底火烟发，留酌元春贺客过。"其诗原注："以酒酿酒曰'双夹'，樵川（邵武的别称）人多制之。一名邵春，酒色深红，岁首用以酬客。"又有邑人张孟玫诗："冬至新炊白糯香，双投酒熟内家藏。明年浴佛时前后，许破泥头涤盏尝。""村醪如水说南门，五斗岂堪供奉吞。倘是三丰仙去后，方传粒米至今存。"

从宋祖谦的诗注看，"邵春"当是今天的红酒无疑。邵武红酒素负盛名，过去福州人家中有孕妇者，大多要买一坛邵武红酒回去供产妇坐月子时食用，盖因红酒有活血补血之功效，尤适宜产妇食用，同时，邵武红酒又是烹饪菜肴的极好佐料。至今邵武东区的洪墘一带农家仍保留酿造红酒的传统。

邵武南区的和平、大埠岗一带农家自酿之酒，则系用糯米蒸

熟，凉后拌入酒糌，再掺进凉开水，发酵成酒后过滤，装入酒坛，封好口，将坛置于谷壳或锯木屑中，以文火慢慢煨，这道火煨的工序，邵武方言为“焖酒”。这种酒，邵武人称“水酒”。滤出水酒后的酒醅，还可以加糌再蒸，又能蒸制出烧酒。蒸过烧酒的酒醅才成了酒糟。这就是宋祖谦所谓的“以酒酿酒”。这种“以酒酿酒”而酿造的水酒、烧酒，当是张孟玫诗“村醪如水”所指，亦即周亮工“淡而有致，与罗家错认水无异，闽酒当以此为第一”所指的了。其酿酒所用的糯米，以糙者为佳，糙糯米酿出的酒，其色清亮透彻，其味香醇甘甜。糯米愈白，则其酒愈浑。邵武传统的农家自酿糯米酒，以其色清味醇且后劲甚大深受各阶层人士的青睐，故而数百年来盛传不衰，至今仍“家家岁底火烟发，留酌元春贺客过”，是农家春节必不可少之物，难怪三百多年前的京官周亮工会给予“闽酒当以此为第一”的高度评价了。

邵武的许多乡村如洪墈和大埠岗镇杨家源村等至今仍保留将酒埋入地下数年作“窖酒”的习俗。洪墈一带酿造的红酒，若窖藏时间较长，则酒色发绿，粘如浆胶，异香扑鼻，若稍饮得多了些，竟能醉人几日不醒。

（傅唤民）

锁着轿门的花轿

邵武市民俗馆征集到一顶古花轿，制作精美考究，雕龙画凤，漆红描金，两扇轿门上分别浮雕“鸾凤和鸣”四个金色楷书大字，但轿门却是安有铜扣，可以上锁的。

当地的传统婚俗，迎亲花轿从男家启程之前，先要用油灯或蜡烛、镜子在轿内照三遍，或在轿内挂一面镜子，或在轿后挂一画有八卦图的篾筛（亦有花轿背面雕有八卦图），以此驱邪，然后用一把铜锁将轿门锁上。花轿从男家启程直至返回男家，轿门的锁始终都不可以打开。那么，新娘如何进入花轿呢？原来，花轿的顶盖是活动的，可以掀开，新娘是从轿顶进入花轿的。

花轿到达女家后，新娘由母舅（或叔、伯、兄）抱出家门，踏上花轿旁早已备好的长凳，把新娘从轿顶放入轿内。花轿回到男家大门外，亦不可着地，而是停放在预先备好的木架或谷桶上，等待吉利时辰，谓之“宿嫁”。吉利时辰一到开启轿门，新娘在伴娘的牵引下踏着铺好的草席或地毯进入男家大门，拜堂成亲。

（傅唤民）

江氏山庄的来历

邵武肖家坊镇境内的“天成岩景区”，被誉为“瑰丽而神奇的山水，梦幻般飘渺的仙境”。这里，奇峰林立，怪石连绵，鬼斧神工，天造地设，古人名之“天成岩”。天成岩满山的奇花异木，遍地是珍禽异兽。幽幽山谷间一条溪流，蜿蜒九曲十五里，丹山碧水，绿树红花，如一卷长轴山水彩画，古人名之“锦溪”，天成岩不仅有迷人的自然景观，还有古寺庙、古关隘、古崖葬、古窑址、古祠堂、古廊桥、将石山庄、江氏山庄等许多诱人的人文景观。

“天成岩景区”诸多的人文景观中，“江氏山庄”颇具传奇色彩。“江氏山庄”又称“南京堂”。说起来，它还很有一番来历。

清朝道光年间，大埠岗的江埠村有个大财主叫江东玉，家财万贯，良田千顷，还时常到南京做生意。他是个出了名的孝子，每次外出经商回来，都要把在外面见到的听到的新鲜事讲给老母亲听，特别是经常在老母亲面前夸耀南京的建筑如何富丽堂皇，南京的风景如何美丽，南京的街道如何繁华热闹。老母亲听得动了心，要儿子带她去南京开开眼界，见识见识。江东玉这下可为难了：这里到南京迢迢几千里，交通又不便，老母亲年纪那么大了，就是坐轿，一路颠簸，老人家也经受不起。但是，老人的这一愿望又不能不满足她。怎么办呢？他绞尽脑汁，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在风景秀丽的天成岩锦溪一带选择一块地方，仿照南京的各种建筑式样，建造一座“南京堂”。他特意跑了一趟南京，请名师绘画南京的宫殿、园林建筑的图样，回来就雇请了大批能工巧匠，按照图样建造“南京堂”。建好的“南京堂”，殿堂、亭阁、水榭、桥廊，样样不缺，就跟京城里皇帝的宫殿一样。他还在殿堂大门上挂了一块匾，上写“南京堂”三个金色大字。

“南京堂”，远远近近都知道，出了名。有好事者告到官府，说江东玉私建京城，要另立朝廷，图谋造反。官府不敢懈怠，飞速上奏皇帝。皇帝立即派出钦差大臣前来查办。

消息传来，江东玉吓坏了，他知道私造京城另立朝廷的谋反罪是要诛灭九族的。他苦思冥想，想出了个主意。他把“南京堂”那块大匾卸下来烧掉，又立马雇请石匠、杂工共一百多人，连夜加班，在“南京堂”对面的石壁上镌刻“江氏山庄”四个大字。这四个大字离地面有两层楼高，字大三尺见方，很醒目，老远就能看到。钦差大臣到来时，“江氏山庄”这四个大字也已凿刻完工。钦差大臣见到这四个大字，在附近转了一圈，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回到朝廷，他奏明皇上，说江东玉并没有建造什么京城，只是建

了一座“江氏山庄。”皇上没有治江东玉的罪，反而办了告状人的诬告罪。

（傅唤民）

白渚桥的来历

邵武城南关外有一座桥，叫白渚桥。它的来历在邵武民间流传着两种不同的传说。

第一种传说是，从前，南关外有一个老员外，膝下无儿，单生一女，员外非常疼爱这个女儿，视如掌上明珠。有一年，员外的这个千金小姐突然得了病，一病就是好几年，员外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俗话说：“病急乱投医。”这员外到处寻访名医，不知请过多少医师，也不知下过多少帖药，总不见好。员外又请神、问仙姑，驱邪做道场，什么办法都试过，还是不见效。他声称：谁能治好他女儿的病，重金酬谢！

他打听到有一个姓白的医生医道高明，就把白医生请来诊治。白医生开了一帖药方，嘱咐照这药方服一个月的药。员外每天照方抓药，二十几天过去了，小姐的病仍然没有丝毫起色，员外很失望。于是，他又慕名请来一位姓渚的医生。这渚医生看过小姐的病，又看了白医生开的药方，心中已经有数，知道那白医生对病症诊断准确，药也下得对。但他不露声色，开了一帖方子，告诉员外，只要照方服几天药，小姐的病就会痊愈。果然，几天后，小姐的病完全好了。员外高兴得不得了！送去百两黄金、千两白银酬谢渚医生。渚医生不肯收，说：“其实是白医生的功劳。白医生已经诊断出小姐的病症，他下的药也完全对症，只是还差几天

时间罢了！我只不过是按他的处方稍作加减，连他的药服满一个月，小姐的病自然好了！你还是去谢白医生吧！”

员外把这笔金银送给白医生，白医生说：“小姐的病是后来渚医生治好的，应该谢他。我不能收！”员外跑来跑去，两位医生推来让去，谁都不肯收。最后，还是白、渚两位医生提议，用这笔钱在南关外鹿口溪上建一座桥，方便来往行人。员外听从了两位医生的意见，在那建了一座桥。人们为了纪念这两位医生，就以两位医生的姓命名这座桥为“白渚桥”。

第二种传说是，明代神医李时珍有两个徒弟，一位姓白，一位姓渚。这两个徒弟很聪明又很勤奋，跟随李时珍十几年，李时珍很器重这两个徒弟，把自己的医术都传授给了他们，然后叫他们四出行医，为百姓治病。

一天，师兄弟俩来到邵武，遇见一家出葬，他俩避让到路边。棺材抬过他俩面前时，他们发现从棺材里渗漏出鲜红的血滴，向旁边的人打听，得知是一个孕妇难产而死。他俩从滴出的鲜血判断，那孕妇不是真死，赶紧跑到前而，拦住棺材，要求开棺医治。送葬的人谁也不相信他俩的话，不肯开棺，还把他俩赶走。棺材下葬后，送葬的人都离开了墓地，这师兄弟俩急忙挖开坟墓，打开棺材，抬出孕妇，给她扎针灌药。不到一个时辰，那孕妇鼻孔开始有气进出，眼睛也慢慢地睁开了。又过了一阵子，“哇”地一声啼哭，一个男婴生下了。他俩背起产妇，裹着婴儿，把这母女俩送回那家人家。那家人见到这死而复生的母子俩，真是喜从天降，对这师兄弟俩感恩不尽，拿出许多银两酬谢，可师兄弟俩怎么也不肯收。最后，还是师兄弟俩提议，南关外鹿口溪没有一座桥，来往行人很不方便，不如把这笔钱用来建一座桥，也算是行善积德。这家人听从了他俩的意见，建造了“白渚桥”。

（傅唤民）

黄伯思与《法帖刊误》

北宋黄伯思的《法帖刊误》，是一部专论《淳化阁帖》之误的专著。法帖，指的是摹刻在石（或木）版上的古人的书法作品，也包括它的拓本。这些书法作品通常都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成就，故又称法书，以便与名画对称。在古籍分类中，书法作品或论书法的图书多入子部艺术类。但由于法帖是摹刻在石版上，又与金属石刻上文字的汇集或考证联系在一起，故《四库全书总目》将这类书归入金石类，而附于史部目录类中，黄伯思的《法帖刊误》就属于后者。以内容而论，《法帖刊误》是一部探讨古人书法作品的专著，在闽人所著的同一内容的图书中，以此为最早。

黄伯思（1079—1118），字长睿，又字霄宾，号云林子，邵武人。祖父黄履，曾官资政殿大学士。黄伯思自幼警敏勤学，能日诵千余言。每听其祖讲论经史，便能复述与同伴听。十六岁入太学后，黄履欲以恩荫补其官，力辞。元符三年（1100）举进士，历官通州司户、河南府户曹参军、校书郎、秘书郎等职。

黄伯思是北宋著名的藏书家、金石学家和书画家。他学识渊博，经史百家，无不精通，对前代典章文物、古器款识的辨认考定颇有成就。善画，诗文亦工，书法自成一家，“篆、隶、正、行、草、章草、飞白，皆至妙绝”，片纸只字，为人所宝。

宋淳化三年（992），侍书学士王著编次摹刻秘阁所藏法书为十卷，名《淳化阁帖》。后书法名家米芾对此帖一一评其真伪，但多以己意断之，而缺乏考证。黄伯思任河南户曹参军时，在洛阳王珍家中见到此帖，深感其中错误颇多，乃复取米芾所定法书进

行刊误，因成《法帖刊误》一书。此书共二卷，分为十篇。一为帝王书；二为汉、魏、吴、晋人书；三为晋、宋、齐人书；四为梁、陈、唐人书；五为杂帖；六、七、八为王会稽；九、十为王大令。宋人评价此书谓："时秘府墨迹真赝杂居，（王）著不能辨也。……米南宫（芾）辨之十已得七八，至长睿，益精详矣。"《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其论多确……指摘真伪，率有依据"。

此书最早为单行本，南宋时其子黄讽将此书又编入《东观余论》一书中。今存《东观余论》宋刊本。丛书本则有《百川学海》本、《说郛》本、《四库全书》本等。

（方彦寿）

秋声亭与《秋声集》

凡到过邵武的人，无人不知这里有一座著名的古建筑——沧浪阁，那是后人为纪念南宋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严羽（号沧浪逋客）而建造的。而在邵武的熙春山上，历史上还曾有过一座秋声亭，是为纪念元代邵武的著名诗人黄镇成而建的，恐怕知道此亭的人就不多了。

黄镇成（1287—1362），字元镇，号存斋，邵武人。自幼力学，元延祐年间，两试不第，遂不复科举。筑南田精舍，从事著述和理学研究，著有《周易通义》、《尚书通考》诸书。至正二十二年（1362），被荐为江西路儒学提举，命下，不及拜而卒。集贤殿谥其为"贞文处士"。

黄镇成工诗，在当时即负盛名。时人称他"学行卓异，抱济世之材，不得志于有司……发为词章，雄赡富丽，如飘风行云，大

音希声，天籁自鸣”。其诗多忧时感事之作，而尤以山水诗成就最高。清初文坛大家周亮工对其诗颇为赞赏，云：“元季词人辈出，而邵武有黄镇成，诗多奇警，《秋声集》十卷，佳句迭出。”渔洋山人王士祯对其《秋风》、《李仲明秋山小景》、《五曲精舍》诸诗评价颇高，认为“甚有风调”。他的诗描写山川风物，寥寥数笔就能勾画出江南景色的独有风韵。如“红树夕阳蝉噪急，白苹秋水雁来多”（《秋风》）；“家住夕阳三峡口，人行秋雨二崤间；不知何处真堪画，移得柴门对楚山”（《李仲明秋山小景》）；“一江风起晚潮上，半夜舟行山月高”（《明州西渡》）等，都是其诗中的佳句。

《秋声集》是黄镇成的诗文别集，最早刻印于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是由当时任延平路（今南平）总管的将乐人氏吴文谊主持刊刻的。但尚未完工，明军入闽，刻本不传。现存最早的刻本是明洪武十一年（1378）其子黄钧刊刻的。题为十卷，因财力所限，仅成八卷而止。其中诗六卷、文二卷。此书现存的另一种较早的刻本是明嘉靖年间（1522—1566）邵武何望海刻本，仅四卷，有诗而无文。清顺治年间（1644—1661），周亮工驻节邵武，将此书与宋严羽的《沧浪诗话》合为《樵川二家诗》，刊刻印行。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诗人，周亮工又命当地建亭于熙春山侧，并以其诗集之名命名此亭，曰“秋声亭”。

（方彦寿）

杭川忆旧



乌君山（光泽县）

光泽县建置沿革

光泽县地处福建西北部，武夷山脉北段。全县地形近似一个由东北向西南倾斜的平行四边形，总面积2245平方公里，东邻建阳市，东北连武夷山市，南邻邵武市，西接江西省资溪县，北界江西省铅山县，西南与江西省的黎川县、西北与江西省的贵溪县毗邻。因城北有溪名“杭川”流过，故别称杭川。

光泽县境，春秋时期属越国，战国时期属东越。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消灭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七年后又取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增设了四个郡，光泽县境属闽中郡。汉高帝五年（前202）把秦代的闽中郡划成三个小王国，福建分给闽越无诸。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废除闽越王封号，另立无诸孙子繇君丑做国王，改称越繇王；另封余善作东越王。武帝元鼎五年（前112），余善拥兵拒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兴师入闽，平定余善的反叛。

三国时期，今光泽县境属吴国。孙吴先后五次派兵入闽。公元203年，孙吴在扫平闽北后，就移南部都尉于建安，驻兵八千余。同时又分东侯官之地为建安县，以属南部都尉。吴永安三年(260）孙休把南部都尉撤去，设立建安郡，包括建安、南平、将乐、建平（今建阳）、东平（松溪）、昭武、吴兴等七个县。光泽属昭武县。后来又加侯官、东安（南安、同安）两县，共为九县，自成一郡，不再隶属会稽了。这也是福建较早设立的“郡”。

西晋、东晋、南朝时，光泽仍属邵武县。唐武德七年（624），辟邵武北乡之地置洋宁镇，属建州邵武县。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改洋宁镇为财演镇，直至宋初。

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邵武设军，县为军治，同年财演镇升为县，为光泽建县之始。财演镇辖鸾凤、光泽二乡，取光泽为县名。元、明、清建制未变。

民国时期福建省行政区划变动较大。民国2年（1913），光泽属建安道。民国23年（1934），正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国民党为了便于“剿共”，8月将光泽县划归江西省管辖，隶属南城督察区。民国36年（1947）8月，复归福建省管辖，隶属第三行政督察区（建瓯）。

1950年2月17日光泽县解放，属建瓯行政专员公署。10月，专区迁址建阳，改称建阳地区专员公署。此后数十年间，虽专署在建阳、南平两地几经迁徙，但光泽县的隶属关系均一直未变。

（俞景明）

九关十三隘话光泽

方志载，光泽地理位置如“吴蜀之荆襄，江淮之雍丘”，“层岩盘亘，险阻并包”，一旦破关克光泽，顺水而下，“则八闽纵骑南下，可以驰骋倏翕”。因此，光泽古有“战城”之称。境内，武夷山脉北段屏于西，杉岭山脉横亘东南，山势陡峻，多在海拔千米以上，最高的香炉峰海拔1930米，又与江西接壤，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自唐、宋以来，在穿越山脉的通道垭口险要处，设九关十三隘。关隘之多，为闽赣交界诸县之首位。

关有关楼、铁门、城堞、炮楼、兵营、仓库、操场、水井、酒肆、客舍等等设施，由重兵把守；隘是平时沟通乡村之垭口，战

时屯兵设防之天险。光泽九关是西部的杉关、铁牛关，西北部分水关、山头关，北部火烧关、云际关、马铃关，东北部鸭母关，西南部王际坳关。十三隘是毛家隘、极高隘、杨公隘、岩岭隘、仙人隘、羊头隘、风扫隘、牛田隘、白虎隘、孔坑隘、台尖隘、蛇岭隘和金家隘。

九关之中，关口最高者为分水关，海拔1180米，而方圆数十里山峰皆为海拔1200米以上，狼牙交错，幽深莫测。古时原始森林无边无际，阴森恐怖，误入者不辨西东，如入“八卦阵”之“死门”。关始建于宋，因山脊水分东西流向，一汇闽水，一归鄱阳，故名分水关。

九关之中历史最悠久的是铁牛关和杉关，均建于唐广明元年（880）。

铁牛关原址大禾山铁牛岭，故名。清顺治四年（1647）迁今老鸦桥南三里处重建。咸丰三年（1853）因抵御太平天国军队，遵旨重修。其地势险阻，中凹成路，垭口嵌夹，垒土筑关，西北拱门顶勒石刻“铁牛关”三巨字。咸丰七年二月太平军某部号称三十余万破关克城，次年三月“黑旗兵”又过铁牛关。1933年2月，邵式平率中国工农红军一个师入关，沿江而下，直取顺昌洋口，果真“纵骑南下……驰骋倏翕”。

铁牛关以“闽省要冲”与杉关并重，但杉关古称“瓯闽西户”，或誉为“控四州之上游”，尚存“闽西第一关”石匾一块（长140厘米，宽50厘米）。因地处杉岭山脉源头，故名。杉关海拔在1000至1100米之间，关口左右的山脊存有千余米明洪武三年（1370）修筑的城垣。自南宋至清，驻扎或路过杉关的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军达二十余次。1367年朱元璋遣吴将、胡廷瑞入杉关，占领光泽，平定闽中。原来关门两侧有耳房、瞭望孔，关顶楼阁炮台耸立，关内营房井然。历代王朝军事家把它视为“天险可

凭，有恃无恐”之地，宋韩世忠、元王溥、明张楷、清许贞等名将所部皆奉旨守过此关。1922年蒋吴战争时，吴佩孚军驻杉关达四月之久。1933年，红军扼据杉关，出击黎川洵口，歼敌一个师。

马铃关、云际关在司前乡，东西两关相距十华里。马铃关始建于宋，东南诸筹岭有一平冈名跑马冈，可安营扎寨，驰马操武，铃响声传山下，故称。现存清咸丰三年所建关门，坚牢如磐。云际关亦为诸关隘中显赫者，始建于五代(907—960)，关口海拔780米，因近云际村而得名，而云际村则因“高与云齐”而得名。有太守夏英赋诗夸其形胜：“五马趋朝光泽过，山行惟见石嵯峨。孤村梦断三更雨，一路魂惊万仞坡。云际峰疑登太岳，鹧鸪岭可挽星河。鹏程九万曾经历，争似崎岖此地多。”1857年3月31日(阴历三月初六)，太平天国杨辅清、杨义清、胡寿阶等率十万太平军入云际关，取道光泽攻占邵武。

火烧关、山头关在寨里镇。民间传说杨六郎为“安抚南蛮”，曾放火烧山，故名。现仅存垭口而无旧迹。山头关因村得名，始建于宋。关口雄踞于悬崖之巅，关内山重水复，山山耸立成势，处处似关如卡；关外天宽地阔，纵目千里，咸归于山口；关北峰回路转，过“一线天”见操兵场，传说为穆桂英习兵练武之地。山奇水秀，峭壁危崖，真是鬼斧神工。1949年，国民党溃军退守关口，图借天险，负隅顽抗。但败局已定，不堪一击，翌日即乱如汤浇蚁群，狼狈南逃。

鸭母关在司前乡岱坪村东北五里地，仅存垭口无关卡。因山脊如鸭引颈呷水而得名。

王际坳关位于城关大羊村南去十五里与邵武交界的广山上。据传关外的邵武下畲等村居民多为少数民族，富有反抗精神，官府畏之，因设此关。

九关十三隘，除王际坳关建在福建省境内，其余均在闽赣两

省交界处。

（俞景明）

奇峰怪石乌君山

光泽乌君山在城东30里地，俗称玫山、猴子山，属于武夷山脉中段，北南走向，自古颇负盛名，早在汉唐时代就是我国东南的一座名山。最高峰海拔1477米，大小山峰三十余座，方圆四十余里。城区东望，山巅兀立一巨石，酷似孙猴王雄踞云端守卫着闽西北山门。

北宋李昉编纂的《太平广记》中记载说，乌君山是建安的名山。传说有一个名叫徐仲山的道士，一心一意访仙求道，曾至乌君山。一日，遇上了一场狂风暴雨，忽于闪电之中见一豪宅，从里面走出一位肤体须发皆白、一身仙风道骨的老翁，招徐仲山为婿，与其小女成亲。原来府中男女皆乌鸦、鹘鹞所变。这是一个优美动人的人鸟联姻的传说。

乌君山青山削翠，群峰兀立，古木参天，风光奇特，名胜古迹很多。著名的有杯玫峰（大猴峰、小猴峰）、乌君洞（红军洞）、飞泉岩、会仙岩、宝盖岩、香炉峰、白壁峰、仙桥石、老人石、仙猴石、飞剑石、风动石（三叠石）、美女石、小石林、夫妻崖、仙女池、蝴蝶泉、仙人担、操军坪、三十三天、巨蟒出洞、神龟下山、群羊下坡、虾蟆望月、文笔插天、玉龙古刹、齐天庙、君山霁雪、仙岗暮霭等等。古代文人名士游乌君山题诗刻石较著名的有19人，留下许多异彩纷呈的诗篇。

乌君山下原来有十来个小山村，早在1930年就开辟为闽北革

命根据地(光泽解放时发现红军洞中尚留有洞口围墙掩体、枪支等物)。1932年成立了坪溪乡苏维埃政府,红军长征后,这里是光泽、邵武、建阳三县最活跃的游击区,遭到国民党军队残酷烧杀和疯狂掠夺,村庄几乎荡然无存。解放后在这些废墟和荒地上办起了国营坪溪农场,并修筑了简易盘山公路,汽车可通到乌君山腹地。

(俞景明)

茅店宋窑遗址

茅店宋窑遗址坐落在光泽华桥大禾山的茅店村,1955年4月修建鹰厦铁路时首次发现,经过国家有关部门和福建省博物馆的多次调查研究,认定茅店瓷器具备南宋风格,它的全盛阶段应是南宋时期,所以也叫茅店宋窑遗址。

茅店宋窑遗址现存九谷松山坡和张家山山坡两处,主要堆积层长15米,厚8米,零星部分不少。瓷器的釉色有青白、黑和青三大类;品种有碗、盘、碟、杯、炉、钵、盒等;烧制的方法有支圈复烧、垫座叠烧和匣钵仰烧等;器皿内外装饰花纹图案的题材有牡丹、盆花、莲荷、双鱼、飞凤、飞鹤、芦鸭、杜鹃、蝴蝶、草等等。

青白釉器形状有侈口弧壁碗、折口浅底盘、敞口平底洗、折口浅底碟。胎骨坚白细腻,形体透光,如水似玉,与景德镇青白釉器"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的"媲假玉"相比毫不逊色。图案的画面新颖别致,优美动人。

黑釉器均为小碗,仿制建盏(建阳水吉窑),但有所不同。建盏足近实,茅盏多内挖成卧足,或称假圈足;建盏胎体灰黑,茅

盏灰白结实，均更高一筹。

青釉器以偏黄的居多，有牙黄、土黄、青黄等。受浙江龙泉青瓷影响，可称“土龙泉”。

宋元时期，我国南方的瓷器工艺以景德镇白瓷、建阳黑釉瓷、龙泉青瓷为三大系统，根据专家鉴定，光泽茅店宋窑的工艺，恰是博取三家之长，独具匠心，创造出有自己特色的精美产品，因此能够畅销海内外。

1976年在南朝鲜新安海域打捞出一艘中国元代沉船，上有一种侈口弧壁芒口青白釉碗，内壁横印六格盆花，完全与茅店同类窑器物相似。专家认为，当时茅店窑青白釉瓷极可能作为贸易品种远销海外。1982年，中国古陶瓷和外销陶瓷学术讨论会上，香港中文大学屈志仁先生在他的学术论文《宋元时期的福建陶瓷》中指出：“光泽茅店窑也烧制黑釉钵，但胎色是淡黄色或者是白色的。这在香港和苏门答腊的哥打贾内都有发现。”这些考古发现可以证明宋元时期茅店瓷器由于工艺独特、技术精湛而远销异地，为海内外人士所青睐。

（俞景明）

汉畲同邑，婚俗迥异

光泽是个多民族的县邑，汉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97.78%，其余是畲族、苗族、回族、壮族、满族、布依族、白族、侗族、土家族、瑶族、蒙古族、阿昌族等13个少数民族，其中畲族占总人口2.03%，散居北路司前乡、寨里镇山区地带。汉族是光泽祖居民族。畲族为明代从南京经江西迁入的，据传刚来时仅19人，经

500多年繁衍已达3000多人，他们在长期的劳动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民族语言和文化传统，与汉族迥然不同。光泽的畲族虽然人口不多，但他们在与汉族兄弟长期共处中，仍能按照自己民族的习俗生活，并代代相传，这种传续也表现在男婚女嫁的传统婚礼仪式上。

光泽汉人旧时婚嫁，青年男女没有自主权。大概男20岁、女18岁时、便靠“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说亲议婚、订婚而后结婚，即封建包办婚姻。

议婚是男方父母请媒人到女家说亲，女方父母同意后，又先由男家写好庚帖，用红纸写好男方出生年月日，也叫“生辰八字”，交送女方“压八字”，请算命先生合婚。如男女双方“八字”相宜，便把庚帖压在大堂案上香炉下，只要七天内女家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即可定亲，否则退回庚帖。订婚时，男家除办订婚宴外，还需备办订婚宴席的食品、衣服、首饰等表示婚姻的信物送给女家。结婚日期是由男家提出，写庚帖征求女家同意。女儿出嫁前一天要到家庙或祠堂朝拜祖宗（谓辞嫁）。迎娶前，男家要备好女家全部宴席货物（也可折现金）和聘礼，由媒人陪同男家一人送到女家。迎娶日可根据男家的经济条件，备花轿、请吹鼓手去迎新娘（称接新人）。新娘坐在花轿里和陪嫁的嫁妆一路吹吹打打到男家。陪嫁的嫁妆，一般多是被、枕、箱、笼，特别不可少的是马桶和火笼。富户人家除此以外，陪嫁的麻线和衲鞋的麻绳都有四五十斤，甚至还有田租、金银和婢女。有钱人家新娘坐的是四人抬的木质彩色“花轿”，没钱人坐的是两人抬的竹质“住家轿”。

按结婚风俗，轿子来后要举行一系列仪式。每个仪式中，不仅配备有两位已婚的中（或老）年妇女（称之为“老娘”）和一男一女的儿童（称之为“金童玉女”）陪伴和牵扶新娘子，而且还配

备有一位司仪先生，呼喊诗歌，以示喝彩，增加喜庆气氛，并引导新婚夫妻按严格的习惯程序完成婚礼。

畲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男女交往公开，婚嫁之权虽操父母手中，但不过虚名而已，实际并不干涉。所以畲族男女自古婚姻自由，五代外可以同姓结婚，且喜欢招婿入赘，但不与汉人通婚。婚礼简朴，结婚之日，待天黑后新郎来迎娶。不点灯，不坐轿，新娘步行到夫家。也有新郎、新娘共撑一把伞，并肩同行，沿途新郎唱，新娘和，歌唱不已。嫁妆都是农具，寓共同耕作之意。陪首饰、衣服的不多。畲民乡亲来贺喜，也是以歌代礼，单唱、对歌、合唱，直唱到天亮。总之，畲族人从相亲、行聘、迎娶到婚礼，都离不开歌。如新娘离开娘家时告别爹娘兄妹要唱《别亲歌》，新郎到女家接新娘，席上要筷子，则唱《筷歌》，要酒，则唱《酒歌》，唱一物，司厨者和之，其物则一一应声而出。吃完之后，同样以一首首民歌，把席上碗碟筷子酒杯一一唱回去。吃合欢酒、进洞房、迎新娘、闹洞房、宾客喝酒等等，均有各种仪式，各种各样盘歌对唱，可以通宵达旦地唱下去，喜气洋洋，热闹异常。

民国时期，畲汉通婚渐多，解放之后更为普遍。不少畲民从高山深处移居平地城镇，参军、上学的很多。党和政府在畲民中还培养了不少优秀干部。移风易俗，婚礼仪式也随之改变不少。

（俞景明）

光泽擂茶

擂茶，是光泽县农村人常用的饮品，也是待客和聚会的上好

饮料，自古以来就非常有名。

光泽的擂茶，是用本地产的最好茶叶，加米、豆、花生、芝麻以及中药的陈皮、桂枝、甘草等，放进土制的擂钵里用擂棒细细地擂成泥状，然后用山泉冷水浸泡或用开水冲泡都可以，讲究的人家最后还用笊篱过滤一遍。泡出的茶色棕红，味清醇，香气清溢，喝后甘甜在口，而且提神舒气，怡心养体。当地人讲究夏天冷饮，冬天热喝，长期饮用这茶，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光泽农村长寿老人相对高于其他地方，不能不说与长期喝这茶有关。许多老人从小喝擂茶，活了八九十岁都很少生病。光泽过去很穷，人们看不起病，都是靠喝擂茶，患什么病就在茶中加对症的草药，不找医生，大人小孩都一样喝擂茶治病，所以这茶又叫“药茶”。

（王建成）

光泽灯舞多姿多彩

在闽北光泽，多姿多彩的民间舞蹈之花遍布城乡，历代的民间艺人留下精湛的艺术瑰宝，至今脍炙人口。其中，最有名的是广泛流行民间的灯舞，尤为独具特色。

灯舞，为民间道具舞蹈。光泽的灯舞中，主要有龙灯舞、狮子灯舞、茶灯舞、马（仔）灯舞、蚌壳灯舞、船（仔）灯舞、花灯舞等十余种。这些灯舞在当地世代流传。每逢节假日、喜庆日、丰收年，光泽山城就沉浸在一片灯舞中，呈现一派欢乐的气氛。常有许多有名的夫妻班、父子团、灯舞队四处表演。解放后更有民间艺人以灯舞参加大型的民间文艺会演，载誉归来。

光泽的龙灯舞，相传始于明初。朱元璋打败元军后，一统天

下，第二年传谕，元宵普天同庆，官民同乐。一时上苍闻讯，派百凤来朝，九龙来贺，京城上空，龙腾凤翔，云蒸霞蔚。当朝丞相刘伯温速命宫中高手匠人制作龙灯，并训练一班舞龙卫士，每逢朝廷盛事，就点灯舞龙，庆贺一番。以后传到各地，光泽也不例外。光泽年年都搞灯会，且以龙灯为主。光泽的龙灯，灯眼饰灯火，张口昂首，龙身为竹木架，罩上或绸、或布、或纸制作的龙衣，涂以各种色彩，节节有灯。龙舞又分龙灯舞、香火龙舞、纸龙舞等等，舞龙人数视龙身长短而定，一般在八至十六人之间。舞者均要身强力壮，头系方巾，身着彩衣，随龙舞的节拍和锣鼓的节奏，使龙上下翻腾，左盘右旋，龙形、龙态、龙声、龙色表演得淋漓尽致。例如常使一个球灯前面引路，逗引龙随球走，此即有名的龙戏珠。此外尚有扭丝龙盘柱、蜕皮、车水、九龙摆尾等表演名目。

狮子灯舞，据说是一位通武术的玩龙灯艺人，带一班徒弟到处舞龙灯卖艺，操得一手精湛的技艺。后来他请匠人制作狮子，两只眼睛安上灯火，又根据狮子的特点，结合许多武术动作，创编了一套走步和动作独特的狮子灯舞。灯舞模仿狮的形态，在锣鼓节奏中，通过扑、腾、剪、绞、翻、滚、立等动作，将狮的威猛神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茶灯舞，流传于光泽县的上屯。据传当地有一位采茶姑娘名叫茶妹，能歌善舞，因其相爱的人给官府抓去当差役，她日日登山而望，夜夜梦郎归来，便边采茶，边歌舞。久之，形成独特的茶舞。茶灯舞有单人舞和群舞之分，由采茶少女头戴包巾，腰系围裙，手挎茶篮灯，在锣、鼓、钹与二胡、笛子、唢呐的伴奏下，唱着优美的采茶歌，翩翩起舞。其动作融合各种采茶姿态而成，舒展大方，与唱词合拍，似听、似讲、似唱、似采、似演，情节丰富动人。

马（仔）灯舞，源于光泽县的崇仁。相传太平天国时，石达开带兵进光泽杉关，老百姓创作了一种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的灯舞。舞蹈通常由男女青年各四人，另有一皇帝（或大官）、一马前卒表演。每人胸前绑一个伸出的纸糊竹架的马头，背后做一个马尾部，涂上各种色彩，手执一马鞭，以示骑马。皇帝（或大官）为高头大马，色彩浓重，以示有别其他的马。此舞带有戏剧性，有穿插、回旋、奔跑等一套程式。念腔、唱腔为采茶戏的曲调，伴奏乐器有锣、鼓、钹、钵、二胡、笛、唢呐。内容多反映各种社会现实生活。

蚌壳灯舞，其来历有一个动人的民间故事。相传从前有个青年打渔郎，有一天，他打鱼时捞上一个金光闪闪的大蚌，他为之惋惜，叹一口气便将蚌放回水中。当晚回家时，发现房中坐着一位美丽的姑娘，她说自己乃是那只蚌所变，因见他诚实忠厚，所以愿嫁给他为妻。后来，他们果然相亲相爱，日子过得很美满。每天他们都打很多很多的鱼，除自己吃外，还送给贫苦的乡亲。后人为了纪念这对渔郎、蚌女，编了这个独特的舞蹈。蚌女由年轻姑娘装扮，用竹木色纸扎成大蚌壳，装上灯火，随着打击乐和口仿风波声滚动上场，表演赶水、逗渔郎、整妆等舞姿；渔郎则头戴竹笠，身披棕衣，手拿渔网、渔篓，在追逐蚌女。动作亲昵，步伐缓慢。蚌女之蚌壳一开一合，唱词清晰动人，你唱我和，表现蚌女大胆、调皮，而又羞涩地向渔郎吐露爱情，情节感人。最后以渔郎网罩住蚌女而舞终。

船（仔）灯舞，又为旱船灯舞，由划龙船演化而来。旱船为竹扎纸糊，涂以各种彩色，装上灯火，一条一条相接相旋。船中人扶船而走，不设板、桨。行船有一定的规则，表现遇浪、平行、触礁、停船等各种细节。船中人边表演边唱，伴奏为锣鼓，唱词、曲调乃俚歌渔唱，相呼相和，富有情趣。

花灯舞，乃花篮灯舞。舞者手提各种花篮，以各种纸花卉，布在其上，装上灯火。由成群的少女，身穿盛装，手挽花篮，唱着优美的当地小调，踩着舞步，边唱边舞。

（王建成）

理学世家“李氏七贤”

唐咸通年间，建州（今建瓯）刺史、浙江建德李家村人李频因病殉职任上。天复年间，其子扶柩归葬，途经光泽，遇战乱道阻，卜葬于城郊乌金洲。从此子孙在此地繁衍，称乌洲李氏。李氏家族世代重文，多有建树，两宋期间县人应试考中进士的 22 人中，李氏子孙占 9 人。在读书穷理的良好家风影响下，从北宋皇祐到元朝至正的 300 年间，逐渐形成了一个很有名望的“乌洲李氏理学世家”，其中继承杨时、朱熹之学，在理学研究上造诣颇深的有李深、李郁、李吕、李闳祖、李相祖、李方子、李应龙等七人，被誉为“乌洲李氏七贤”。

李深（1049—1108）字叔平。熙宁九年（1076）进士，初任州县官，后调升编敕所任职。因反对权臣蔡京、章惇被降官一级，以宣奉郎（从七品）外调。绍圣四年官复奉直郎任甘肃通远军通判。元符间，又上书痛斥章惇、蔡京任人唯亲、欺君误国罪行，连遭迫害，罢官回乡。宋徽宗即位后，为“消释朋党”之争，重新起用李深为司农寺丞。过二年蔡京当国，大肆迫害元符末年上书揭露他们罪恶的人，李深被开除名籍。第二年，与陈瓘、任伯雨等又被划入元祐党籍，受尽残酷打击。崇宁五年党禁解除，恢复官职，两年后病卒于江苏海陵官署，朝廷赠以朝散大夫。夫人陈

氏，沙县人，著名理学家、左司谏、权给事中（谏议大夫）陈忠肃（瓘）之妹，受封为安仁县君。李深遗著有《杭川集》二十卷传世。

李郁（1085－1150）字光祖，李深子，学者称他西山先生。少时游学太学，曾以乡荐参加礼部进士考试，未及第。绍兴初年高宗有意中兴大业，派御史朱异遍寻四方遗逸，发现李郁德才兼备而举荐于朝廷，受高宗召见，称赞他“居山林，论事何娴也”，“学通世务，议论可采”，任他为右迪功郎、敕令所删定官。不久因母亡离任。居丧期满，逢朝中秦桧为相，自思难与共事，弃官不出，便在光泽县西大陂建一西山书院，读书讲学。李郁从小跟随舅父陈瓘读书，二十多岁时到余杭（今杭州）拜程门四大弟子将乐杨时为师。杨见他谈吐不凡，才华出众，即以第三女许他为妻。郁独取《论语》、《孟子》诸书，苦读18年，欣然若有所得，深为杨时赞许。著作有《论孟遗书》、《易传》、《参同契论》、《李西山文集》、《古杭梦游录》等，是龟山先生学术思想重要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之一。朱熹对李郁评价很高，说：“熹少好读程氏书，年二十许时，始得西山先生所著《论孟遗书》，读之又知龟山之学横出此支，而恨不及见也。”

李吕（1122－1199）字滨老，号澹轩。李郁的侄儿。少时从叔父精研龟山之学，40岁后放弃科举考试，专事理学研究，著书立说。他对《资治通鉴》、《易经》研究尤深，写有论文数百篇。著作有《周易义说》、《澹轩集》十五卷。绍熙初年在光泽仿效朱熹推行社仓法。朱熹对他十分推重，信中赞道：“今世之学，幸得诸先生之先倡，指示要途，以翅圣贤之域……今足下之学之传，远有端绪……”南宋淳熙六年（1179）两人初会于庐山，一见如故，引为讲学挚友。绍熙四年（1193），光泽社仓建成后，朱熹特为撰写长篇碑文《新建社仓记》。其子闳祖、相祖，都是朱熹的高足。

李闳祖（生卒年不详），字守约，号纲斋，宋嘉定四年（1211）进士。初任静江府临桂主簿，后为古田县令、留佐广西安抚使幕干。幼受家学，后从朱熹，随任研究学问，传道讲学不辍。他是最早将闽学传至桂林地区的一位理学家，史载："桂士之知有正学，自闳祖始。"与朱熹多有通信，同门黄榦、李燔、张洽、陈淳等都非常敬重他。著作有朱熹命编的《中庸章句》、《或问辑略》十卷。

李相祖（1166—1232），字时可。一生不愿为官，幼受家学，后为朱熹门生。平时雅言矩步，见者肃然起敬，都认为他不愧家传，不负师门。著作有受朱子命编的《书说》三十卷。淳祐十年，直龙图阁叶武子取《书说》进呈理宗，赠李为宣教郎。

李方子（1169—1226），字公晦，号果斋。宋嘉定七年进士，廷试第三，授泉州观察推官、国子监学录。后因丞相史弥远中伤，被劾罢官，奉祠而归。外出为官时间短，在家读书讲学时间长。祖父李吕，父绍祖。方子幼随李吕学，深得所传龟山之学的要领；后从朱熹，博学能文，深通程朱之学。学官李道传、名臣牟子才、真德秀与他为友、拜他为师。归家后在少年读书的云岩书院倡道讲学，学者慕名而来不绝于途。他对朱熹学术的研究被誉为"独深其奥，尤精其粹"。著作有《禹贡解》、《紫阳年谱》三卷、《传道精语》三十卷、《清源文集》四十卷等。

李应龙（1294—1355），字玉琳。他一生未涉科举，深居西山书院，承理学渊源，接李郁家学，穷究儒家经籍，博学能文，节操高尚，为时师表。（后）至元年间使者慕其名节，先后推荐他出任白鹿洞山长和漳州教授，均被辞谢。著作有《春秋纂例》、《孝经集注》、《四书讲义》等，这些著述对理学的研究均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李氏七贤"上接先圣之心源，下衍一线之道脉"，为古代哲学

研究做出卓越贡献，后来县人把他们同祀于乡贤祠。

（俞景明）

方志学家高澍然

清代中叶福建著名方志学家高澍然，字时野，号甘谷，晚号雨农，光泽县城人氏。生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父高腾，乾隆四十二年举人，曾任福鼎县训导，十分重视以汉学训育当地学生。澍然自幼受家教影响，好学进取，读儒家经籍，常取《说文》诸书，对照分析，以扩大它的内涵，寻求新义，联系身心实际，身体力行，因此学问日进。嘉庆六年（1801）选为拔贡，同年乡试录取为举人。嘉庆十年（1805）礼部会试后任职内阁中书，半年后调任侍读。但因澍然自认“治身心自远名利始”，从小淡泊于名利，以为官场酬酢，不利于做学问。又因父卒，自恨远宦不能尽孝，便决意辞官回故里。在光泽家乡倡修孔庙，掌教书院，建义仓，修城墙，热心公益事业，并在家中专心致力于古文和儒学经籍的研究。他对唐代韩昌黎的文章非常爱好，细心研读达30年之久，精通它的义旨和写作要领，辑成《韩文故》一书，成为当时研究古文学的一大宗师。

清道光九年（1829），高澍然应福建总督孙尔准和《福建通志》总纂陈寿祺之聘，与陈池养、张际亮等17人为分纂，参加纂修《福建通志》。道光十四年二月陈寿祺去世，五月，高澍然继任总纂。当时通志已大致编纂就绪，即将脱稿付印，但因有人从中作梗，致使《福建通志》迟迟不能刊印，于是高澍然愤而辞职。

道光十五年高澍然回到光泽后，县令胡国荣、觉罗永安先后聘他纂修《光泽县志》。道光二十年，他纂成《重纂光泽县志》三十卷。

高澎然自幼聪明好学，为文不随人见，文才过人，品行高洁，是个有成就的史学家。著作有《春秋释经》十二卷、《诗音》十五卷、《诗考异》三十卷、《易说》十三卷、《论语私记》二卷、《韩文故》十三卷、《李习之文牍》十卷、《福建历朝宦绩录》四十卷、《闽水纲目》十三卷、《抑快轩文集》七十三卷、《河防三编》各一卷等。道光二十一年（1841）病卒于家，享年68岁，县人奉祀他于乡贤祠。

（俞景明）

连捷七年三太史

清朝中叶，在离县城120多里、位于闽赣边界的山巅上的一个叫新丰村的小村庄，出了三个同胞兄弟龚文焕、龚文炳、龚文辉，并由此引出一段“连捷七年三太史”的文坛佳话。

清嘉庆十八年（1813），文焕、文炳俩在府县考试中双双获选为贡生，被誉为“一科双拔”。同年乡试，文焕、文炳、文辉三兄弟以“同榜三魁”同时考中举人。在这以后七年的朝考殿试中，三兄弟又以“连登进士”、“叠选词林”，荣膺三进士、三翰林的桂冠。嘉庆皇帝为了褒奖这三兄弟，激励后人奋进，赐旨在“三龚”的家乡建造石牌楼一座，牌楼横额刻有“三凤齐鸣”四个大字。牌楼两边的石柱上刻御赐对联四副：正面中联是：“辟五百年之天荒，一彪独踞；冠十八省之人杰，三凤齐飞。”边联是：“连兄连弟连

登进士；同榜同魁同选词林。”后面中联是：“同怀半载五登科，杭北家声第一；连捷七年三太史，斗南人杰无双。”边联因牌楼被毁无以查考。皇帝垂恩褒奖，一时间“三龚”兄弟名驰朝野，誉满京华。从此乡人把“三龚”喻为人中凤，把赐建的牌楼叫成“三凤齐飞”牌楼，真所谓“山窝窝里飞出金凤凰”。

据志书载，“三龚”兄弟的祖父龚周德，乐善好施。父亲龚懋，清乾隆六十年（1795）举人，他治学严谨，对文焕兄弟的教育极为严格，所以个个成为栋梁之才。

龚文焕（1784—1848），字广才，一字伯耀，号霞城。历任翰林院检讨、文渊阁校理、武英殿纂修。道光八年（1828）任顺天府（今北京）乡试同考官。道光十二年任会试同考官、江南恩科副主官。道光十四年京官考核名列一等，特授江南名郡镇江知府，诰授朝议大夫，连任八年府尹。道光二十二年因双亲年老辞官归里。在乡家居因两弟年轻早逝，不及大用，积郁在心，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与老父同年同月病卒于家，终年 65 岁。

龚文炳（1785—1826），字翘才，一字仲彪，号虎观，一号晴澜。自幼聪颖好学，熟通经史百家之书，兼工书法，学习满文，名列第一。嘉庆十九年进士，殿试朝考入选第七名，钦定翰林庶吉士。卒于汉阳，终年 42 岁。

龚文辉（1787—1828），字异才，一字叔光，号黎堂、鉴湖。文辉 5 岁入学，9 岁能文，嘉庆十八年秋，他年 27 岁，与两兄同时乡试考中举人。嘉庆二十五年在进士殿试中获二甲第一名，钦点金殿传胪，选为翰林院庶吉士。道光元年朝廷对他加官二级，授以承德郎（正六品）。道光四年到江西主讲鹅湖等书院。道光八年九月，奉调到翰林院供职，赴京途中不幸病卒于粤东，年仅42 岁。

宣宗至晚年尚念念不忘“三龚”兄弟卓著功名，道光三十年

特御赐“广厦资扶”匾额，悬挂在新丰龚家大院正厅中堂。

（俞景明）

何秋涛和《朔方备乘》

何秋涛是清代后期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所著《朔方备乘》一书，是我国边疆史地学方面的名著，在历史上曾产生过重大影响。

何秋涛（1824—1862），字巨源，号愿船，光泽人。祖父何长敦历任河北新城、盐山、饶阳、博野等县知县。父何高华受封朝议大夫。母亲上官紫凤知书达礼，擅长诗词，秋涛幼年所学四书五经，均由其母教授。

秋涛童年独钟史地，披阅天下舆图，能历举府、厅、州、县名称，默数它们四境所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中举人。二十七年举进士，被授以刑部主事。刑部尚书器重他的才能，举为律例馆提调、秋审廷坐办。当时刑部所撰《律例根源》多由他手定。

秋涛登进士第后更加刻苦读书，研究学问。他倾囊购书数万卷，日夜吟诵，对经史百家之文，事物之理，认真考证分析，究其原委，较其异同。并且常与何绍基、张穆、陈庆镛等在京的名流学者讨论、切磋，治学态度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以实用为本，“专精汉学”，“于经史小学，靡不研究，而尤长于舆地”。

咸丰三年（1853），秋涛随侍郎李嘉端巡抚安徽，不久因父南归，他也辞职随父归里，任劝捐京米兼邵属五书院讲席。后因太平军攻打福建，光泽动荡不安，又携带眷属回到北京，专心致力于经世之学的研究，尤其注重边疆史地的研究。中俄边界犬牙交错，长达万里。当时沙俄的侵略政策时刻威胁着边境的安宁。鸦

片战争之后，边疆史地学的研究成为当时重要的学术课题，在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两部地理巨著问世之后，何秋涛不辞辛苦，广搜官私载籍，精选历代正史、中外舆图及稗官外纪等著述中有关北部边疆的史料，进行分类排比和考订而成资料汇编，取名《北徼汇编》。

《北徼汇编》全书八十卷、例目一卷。前十二卷录自“圣训”、“圣藻”及钦定《平定罗刹方略》、《清一统志》、《皇朝通典》、《皇朝文献通考》、《大清会典》等材料。其余六十八卷，分为圣武述略六、考二十四、传六、纪事始末二、记二、考订诸书十五、辨正诸书五、表上及图说一卷，详细记述了自汉、晋至清道光时期我国蒙古、新疆和东北地区的历史、地理和中俄关系诸问题。该书不局限于蒙古及西北地理，而是以北方边界与俄罗斯有关联者为范围，叙及东北边疆，对俄罗斯西伯利亚及中亚东欧之地，俱有考证。对汉、唐、辽、金、元历代北方边界用兵，清初中俄交涉等都有记述。书中最有价值者乃有关中俄关系的论述，主要篇章有《北徼界碑考》、《艮维窝集考》、《艮维诸水考》、《库叶附近诸岛考》、《俄罗斯学考》、《俄罗斯馆考》、《俄罗斯互市始末》、《俄罗斯进呈书籍记》等，具体记载了清初沙俄向我东北边境扩张和中国政府反侵略斗争，以及中俄两国人民早期友好往来的历史情况，对中俄山界、水界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考证，“先绘成俄国全图及中俄分界图，与是书相辅而行，俾览者有所考焉”。

当时沙俄是我国北方最大的敌国，边界延袤，错综复杂。为巩固北方边防，有必要弄清边界的历史和现状。兵部尚书陈孚恩和翰林编修郭嵩焘认为该书对研究中国北方边境很有价值，于咸丰八年进呈朝廷。文宗皇帝阅后大加赞赏，在咸丰十年正月二十四下达内阁的谕旨中评价：“此书于制度沿革，山川形势，考据详明，具见学有根柢。”赐名《朔方备乘》，并预备召见何秋涛，赏

加员外郎衔，赐在懋勤殿行走。后因局势紧张而未兑现。何秋涛在京师租房居住，过着贫困的生活，有时一天两餐都难以为继，然安贫乐道，讲学、读书从不间断。同治元年（1862），楚南编修黄彭年推荐他到保定莲池书院就教，不久病故，年仅38岁。保定人士将其安葬在西郊马池村。

（俞景明）

一家三位女诗人

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刑部主事光泽人何秋涛一家出了三位才气横溢的女诗人，百余年来被邑人津津乐道。

上官紫凤，字灵仙，何秋涛之生母。她秉性娴静慧敏，深通儒家经义。秋涛幼年所学的《四书》、《五经》，均由她亲口传授。紫凤酷爱古诗词，尤其喜欢汉魏乐府，对唐宋及明初诸家诗作也常读不厌。她终日除下帷读书写诗外，还精于针绣。道光二十四年（1844），秋涛在京为官，她随秋涛到京居住，曾经手织一幅“金鳌玉蛛并山川锦绣图”，在诸官眷属中传观，被叹为“神针”。上官紫凤的著作有《八角楼诗集》十二卷、《岐园标雅诗余》四卷。道光二十六年封宜人，道光三十年封恭人。

何淑苹，何秋涛之姑母，生于嘉庆十五年（1810）。淑苹自幼好诗，并且随父遍游古吴越齐鲁燕赵等地，见多识广，开阔了诗境，每到一处必有诗篇。她还爱好音乐，能操琵琶、古筝、古琴多种乐器。何淑苹经常与上官紫凤切磋诗艺，姑嫂两相唱和，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写景抒怀的优美诗篇。她的作品由清朝著名诗人张际亮选定，刊印成书，书名为《琴北诗钞》。道光版《光泽县

志》录有她的五言绝句《望乌君山》一首："欲识春山态，时登小阁看。白云浮翠速，晨气逼烟寒。"

何如兰，何秋涛之姐，也是一位早慧卓越的女诗人，由于婚事不如意早夭，留下诗著《绮余阁诗稿》四卷。

（曾素萍）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闽北掌故
作者=
页数=352
SS号=0
出版日期=
Vss号=68530527